DEMAND FULL AUTOMATION

DEMAN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EMAND THE FUTURE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Nick Srnicek
Alex Williams

VERSO

创造未来

这本电子书被授权给一些随机的，random@mailinator.com在04/01/2016

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

后资本主义和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

尼克·斯尼切克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2015年由Verso首次出版Nick Srnice
©k和Alex Williams 2015年

版权所有

作者的精神权利得到了维护

13579 108642

Verso
UK:伦敦米德街6号WIF OEG美国:纽约布鲁克林
杰街20号1010室11201
www.versobooks.com

Verso是新左派图书的印记

ISBN-13: 978-1-78478-096-8 (PB)
eISBN-13: 978-1-78478-098-2(美国)
eISBN-13: 978-1-78478-097-5(UK)

大英图书馆出版资料编目
这本书的目录记录可从大英图书馆获得

国会图书馆出版目录数据这本书的目录记录可从国会图书馆获得

由Hewer Text UK Ltd，爱丁堡，苏格兰，以Electra LT标准排版，美国由Maple Press印刷

这本电子书被授权给一些随机的，random@mailinator.com在04/01/2016

目录

致谢
引言

1. 我们的政治常识:介绍民间政治
2. 为什么我们赢不了?对当今左派的批判
3. 他们为什么会赢?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形成
4. 左派现代性
5. 未来行不通
6. 工作后的想象
7. 新常识
8. 建设力量

结语

备注
索引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Acknowledgements

这本书不是两个人写的，而是很多人写的。我们要感谢他们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的协助:Alex Andrews、Armen Avanessian、Diann Bauer、Ray Brassier、Benjamin Bratton、Harry Cleaver、Nathan Coombs、Michael Ferrer、Mark Fisher、Sam Forsythe、Dominic Fox、Lucca Fraser、Craig Gent、Jeremy Gilbert、Fabio Gironi、Jairus Grove、Doug Henwood、Aggie Hirst、Amy Ireland、Joshua Johnson、Robin Mackay、Suhail Malik、Keir Milburn、Reza Negarestani、Matteo Pasquinelli, Patricia Reed, Rory Rowan, michael Rozworski, Mohammed Salemy, Robbie Shilliam, Ben Singleton, Keith Tilford, James Trafford, Deneb Kozikoski Valereto, Pete Wolfendale，以及无数通过讨论塑造它的人。我们还要感谢Verso的团队，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帮助这本书变得更好:Rowan Wilson, Mark Martin和Charles Peyton。最后，尼克要感谢他的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海伦·海丝特，从最小的语法变化到最大的概念问题，她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Alex要感谢他的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建议，感谢Francesca Peck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始终不渝的智力鼓励和包容。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Introduction

未来走向何方?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未来主宰着我们的梦想。在政治左派的视野中，聚集了各种各样的解放愿景，这些愿景往往源于大众政治力量和技术解放潜力的结合。从对休闲新世界的预测，到苏联时代的宇宙共产主义，到非洲未来主义者对黑人文化的综合和散居性质的庆祝，再到激进女权主义的后性别梦想，左派的大众想象所设想的社会远远优于我们今天所梦想的任何社会通过大众对新技术的政治控制，我们将共同把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梦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21世纪的技术基础设施正在生产各种资源，使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得以实现。机器正在完成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任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数十亿以前闻所未闻的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使全球参与式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实。开源设计、copyleft创意和3D打印都预示着一个世界，许多产品的稀缺性可能会被克服。新形式的计算机模拟可以重振经济规划，让我们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理性地指导经济。最新的自动化浪潮正在创造一种可能，那就是永久消除大量无聊和有辱人格的工作。清洁能源技术使几乎无限的、环境可持续的电力生产形式成为可能。新的医疗技术不仅使人的寿命更长、更健康，而且还使有关性别和性同一性的新实验成为可能。左派的许多经典要求——减少工作、结束匮乏、经济民主、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解放人类——在物质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现。

然而，尽管我们的科技时代光鲜亮丽，我们仍然被一套陈旧过时的社会关系所束缚。我们继续长时间工作，通勤距离更远，去完成那些感觉越来越没有意义的任务。我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我们的收入停滞不前，我们的债务变得势不可挡。我们努力维持生计，养家糊口，支付房租或抵押贷款，当我们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时，我们回忆起养老金，努力寻找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自动化让我们失业，停滞不前的工资摧毁了中产阶级，而企业利润飙升至新的高度。在一个日益不稳定和要求越来越高的世界的压力下，美好未来的曙光被践踏和遗忘。每天，我们都像往常一样回到工作岗位:疲惫、焦虑、压力和沮丧。

从全球层面来看，情况似乎更加不祥。全球气候的崩溃有增无减，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导致各国政府接受了紧缩政策的瘫痪死亡螺旋。受到难以察觉和抽象力量的冲击，我们感到无法逃避或控制经济、社会和环境力量的潮汐脉动。但我们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在我们周围，主导过去一百年的政治制度、运动和进程似乎不再能够带来真正的变革。相反，它们迫使我们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选举民主制度年久失修。中左翼政党已被掏空，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他们的尸体跌跌撞撞地成为野心家野心的工具。激进的

政治运动蓬勃发展，但很快就因疲惫和镇压而被扼杀。有组织的劳工已经看到自己的力量被系统性地瓦解，使其变得僵化，除了无力的抵抗之外无能为力。然而，面对这些灾难，今天的政治仍然顽固地受到缺乏新思想的困扰。新自由主义已经统治了几十年，而社会民主主要是作为一种怀旧的对象而存在。随着危机积聚力量和速度，政治枯萎和退却。在这种政治想象的瘫痪中，未来被取消了

这本书是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以及我们下一步可能走向何方。我们用一个我们称之为“民间政治”的概念，对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失去了建设更美好未来的能力进行了诊断。在民间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最近一轮的斗争——从反全球化到反战再到占领华尔街——涉及到对地方空间、即时行动、短暂姿态和各种特殊主义的拜物教。这种形式的政治并没有承担扩大和巩固成果的艰苦劳动，而是专注于建造碉堡，以抵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侵蚀。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已成为一种防御政治，无法阐明或建立一个新世界。对于任何努力逃避新自由主义、建设更好的东西的运动来说，这些民间政治的方法是不够的。取而代之的是，这本书提出了另一种政治——一种寻求收回对我们未来的控制，并培养对一个比资本主义所允许的更现代的世界的雄心的政治。21世纪技术所固有的乌托邦潜力不能继续束缚在狭隘的资本主义想象中;它们必须被一个雄心勃勃的左派替代方案解放出来。新自由主义已经失败，社会民主主义是不可能的，只有另一种愿景才能带来普遍的繁荣和解放。阐明并实现这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当今左派的根本任务。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1

我们的政治常识:介绍民间政治

下一步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只是站在那里,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就像善良的良心拒服兵役者在我们纯粹象征性的观点提出后等待我们的惩罚一样。

Dave Mitchell

今天看来，要实现最小程度的改变，似乎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数百万人游行反对伊拉克战争，但战争仍按计划进行。数十万人抗议紧缩政策，但史无前例的预算削减仍在继续。学生抗议、占领和骚乱不断地与学费上涨作斗争，但它们仍在无情地向前推进。在世界各地，人们建立抗议营地，动员起来反对经济不平等，但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反全球化斗争，到21世纪初的反战和生态联盟，再到2008年以来的新学生起义和占领运动，一个共同的模式出现了:抵抗斗争迅速崛起，动员了越来越多的人，但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冷漠、忧郁和挫败感。尽管千百万人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这些运动的效果被证明是微乎其微的。

在去抗议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失败渗透在这种斗争的循环中，因此，当代左派的许多策略都带有一种仪式的性质，背负着沉重的宿命论。占主导地位的策略——抗议、游行、占领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直接行动——已经成为一种既定叙事的一部分，人民和警察各自扮演着被分配的角色。这些行动的局限性在剧本变化的那些短暂时刻尤为明显。正如一位活动家在2001年美洲首脑会议的一次抗议活动中所说的那样:

> 4月20日，示威活动的第一天，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向栅栏走去，34个国家的元首聚集在栅栏后面，敲定了一项半球贸易协议。在弹射器发射的泰迪熊的冰雹下，身穿黑色衣服的活动人士迅速用断线钳拆除了围栏的支撑，并用抓斗将其推倒，旁观者为他们欢呼。有那么一瞬间，我们和会议中心之间没有任何阻隔。我们爬上了倒塌的栅栏，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没有再往前走，好像我们一直以来的意图只是用我们自己制造的一个人来取代国家的铁链和混凝土屏障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些行为的象征性和仪式性，以及完成*某事*的兴奋感——但在与预期叙事的第一次决裂时，却出现了一种深深的不确定性。尽职的抗议者的角色没有给这些活动人士任何指示，告诉他们当障碍倒塌时该怎么做。壮观的政治对抗，如“停止战争”游行，现在熟悉的反对G20或世界贸易组织的混战，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激动人心的民主场面，都给人一种高度重要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事情真的处于危险之中然而，一切都没有改变，长期的胜利被简单的表达不满所取代。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除了表达对世界的普遍不满之外，这些运动想要什么往往都不清楚。当代的抗议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混杂着各种狂野而多样的诉求。例如，2009年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G20)峰会上，抗议者游行示威，要求的议题从宏大的反资本主义规定，到以更多地方问题为中心的温和目标。即使能看到诉求，他们通常也无法表达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它们往往只是空洞的口号——和呼吁世界和平一样有意义。在最近的斗争中，提出要求这个想法本身就受到了质疑。众所周知，占领运动难以阐明有意义的目标，担心任何过于实质性的东西都会造成分裂在西方世界，大量的学生占领活动都打着“不要求”的口号，他们被误导了，信仰什么都不要求就是激进的行为

当被问及这些行动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时，参与者们的看法不一，有的人承认这些行动是徒劳的，有的人则认为这些参与者变得激进了。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抗议活动看作是一种公众意识的锻炼，那么它们似乎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成败参半。他们的信息被无情的媒体搅乱了，媒体被破坏属性的画面所震撼——假设媒体甚至承认这种形式的争论已经变得越来越重复和无聊。一些人认为，这些运动、抗议和占领实际上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其目的是实现参与者的某种转化，并在权力的通常运作之外创造一个空间。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像抗议营地这样的事情往往仍然是短暂的、小规模的，最终无法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更大结构。这是一种被转化为消遣的政治——或许是作为毒品体验的政治——而不是任何能够改变社会的东西。这样的抗议只在参与者的头脑中被记录下来，绕过了任何社会结构的转变。虽然这些激进化和提高意识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重要的，但这些序列究竟*何时*才能奏效，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临界点，即意识提升的临界质量将准备好采取行动?抗议活动可以建立联系，鼓励希望，并提醒人们自己的力量。然而，在这些短暂的情感之外，政治仍然要求行使这种权力，以免这些情感纽带被浪费。如果我们在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之一之后不采取行动，那么什么时候呢?

对抗议活动的情感方面的强调与一种更广泛的趋势相呼应，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将情感作为真实政治的场所给予特权。身体的、情感的和本能的因素开始取代和阻碍(而不是补充和加强)更抽象的分析。例如，社交媒体的当代景观充斥着无休止的愤怒和愤怒带来的痛苦后果。鉴于当前社交媒体平台的个人主义——以维护在线同一性为前提——看到在线“政治”倾向于道德纯洁的自我表现也许并不奇怪。我们更关心的是表现得正确，而不是思考政治变革的条件。然而，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暴行过去的速度和它们出现的速度一样快，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下一轮刻薄的讨伐。在其他地方，对苦难的同情取代了更细致的分析，导致草率或错误的行动——或者根本不采取行动。虽然政治总是与情感和感觉(希望或愤怒，恐惧或愤怒)有关，但当被视为政治的主要模式时，这些冲动可能会导致非常反常的结果。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85年的“现场援助”(Live Aid)通过将扣人心弦的意象和操纵情感的名人主导的活动结合起来，为饥荒救济筹集了巨额资金。危机感要求紧急行动，不惜牺牲思想。然而，筹集的资金实际上

允许叛军民兵使用粮食援助来维持生计，从而延长了导致饥荒的内战虽然国内的观众感到宽慰的是，他们是在有所作为，而不是什么都不做，但一项冷静的分析显示，他们实际上助长了这个问题。随着行动目标变得更大、更抽象，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变得更加普遍。如果缺乏激情的政治导致冷酷无情的官僚技术官僚，那么缺乏分析的激情就有可能成为有效行动的性欲驱动的替代品。政治变成了个人赋权的感觉，掩盖了战略收益的缺失。

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即使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它们也是在压倒性损失的背景下进行的。例如，英国各地的居民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成功地动员起来，阻止了当地医院的关闭。然而，这些真正的成功被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解体和私有化的更大计划所掩盖。类似地，最近的反水力压裂运动已经能够阻止许多地方的试钻，但政府仍然继续寻找页岩气资源，并为公司这样做提供支持在美国，在住房危机之后，各种阻止驱逐的运动在让人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果然而，次级抵押贷款崩溃的肇事者继续从中获利，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浪潮继续席卷全国，城市世界的租金继续飙升。小小的成功——无疑有助于给人带来希望——在巨大的损失面前也会枯萎。即使是最乐观的积极分子，在不断失败的斗争面前也会动摇。在其他情况下，像Rolling Jubilee这样善意的项目努力摆脱新自由主义常识的魔咒众包资金来支付弱势群体的债务，这一表面上激进的目标意味着接受一个自愿慈善和再分配的体系，以及首先接受债务的合法性。在这方面，这一倡议只是众多项目中的一个，它们的作用仅仅是对摇摇欲坠的国家服务的危机回应。这些都是生存机制，而不是对未来的理想愿景。

从这一切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尽管有许多小规模的成功和大规模动员的时刻，但最近的斗争周期必须被确定为一个全面失败的周期。今天对左翼的任何分析都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哪里出了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国家镇压的加剧和企业力量的增强在削弱左翼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工人所面临的镇压、群众的不稳定和资本家的权力是否比19世纪后期更大，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那时的工人仍在为争取基本权利而斗争，他们常常反对那些愿意对他们使用致命暴力的国家但是，尽管那个时期看到了大规模动员、总罢工、激进的劳工和激进的妇女组织都取得了真正和持久的成功，但今天却被它们的缺席所定义。左翼最近的软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和资本主义镇压的加剧:一个诚实的判断必须承认，问题也存在于左翼*内部*。一个关键问题是对我们所说的“民间政治”思想的广泛和不加批判的接受。

定义民间政治

什么是民间政治?民间政治指的是当代左派内部的一系列观念和直觉，它们为组织、行动和思考政治的常识性方式提供了信息。它是一组有可能削弱左派的战略假设，使其无法扩大规模，创造持久的变化或扩展到特定利益之外。民间影响下的左翼运动

政治不仅不可能成功——事实上，它们也无力改造资本主义。这个词本身有“民间”的两种含义。首先，它引起了对民间心理学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直观概念既是历史建构的，而且经常是错误的其次，它认为“民间”是小规模的、真实的、传统的和自然的场所。这两个维度都隐含在民间政治的理念中。

因此，作为第一个近似，我们可以将民间政治定义为与实际权力机制脱节的集体和历史建构的政治常识。随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世界的变化，以前能够将集体力量转化为解放成果的战术和战略现在已经失去了效力。作为今天左派的常识，民间政治往往是直觉地、不加批判地、无意识地运作的。然而，常识也是历史性的、易变的。值得回顾的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和战术，远非自然或预设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应对具体的政治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请愿、占领、罢工、先锋党、亲和团体、工会:所有这些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然而，某些组织和行动方式曾经有用的事实并不能保证它们继续具有相关性。主导当代左派的许多策略和组织结构，都是对国家共产主义、排他性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派崩溃的经验的回应。然而，那些在那些时刻之后有意义的思想不再是政治转型的有效工具。我们的世界在向前发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抽象、非线性和全球化。

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抽象和非人道，民间政治旨在通过强调时间、空间和概念上的即时性，将政治降至“人类尺度”。民间政治的核心是一种指导性直觉，即即时性总是更好的，而且往往更真实，其必然结果是对抽象和中介的深刻怀疑。就时间的即时性而言，当代民间政治通常仍然是被动的(对企业和政府发起的行动做出回应)，而不是发起行动);[13]忽略了长期战略目标，而倾向于战术(围绕单一问题的政治或强调过程进行动员);[14]更喜欢通常本质上转瞬即逝的实践(如占领和临时自治区);[15]选择过去的熟悉而不是未来的未知(为例如，反复梦想回归“好的”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16]并表现出对自愿主义和自发的偏好，而不是制度(如在骚乱和叛乱的浪漫化中)

就空间即时性而言，民间政治将当地作为真实性的场所(如100英里饮食或当地货币);[18]习惯性地选择小而不是大(如对小规模社区或当地企业的崇拜);[19]偏爱那些无法扩展到小社区之外的项目(例如，大会和直接民主);[20]并且经常拒绝霸权的项目，重视撤退或退出，而不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反霸权同样，民间政治倾向于参与者自己采取行动——例如，它强调直接行动——并将决策视为由每个人而不是任何代表执行的事情。在民间政治思维中，规模和外延的问题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淡化。

最后，在概念即时性方面，对日常生活的偏好超过了结构性的、价值增值的个人经验，而不是系统的思考;对于感觉胜过思考，强调个体的痛苦，或者在过程中体验到的热情和愤怒的感觉

政治行动;为特殊凌驾于普遍之上，视后者为本质上的极权主义;又支持伦理凌驾于政治之上——如在伦理消费主义，或对贪婪银行家的道德批判中组织和社区应该是透明的，事先拒绝任何概念性的调解，甚至是适度的复杂性。普遍解放和全球变化的经典形象已经转变为对特殊苦难和地方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因此，任何建构普世政治的过程从一开始就遭到拒绝。

以这些方式理解，我们可以在组织和运动中发现民间政治的痕迹，如占领运动、西班牙的15M运动、学生占领运动、左翼共产主义起义者如Tiqqun和Invisible Committee、大多数形式的水平主义、萨帕塔运动和当代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政治，以及其他各种趋势，如政治地方主义、慢食运动和伦理消费主义等。但没有一个单一的立场体现了所有这些倾向，这让我们想到了第一个条件:作为一种不加批判的、往往是无意识的常识，民间政治在不同程度上被具体的政治立场实例化。也就是说，民间政治并没有指明一种明确的立场，而只是一种隐含的倾向。表征这种倾向的思想在当代左派中广泛分布，但有些立场比其他立场更具有民间政治色彩。这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重要的限定条件:民间政治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从地方开始的;一切政治都是从地方开始的。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民间政治思维满足于停留在(甚至是特权)这个层面——短暂的、小规模的、未经调解的和特殊的层面。它认为这些是足够的时刻，而不仅仅是必要的时刻。因此，关键不在于简单地拒绝民间政治。民间政治是任何成功的政治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它只能是一个起点。第三个限定条件是，民间政治只对特定类型的项目有问题:那些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项目。民间政治思想可以很好地适应于其他政治项目:仅以抵抗为目的的项目，围绕地方问题组织的运动，以及小规模的项目。以保持医院开放或防止驱逐为基础的政治运动都是令人钦佩的，但它们与试图挑战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运动有着重要的不同。一种组织、战术或战略同样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斗争，这是当今左派中最普遍、最具破坏性的信仰之一。在进行任何政治项目之前，必须进行战略反思——对手段和目的、敌人和盟友进行反思。鉴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任何后资本主义项目都需要一种雄心勃勃的、抽象的、中介的、复杂的、全球性的方法——一种民间政治方法无法提供的方法。

结合这些条件，我们因此可以说，民间政治对于后资本主义政治项目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由于强调并停留在当下的层面，民间政治缺乏将新自由主义转化为其他东西的工具。虽然民间政治无疑可以对地方斗争进行重要干预，但当我们认为这些斗争正在扭转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潮流时，我们欺骗了自己。它们顶多代表了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冲击的暂时喘息。本书的目的是开始概述另一种选择——一种左派从地方走向全球，并将特殊与普遍结合起来的方式。这样一种替代方案不能简单地成为上世纪工人阶级政治的保守回归。相反，它必须将一种更新的政治*思维*方式(从即时性转向结构性分析)与一种升级的政治*行为*方式(将行动导向搭建平台和扩大规模)结合起来。

不堪重负

为什么民间政治首先会出现?为什么民间政治倾向尽管有种种明显的缺陷，却对今天的运动如此具有诱惑力和吸引力?至少有三个答案浮现在眼前。第一种解释是把民间政治看作是对如何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解释和行动这一问题的回应。第二种相关的解释涉及将民间政治定位为对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历史经验的反应。最后，民间政治是对当代政党政治空虚景象的一种更为直接的回应。

全球多极政治、经济不稳定和人为气候变化日益超越了我们用来构建和理解生活的叙事。这些都是所谓的*复杂系统的一个例子,其特点是非线性动力学*，其中细微不同的输入可能导致显著不同的输出，错综复杂的原因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反馈，它在空间和时间的尺度上起着独特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的独立感知全球化、国际政治和气候变化:每一个体系都塑造着我们的世界，但它们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和复杂，以至于我们很难将自己的经验置于其中。全球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简单地说，经济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它是跨时空分布的(你永远不会亲自见到“经济”);它包含了一系列广泛的元素，从属性法到生物需求，从自然资源到技术基础设施，从市场摊位到超级计算机;它还涉及一套巨大而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反馈回路，所有这些反馈回路都产生了不可简化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紧急效应换句话说，一个经济体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不能仅仅通过了解这些部分是如何孤立地工作来理解的——只有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使经济变得有意义。虽然我们可能知道经济是由什么组成的，但我们永远无法像其他现象一样直接体验它。它只能通过关键的统计指数(用图表显示通货膨胀或利率、股指、GDP等的变化)进行症状性观察，但永远无法从整体上看到、听到或触摸到。

因此，尽管关于资本主义已经写了那么多，但我们仍然难以理解它的动力和机制。最重要的是，我们缺乏我们社会经济系统的“认知地图”:一幅关于个人和集体人类行为如何在难以想象的浩瀚的全球经济中定位的心理图景近几十年来，影响政治的动态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可以把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视为一种新的问题——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涉及的影响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我们甚至很难知道该在哪里进行干预。同样，就资本的流动性、全球金融的复杂性和所涉及的行动者的多样性而言，今天的全球经济似乎要复杂得多。我们对世界的传统政治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变化?至少对左派来说，以产业工人阶级为前提的分析是解释19世纪和20世纪初社会和经济关系总体的有力方式，从而阐明了明确的战略目标。然而，二十世纪全球左派的历史证明，这种分析未能兼顾可能的解放斗争范围(基于性别、种族或性取向)和资本主义自我重组的能力——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或者全球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今天，旧模式在面对新问题时往往摇摇欲坠;我们失去了理解自己在历史和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能力。

日常经验与我们生活的体系之间的这种分离导致了异化的加剧:我们在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世界里感到漂泊不定。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指出，阴谋论的泛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情况的反应阴谋论的作用是将我们世界背后的机构缩小到一个权力人物(彼尔德伯格集团、共济会或其他方便的替罪羊)。尽管其中一些理论异常复杂，但它们仍然提供了一个令人放心的简单答案，即“谁是幕后黑手”，以及我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角色。换句话说，它们就像一张(有缺陷的)认知地图。

民间政治是对压倒性复杂性问题的另一种可能的回应。如果我们不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那么民间政治的训诫就是将复杂性降低到人类的尺度。的确，民间政治写作充斥着对回归真实、回归即时性、回归一个“透明”、“人性化”、“有形”、“缓慢”、“和谐”、“简单”和“日常”的世界的呼吁。27这样的思考否定了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因而也否定了一个真正的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可能性。它试图赋予权力以人性的面目;而真正可怕的是这个系统普遍的非主观性。这些面孔是可以互换的;力量保持不变。转向地方主义，暂时的抵抗时刻，以及直接行动的直觉实践，都有效地试图将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浓缩为具体的人物和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政治往往将政治降格为一种伦理的、个人的斗争。有时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只需要“好的”资本家，或者“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与此同时，“使其本地化”的必要性导致民间政治盲目崇拜即时结果和行动的具体外观。例如，推迟企业对环境的攻击,被称赞为成功——即使公司只是等待公众的关注，然后再回来。此外，正如罗莎·卢森堡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对“即时结果”的崇拜导致了一种空洞的实用主义，它努力维持目前的权力平衡，而不是寻求改变结构条件没有必要的战略思想的抽象，战术最终只是稍纵即逝的姿态。最后，放弃复杂性与新自由主义支持市场的理由不谋而合。反对计划的主要论点之一是,经济太复杂了，无法引导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资源分配交给市场，拒绝任何对市场进行理性引导的尝试从所有这些方面考虑，民间政治似乎是一种使全球资本主义小到可以想象的尝试，同时，阐明如何根据资本主义的这种受限形象采取行动。相比之下，本书的论点是,民间政治倾向是错误的。如果复杂性目前超过了人类的思考和控制能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复杂性降低到人类的尺度;另一种是扩大人类的能力。我们支持后一种立场。任何后资本主义项目都必然需要创造新的认知地图、政治叙事、技术界面、经济模式和集体控制机制,以便能够为人类的改善而整理复杂的现象。

过时的

虽然对日益复杂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民间文化的兴起

政治思维，也必须置于二十世纪左翼政治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中。在许多方面，民间政治倾向是对过去五十年所面临的挑战的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充分的话)回应——这些挑战既出现在左翼内部，也出现在与保守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中特别是，民间政治的出现是对战后社会民主复合体崩溃的一种回应，这种复合体将工人阶级机构、社会民主党派和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霸权编织在一起这个社会民主集团的崩溃发生在多条冲突线和各个领域:在与情感和认知相关的新工作形式的出现中;能源危机的出现破坏了地缘政治的确定性;资本主义企业在实现盈利方面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加;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智库和大学院系的制度网络扩散;在新形式的政治主体性、项目和诉求的爆发中;以及对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普遍质疑。这些因素都破坏了战后欧美社会体系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既有旧的左翼范式的*过时*,*也有对*新范式的智取。

或许，在战后解决方案的这种不稳定中，最重要的时刻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1968年的全球起义为一系列左翼运动提供了新的突出地位和新的灵感，这些运动拒绝了工会和政党所阐述的斗争坐标。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斯大林主义镇压历史的推动，当与苏联政权对东欧民主化潮流的镇压相结合时，这意味着共产党在欧洲年轻的左翼分子眼中越来越不可信。这让人质疑列宁主义纲领的战略有效性，即由一个革命党领导一个以工业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力量联盟来接管国家如果从长远来看,即使是“成功的”革命也会导致僵化的技术官僚和政治压迫，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解放行动呢?共产党内部的等级制度和先锋派似乎越来越反对新兴社会运动的目标。

除了在共产主义管理下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困难之外，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达国家国家接管的前景似乎渺茫，特别是考虑到左翼出现的分歧。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起义，法国共产党明显未能支持工会主义者和学生团体，这似乎终结了任何政治革命的前景。此外，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对社会不平等的凯恩斯主义社团主义解决方案似乎越来越满足于现有秩序，无法或不愿走向解放的社会主义。虽然社会民主主义能够为某些群体提供显著的收益，但它保留了一个专制的机构和一个家长式的角色,通常排斥妇女和少数民族，并依赖于一种产生不同寻常的社会凝聚力的资本主义组织模式(福特主义)。正是这种社会凝聚力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被新的群众愿望(例如，增加工作灵活性)和新的坚持要求(种族和性别平等、核裁军、性自由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出现所侵蚀。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新问题无法再用现有的左翼政治代理人来解决，选举压力开始将社会民主党从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政党转变为一个日益以联盟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中剩余的激进分子正在慢慢被掏空。

政党形式的持续衰落可以部分归因于名义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统治的灾难性现实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望。与此同时，新左派内部出现了一系列有根据的批评，部分原因是激进组织中女性的经历，她们发现自己的声音即使在所谓的激进组织中也继续被边缘化。更加等级化的组织形式，如政党或传统的工会组织，继续巩固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男权和性别歧视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产生能够对抗这种社会压迫的新组织形式。这包括使用共识决策和横向辩论结构，这些结构后来因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享誉全球在女权主义团体之外，大学校园里的新学生左派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往往是明确的反权威、反官僚、甚至反组织的这些团体所支持的许多策略都强调直接行动的好处，并从非洲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和早期的学生运动，以及欧洲情境主义、无政府主义政治潮流和早期的环境运动的思想中汲取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政治的基本战略取向和行动模式的出现:从占领、静坐或蹲着的公社到嘉年华式的街头抗议和“偶发事件”。这些策略中的每一种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作为一种破坏日常权力运作的方式，暂停“正常”的社会监管形式，促进平等主义的讨论空间。除了试图改变社会之外，这些干预措施旨在改变参与者本身，并体现即将到来的新社会形式。

因此，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运动在其构成和前景上是多种多样的，跨越了各种主体性、领土位置以及战术和战略形式。但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新的愿望，这些愿望不容易被左翼政治的旧形式所容纳。考虑这些运动的一种方式是将其视为当时普遍化的“反体制”政治现象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有一种倾向于挑战和分解官僚等级制度的权力，以支持直接行动的新模式，从美国的学生、女权主义和黑人权力运动，一直延伸到欧洲的情境主义运动、学生和联合劳工运动，布拉格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墨西哥和东京的学生起义，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39]然而，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反体制的政治导致了政治权力被*固有*的压迫、父权制和霸道倾向所污染的认同这就留下了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一方面，它可以选择与现有权力结构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或妥协，这将倾向于新左派的腐败或拉拢。但另一方面，它可以选择保持边缘地位，从而无法改变那些尚未被其议程所说服的社会要素许多这些反体制运动对既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旧左派官僚权力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然而，反体制政治没有提供多少资源来建立一场能够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新运动。

因此，这些社会运动的遗产是两面性的。他们所表达的思想、价值观和新的愿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权利和反官僚主义诉求的传播仍然是他们最大的成就。在这一点上，它们代表了左派进行自我批判的绝对必要时刻，民间政治策略的遗产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历史条件。然而，与此同时，一种无能为力

42 .或者说，缺乏将这些计划的激进方面转变为霸权方面的愿望，也对随后的不稳定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新的社会运动能够产生一系列新的和强有力的人类自由思想，但总的来说，它们无法取代摇摇欲坠的社会民主秩序。

诡计多端

正当新社会运动兴起时，社会民主共识的经济基础开始瓦解。20世纪70年代，能源价格飙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全球资本流动增长，经济持续滞胀，资本主义利润下降这实际上终结了支撑战后时代的基本政治解决方案: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福特-社团主义工业生产和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独特联系，后者将部分社会剩余返还给了工人。在世界范围内，结构性危机为广泛左翼和广泛右翼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产生一个可以解决危机的新霸权。

对于右翼来说，挑战在于恢复资本积累和盈利能力。这一挑战最终以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全球舞台上的出现而得到了回应;但甚至在此之前，英国和美国的右翼势力就在尝试新的方法，以智胜新老左翼。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是将资本主义危机与工会权力联系起来的政治经济战略。随后在整个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劳工的失败，也许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成就，它显著地改变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权力平衡。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多种多样，从物理对抗和战斗，到利用立法来破坏团结和工业行动，再到接受损害工会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转变(如分解供应链)，围绕个人自由和“消极团结”的广泛新自由主义议程，重新设计公众舆论和共识。后者不仅仅意味着对工人的骚动漠不关心——它是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的培养，因为我必须忍受日益严峻的工作条件(工资冻结，失去福利，养老金减少)，所以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这些共同转变的结果是工会的空心化和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失败

虽然右翼通过巩固其政治和经济权力成功地面对了结构性危机，但新旧左翼的运动却无法面对这种新的力量配置。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能够在西欧的选举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但老左派只是试图通过加倍推行传统的社团主义议程来解决危机但在这些新的经济条件下，旧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启动增长、抑制失业或降低通胀。因此，20世纪70年代上台的左翼政府，如英国工党，往往最终不得不实施原新自由主义政策，试图促进经济复苏，但收效甚微传统的劳工运动，年久失朽，停滞不前，现在正被右翼势力击败和拉拢。在这种背景下，新左派是一种必要的批判，对左派的振兴和进步至关重要。然而，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如果旧的劳工组织在许多意义上失去了思想，新左派就无法将自己制度化并阐明一种反霸权。其结果是，左派变成了

越来越边缘化。

随着新自由主义常识的扩大和巩固，剩余的社会民主党派越来越多地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条件。随着大多数主要政党有效地签署了其政治和经济计划，以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被私人掌握，在投票箱上实现重大变革的能力大大降低。随着被掏空的政党政治变得类似于公共关系行业，政客们沦落为兜售不受欢迎的商品的店主的角色，普遍的玩世不恭开始伴随而来随着人们逐渐接受新自由主义坐标，大众对选举政治的参与度也随之下降，后政治时代即将来临。选民的大规模不满是今天的结果，选民投票率经常处于历史低点。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政治对立竿见影的结果和小规模参与式民主的坚持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在这种背景下，新社会运动的立场更加模糊。[49] .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人阶级作为特权政治主体的定位已经完全被打破，更广泛的社会身份、欲望和压迫得到了承认人们进行了越来越复杂的尝试来发展对相互作用的权力结构的分析，从而产生了交叉压迫的思想作为文化传播和主流政治认可的结果，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酷儿政治运动的大部分纲领已被庄严载入法律，并在社会层面上得到接受。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1970年代概述的那种激进要求却出现了倒退，这种要求设想了一个更彻底的社会变革。例如，女权主义者在薪酬平等、堕胎权利和儿童保育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与彻底废除性别的项目相比，这些成果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同样，对于许多黑人解放运动来说，虽然反种族主义的就业政策和反歧视法被广泛颁布，但它们并没有伴随着早期运动所支持的其他激进方案今天的新社会运动所看到的大部分成功都局限在新自由主义建立的霸权术语中——围绕着以市场为中心的主张、自由权利和选择的修辞。在这一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是这些项目中更为激进和反资本主义的元素。

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了传统左翼组织的崩溃，同时出现了另一种新左翼的崛起，这种新左翼基于对官僚主义、垂直主义、排斥性和制度化的批评，并将一些新的愿望纳入新自由主义的机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间政治直觉作为一种新的常识日益沉淀下来，并开始在另类全球化运动中得到表达这些运动分两个阶段出现。第一阶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由萨帕塔(zapatista)、反资本主义、另类全球化主义者、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和全球反战抗议的参与者等团体组成。第二阶段在2007-09年金融危机之后立即开始，以各种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立场相似的团体为特征，包括占领运动、西班牙的15M运动和各种全国性的学生运动。最新社会运动的两个阶段都试图对抗新自由主义及其国家和企业的化身，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全球贸易和治理组织，而后者则更多地关注金融化、不平等和债务受早期社会运动的影响，这一最新的斗争周期包含了倾向于给予地方和自发、横向和反国家特权的群体。社会运动

民间政治表面上的合理性，取决于左翼传统组织模式的崩溃，社会民主党被吸纳为一个没有选择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以及当代政党政治的平淡无奇所产生的广泛的权力剥夺感。在一个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复杂得难以解决的世界里，民间政治提供了一种诱人的方式来预示当前的平等主义未来。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政治无法产生可能取代(而不仅仅是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持久力量。

展望未来

这本书中对民间政治的批判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警告主流和激进左翼的现有倾向正在走向民间政治极点，我们寻求扭转这一趋势。因此，本书前半部分的目的是要打破一套越来越教条的原则，即今天如何制定战略和做政治。第2章从对现有政治的批判入手，试图诊断和概述当代民间政治思维的局限性。虽然左派拒绝了霸权和扩张的计划，但第三章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如何成功地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在民间政治的位置上，后半章将提出一个围绕全球和普遍解放组织起来的替代左派计划。第四章认为，面向未来的左派需要收回现代化的主动权及其对进步和普遍解放的强调。第五章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工作和社会再生产的危机。这些趋势需要回应，我们的论点是，左派应该开始动员一项政治计划，以进步的方式指导这些力量。与今天对债务和不平等的主要关注相反，第6章设想了一个后工作世界。第7章和第8章考察了实现这一愿景需要采取的一些步骤，其中包括建立反霸权运动和重建左翼的能力。最后，结束语退一步，从一个以普遍解放为目标指导的面向未来的左翼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性的工程。这本书基于一个简单的信仰——现代左派既不能继续当前的制度，也不能回到一个理想化的过去，而是必须勇敢地面对建设一个新的未来的任务。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2

为什么我们没有赢?对当今左派的批判

Goldman Sachs doesn't care if you raise chickens.

Jodi Dean

今天左派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要正视最近一轮斗争的失望和失败。从反全球化到占领运动，我们看到了民间政治实践的高潮。为什么这些运动尽管动员了大量的民众和激情，却未能对政治现状产生任何重大的改变?一些作家认为，当代左翼运动的无能可以用他们的阶级基础来解释，比如他们所谓的缺乏工人阶级成分，或者是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利益的渗透另一些人则认为，问题在于体制的本质，以及任何变革项目面前所设置的障碍。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论述的，这只能部分解释最近的失败。相比之下，本章的论点是，问题更多地在于塑造了最近左翼政治战略视野的民间政治假设。在这里，我们试图诊断当代民间政治所构成的限制。

正如第一章所论述的那样，民间政治出现在对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的普遍反应和20世纪左翼运动的特定历史之间的交汇处。本章考察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民间政治直觉是如何塑造当代左翼政治的一些主要流派的。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声称要涵盖整个社会运动领域，而只是把重点放在过去十五年中激进左翼在政治上最受欢迎和最重要的时刻。我们也不主张这些运动所使用的任何特定的政治策略本身就有问题。只有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旨在改造它的战略的背景下，才能看清特定策略的优点。正是在我们当前的背景下——一个由全球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所决定的世界，加上以地方和自发为重点的民间政治战略——我们找到了当代左翼的根本弱点。在转向以地方主义为中心的广泛思想，以及大多数主流和激进左翼政治的普遍反应性推动力之前，我们首先考察了过去15年来最流行的政治倾向之一——水平主义。

横向主义

水平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中具体化，并在萨帕塔运动、另类全球化活动家和广场运动的推动下变得突出，它已成为当今激进左翼的主要流派作为对20世纪国家主导的政治变革失败的回应，水平主义运动主张通过自下而上地改变社会关系来改变世界他们借鉴了无政府主义、委员会共产主义、自由共产主义和自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悠久传统，用一位支持者的话来说，是为了

“在不夺取权力的情况下改变世界”。这些运动的核心是对国家和其他正式机构的拒绝，以及对社会的特权，认为社会是产生激进变革的空间。水平主义反对霸权主义，认为它本质上是霸道的，并提出了一种基于亲和力的政治水平主义不主张诉诸或接管国家的垂直权力，而是主张自由联合的个人走到一起，创建他们自己的自治社区，管理他们自己的生活。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用四个主要承诺来概括这些思想:

1. 拒绝一切形式的统治
2. 坚持直接民主和/或一致决策
3. 对预示性政治的承诺
4. 强调直接行动

在这一套承诺中包含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制约和限制了它们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潜力。

水平主义对各种形式的统治的关注也许是它的标志性贡献它超越了老左派对国家和资本的传统关注，强调了其他类型的统治继续构建社会的各种方式(种族、父权、性别、ableist等)。今天的许多激进左派已经采纳了这些思想，并把他们的实践集中在彻底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认为，任何严肃的左派政治都必须采纳这一承诺。然而，水平主义运动试图克服统治和压迫的手段往往最终受到民间政治的限制。在寻求直接和无中介地消除统治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这些运动要么倾向于忽视那些持续存在的更微妙的统治形式，要么无法构建能够长期维持新的社会关系的持久政治结构。

对避免所有形式的统治的承诺与对再现的批判——无论是概念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密切相关。在实践中，这导致了对代议制政治特征的等级结构的拒绝在经历了腐败的工会和迅速被侵蚀的自由民主的历史之后，代议制被视为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私自利和占主导地位的精英。这些结构将被直接的民主形式所取代，这种民主形式赋予了即时性而不是调解的特权，唤起了一种更个人的政治意识这里的想法是，“面对面的民主”可能更自然、更真实，更不容易出现等级制度政治决策不是由代表做出的，而是由亲自代表自己的个人做出的直接民主最终被视为一种基本价值，它得到了民间政治直觉的支持，即直接的比中介的更好。讨论的主要目标往往是达成共识，而不是多数决定原则、议会程序或中央委员会的指令因此，辩论和治理应该最大限度地具有包容性，审议过程本身，而不仅仅是其结果，是值得重视的可以理解的是，参与式民主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特别是考虑到当代代议制民主的空洞和仪式性姿态许多参与者谈到了他们从参与协商一致的决策过程中获得的赋权感因此，最大的包容性和共识得到了重视，战术和过程的重要性被置于战略目标之上。

直接民主、共识和包容性都是水平主义承诺的一部分

预示性政治，其目的是在此时此地创造他们希望看到的世界。从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开始，预示性政治就一直是左翼的传统，但直到最近才成为左翼政治前沿的特征。早先的承诺，在革命之后，等级制度和排斥将会消失，这对女性和有色人种来说并没有什么安慰，他们的担忧被另一位白人男性领导人所忽视。预示性政治不是等待所谓的革命，而是试图立即实例化一个新世界——再次依赖于一种隐含的感觉，即即时性本质上优于更中介的方法。在最好的情况下，预示性政治试图体现乌托邦的冲动，将未来带入今天的具体存在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对预言的坚持变成了一种武断的断言，即手段必须与目的相匹配，同时对反对它的结构性力量的无知

如果目标是在此时此地创造我们想要的世界，如果求助于中介机构是被禁止的(或者至少是被否认的)，那么适当的实践形式就必须是直接行动。这是一种包含广泛可能策略的实践形式，从情境主义者的戏剧抗议，到野猫罢工，到封锁港口，再到烧毁豪宅开发项目。在这些实践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民间政治的暗示——对直接的、即时的和直觉的特权。可以肯定的是，直接行动有时比抗议更有效、更有用——比如用混凝土摧毁反对无家可归者的尖塔，或者在工作场所的斗争中使用慢节奏的方法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直接行动往往仍然不足以确保长期的变化，孤立地说，通常只是对国家和资本权力的暂时障碍。

我们赶紧补充一句，直接民主、先兆政治和直接行动并没有本质上的缺陷与其谴责它们本身，还不如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况和特定的战略目标来判断它们的效用——根据它们运用真正的力量来创造真正持久的变革的能力。复杂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是，由相对不可扩展的行动组成的小规模干预，极不可能重新组织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正如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所建议的那样，水平主义的战术曲目可以有一些用途，但只有在与其他更为中介的政治组织和行动形式相结合时才会有用。在对水平主义的理论承诺和与之相关的一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概述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转向21世纪政治中的两个重要序列，以突出这些模型中所包含的实践可能性和强烈的民间政治限制。接下来，我们将研究水平主义的两个最有力的案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占领运动和2001年阿根廷违约后的经验。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方法的真正成功和明显的局限性。

占领

水平主义原则最近最重要的体现出现在“广场运动”中。虽然占领并不需要水平主义的治理(事实上，这种策略的前身最初来自军方)，但绝大多数2008年后的占领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2011年，这波占领公共空间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全球95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受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阶级关注的影响。在这里，我们想要考察“占领”运动在西方世界的失败

因为它凸显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民间政治思维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占领运动的名义下包含了广泛的方法，但这种失败还是发生了。例如，在美国，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奥克兰，这一运动从教条式的非暴力到公开的对抗，介于经常困惑的自由主义和激进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之间除了这种地区差异之外，参与者的意识形态构成也很复杂，他们跨越了政治光谱，包括改革派自由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叛乱无政府主义者、反国家共产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以及少数反美联储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除了这种多样性之外，对政治诉求的表达也存在着广泛的抵制，这使得运动的统一性更加难以辨别。

相对容易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激励加入运动。“占领”运动的水平主义性质给了人们在面对几乎没有记录他们声音的社会时表达自己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美国，围绕两大政党的选举民主结构意味着政治话语的窗口变得异常狭窄。与“占领”相关的各种口号和原因证明了被压抑的愤怒的爆发和政治要求的激增，否则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即使在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占领的人中，占领运动也为那些被排斥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比如“我们是99%”的Tumblr网站，人们齐声抗议经济贫困和社会排斥除了任何直接的政治结果之外，被排斥者的挫折感被公开传播的机会对许多人来说是鼓舞人心的，也是赋予他们力量的。

占领运动还致力于扰乱参与者和观察者的日常生活，并允许人们共同参与一个共同的政治项目。用一位观察者的话来说，“自主性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关于自己力量的教训”。在像奥克兰这样的地方，激进分子经常推动比通常的调解组织(如非营利组织)所允许的更激进的政治。像许多抗议运动一样，占领运动的作用是使参与者变得激进，尤其是当他们面临警察不成比例的残酷反应时。占领运动被认为预示着新世界的到来;但是，即使那个新世界尚未出现，这些运动无疑向参与者展示了政治团结的可能性

除了这些内部利益之外，被占领的空间还作为反对政治制度的行动基地(如反对八国集团的抗议营地)这些行动大多由抗议游行和集会组成，这些空间也作为集体决策的物理场所。28 .关于外部行动，被占领的空间还作为技能培训的总部- -例如，进行非暴力反抗行动、对付警察镇压或提供关于合法权利的资料从一般意义上说，占领是整个运动基础设施的最明显的现实世界表现。这些职业也是(尽管并不总是)支持社会最边缘群体，特别是无家可归者的场所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占领为媒体提供了一个持续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纽约祖科蒂公园的占领——并使许多原本被边缘化的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广大公众的注意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占领运动能够吸引主流媒体和电视新闻对经济正义问题的关注——这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化的媒体环境中是一个真正的成就。

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占领运动还是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失败了。众多的

31 .运动内部的评论员已经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占领运动的包容性修辞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基于种族、性别、收入和空闲时间的排斥民间政治的约束被包含在运动的实践和思想中，正是这些倾向最终使它无法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上巩固，或使自身普遍化。可以肯定的是，构成“占领”运动的一些运动并没有扩大规模、在时间上坚持下去或使自身普遍化的意图。许多(虽然不是全部)水平主义思想家强调相对短命的、自发的政治的特殊活力，认为“相对持久不一定是一种美德”。32但是，无论有意与否，该运动在实践中倾向于优先考虑空间、时间和概念上的即时性，这在集体上削弱了它，使它无法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从而有机会认真地追求其基本目标。

借鉴水平主义的原则，占领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坚持直接民主。虽然直接民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从工人委员会到瑞士式的州民主——但在占领运动中，它以全体大会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在一个民主效率下降的时代，一种新的民主方式是这些抗议活动参与者表达的最普遍的愿望之一然而，当直接民主本身被盲目崇拜为一种目的时，它就无情地施加了重大的限制。首先，直接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努力和参与程度导致了可持续性问题。例如，参与式经济学(parrecon)项目设想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实现直接民主;但这种对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憧憬，转化为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进行无休止的分支化的员工会议——几乎不是乌托邦式愿景的鼓舞人心的东西在“占领”运动中，许多全体大会都陷入了类似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平凡的问题也必须由一个集体来煞费苦心地解决关于占领祖科蒂公园时鼓手制造太多噪音的激烈辩论，只是其中一个特别滑稽的例子。更普遍的观点是，直接民主需要大量的参与和努力——换句话说，它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作。在革命热情高涨的短暂时刻，这些额外的工作可能变得无关紧要;然而，在恢复正常之后，它只是被添加到日常生活的普通压力中直接民主的额外工作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结构性排斥——特别是对于那些身体上无法参加的人，那些在大群体中感到不舒服的人，以及那些缺乏公开演讲技巧的人(以及这些因素固有的所有性别和种族偏见)随着“占领”运动的进行，大会往往在疲惫和无聊的重压下干脆崩溃了。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今天民主的问题并不是人们想要对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发言权。民主赤字的真正问题在于，社会上*最重要*的决定都不在普通人的手中直接民主回应了这个问题，但它试图通过使民主成为一种拒绝调解的直接的、身体的体验来解决这个问题。民主中对即时性的类似偏好也阻碍了它的空间可扩展性。简单地说，直接民主需要小社区。值得注意的是，埃及解放广场上的数十万人并没有一个全体代表大会，即使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全体代表大会也只由参与者总数的一小部分组成直接民主(面对面的讨论)的机制和理想本身，使得它很难在小社区之外存在，也使得它实际上不可能对国家、地区和全球民主的问题作出反应。直接民主的空间限制也忽略了小的退步方面

社区。这些“亲密”社区往往是最恶毒的仇外心理、同性恋恐惧症、种族主义、恶毒的流言蜚语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落后思维的家园。直接民主所要求的那种小社区并不是现代左翼运动的合适目标。此外，参与式民主完全可以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构建，特别是使用当今可用的通信技术。

在强调协商一致是这一进程的基本目标时，出现了另一个民间政治限制。共识的目的是达成一个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决定，同样依赖于空间即时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面对面的社区中，弄清楚社区中大多数成员想做什么，比弄清楚如何说服那些不同意的人去做要容易得多。”[41]然而，在一个范围内(面对面的社区)行之有效的方法，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奏效要困难得多。也许不可避免的是，在像占领运动这样相对分散的运动中，共识决策导致了一组最低公分母的要求，在那里它们出现了。也有很多修辞将缺乏决定性要求美化为某种程度上的激进。这些来自运动内部的论点认为，提出要求是疏远和分裂的，因为通过诉诸外部力量(如国家)可能会降低运动的作用，因此容易导致运动被同化然而，这些观点的批评者认为，要求的分裂性也是积极的:虽然让一些参与者望而却步，但它们可能同样动员那些致力于实现相关要求的人。此外，他们努力澄清运动中包含的真正的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在实践中经常被忽略，即使在这些分歧可能被证明是不可克服的地方

占领运动的进一步问题出现在其名义上拒绝任何形式的组织垂直性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导致了运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团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埃及和突尼斯的广场运动与现有的工人运动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而西方世界的占领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种联系这导致了三种趋势。首先是决策结构经常瘫痪。当占领运动采取行动时，它们往往来自一个独立行动的小组，而不是来自大会做出的一致决定换句话说，行动并非来自横向主义。其次，有证据表明，等级组织在捍卫反对国家的运动方面至关重要。在占领运动中，维持被占领的空间不受警察镇压不是横向主义的结果，而是纵向机构动员其成员支持占领的结果类似地，在埃及，足球支持者和宗教组织是保卫解放广场反对国家和反动派暴力的核心力量最后，对所有形式的垂直性的拒绝意味着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扩展运动的关键机制被抛弃了。与劳工、社会正义，甚至政党的联系，将为占领运动超越民间政治参数提供基础设施。例如，有组织的工人在埃及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将一般的抗议转变为近乎总罢工的形式，使国家陷入瘫痪，并给穆巴拉克政权以最后一击与政党的联系也帮助占领了冰岛、希腊和西班牙，取得了更广泛的成功。最后，尽管有传播“占领”运动思想的明确愿望，以及在吸引公众关注方面的真正成功，但改变社会结构的必要举措从未被采取。

然而，更根本的是，占领运动通过强制执行一种严格的先驱性政治来约束自己。最基本的预示姿态是立即体现未来世界——改变我们的世界

为了在当下活出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我们彼此联系的方式。职业的作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经常自觉地以通过互助、拒绝等级制度和严格的直接民主来制定非资本主义世界的空间为目标。然而，这些空间被理解和建造为明确的临时空间——而不是用于持续变革或制定具体替代方案的空间，更不用说雄心勃勃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者了。相反，它们是短期的空间，包含了一个直接社区的短暂经验占领运动先驱的一本小册子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坚持不提要求的学生]把占领的意义看作是在资本主义的时间和空间中创造一个短暂的开放，一种重新安排，勾勒出一个新社会的轮廓。我们站在这种反改良主义立场的一边。虽然我们知道这些自由区将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但它们暴露出的现实与可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将斗争推向更激进的方向

在承认占领将是暂时的同时，人们还天真地信仰，也许这一次它将引发一场彻底的变革。预示性空间面临着一场持续的反对解散的斗争，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它们需要各种后勤支持，包括住房、食品、卫生、医疗、国防和法律咨询。51 .其中大部分不是来自预先存在的社区内部，而是依赖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网络52 .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营地的社会再生产也是困难的，甚至建立的乌托邦社区(通常是宗教性质的)通常也发现不可能保持独立和自我维持第二，预示性空间经常受到国家和企业的压制——如果它们不是，那通常是因为它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不构成威胁。例如，萨帕塔被允许相对自由地存在，仅仅是因为国家和资本不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预示空间成为威胁的时刻，就是压迫压在它身上的时刻，也是它对水平主义的拜物教成为严重负担的时刻。因此，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预示性政治忽视了反对创造和扩展新世界的力量。简单地设想和实践一个新世界是不足以克服这些力量的，正如占领运动所面临的镇压所表明的那样

因此，对任何先兆政治必须提出的直接问题是:它如何能够扩大和扩大规模?55即使假定大多数人想要像“占领”阵营那样生活，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努力来从物质上和社会上扩大这些空间呢?当理论家面对这个问题时，通常会含糊地挥手示意:据称时刻会彼此“共鸣”;日常的小动作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质变，“打开”社会;骚乱和封锁会“蔓延和倍增”;体验会“污染”参与者并扩大;预示性抵抗的口袋会“自发爆发”。56无论如何，从特殊到普遍，从地方到全球，从暂时到永久的艰难任务，都被一厢情愿的想法所忽略。扩大、延伸和普遍化的战略要求没有得到实现。

如果占领运动未能成功地将预示空间扩展到社会边缘之外，这些抗议营地仍然可以作为直接行动的发射台。事实上，占领运动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可以作为直接行动的基础。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国，已经组织了债务罢工，并为没有罢工权的工人设立了纠察线。其他占领运动支持擅自占用者，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建立海盗媒体，动员起来防止驱逐，抗议政府削减开支，并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提供人道主义救济

自然灾害发生后。但占领运动的影响不应被夸大。例如，许多成功的驱逐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运动都是黑人积极分子领导的“夺回土地”等运动所做的已有工作的延伸。更广泛地说，问题在于直接行动通常只起到表面效果，修补了资本主义的伤口，却没有触及根本的问题和结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继续迅速发生，消费者债务上升到新的高度，工人被扔到街上，无家可归的人口激增。[58] .在占领运动中，对行动的宣传的局限性变得显而易见虽然直接行动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功，但它仍然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在这一点上它仍然是民间政治的。直接行动可以有效地减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过度行为，但它永远无法解决攻击全球分散的*抽象概念的难题*，而往往集中在直观的目标上扩张性左派的计划——旨在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的左派——仍然缺席。

这里出现的占领运动的形象是一场运动，它与某些关于地方空间、小社区、直接民主和社会边缘临时自主性的好处的假设相结合。反过来，这些信仰使运动无法在空间上扩展，建立可持续的转变和普遍性。占领运动在创造团结、为不抱幻想和被边缘化的人发声、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一个由预示性岛屿组成的群岛，被一个不可调和的敌对资本主义环境所包围。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国家镇压，在美国各地，穿着防暴装备的警察无情地清理被占领的空间。但是，结构性的原因是建立在运动的假设和实践之中的。没有被占领空间的中心焦点，运动就会分散和碎片化。最终，这些运动的组织形式无法克服可扩展性的问题，无法构建一种能够有效抵抗来自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反应的持久力量形式。在一个规模(也许是一百人)内运作良好的东西，一旦扩展到这个规模以外，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有效运作如果一个真正雄心勃勃的左翼政治要挑战全球行动者——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管理机构、领导政府及其军队和警察部队，以及整个星球上的公司和金融实体——那么，超越仅仅是地方的运作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这些运动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我们的论点是，它们本身在带来大规模变革方面仍然是无效的。

阿根廷

如果说近代史上有什么案例为水平主义的充足性提供了希望，那似乎就是阿根廷，它实现了大规模的全国转向水平主义和工人对工厂的广泛控制。然而，简单看一下阿根廷的经验，实际上揭示了民间政治方法局限性的新维度。在阿根廷的情况下，新的社会组织的迫切需要来自于国民经济的崩溃。受1998年大规模经济衰退的打击，阿根廷经济一蹶不振，到2002年损失了GDP的四分之一以上。2001年12月，紧张局势达到顶峰，政府的限制和金融混乱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其结果是政府垮台，最终导致债务违约。由于政府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帮助人民，人们被迫寻找新的方法来养活自己。

在这些挑战之后，许多阿根廷人承担了自我的责任

组织和创造新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反应是围绕明确的水平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与占领运动一样，在阿根廷的水平运动组织中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好处。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运动能够破坏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常识性规范，超越市场个人主义和消极团结。培养个人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克服大多数抗议和罢工经常面临的来自社会其他部分的对抗。与占领运动一样，阿根廷的水平运动在更大的范围内也迅速为危机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提供了手段

但是，虽然这些水平运动的实验带来了一些成就，但它的经验也揭示了几个进一步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邻里集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所面临的限制。邻里集会以水平主义原则为模型，是对危机所带来的直接需求和可能性的回应。就像占领运动的全体大会一样，它们使人们有了新的声音。但即使在邻里间的集会中联合起来，他们也从未接近取代国家的地步，或者能够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国家的职能——福利、医疗、再分配、教育等等——并不打算被水平主义运动所取代，即使是在其参与的高峰时期。因此，它仍然是对危机的一种局部反应。进一步的限制浮出水面，因为这些集会只能通过要么拒绝有组织的——也就是说，集体的——利益，要么将它们纳入其中，从而被压倒集体利益不可能在不破坏决策过程的情况下被引入决策过程，因为他们经常控制讨论和辩论。有问题的是，这些集会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运作得最好。

阿根廷的其他组织实验包括工人控制工厂的扩张。在经济危机之后，一些倒闭的企业被员工接管并维持。这些工厂帮助工人保住了工作，而且有证据表明，它们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工资。64 .不幸的是，尽管人们给予了这些关注，但涉及的总人数相对较少:最乐观的估计是，大约有250家工厂，雇用的工人不到1万人在劳动力超过1800万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只有不到0.1%的经济参与了工人控制的工厂。这些工厂不仅只占整个经济的一小部分，而且它们仍然必然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逃离之梦仅仅是:一个梦。由于必须创造利润，工人控制的企业可能和任何大型企业一样具有压迫性和环境破坏性，但却没有规模效益。65 .这些问题在工人合作社经验中普遍存在，不仅在阿根廷出现过，而且在萨帕塔模式和整个美国也出现过

除了这些组织限制之外，阿根廷作为后资本主义典范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只是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一剂良药，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随着经济开始改善，参加邻里大会和替代经济的人数急剧下降阿根廷危机后的水平主义运动是对现有秩序崩溃的紧急回应，而不是对运行相对良好的秩序的竞争。事实上，当代水平主义更普遍的问题是，它经常把飓风、地震或经济崩溃之后的紧急情况视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代表退一步说，看到灾后状况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改善，是一种挣扎。一种找到最佳状态的政治

在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崩溃中表达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下意识的生存本能。同样有问题的是，水平主义者倾向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水平组织的世俗方式中寻找政治潜力——朋友聚会、聚会、节日等等问题在于，这种组织模式无法扩展到一个小社区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某些政治目标没有用处。正如阿根廷的例子所示，这些组织模式对于基本的社区生存和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感是有价值的。但水平主义难以与更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竞争，难以在基本的正常水平回归后维持自身，也难以实现长期和大规模的政治目标，如提供全民医疗、高水平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些方法在特殊情况下和小范围目标中仍然有用，但它们既不会彻底改变社会，也不会真正威胁到全球资本主义。

在邻里集会和工人控制的工厂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水平主义的主要组织模式是不够的。它们往往是反应性的策略，无法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敌对环境中竞争。在理论层面，以及“占领”运动和阿根廷运动的实际经验中，过去十年来，水平主义的局限性一再被明确。在认识到水平主义策略为社区提供小规模支持和暂时破坏某些剥削实践的重要能力的同时，对共识，直接行动，特别是预示政治的拜物教版本的承诺，限制了扩大和超越现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

地方主义

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不如水平主义激进，但同样无处不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地方主义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左翼，它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常识，影响着亲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激进主义和主流文化的政治。[69] .在所有这些观点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即现代世界的抽象和庞大的规模是我们当前政治、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办法在于采用“小即是美”的方法来对待世界小规模的行动、地方经济、即时社区、面对面的互动——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地方主义世界观的特征。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政治战略和战术显得迟钝和无效的时代，地方主义具有诱人的逻辑。从中右派的社群主义[70]到伦理消费主义71，从发展性小额贷款[71]到当代无政府主义实践[72]，它所提供的做一些具体事情的承诺，使政治行动能够立即产生明显的效果，在个人层面上是赋权的。但这种赋权感可能会产生误导。地方主义的问题在于，在试图将大规模的系统性问题减少到地方社区更易于管理的领域时，它实际上否认了当今世界的系统性相互联系的本质。诸如全球剥削、全球气候变化、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和资本主义的反复危机等问题，在表面上是抽象的，在结构上是复杂的，而且是非地方性的。虽然它们涉及到每一个地方，但它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区完全表现出来。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系统的、抽象的问题，需要系统的、抽象的回应。

虽然右翼的许多民粹主义地方主义很容易被斥为倒退的大男子主义幻想(例如，分离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为紧缩经济(英国保守党的“大社会”)或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的指责)提供险恶的意识形态掩护

结构性经济问题的移民)，左派的地方主义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审视。虽然毫无疑问是善意的，但激进左翼和主流左翼都参与了地方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这对他们是有害的。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批判性地研究两种更流行的变体——地方食品和经济地方主义——它们在非常不同的领域中例证了地方主义普遍存在的问题。

当地食物

最近，地方主义在有关食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典型的政治圈子。在这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被称为“慢食”(slow food)和“土食主义”(locavorism)的相互关联的运动。慢食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意大利，部分原因是为了抗议快餐连锁店日益增长的侵占。慢食，顾名思义，代表了麦当劳所没有的一切:当地食物、传统食谱、慢食和高技能的生产正是食物最真切地体现了慢生活方式的好处，克服了快节奏资本主义的变迁，回归到品尝美食和传统生产技术的古老文化但就连慢食的支持者也承认，慢食的生活方式有困难:“我们中很少有人有时间、金钱、精力或自律来成为慢食的典范。”’ 75

如果不评估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被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所构成的，这些压力使得吃预先准备好的食物比接受慢食的生活方式更容易，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带有享乐主义扭曲的道德消费主义的变体。花时间享受一顿精心准备的饭菜可以是一种愉快的经历，这显然是正确的。对一顿饭的关注将这种体验从纯粹的实用转变为一种更具社交性和审美性的体验。但是，我们不经常选择这样做是有结构性原因的——这些原因并不是任何个人道德沦丧的结果。例如，工作的结构是我们许多人无法享受慢食或按照慢食运动的理念准备的饭菜的主要原因。慢食可能并不总是需要钱，但它总是需要时间。对于那些不得不打多份工来养家的人来说，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更重要的是，慢食的性别政治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男权社会，大部分食物的准备工作仍然被认为是妻子和母亲的任务虽然“快餐”或预先准备好的饭菜可能不健康，但它们的流行使妇女能够解放出来，过较少每天为养家糊口所做的苦差事的生活虽然慢食运动乍一看是无辜的，但它像许多其他形式的道德消费主义一样，未能大规模地思考其理念如何在贪婪的资本主义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发挥作用。

与慢食运动密切相关的是土食主义和“100英里饮食”——一种强调在当地饮食的食物政治。本土素食主义认为，本地采购的食物不仅更健康，而且是我们减少碳排放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减少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它将自己定位为对全球问题的回应。此外，土食主义声称是克服资本主义下我们与食物关系异化的一种方式。通过食用在我们当地种植或生产的食物，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运行的，我们将能够重新接触到我们的食物生产，并把它从一个已经横行的资本主义的死人手中收回来与慢食运动相比，土食主义在政治上更明确地反对全球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吸引了一群民间政治观念，这些观念与当地作为政治行动的地平线的首要地位以及农业的美德有关

地方高于全球，直接高于中介，简单高于复杂。

这些观点往往将复杂的环境问题浓缩为个人伦理问题。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本质上也是集体的)危机之一被有效地私有化了。这种个性化的环境伦理体现在地方主义的食品政治中——尤其是对当地种植的食品的道德(和价格)溢价。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生态动机的论点(例如，通过减少食物运输的距离来减少能源消耗)与阶级分化(以旨在促进对有机食品的认同的营销形式)相结合。同样，复杂的问题也被浓缩成表述不佳的简写。例如，“食品里程”的概念——确定食品运输的距离，以减少碳排放——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它常常被认为足以作为道德行为的指南。正如英国农业和食品部2005年的一份报告所发现的那样，虽然运输食品对环境的影响确实相当大，但以总食品里程为基础的单一指标不足以作为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食品里程度量法强调的是食品生产中对总碳排放量贡献相对较小的一个方面。当我们简单地假设“小即是美”时，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在当地生产食物相关的能源成本可能远远超过将食物从更适宜的气候中运输出来的总成本即使是为了评估食物运输的贡献，食物里程也是一个糟糕的度量标准。例如，空运在食品总里程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在与食品有关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却大得不成比例把食物端上我们的盘子所消耗的能量是很重要的，但它不能用食物里程这样简单的东西来衡量，也不能用“本地最好”的观念来衡量。事实上，效率极低的本地食品生产技术可能比高效种植的全球采购食品成本更高。这里更大的问题涉及我们对我们生产的食物类型的优先考虑，如何控制生产，谁消费这些食物以及以什么成本消费这些食物。

地方主义的食品政治将其试图解决的复杂性扁平化为一个简单的二元:全球的，坏的;本地的，好。相比之下，我们需要的是用不那么简单的方法来看待复杂的问题——一种把全球粮食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分析，而不是像食物里程或“有机”食品与“非有机”食品这样直观的简略公式。全球粮食生产的理想方法很可能是地方倡议、工业化农业实践和全球分配系统的某种复杂混合。同样有可能的是，能够计算出种植和分配食物的最佳方法的分析超出了任何单个消费者的掌握范围，需要大量的技术知识、集体努力和全球协调。一种只看重本土的文化无法很好地服务于这一切。

地方经济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地方主义，都代表着一种放弃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大系统所涉及的规模问题和政治的尝试。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系统性和全球性，它们需要同样系统性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行动必须始终发生在地方一级——事实上，一些地方主义的想法，如弹性，可能是有用的。但作为意识形态的地方主义走得更远，它拒绝进行可能指导和协调地方行动的系统分析，以对抗、反对和潜在地取代全球权力或迫在眉睫的行星威胁的压迫性实例。地方主义解决方案的无能无处不在

挑战复杂的全球问题，而不是朝着本地化的商业、银行和经济发展。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义左派出现了许多改革经济和货币体系的趋势。虽然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用的，但其中一个突出的部分侧重于通过本地化改造经济体系。按照这种思路，大企业的问题不在于其固有的剥削性质，而在于所涉及企业的规模。小型企业和银行应该更能反映当地社区的需求。

最近一个流行的运动，“转移你的钱”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如果银行的规模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那么客户应该把他们的资金集体转移到更小、更有道德的机构。像这样的道德消费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有效行动的表象——它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系统问题的有意义的叙述，并指出了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简单而无痛的行动。与大多数民间政治行动一样，它具有做了一些事情的所有外观和感觉。大银行被定位为坏人，个人只要把钱转移到较小的地方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就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这个模型忽略了现代银行体系的复杂抽象。货币流通是立即全球化的，并与其他所有市场立即相互关联。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家小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存款超过了它在当地进行再投资的盈利能力，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更广泛的金融体系中寻求投资。事实上，阅读一下美国小银行的账目就会发现，它们和其他人一样参与并为同样的全球金融市场做出贡献——投资于国债、抵押贷款或公司债券，同时经常参与与大银行一样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贷款活动虽然这显然是一项改革措施，但“转移你的资金”至少可能会导致美国银行体系的构成发生一些变化。然而，截至2013年9月，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六大银行持有的总资产增加了37%。事实上，以所有可用的指标衡量，如今美国大型银行的规模都比危机爆发之初更大，占美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67%虽然世界各地的立法努力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对导致危机的活动施加限制(要求提高资本资产比率，并定期进行“压力测试”，以避免进一步的救助)，但风险贷款仍在继续，风险衍生品的持有仍处于惊人的高水平

如果限制最大银行规模的地方主义者的努力注定要失败，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复制构成欧洲大陆银行体系大部分的一些地方银行的替代运动呢?例如，德国银行业的70%由社区银行或较小规模的银行组成他们的支持者认为，德国和瑞士的社区银行共同分担风险，为双方所有，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可以利用当地的知识，因此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总体上保持盈利还有人认为，这种类型的地方银行比美国和英国更常见的大型机构更有可能向小企业提供贷款。一些地方银行模式有其优势，但其稳定性往往被夸大了。例如，尽管西班牙的社区银行*(cajas)*高度本地化并受社区控制，但在21世纪头十年，它们在属性和其他投机性投资中承担了重大风险，在2008年危机之后，有必要进行彻底的金融重组。尽管在所谓的有社区代表的董事会的控制下，投资决策实际上是在几乎没有适当监督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这里，地方化意味着所谓的无私政治化

88 .治理委员会，把一些储蓄银行变成地方政府投资投机性属性计划的平台，因为裙带关系的文化根深蒂固由于西班牙最严重的银行业危机集中在地方银行，重组意味着地方银行合并，形成更大的机构。即使在经常被吹捧为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本土化银行体系的德国，一些地方银行也存在问题。例如，地方银行(Landesbanken)大量投资于结构性信贷产品，而这些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尤为糟糕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小型机构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能使它们抵御当代金融最严重的过度行为——而且，在今天，将地方银行与全球银行彻底分离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政治捕获、寻求超越当地可用投资的有利可图投资的需要，以及风险更高的投资的高回报，都是导致地方银行参与更广泛金融体系的因素。即使是共同所有权也不能保证金融诚信，正如英国合作银行(Co-operative Bank)最近的阵痛所证明的那样，该银行在2009年收购一家建房互社(building society)后考虑不周，几乎完全倒闭。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问题只能通过拆分金融权力来妥善解决。无论是通过广泛监管(就像战后凯恩斯主义短暂实现的那样)，还是采用更具革命性的方法，都能解决这一问题。盲目迷恋小的和地方的东西，似乎只是一种忽视更重要的方式的手段，这些方式可以使体系变得更好。

抵抗是徒劳的

一种民间政治情绪在激进的水平主义者和更温和的地方主义者运动中都表现出来，然而类似的直觉支撑着当代左翼的广泛范围。在这些群体中，一系列的判断被广泛接受:小就是美，地方就是道德，简单就是更好，永恒就是压迫，进步已经结束。这些观念比任何反霸权计划——一种可能在最大规模上与资本主义权力抗衡的政治——都更受青睐。因此，在其核心，许多当代民间政治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悲观主义:它假设我们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集体社会变革”。91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在左派中横行——考虑到过去三十年持续不断的失败，也许有充分的理由。

对于中左翼政党来说，怀念逝去的过去是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事情。在这里可以找到的最激进的内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梦想和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然而，曾经使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建立在有序工厂环境的生产范式之上的，在那里(白人，男性)工人获得了安全和基本的生活标准，以换取一生的无聊和社会压迫。这样的体系依赖于帝国、殖民地和不发达外围的国际等级制度;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国家等级制度;以及女性屈从的僵化的家庭等级制度。此外，社会民主依赖于阶级之间的特殊力量平衡(以及他们之间妥协的意愿)，而即使是这样，也只有在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破坏之后，以及面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外部威胁时才有可能。尽管许多人可能会有怀旧之情，但这种政权既不受欢迎，也不可能恢复。但更切题的一点是，即使我们可以回到社会民主主义，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而社会民主主义对就业和增长的坚持，意味着它永远会站在资本主义一边，以牺牲人民为代价。与其把我们的未来建立在怀旧的过去之上，我们

我们应该致力于为自己创造一个未来。超越当下约束的行动，无法通过回归一种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资本主义是由对过去模糊的回忆重建而来的。

虽然怀念逝去的过去显然不是一种恰当的回应，但今天对抵抗运动的广泛颂扬也不是。抵抗总是意味着对另一种积极力量的抵抗。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防御和反应的姿态，而不是一种主动的运动。我们不抵制一个新世界的形成;我们以旧世界的名义进行抵抗。因此，当代对抵抗的强调掩盖了对扩张性资本主义侵犯的防御立场。例如，工会将自己定位为抵抗新自由主义，要求“拯救我们的医疗系统”或“停止紧缩”;但这些要求只是揭示了运动核心的一种保守倾向。根据这些要求，在面对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时，人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就是小小的障碍。我们只能努力保持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尽管它可能是有限的和充满危机的。即使在左倾的拉丁美洲，这种趋势也很明显，最显著的成功主要是围绕着阻碍跨国公司的努力，特别是在采矿方面在许多圈子里，抵抗运动得到了美化，在激进言论的面纱后面掩盖了这种立场的保守性质。抵抗被认为是所有可能的，而建设性的项目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抵抗是重要的，但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任务中，抵抗是徒劳的。

其他运动主张一种撤退的方法，即个人退出现有的社会制度。横向主义与这种方法密切相关，它以拒绝现有制度和创造自治形式的社区为基础。事实上，最近的行动主义历史已经趋向于这样的方法这些方法通常明确地反对复杂的社会，这意味着隐含的最终目标是某种形式的社群主义或无政府原始主义另一些人则建议隐姓埋名，以逃避国家的侦查和镇压在极端情况下，一些人主张相当于左翼生存主义的观点:文明处于灾难之中，98因此我们应该隐形，99撤退到小公社，100并学习如何种植粮食，狩猎，治疗和保护自己如果停留在生存主义的层面，这些立场虽然可能不吸引人，但至少会有一些一致性。它们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自己的含义持开放态度。然而，支持退出和退出的论点太容易混淆与资本主义*分离*的社会逻辑与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逻辑——或者，更有力地说，是对资本主义逻辑*构成威胁*的社会逻辑然而，资本主义已经并将继续与广泛的不同实践和自治空间兼容。西班牙的马里纳莱达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小社区(流行)2700人)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它征用土地，建造自己的住房和合作社，保持低生活成本，并为每个人提供工作。然而，这种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法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住房材料由地方政府提供，农业补贴来自欧盟，工作是通过拒绝使用节省劳动力的设备来维持的，收入仍然来自在更广阔的资本主义市场上销售商品，企业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竞争和全球金融危机马里纳莱达只是一个例子，说明退出、逃离或退出资本主义的计划仍然包含在一个民间政治的视野中，在这个视野中，保护自主性的小掩体免受资本主义的冲击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事情。然而，我们认为，不仅可以有更多的希望(和实现)，而且，在缺乏广泛和系统的争论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

小范围的抵抗可能会被迅速消除。

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

水平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抵抗和退缩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如何进行政治活动的民间政治直觉。而它们都不足以胜任改造资本主义的任务。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应该被全盘拒绝。正如本书的其余部分将阐明的那样，这些方法中有一些重要的元素需要保留。民间政治并非本质上是恶意的，它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不充分的。例如，各种水平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关于权力、统治和等级制度的重要问题——但它们并没有对此做出充分的回应。民间政治作为一种倾向，从一开始就试图消除这些问题，从而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困难。然而，在一个支配、权力、等级和剥削强加于我们的世界里，这些问题必须直接面对，而不是逃避同样，在一种陈腐的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性的。我们对我们附近的事物采取行动，以改变更大的政治结构。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当地的事物。但今天的民间政治倾向唤起了一种更强烈的地方政治意识:为了避免复杂而抽象的社会问题而退回到地方;对本地的真实性和自然性的假设;以及对可能超越本地的可扩展和可持续实践的忽视。虽然所有的政治都始于地方，但民间政治仍然*是地方性*的。

最后，民间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在于它倾向于坚持的特定策略和实践，而在于它所处的总体战略愿景。抗议、游行、占领、静坐和封锁都有它们的位置:这些策略本身都不是本质上的民间政治。但是，当它们被一种将暂时的、小规模的变化视为成功的地平线的战略愿景所组织，或者当它们被外推到使它们有效的特定条件之外时，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会与民间政治思维捆绑在一起。例如，如果采用占领的策略是为了创造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范例和临时空间，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无法实现实质性的变革。另一方面，如果它被理解为一种产生团结网络并动员它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机制，那么它可能在更广泛的反霸权战略中仍有用处。但是，这种关于任何特定行动的优点和局限性的战略反思，是今天太多左派所缺乏的。众多的抗议、游行和占领活动通常没有任何战略意识，只是作为分散的、独立的抵抗活动。人们很少考虑如何将这些不同的行动结合起来，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有时会取得成功，但很少考虑到这些行动如何有助于实现中期和长期目标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右派是如何进行这种战略性反思，并精心策划了一种局面，使新自由主义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常识。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3

他们为什么会赢?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形成

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

Milton Friedman

如果我们的时代被一种霸权意识形态所主导，那就是新自由主义。人们普遍认为，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最有效方式是允许工具理性的个人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相比之下，国家法规和国家工业被视为扭曲和低效，阻碍了自由市场固有的生产动力。今天，这种关于经济应该如何运行的观点，被其批评者和支持者视为基准。新自由主义为现实的、必要的和可能的事情设定了议程。虽然2008年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对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信仰，但它仍然是我们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以至于它的批评者也很难描绘出连贯的替代方案。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完全从米尔顿·弗里德曼或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中形成的，甚至也不是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它的全球霸权也不是不可避免地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生的。

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来看，它是一种边缘理论。它的追随者发现很难找到工作，经常没有终身教职，并受到凯恩斯主义主流的嘲笑新自由主义远没有成为它最终会成为的主宰世界的意识形态。本章将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一小群新自由主义者是如何如此彻底地重塑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从来不是既定的，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终点。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项目，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成功在于巧妙地构建了一种意识形态和支持它的基础设施，并以一种非民间政治的方式运作。本章旨在表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扩张性的普遍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普遍化逻辑从卑微的开始，使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渗透到媒体、学术界、政策界、教育、劳动实践以及日常人们的影响、感受和身份。因此，本章主要关注新自由主义霸权是如何构建的，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具体内容。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它如何能够改变全球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结构。

新自由主义的标准历史常常忽视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这种意识形态架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如何系统而精心地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史前时期，我们可以辨别出另一种政治行动模式——一种逃避民间政治限制的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史前史为任何未来的左翼纲领提供了一个可以简单复制的模式;相反，它是一个有益的案例研究，说明右翼如何能够超越民间政治，创造一种新的霸权。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偶然性、斗争、集中行动、耐心和宏大战略思考的历史。它是一种灵活的思想，根据历史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它所遇到的具体情况:从上世纪40年代的德国、70年代的智利和80年代的英国，到本世纪头十年后侯赛因时代的伊拉克。这种多功能性使新自由主义有时成为一个矛盾的项目，但它的成功恰恰在于将这些矛盾转化为富有成效的紧张关系

这些矛盾和变化导致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一词毫无意义，应该被降级为论战。但这个词有一定的有效性，即使它经常被松散地使用。在普遍的感知中，新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对自由市场的赞美——这一立场也需要对自由贸易、私人属性权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承诺。然而，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有问题的，因为许多表面上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并不坚持自由市场政策。其他人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尽可能灌输竞争的基础上的这对推动私有化是有意义的，但它无法解释新自由主义内部关于竞争是否是一种终极善的辩论有些人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内部的这些紧张关系，并认为它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政治项目，而不是经济项目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表面上看，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据称从中受益的资产阶级长期拒绝。

我们的观点是，与流行的表述相反，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一个重要的角色归于国家因此，新自由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国家并重新定义它的用途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尊重一个据称超出国家控制的自然化领域(人类和市场的自然法则)，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市场不是“自然的”。市场不会随着国家的退出而自发地出现，而是必须有意识地构建，有时是从头开始构建例如，公地(水、新鲜空气、土地)、医疗保健或教育没有自然的市场这些市场和其他市场必须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物质、技术和法律结构来建立。碳市场的建立需要数年时间;波动性市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金融模型的一种功能;甚至最基本的市场也需要复杂的设计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国家在创造“自然”市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在维持这些市场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捍卫属性权利，执行合同，实施反垄断法，压制社会异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价格稳定。尤其是后一种需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大大扩展为通过央行对货币问题进行全方位管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目的仅仅是退出市场，那么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干预不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崩溃的症状，而是其核心功能的症状:不惜一切代价创造和维持市场然而，从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到现在，这是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支配着那些向市场注入数万亿美元的人。

新自由主义思想集合体

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在地理上和思想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30年代的芝加哥和伦敦，以及30年代和40年代的德国，都可以找到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元素。在这几十年里，民族运动在学术界的边缘工作，以维持自由主义思想。直到1938年，这些独立的运动才开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巴黎举行的沃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促成了他们的第一个跨国组织。这一事件第一次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新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它聚焦于古典自由主义在集体主义崛起面前的历史退潮，也正是在这里迈出了巩固一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第一步。这一事件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国际自由主义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d ' Études pour la r<s:1> novation du libsamalisme)，其明确目标是发展和传播一种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迅速终结了这个组织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参与其中的人们将继续为发展新自由主义而努力。全球新自由主义基础设施的种子已经种下。

哈耶克的思想最终将这种基础结构动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并开启了新霸权的缓慢崛起由于沃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被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的猛烈冲击所淹没，新自由主义初期的跨国基础设施必须重建。1945年与一位瑞士商人的偶然会面给了哈耶克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的经济手段由此诞生了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 MPS):一个封闭的知识分子网络，为新自由主义的发酵提供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新自由主义创立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出席了1947年的第一次会议，其中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英国自由主义者、芝加哥学派、德国自由主义者和法国的一支队伍

从一开始，MPS就有意识地专注于改变政治常识，并寻求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它明确地认识到，这种知识框架随后将通过智库、大学和政策文件积极地过滤下来，以便使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化并最终垄断哈耶克在给他邀请的人的一封信中写道，MPS的目的是

> 在制定一项有机会获得普遍支持的计划时，争取最优秀的人才的支持。因此，我们的努力不同于任何政治任务，因为它本质上必须是一项长期的努力，所关心的不是立即可以实现的东西，而是如果要避免目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就必须获得优势的信仰

因此，学会承诺在“思想之战”中进行一场长期的阵地战……因此，私有化的、战略性的、精英的审议被确立为一种运作方式。[23]在为期十天的会议开幕式上，哈耶克诊断了新自由主义者的问题:缺乏对现有(凯恩斯主义)秩序的替代。没有“反对派团体一致的哲学”，也没有变革的“真正纲领”由于这一诊断，哈耶克将MPS的中心目标定义为改变精英意见，以便建立民意形成的参数。与普遍的假设相反，资本家最初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MPS的一项主要任务是教育资本家为什么他们应该成为新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有效行动的愿景是在政治常识的无形框架上运作，这种框架是由精英网络中流传的思想形成的。从它的起源开始，MPS就避开了民间政治，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工作，通过抽象地工作(在现有可能性的参数之外)，通过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概念来占领地形-即精英意见-以改变政治常识。

在这一套目标的背后，有一个关于新*自由主义新事物的一致但高度灵活的解释*。分歧出现了，特别是在国家在维持竞争秩序方面的作用;一些人认为干预对于维持竞争是必要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干预是垄断和中央集权的根源关于其他特定政策立场的争论分歧较小，表明这远不是一个同质或统一的群体。在许多方面，共同的因素仅仅是社会网络本身，它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自由主义然而，这种内在的多元性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传播时得以培育和变异，使其在适应每个空间的特殊性方面具有霸权力量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使它能够出色地执行其将不同群体纳入总体共识的霸权功能

这些辩论也延伸到战略问题。圣佩林山的许多成员和出资人对哈耶克的长期方针感到不耐烦，想立即开始出版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以影响公众在凯恩斯主义占主导地位、经济稳定增长和低失业率的情况下，哈耶克敏锐地意识到，改变公众舆论的可能性不大。协会的战略是自觉的长期战略，哈耶克的观点最终在会议中胜出。在这些会议之外，围绕MPS的网络开始积极构建广泛的跨国意识形态传播基础设施。哈耶克至少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开始计划建立一个智库体系，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同时努力将社会成员安置在政府职位上(这一战略最终产生了三位国家元首和一大批内阁部长)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学会结盟的智库大量涌现，新自由主义思想随后扩散到学术和政策领域。

在英国，MPS的目标是由智库和其他组织组成的网络来实现的，比如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和一系列较小的团体。MPS要进入美国政坛，首先是通过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等智库，然后是通过更正式的职位，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总统期间担任经济顾问。然而，正是在德国，新自由主义首先取得了组织和政策上的成功。

并非如此试探性的步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正是德国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经济困难——既包括魏玛共和国众所周知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艰巨的重建工作。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时，德国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其指导者是一些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Walter Lippmann symposium)的新自由主义者。鉴于德国国家的彻底崩溃，战后重建规划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重建国家——具体来说，如何在没有已经到位的功能性国家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产生合法性。答案可以在早期自由主义人士提出的理念中找到:建立一个经济自由的空间。这进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联系网络，从而产生了战后新生的德国国家的合法性。人们认为，国家的合法性不是来自法律上的合法性，而是来自运转良好的经济正是这种观点为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政策实验提供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自由主义者开始进入政府职位并实施他们的思想，为塑造经济意识形态奠定了物质和制度上的立足点。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具历史意义的职位，是任命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为战后英美军事行政区的经济理事会(directorate of economics)主席。在另一位世界自由主义者威廉Röpke的支持下，艾哈德同时取消了所有现有的价格和工资管制，并大幅削减了所得税和资本税。这是一次激进的解除管制的行动，迫使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并开启了冷战。[33]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占据了德国经济部的重要职位，艾哈德本人于1963年成为总理。但是，尽管他们有这样的意图，但他们在合法和非法的政府干预之间缺乏原则性的区分——这种模糊性促进了德国经济向日益凯恩斯主义形式的转变。维持竞争的干预逐渐转变为提供福利的干预，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已成为一个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政策领域遇到的困难并没有阻止新自由主义在其他领域的创新，尽管——尤其是在所谓的“二手交易商”的思想空间。

二手交易商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强调利用各种场所影响精英、构建新常识的重要性。在战后时代，这种方法跨越了学术界、媒体和政策界。但新自由主义巩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创新之一是使用智库。虽然它们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MPS对它们的广泛使用是一种新鲜事物。它涉及发展政策论点，建立政策解决方案和瞄准经济罪魁祸首。非正式的劳动分工建立起来，一些智库专注于大的哲学思想，目标是正统凯恩斯主义立场的假设和基本原理——这是曼哈顿政策研究所(MIPR)在20世纪70年代所采取的任务。——而另一些则旨在提出更直接的公共政策建议。这些都是明确的尝试，以脱离主流世界观，以便随后引入基于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具体政策解决方案。

安东尼·费雪的形象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建立至关重要作为UK第一个新自由主义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的创始人之一，费舍尔明确指出，改变思想最困难的部分不在于它们的产生，而在于它们的传播。由于这种信仰，费舍尔不仅在UK，而且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和美国(MIPR)大力参与建立保守派智库。IEA本身关注的是“那些被哈耶克称为思想‘二手交易商’的人，即那些决定国家长期思想的记者、学者、作家、广播公司和教师”。[35]其明确的意图是改变英国精英的意识形态结构，渗透并微妙地改变话语的条件。这也巧妙地延伸到了IEA本身的使命上，它在自己的目标上保持着一种欺骗性的立场，将自己呈现为一个专注于一般市场研究的非政治性组织[37]。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接管的设想，IEA制作了简短的小册子，目的是使主流读者尽可能容易理解此外，这些文本是以某种乌托邦的方式编写的，没有考虑到一项政策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实施

瞬间目标，一如既往，是对可能性的长期重新定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干预发展了广泛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39] .IEA及其同事所构建的不仅仅是对当今流行问题的单一问题的回应，而是一种系统的、连贯的经济观点智库通过教育和社会化新兴政党成员，逐渐灌输了这种世界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许多成员都曾在IEA任职IEA努力的结果不仅是微妙地改变了英国的经济话语，而且使两项特定政策变得自然化:攻击工会力量的必要性，以及货币稳定的必要性。据称，前者将让市场自由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而后者将提供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基本价格稳定。

在美国，也建立了智囊团和学术研究小组来推动广泛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传统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个MIPR旨在通过撰写面向大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书籍来重新定义政治常识，其中一些书籍最终销量超过50万册。其他一些书，如查尔斯·默里的《*失地*》，为政策转变奠定了基础，如今，政策转变将福利依赖而非贫困本身视为核心社会问题。其他许多广为流传的政策理念，如零容忍政策和福利政策，都源于MIPR这个政策工厂。mipr的书成功地实现了改变政治阶层和公众常识的目标。智库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成功中是如此不可或缺，以至于创建智库的过程本身就被制度化了。1981年由费雪创立的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就宣称其明确的目标是“将这个帮助建立新智库的过程制度化”。今天，阿特拉斯夸耀自己已经帮助创建或连接了8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新自由主义智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础设施的庞大规模在这里完全透明。

除了智库之外，还有各种其他机制被用来建立霸权话语。在努力将芝加哥品牌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选择的过程中，米尔顿·弗里德曼撰写了大量的专栏和报纸专栏，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了电视采访，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企业资助了一些项目，把他的作品改编成流行的电视节目，在媒体领域掀起了一股风暴这些技术工具是他用来向决策者和公众传播他的经济愿景的重要手段。《*华尔街*日报》、《*每日电讯报*》和《*金融时报*》等报纸与这一努力并行，利用一切机会援引新自由主义政策来塑造公众的观点商学院和管理咨询公司也开始采纳和传播有关公司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芝加哥学派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球灯塔这些机构对于新自由主义霸权的传播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往往是全球精英的训练基地个人会来到这些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校，然后带着灌输给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回到自己的国家。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一个全面的基础设施已经发展起来，可以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智库和乌托邦宣言组织了长期思考;面向公众的演讲、小册子和媒体努力勾勒出新自由主义常识的总体轮廓;而政治家和政策提案则对政治地形进行了战术干预然而，尽管凯恩斯主义的霸权潜力日益增强，但在撒切尔和里根上台仅仅10年之前，它仍然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组织国家和市场的方法。这群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仍然随处可见

是对大萧条前失败政策的愚蠢倒退。但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十年将使凯恩斯主义陷入混乱，并将新自由主义奉为经济现代化的卓越模式。

把握方向盘

在取得全国性进展后，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在国际上获得重要地位，作为对高失业和高通胀双重压力的回应——这两种压力都源于石油危机、一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工资上涨和信贷扩张。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当失业率上升时，政府应该通过向经济投入资金来刺激经济，但当通货膨胀上升时，政府应该从经济中撤出资金，以减缓价格上涨。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问题同时出现了——通胀上升和失业率上升，或称“滞胀”。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解决方案无法处理这种结合，因此似乎决定转向替代理论。重要的是要清楚，在这一点上，对经济问题的多种解释是可能的。通过工资僵化和工会力量产生通货膨胀并不是唯一可能的问题框架，新自由主义也不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有其他的解释，有可能有其他的答案;此刻，谁也不知道出路是什么例如，新自由主义对危机的描述淡化了UK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Anthony Barber)在上世纪70年代初对银行业放松管制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起的作用。这些放松管制引发了基础货币的激增，随后物价通胀飙升，然后是工资通胀换句话说，另一种说法是可能的，即问题不在于强大的工会，而在于放松管制的金融。

新自由主义的故事之所以胜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思想的追随者在过去几十年里构建了意识形态基础设施。新自由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一贯主张，通货膨胀是福利国家不愿打破工资和价格僵化的必然结果。他们既有对问题的诊断，也有解决方案。面对危机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政府官员在新自由主义中找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因此，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对知识霸权的长期建构，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权力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只有危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感知到的——才会产生真正的变化。”当危机发生时，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能:制定现有政策的替代方案，使它们保持活力和可用性，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51本节目单将详细阐述上世纪70年代危机中发生的事情。如果对危机的另一种分析被接受，它将需要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反应。例如，政治家本可以通过重新监管信贷创造来应对，而不是攻击劳动力的力量。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不是必然的结果，而是一种政治建构

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最终能够解释滞胀，但为时已晚，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已经接管了学术经济学和政策世界。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霸权主义。1979年之后的十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保罗·沃尔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面临同一性危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迅速被渗透，并在20世纪80年代转变为真正的新自由主义信仰的坩埚。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在密特朗执政期间转向新自由主义，欧洲主要经济体受到欧盟宪法具身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约束。在美国和UK，发起了一波针对劳工权力的系统性攻击。一件一件地，工会被拆除，劳动法规被废除。资本管制被放松，金融管制被解除，福利国家开始被清理出有利可图的部分。

在欧洲和北美以外，新自由主义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的军事政变后强加于智利和阿根廷。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是打破传统的原社会主义霸权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关键时刻此外，随着USSR的解体，在西方经济顾问的推动下，东欧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浪潮。据估计，前苏联国家的这些私有化政策导致了一百万人死亡，证明私有化可能和集体化一样致命，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远非不流血的事情随着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苦难、死亡和独裁。这是一个规范的政权，它强迫自己进入世界人口的日常精神和身体现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USSR的解体，新自由主义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政策得到扩展，在英国新工党和克林顿的美国政府中得到巩固，以及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达到了霸权的顶峰。20世纪70年代的新经济时刻很快被公众所遗忘，新自由主义呈现出撒切尔“别无选择”的学说所支持的普遍和自然的特质。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识，被每一个掌权的政党所接受。左派或右派获胜无关紧要;新自由主义已经把牌堆好了。

不可能变成必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自由主义通过分工来宣传其意识形态——学者塑造教育，智库影响政策，平民主义者操纵媒体。新自由主义的灌输涉及构建霸权世界观的全方位工程。一种新的常识被建立起来，它吸收并最终主导了“现代性”和“自由”的术语——这些术语在50年前会有非常不同的内涵。今天，说到这些词，几乎不可能不立即援引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戒律。

我们今天都知道，“现代化”意味着裁员、削减福利和政府服务的私有化。今天，“现代化”仅仅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化。“自由”一词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沦为个人自由、脱离国家的自由，以及在消费品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与USSR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西方世界的人民动员起来支持任何声称重视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由于强调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能够吸收围绕“自由主义、同一性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组织的运动的元素。[55]同样，通过强调脱离国家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能够吸引无政府资本主义和1968年5月爆发的欲望运动。[56]最后，由于自由的概念被限制在市场的自由，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吸收消费主义的欲望。在生产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可以

还要在工人中招募对灵活劳动力的新愿望——这种愿望很快就会变成反对他们的愿望在争取并成功地占领现代性和自由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已经设法无情地蜿蜒进入我们的自我概念。在霸占现代化和自由等术语的含义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已经证明了自己是过去五十年来唯一最成功的霸权项目。

因此，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存在的形式*——我们被引导去做我们自己，与他人和我们自己联系的方式”。[58]换句话说，不仅仅是政治家、商界领袖、媒体精英和学者被纳入了这种世界观，工人、学生、移民——以及其他所有人也都被纳入了这种世界观。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创造了主体。从范式上讲，我们被建构为竞争主体——一个包含并超越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主体的角色。新自由主义的必要性驱使这些主体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自我完善。永久的教育，无所不在的就业要求，以及不断的自我改造的需要，都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是一体的此外，竞争性主体跨越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鸿沟。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就像他的工作生活一样与竞争紧密相连。在这样的条件下，焦虑在当代社会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一系列的精神病理学都被加剧了:压力、焦虑、抑郁和注意力缺陷障碍日益成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常见心理反应至关重要的是，日常新自由主义的建构也一直是政治被动的主要来源。即使你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它的影响仍然会迫使你陷入越来越不稳定的境地，越来越倾向于创业。我们需要钱来生存，所以我们推销自己，做多份工作，压力和担心如何支付房租，在杂货店省钱，把社交变成网络。考虑到这些影响，政治动员成为一个永远被推迟的梦想，被日常生活的焦虑和压力赶走。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产生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强加。霸权，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一种建立在民众非常真实的欲望之上的东西。新自由主义霸权利用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思想、渴望和动力，动员并承诺实现那些可能与其基本议程一致的东西。对个人自由的崇拜，努力工作的价值，从死板的工作周中获得的自由，通过工作实现的个人表达，对精英政治的信仰，对腐败的政治家、工会和官僚机构的怨恨——这些信仰和欲望在新自由主义之前就存在，并在新自由主义中得到表达弥合了左翼和右翼的分歧，今天的许多人只是对他们所看到的其他人在利用这个制度感到愤怒。对富人逃税者的仇恨很容易与对穷人福利骗子的厌恶结合在一起;对压迫性雇主的愤怒与对所有政客的愤怒变得难以区分。这与中产阶级身份和抱负的传播有关——对房屋所有权、自力更生和企业家精神的渴望得到培养，并扩展到以前工人阶级的社会空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其生活经验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术难题而存在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寄生于日常经验的东西，任何错过这一点的批判性分析都必然会错误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在当今社会的深层根源。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不仅塑造了精英的观点和信仰，还塑造了日常生活本身的规范结构。[64] .新自由主义者的特殊利益已经普遍化，也就是说，霸权化了新自由主义构成了我们的集体常识，

使我们成为它的主体，不管我们信不信

左派的朝圣之旅?

人们经常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成功(尽管失败了，但它仍在继续成功)，是因为它得到了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持——跨国精英、金融家、大公司的主要股东。虽然这些利益肯定有助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效力，但这样的解释仍然留下了一些未解之谜。如果精英的支持足以使意识形态取得成功，如果新自由主义显然有利于精英，那么从最初的构想到实施之间就不会有40年的延迟。相反，凯恩斯主义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占主导地位，尽管它限制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在1929年的大崩盘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之后，金融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边缘化。维持凯恩斯主义共识的权力机制需要被一点一点地拆解。同样，对新自由主义成功的解释仅仅依赖于它与特定精英利益的兼容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对20世纪70年代问题的其他可能的回应从未得到实施。新自由主义最终在意识形态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既存在危机，也存在现成的解决方案。危机(滞胀)是当时任何政府都不知道如何应对的危机，而解决方案则是在其意识形态生态中发酵了几十年的先入为主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者为自己的立场提出了更好的论据(理性政治话语的神话);而是构建了一种制度性的基础设施来投射他们的思想，并将其确立为政治精英的新常识。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重要的教训值得学习，这导致一些人呼吁建立左派的圣山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这段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表明，右翼最近的最大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自由主义霸权——是通过非民间政治手段实现的。这意味着，首先，新自由主义是以长远的眼光来思考的。这与选举周期和个人抗议的盛衰都是不同的暂时性。相反，左派可以学习的是，MPS如何耐心地制定明确的目标，并分析他们的历史结合的地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出具体而有效的方法来改变地形。它着眼于长期变革，等了40年才迎来凯恩斯主义危机和里根和撒切尔的出现。在采取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抽象地从可能性的角度进行思考: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不可能的事情在后来变成了可能，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行动和准备。其次，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反霸权计划，推翻围绕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共识。他们采取了全方位的方法来改变霸权条件，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能够渗透到每一个政治问题和每一个政治常识纤维中。它推翻了当时的霸权思想。正如菲利普·米罗斯基所写，他们的战略天才是

要认识到，仅仅把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愿景作为政治行动的最终动机是不够的;取得胜利的干部是能够同时提出一整套看似无关的政治建议的一方，这些建议处理行动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视野，将知识制度和临时结果结合起来，从而使最终结果是城邦的无情运动越来越接近最终目标。同时进行短期博弈和长期博弈的精明策略，表面上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是相互冲突的，但在幕后却通过总体理论目标统一起来，这可能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胜利的唯一最重要的解释

67 .在一个危急关头，他们的对手已经料到会遭到彻底的驳斥

左派要学习的第三个主要教训是，MPS的松散集体也在空间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旨在通过关键节点将网络扩展到全球。在智库中，他们发现了一种适应全球知识霸权任务的组织形式。他们在智库、政治家、记者、媒体和教师之间建立了网络——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建立了一种一致性，这些群体不需要统一的目标或组织形式。这给他们的项目带来了令人钦佩的灵活性。虽然新自由主义经常被谴责为经验上过于分散，无法作为一个连贯的项目有意义，但事实上，正是这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其思想的意愿，使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特别强大。

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左翼的圣山不应被视为简单地复制其运作模式的理由。相反，这个论点是，左派可以从长期愿景、全球扩张的方法、务实的灵活性和反霸权战略中学习，这些战略团结了一个由利益多样化的组织组成的生态。对左派圣山的要求最终是呼吁重新建立左派的霸权。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4

Left Modernity

In the present climate, around the world, almos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will appear to be either utopian or trivial. Thus our programmatic thinking is paralysed.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这一章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诊断当代左派的战略局限这一消极任务出发，本章开始了阐述一条脱离我们当前状况的逃生路线这一积极项目。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认为当代左派应该收回现代性，建立民粹主义和霸权力量，并动员起来走向后工作的未来。民间政治在预言、直接行动和无情的水平主义方面的尝试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目标，部分原因是他们错误地认识了对手的性质。资本主义是一种积极扩张的普遍性，试图从中分离出自主性空间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撤退、抵抗、地方主义和自治空间代表了一种对抗不妥协和不断侵占的资本主义的防御游戏。此外，特殊主义很容易与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共存。资本主义的无数文化和政治变体，对于抑制商品化的扩张、无产阶级的创造和积累的必要性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资本主义吸收抵抗的能力常常令人惋惜，这恰恰表明，特殊性本身无法与普遍主义竞争事实上，鉴于新自由主义固有的扩张性，只有另一种扩张性和包容性的普遍性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并取代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核心是积累的动力，非扩张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修饰法。因此，雄心勃勃的左派政治不能满足于捍卫地方的措施。相反，它必须寻求构建一种新的面向未来的政治，能够在最大规模上挑战资本主义。它必须揭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伪普遍性，重新把握未来的意义。

本章从前几章的经验和历史焦点中退了一步，并试图为后面的章节详细阐述一个哲学基础。我们认为，任何面向未来的左派的一个关键要素必须是对“现代性”的概念提出质疑。然而，民间政治方法缺乏对未来的诱人愿景，对现代性的斗争一直是对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斗争:从苏联早期的共产主义现代主义到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再到撒切尔和里根的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效率。4现代的含义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一个高度“有争议的领域”。5然而，面对资本主义在自身普遍化方面的成功，这一术语几乎完全让渡给了右翼。“现代化”仅仅意味着私有化、剥削加剧、不平等加剧和无能的管理主义的某种可怕的组合同样，关于未来的概念往往围绕着生态启示录、福利国家的解体或企业主导的反乌托邦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带有乌托邦或普遍解放标志的东西。因此，对许多人来说，现代性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表达由此可见，

智慧，必然的结论是:只有取消现代性才能带来资本主义的终结。其结果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众多社会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反现代的倾向。然而，这种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制度混为一谈的错误做法忽视了现代性可以采取的其他形式，以及许多反资本主义斗争依赖于其理想的方式现代性既为大众动员提供了一种叙事，也为理解历史的弧线提供了一种哲学框架。作为指示社会方向的术语，它必须成为任何致力于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左翼政治的关键话语战场本章通过考察有助于阐述左翼现代性的三个因素，阐述了这样一个项目的广泛哲学赌注:历史进步的形象，普遍主义的视野和对解放的承诺。

在讨论“现代性”时，我们面临着澄清其含义的直接问题。它可以指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期，通常是在欧洲历史中过滤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事件被认为是它的起源: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对其他人来说，现代性是由一套独特的实践和制度来定义的:广泛的官僚化，自由民主的基本框架，社会功能的分化，非欧洲世界的殖民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张。然而，现代性也指围绕进步、理性、自由和民主的普遍理想而进行的一系列概念创新。本章强调后一个方面:现代性命名了一组概念，这些概念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独立发展，但在欧洲引起了特别的共鸣。这些是现代性的要素，不能被抛弃，它们形成了围绕现代化的更流行的话语产生的源泉。概念上的理想——如自由、民主和世俗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源泉，也是反对它的斗争的源泉。与现代有关的思想激励了废奴主义者的工作，形成了许多非洲工会斗争的基础，并在今天继续着“成千上万的争取工资、土地权利、基本健康、安全、尊严、自决、自主性等的运动”。[12]因此，从广义上讲，无论是否得到明确承认，今天的政治斗争都是在现代性及其理想的空间*内*进行的斗争。现代性必须受到质疑，而不是被拒绝

夸张的进步

提起现代性，最终就是提出关于未来的问题。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设置什么样的课程?当代意味着什么?又代表着谁的未来?自这个术语出现以来，现代性一直关注于解开一种循环或追溯的时间概念，并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引入断裂。有了这种断裂，未来就被设想为可能*不同于*过去，而且*比*过去*更好*现代性等同于“对未来的发现”，因此发现自己与诸如“进步、进步、发展、解放、解放、成长、积累、启蒙、改良、[和]前卫”等概念密切相关。认为历史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人类行为而进步，正是这种进步的本质引起了现代性的各种不同定义的争论从历史上看，左派在面向未来中找到了自己的天然归宿。从早期的共产主义对技术进步的愿景，到苏联的太空乌托邦，再到“技术白热”的社会民主主义修辞，左翼与右翼的区别在于其明确的立场

对未来的拥抱。未来在物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要比现在更好。相比之下，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政治右派的力量是由他们对传统的捍卫和他们本质上的反动性质决定的

在新自由主义兴起期间，这种情况发生了逆转，像撒切尔这样的政治家对现代化和未来的言论发号施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那时起，新自由主义对现代性的看法就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将这些术语吸纳并动员成一种新的霸权常识。因此，从未来的角度来讨论左派，现在看来是异常的，甚至是荒谬的。在后现代的时刻，未来、现代性和解放之间看似内在的联系被分开了。像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这样的哲学家现在可以自信地断言，“我们必须抵制未来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这永远是资本主义进步观念的终极王牌”。[18]这样的民间政治情绪盲目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宁愿回避宏大的愿景，而代之以故作姿态的抵抗。从激进左派对技术现代性的不适，到社会民主左派对另一个世界的无力设想，今天，世界各地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让与了右派。左派曾经擅长的一项技能——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构建诱人的愿景——在多年被忽视后已经退化。

然而，如果左派想要恢复一种进步感，就不能简单地采用走向单一目的地的历史经典形象。对于这些方法来说，进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必需品编织进历史的结构中。人们认为，人类社会沿着一条预设的道路，朝着以欧洲为模型的单一结果前进。欧洲国家被认为是独立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他们的历史发展经验被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比其他文化优越这些思想主导了传统的欧洲哲学，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文学中继续存在，他们试图将资本主义归化，以反对苏联的对手早期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都部分认同这种一刀切的历史进步模式，这种模式将非西方社会定位为缺乏发展和需要发展的社会——这一立场为殖民和帝国主义的实践提供了理由

从他们的哲学批评家的观点来看，这些进步的概念被贬低正是因为他们对先入为主的目标的信仰——无论是自由主义向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20世纪的复杂而往往是灾难性的记录确凿地表明，不能指望历史沿着任何预定的道路前进倒退和进步一样有可能发生，种族灭绝和民主化一样有可能发生换句话说，在历史的本质、经济制度的发展或政治斗争的顺序中，没有任何固有的东西可以保证任何特定的结果。例如，从广义左派的角度来看，即使是那些已经取得的有限但并非微不足道的政治成果——比如福利提供、妇女权利和工人保护——也可以倒退。此外，即使在名义上的共产主义政府掌权的国家，事实证明，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生产制度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这一系列的历史经验，通过精神分析、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助长了对欧洲现代性的内部批判。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现代性与轻信的天真联系在一起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划时代的定义中，后现代性被认为是对宏大的元叙事产生怀疑的时代基于此，后现代性是

一种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对进步的描述所代表的浮夸叙述的幻灭的文化状态。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评论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间结构中一些重要的东西。然而，在欧洲以外的人看来，宣告宏大叙事的终结，绝对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此外，凭借三十年的后见之明，利奥塔所诊断的文化状况的更广泛影响并不是对元叙事本身的信仰的下降，而是对左翼所提供的东西的广泛觉醒。资本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而适当进步的未来概念在后现代批判下枯萎了，并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残骸下被压制了。最重要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的兴起，历史*似乎*确实有一个宏大的叙述在全球范围内，市场、雇佣劳动、商品和提高生产率的技术都在系统性的积累要求下扩张。资本主义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命运，它与国家差异愉快地共存，对文明之间的冲突置若置之。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区分终点(资本主义)和通向终点的路径。的确，各国之间的相互纠缠意味着，欧洲道路(严重依赖剥削殖民地和奴隶制)对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被禁止的。虽然有广泛的发展范式，但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在不同的文化中得到实例化，遵循不同的轨迹和不同的发展节奏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是当今的潮流因此，进步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欧洲道路，而是经过各种政治和文化星座的过滤，所有这些都指向资本主义关系的实例化。今天，现代化者只是在为安装哪种资本主义变体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恢复进步的观念，首先意味着挑战这一不可避免的终点的教条。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来都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由各个阶级驱动的一个成功的工程，是朝向积累和扩张的系统性命令。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是可能的，对未来的新愿景对左派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图像是任何变革性政治计划的必要补充。它们为政治斗争指明了方向，并产生了一套标准来评判支持哪些斗争、抵制哪些运动、发明什么等等。在缺乏进步形象的情况下，只能有反应性、防御战、地方抵抗和地堡心态——我们称之为民间政治的东西。因此，对未来的憧憬对于阐述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是不可或缺的。与早期的现代性思想家不同，没有必要进步，也没有单一的途径来判断发展的程度。相反，进步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迷信*:作为一种虚构，但它的目的是将自身转化为一种真理。Hyperstitions的运作方式是将分散的情绪催化成一种历史力量，使未来成为现实。它们具有“将会存在”的时间形式。这种对进步的迷信形成了引导前进的定向叙事，而不是世界的既定或必要属性。进步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不遵循预先设定的轨迹或自然趋势，也没有成功的保证。如果从一种甚至多种防御立场的角度来看，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任何形式的前瞻性政治都必须着手构建*新的*。必须开辟和铺设进步的道路，而不是仅仅按照某种预定的方式前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成就而不是神圣的或世俗的天意。

颠覆性的普遍性

任何对另一种进步形象的阐述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普遍主义的问题，即某些价值观、思想和目标可能在所有文化中都适用正如我们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的普遍性，它将自己编织在多种文化结构中，并在前进的过程中对它们进行改造。任何不具有竞争性的普遍性的东西最终都会被一系列包罗万象的资本主义关系所窒息各种特殊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局部的、特定的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轻松共存。随着资本主义分化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巴西的资本主义、印度的资本主义、尼日利亚的资本主义等等，可能性的清单还在继续增长。如果捍卫一种特殊主义是不够的，那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普遍主义的全球空间是一个冲突的空间，每一个竞争者都要求其竞争对手的相对地方化如果左翼要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它就需要重新思考普遍主义的计划。

但援引这样一种思想，就会唤起近几十年来针对普遍主义的一些根本性批评。[34] .虽然普遍政治必须超越任何地方斗争，在全球范围内和跨越文化差异推广自己，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它受到了批评从历史记录来看，欧洲的现代性与其“阴暗面”是分不开的——被剥削的殖民地领土的庞大网络、对土著人民的种族灭绝、奴隶贸易和对殖民地国家资源的掠夺在这次征服中，欧洲表现出了代表普遍生活方式的形象。所有其他民族都只是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欧洲方式的残余细节——即使这需要无情的身体暴力和认知攻击来保证结果。与此相关的是一种信仰，即普遍等同于同质。因此，文化之间的差异将在细节被纳入普遍的过程中被抹去，创造出一种以欧洲文明形象为模型的文化。这是一种与纯粹的沙文主义难以区分的普遍主义。在整个过程中，欧洲通过部署一系列机制来掩饰自己的狭隘立场，以抹去提出这些主张的主体——白人、异性恋者、有产权者。欧洲和它的知识分子从他们的位置和同一性中抽身出来，把他们的主张说成是建立在“无处可去的观点”之上。这种观点被认为不受种族、性别、民族或任何其他特殊性的玷污，为所谓的欧洲主张的普遍性和其他观点的非法性提供了基础。虽然欧洲人可以谈论和体现普遍性，但其他文化只能被代表为特殊性和狭隘性。因此，普遍主义一直是现代性历史最糟糕方面的核心。

考虑到这一遗产，似乎最简单的反应是从我们的概念武器库中取消普遍主义。但是，尽管这个想法有种种困难，它仍然是必要的。问题部分在于，一个人不能简单地拒绝普遍概念而不产生其他重大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放弃这个范畴只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不同的细节。在缺乏某种共同因素的情况下，似乎没有办法建立有意义的团结。宇宙也作为一种超然的理想而运作——从不满足于任何特定的体现，并且总是开放地为更好而奋斗它包含着打破自身局限的观念冲动。拒绝这一范畴也有将其他文化东方化的风险，

把他们变成异域的他者。如果只有特殊主义，而狭隘的欧洲与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联系在一起，那么令人不快的暗示是，非西方文化一定缺乏这些。古老的东方主义分歧，在一种误入歧途的反普遍主义的名义下，不经意间得到了延续。另一方面，人们也有可能把各种压迫简单地当作多元文化形式的必然结果而加以许可。如果没有标准来辨别*哪些*全球知识、政治和实践支持解放政治，那么文化相对主义的所有问题就会重新出现。考虑到这一切，看到普遍主义的各个方面在历史上和文化间突然出现(38)就不足为奇了，甚至看到它的批评者也不情愿地接受它的必要性(39)，并看到各种各样的修改这一范畴的尝试(40)

为了维持这一必要的概念工具，我们不能将普遍主义等同于一套既定的原则和价值观，而应等同于一个无法明确填补的空占位符。当一个特殊通过霸权斗争占据这个位置时，普遍就出现了:41特殊(“欧洲”)开始将自己代表为普遍(“全球”)。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假的普遍，因为这是一种相互的污染:普遍在特殊中具身了，而特殊在作为普遍的过程中却失去了它的某些规定性。然而，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完全实现的普遍主义，因此，普遍总是容易受到其他普遍的争论。这就是我们稍后将在政治战略术语中概述的“反霸权”——一个旨在颠覆现有普遍主义以支持新秩序的项目。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点——作为反霸权，普遍主义可以具有颠覆性和解放性的战略功能。一方面，一个共相提出了一个无条件的要求——一切都必须置于它的统治之下然而，另一方面，普遍主义从来都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工程(甚至资本主义也仍然是不完整的)。这种张力使任何既定的霸权结构都成为争论的对象，并使普遍性成为反抗排斥的起义载体。例如，普遍人权的概念，尽管可能存在问题，但已经被许多运动所使用，从地方住房斗争到战争罪行的国际正义。它的普遍和无条件的要求已经被动员起来，以突出那些被排除在其保护和权利之外的人。同样，女权主义者批评某些概念排斥女性，并动员普遍主张反对其约束，例如使用“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普遍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特殊性(“女性”)成为对现有普遍性(“人性”)进行批判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先前建立的普遍(“人性”)被揭示为一个特殊(“男人”)。43这些例子表明，通过挑战和阐明共性的斗争，共性可以重新焕发活力。在这方面，“诉诸普遍主义作为一种断言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方式是背叛普遍性，但诉诸普遍主义作为一种拆除西方优越性的方式是实现普遍性”。44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遍主义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站在冲突之上的超然的法官。

现在我们可以转到普遍主义的最后一个方面，即它的异质性正如资本主义所表明的那样，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同质性——它并不一定涉及将不同的事物转化为同一种事物。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力量恰恰是它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实地条件时的多功能性，以及它容纳差异的能力。类似的前景也必须适用于任何左派的普遍性——它必须是一个整合差异而不是抹去差异的前景。那么，这一切对现代性工程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任何特定的现代性形象都必须对共同创造、进一步的转型和改变开放。而在一个不同民族必然共存的全球化世界里，这意味着建设

尽管生活方式多种多样，但共同生活的制度。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描述和普遍主义的经典形象相反，它必须认识到欧洲以外的人的能动性，以及他们在建设真正的全球和普遍未来方面的声音的必要性。因此，普遍是一个空洞的占位符，霸权的特殊性(具体的要求、理想和集体)来占据它。它可以作为一种颠覆性和解放性的变革载体，相对于既定的普遍主义，它是异质的，包含差异，而不是消除差异。

合成自由

虽然左派传统上与平等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体现在今天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关注上)，但我们相信自由是左派现代性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则。这一概念在整个20世纪的政治斗争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美国经常以“自由世界”的姿态对抗极权主义敌人(以苏联的形象为例，然后是越来越不连贯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形象)。在这些霸权斗争中，资本主义通过坚持一种*消极自由*的观念，一再宣称自己的优越性这就是个人不受其他个人、集体和机构(典型地是国家)任意干涉的自由。消极自由坚持不受干涉，这使它成为用来对抗所谓极权主义对手的理想工具，但它是一个可悲的憔悴的自由概念。在实践中，它转化为来自国家的少量政治自由(在数字间谍和反恐战争的时代，这种自由越来越少)和出售我们的劳动力和选择闪亮的新消费品的经济自由在消极自由下，富人和穷人被认为同样自由，尽管他们在行动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消极自由与大规模的贫困、饥饿、无家可归、失业和不平等完全相容。它也完全兼容于无处不在的广告所制造和设计的我们的欲望。为了反对这种有限的自由概念，我们主张一个更为实际的版本。

49 .消极自由关注的是确保避免干涉的形式权利，而“综合自由”则承认，没有物质能力的形式权利是毫无价值的例如，在民主制度下，我们都有竞选政治领袖的正式自由。但如果没有竞选所需的财政和社会资源，这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自由。同样，形式上我们都有不接受工作的自由，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被迫接受工作的无论哪种情况，理论上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出于所有实际目的，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揭示了拥有实现正式权利的手段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对行动的手段和能力的强调，对左派的自由方法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只有在现实世界中，通过现实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51这样理解，自由和权力就交织在一起了。如果权力是在某人或某事身上产生预期效果的基本能力，那么，我们实现欲望的能力的增强，同时就是我们自由的增强。我们行动的能力越强，我们就越自由。对资本主义最大的指控之一是，它只允许极少数人有行动的自由。因此，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使综合自由最大化，或者换句话说，使全人类的繁荣和我们集体视野的扩大成为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至少涉及三个不同的因素: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扩大社会资源，

以及技术能力的发展综合起来，这些构成了一种人造的而非自然的综合自由，一种集体的历史成就，而非放任自流的结果。因此，解放不是要脱离世界，解放自由的灵魂，而是要建构和培养正确的依恋。

首先，综合自由需要最大限度地提供有意义的生活所需的基本资源:收入、时间、健康和教育。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大多数人只能算是*形式上*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以这种方式理解，不断加剧的全球不平等表现为同样巨大的自由差距。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即提供社会的共同利益，如医疗、住房、儿童保育、教育、交通和互联网接入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应该通过市场上的选择自由得到改善，而忽视了做出这些选择所涉及的实际(经济和认知)负担在一个合成自由的世界里，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将被提供给我们，让我们继续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担心去找哪个医疗保健提供者。然而，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想象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生存要素:时间和金钱。自由的时间是自我决定和发展我们的能力的基本条件同样，综合自由要求向所有人提供基本收入，以使他们充分自由这种政策不仅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提供了货币资源，而且也使自由时间的增加成为可能。它使我们有能力选择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尝试和建立非常规的生活，选择培养我们的文化、智力和身体的敏感性，而不是盲目地为生存而工作因此，时间和金钱在任何实质性意义上都是自由的关键组成部分。

综合自由的完整形象还必须寻求扩大我们的能力，超越目前的可能。如果要避免操纵人们使他们满足于现状的问题，那么综合自由就必须向人们所希望的一切敞开大门也就是说，自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使现有的选择可行，而必须向尽可能多的选择开放。在这方面，集体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例如，社会推理的过程可以使人们对世界有共同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我们”，这个“我们”比单独的个人有更大的行动能力同样，语言是有效的认知支架，使我们能够利用象征性思维来扩展我们的视野知识的发展、深化和扩展使我们能够想象和实现否则无法实现的能力。当我们获得了关于建筑环境的技术知识和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知识，并开始理解社会世界的流动趋势时，我们就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能力。正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

> 正如关于光的法则的知识从来没有阻止人们去看……同样，关于支配社会发展的法则的知识也不会阻止人们去生活，或者取代劳动、爱和斗争。恰恰相反，关于光的规律的知识制造出了改变了人类视力的眼镜，正如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引发了改变和扩大了人类生存视野的种种努力一样

因此，渗透到政治右派并日益影响到批判左派的反智主义，是一种最恶劣的倒退。健康的怀疑主义被转化为放弃我们扩大自由的承诺。这种对知识的退步也发生在对实践中直接的和不受约束的自由的幻想中。将调解、制度和抽象视为自由的对立面的唯意志主义形象，只是将技巧的缺失与自由的充分表达混为一谈。不用说，这是一种误导。集体行动，

随着合成自由的扩展，集体行动往往是通过复杂的劳动分工、中介化的参与链和抽象的制度结构来实现的。因此，合成自由的社会方面并不是回归人类对面对面的社交和简单合作的某种渴望，而是呼吁集体的、复杂的、中介的自决。

最后，如果我们要扩大我们的行动能力，技术的发展必须发挥中心作用。一如既往，“技术是我们选择的源泉[而]选择是未来的基础，使我们超越棋子的水平”。我们的自由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发展的历史条件从这些领域中产生的技术既扩大了现有的行动能力，又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全新的能力。因此，合成自由的充分发展需要根据扩大我们行动能力的动力来重新配置物质世界。它需要集体的和技术的增强实验，需要一种拒绝接受任何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障碍的精神增强型电子人、人工生命、合成生物学和技术介导的生殖都是这种阐述的例子因此，总体目标必须被挑选出来，作为一项不屈不挠的工程，解开这个世界的必需品，并将它们转化为进一步建设自由的材料这种解放的形象永远不能满足于或浓缩于一个静态的社会，相反，它将不断地超越任何限制。自由是一种合成的事业，而不是一种天生的天赋。

70 .在这种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是把人类看作是一种变革的和可建构的假设:一种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实验和阐述而建立起来的假设没有真正的人类本质需要实现，没有和谐的统一需要回归，没有被虚假中介所遮蔽的未异化的人性，没有有机的整体性需要实现。异化是一种使能模式，人性是一种不完全的转化载体。我们是什么，我们能成为什么，都是有待时间建构的开放式工程。正如赛迪·普兰特所说，

> It’s always been problematic to talk about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because that presupposes that we know what women are. If both women and men have been organised into the forms we currently take, then we don’t want to liberate what we are now, if you see what I mean …It’s not a question of liberation so much as a question of evolution –or engineering. There’s a gradual re-engineering of what it can be to be a woman and we don’t yet know what it is. We have to find out.71

因此，必须阐明的是一种没有预先定义的人文主义。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计划，但没有预先确定的终点只有经过修正和建构的过程，人类才能认识自己。这意味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人进行修正，参与新的存在模式和新的社会形式，作为使“人”明确化的实践分支它是对人采取一种干预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与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的狭隘形象的人道主义相反这些干预的范围从个人的身体实验到反对受限制的人类形象的集体政治动员，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这意味着将我们自己从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安装的人类的陈旧经济形象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因此，在这一愿景下，解放将意味着增加人类根据其欲望可能变成的任何东西而行动的能力。而普遍解放将是这一目标对全人类的坚持和最大限度的扩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遍解放处于现代左派的核心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没有对未来的概念，左派就会被束缚在对自由的捍卫上

传统，以及保护抵抗碉堡。那么，左派的现代性会是什么样子呢?它将提供一个更美好未来的诱人而广阔的愿景。它将以一个普遍的视野运作，动员一个实质性的自由概念，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实现其解放的目标。它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未来观，而是依赖于一组全球声音，在实践中阐明和谈判一个共同和多元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无论是通过奴隶起义、工人斗争、反殖民主义起义还是妇女运动来运作，对根深蒂固的普遍主义的批评一直是现代性构建未来的重要代理人;他们是不断修正、反抗和创造一种“自下而上的普遍主义”的人。77然而，要真正实现未来的多元解放，首先需要超越当前以有偿劳动和资本主义积累为前提的全球秩序。换句话说，左翼现代性需要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和后工作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多种生活方式可以出现并蓬勃发展。接下来的两章将阐述这种特殊的未来愿景的必要性和可取性。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5

The Future Isn’t Working

It is already 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the free labourer, *that he is a* pauper: *a virtual pauper*.

Karl Marx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当代左派倾向于一种民间政治，这种政治无法扭转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潮流。取而代之的是，左派需要收回现代性的争议遗产，并提出对新未来的愿景。然而，它对新未来的愿景必须以实际存在的趋势为基础。本章从工作的角度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一种契合性分析。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下一章将论证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的可取性。呼吁终结工作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工作”指的是我们的工作或雇佣劳动:我们为换取收入而出卖给别人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时间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是在我们的老板、经理和雇主的控制之下。我们成年后整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屈从于他们。工作可以与“休闲”形成对比，通常与周末和假期联系在一起。但休闲不应与无所事事混为一谈，因为我们最喜欢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学习乐器、阅读文学作品、与朋友交往以及从事体育运动都需要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这些都是我们自由选择的事情。因此，工作后的世界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世界;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们不再被工作束缚，而是自由创造自己生活的世界。这样的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黑人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反对工作的中心地位这些思想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寻求将人类从工作的苦差事、对雇佣劳动的依赖以及对老板的屈从中解放出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开辟“自由的领域”，从中人类可以继续其解放的工程

虽然这个计划的广泛目标有一系列的先例，但最近资本主义的发展给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紧迫性。快速的自动化、不断扩大的过剩人口和持续的紧缩政策都提高了重新思考工作和为资本主义的新危机做好准备的必要性。正如圣山会(Mont Pelerin Society)预示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并准备了一套全方位的应对措施，左派也应该为即将到来的工作和过剩人口危机做好准备。虽然2008年危机的影响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回荡，但要利用这一时刻为时已晚;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已经以一种更新和尖锐的形式恢复并巩固了自己。相反，左派必须为下一个机会做好准备

本章解释了为什么后工作世界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选择。第一部分概述了正在出现的工作危机——发达国家稳定工作的崩溃，失业率和过剩人口的上升，以及作为维系社会的纪律措施的“工作”的崩溃。然后，我们转向这场危机的各种症状，因为它不仅表现在失业数字上，还表现在不稳定性的增加、失业复苏、不断增长的贫民窟和失业人口中

不断扩大的城市边缘。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影响在新的社会冲突和问题中冒泡。最后，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产生过剩人口的倾向是如何被国家管理的。今天，工作危机威胁到这些传统的控制工具，为向后工作世界的转变奠定了社会条件。

VI现实中的贫民

虽然工作在每个社会都是常见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具有历史上独特的品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作是必要的，但人们共享土地、自给农业和必要的生存手段。农民很穷，但自给自足，生存并不依赖于为别人工作。资本主义改变了这一切。通过被称为原始积累的过程，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被连根拔起，离开了他们的土地，失去了他们的生存资料农民与此作斗争，继续在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生存，最终采取暴力力量和严厉的新法律制度将雇佣劳动强加给人民。换句话说，农民必须被改造成*无产阶级*。这种新的无产阶级形象是由他们缺乏获得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机会，以及为了生存而需要雇佣劳动来定义的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也不是由收入水平、职业或文化来定义的。更确切地说，无产阶级只是一群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有工作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世界人口通过对农民的不断剥夺而转变为无产阶级生活的历史。随着最近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整合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全球无产阶级已经看到了“巨大的翻番”，现在有15亿多的人依靠有工资的工作来生存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失业形式。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发明由于失去了生存手段，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无法找到有工资的工作的新的“过剩人口”虽然资本主义可能剥削被雇佣的工人阶级，但正如琼·罗宾逊曾经写道:“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与根本不被剥削的痛苦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11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盈余的规模与经济周期同步扩张和收缩。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人从剩余中被吸引到有偿劳动中，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市场收紧。然而，在某一点上，经济需求停滞不前，工资开始削减盈利能力，或者工人在政治上变得过于大胆。出于盈利或通货膨胀的原因，或仅仅是为了重新获得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工人们被解雇盈余随后扩大，为下一个增长周期储备起来。然而，这些周期性机制只能部分解释我们目前的状况，特别是考虑到几十年来工资压力一直停滞不前，通胀保持稳定，劳工运动受到重创。基于经济需求的周期性解释当然可以解释2008年危机的深度，但它并不能解释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变化，比如不稳定性的上升、失业复苏的出现以及非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增长。因此，要全面理解当前的危机，还需要考虑其他趋势。这些是产生长期趋势的机制，趋向于一个更大的

和更多的过剩人口，独立于周期性繁荣与萧条模式正是这些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今天，通过技术变革产生的过剩人口日益催眠了媒体的想象力。虽然这种关注一直集中在对大量机器人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工作末日的担忧上，但技术发展也可以在没有自动化的情况下提高旧流程的生产率(例如，农业的进步)。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主义需要更少的劳动力来生产同样的产出。然而，自动化似乎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据估计，在未来20年内，目前47%至80%的工作都可能实现自动化但是，仅仅基于技术进步的估计不足以预测失业率的上升。毕竟，尽管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就业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经过一些痛苦的延迟，新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以取代那些失去的工作岗位。然而，基于过去经验的乐观主义忽视了这一历史记录的政治和偶然基础:政府政策、工人运动、劳动力的性别划分，以及每周工作时间的同时减少，都在过去维持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因此，要了解在什么条件下技术变革会导致失业增加，就必须具备额外的条件。第一个限定条件认为，由于生产率提高降低了产品价格，只有当需求增长不足以应对价格下降时，失业才会增加如果更低的价格激发了更多的销售，公司可能会扩张而不是裁员。类似的论点认为，技术发展经常创造新的产业，而这可能会创造替代性的工作例如，自从个人电脑问世以来，已经出现了1500多种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两种情况下，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因为它们更便宜或新的)，而其他人保持就业。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服务业。例如，自动柜员机的普及使每个分行雇用的出纳员减少了——但是银行为了降低成本而开设更多的分行，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结果是银行柜员的数量保持稳定(尽管今天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银行将业务转移到网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逻辑是，即使技术消除了一些工作，需求的增长足以创造新的工作。在第二种情况下，技术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口无法跟上所需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够创造新的需求，也根本没有足够的有能力的工人来从事这些工作——劳动力的供应出现了停滞技术变革和扩散的速度可能会使人口的整个部分成为过时的剩余。在第三种情况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可能具有如此普遍的用途，以至于它们扩散到整个经济中，从而抑制了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创造了新的工业，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些技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如果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成立，那么技术变革就会导致失业增加。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条件中的一些确实成立。但是，尽管技术性失业是当今过剩人口膨胀的最主要原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另一种积极改变剩余人口规模的机制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原始积累这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起源故事，也是一个涉及前资本主义生存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持续过程。通过各种手段，一个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使其依赖

雇佣劳动来生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全球化，这个过程加速了，导致无产阶级翻了一番。中国可以利用的农村劳动力供应正在减少，但非洲和南亚的一体化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供应继续以快速的速度增加其结果是一个庞大的新的全球劳动力，依赖于创造同样大量的新就业机会。因此，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任何技术变化，过剩人口因为这种新的劳动力供应而增加。除此之外，第三种机制涉及将特定人口主动排除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主要是将妇女和少数民族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虽然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问题不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要求——事实上，它们有各自的统治逻辑——但这些现象也间接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目标奴隶制形式的不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起源的一个关键因素(并且今天仍在继续)，30，许多妇女和种族化的监狱人口的无偿劳动继续作为超级剥削的来源在更温和的层面上，失业继续在种族、性别和地理上的差异中不均匀地分布(例如，见证后工业城市的破坏)。32 .在经济繁荣时期，某些群体更有可能是最后被雇用的，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更有可能是第一个被解雇的因此，过剩人口面临的脆弱性因性别和种族而异;剥削和驱逐的经济逻辑与其他压迫逻辑交叉。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由于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的原因，过剩人口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换句话说，技术变革或原始积累并不是造成他们难以找到有偿劳动力的原因。但这些机制往往相互交叉:有些人更容易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而新的过剩人口的纳入通常涉及种族编码这些机制——技术变革、原始积累和主动排斥——以无数种方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正式劳动力之外的无产阶级。

那么，今天过剩人口的构成是什么呢?大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不同的阶层:资本主义部分、非资本主义部分、潜在部分和非活跃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都很熟悉:处于正常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这一群体至少可以获得一些最低限度的国家福利，正在积极寻找(另一份)工作，因此对就业者的工资施加压力。然而，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失业”是一种相对奢侈的生活在没有任何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必须不断地工作以求生存，因此被迫在资本主义的同时创造新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是剩余人口中的非资本主义部分，他们被剥夺了生存手段，但几乎没有社会安全网(无论是社区的还是国家的)来允许他们长期失业。这些自给经济为市场生产商品——例如小饰品——但它们被组织为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因为它们不寻求积累这些类型的经济日益支配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占任何一个国家劳动人口的30%到80%不等第三个潜在群体主要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可以很容易地动员到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这包括原始无产阶级的储库(包括农民)，但这一群体也包括无薪家庭佣工，以及受薪专业人员，他们面临着被送回无产阶级的威胁，通常是通过去技能化(例如，医疗专业人员、律师和律师)

学者)。[41]这个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当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紧张时，它为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额外的劳动力储备最后，除了其他阶层之外，还有大量的人被认为在经济上不活跃(包括灰心丧气的人、残疾人和学生)总的来说，根据现有的数据很难确定全球过剩人口的确切规模和性质，而且随着个人进入和离开不同的类别，这些数据也会发生波动，但是各种措施汇集在一起表明，过剩人口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活跃的工人阶级

这是资本主义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面临的工作危机: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人口缺乏正式或体面的工作。在较早的一代人中，将过剩人口视为一个问题是一个经常被嘲笑的想法。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低失业率、稳定的工作、不断上涨的工资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意味着资本主义产生了过剩人类的观点几乎没有物质支持。然而，当大多数左派思想家转向资本主义增长的经济问题时，一种闭塞的知识传统反而强调了过剩人口的社会再生产问题。毫不奇怪，往往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秩序运作之外的人看到了这个剩余阶级的潜力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在20世纪70年代从阿尔及尔(Algiers)撰写的文章中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当工人因生产的流线型而永久失业时，他们会回归到他们的基本(无产阶级)状态”，并且“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革命因素是(无产阶级)”。[46]保罗·马蒂克从资本主义的核心出发，称之为“所有资本主义矛盾中最重要的”。[47]最近，共产主义理论家在分析雇佣劳动的危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资本论*》“不是一本关于政治的书，甚至不是一本关于劳动的书:它是一本关于失业的书”。[48]事实上，人们常常忘记马克思认为，驱逐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一般规律”的一部分。[49]在2008年危机和劳动力市场的持续低迷之后，过剩人口的问题再次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技术变革的飞速发展，已经大量过剩的人口似乎还会继续膨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有偿工作——正在崩溃。

没有被剥削的痛苦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劳动力中很少有人从事正式的雇佣劳动，而这一数字在2008年危机之后才有所下降。这种不断增加的过剩人口最明显的症状具身在失业统计数据的长期变化上。在刚刚结束的战后时期，失业率低至1%至2%一度被认为是发达经济体可行的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失业率徘徊在2%左右，而德国的失业率甚至降至1%以下。自那以后的每一个十年，失业率都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上升，同时就业增长也在下降今天，美联储认为5.5%是最优的长期失业率——是战后水平的两倍多在美国，不工作的男性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增加了两倍，而女性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尽管她们的起点要高得多就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近几十年来，总过剩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在全球范围内，2008年金融危机后，失业率继续上升，这两方面都是如此

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全球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仍然明显较低，主要是产生兼职工作，预计其缓慢趋势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全球劳动力参与率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而且还将继续下降几十年然而，这些统计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工作危机和人口过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这些直接措施上，还表现在一系列更为微妙和间接的影响上。

其中之一——不稳定性增加——已成为发达经济体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的例证与前几代人稳定和高薪的职业相比，今天的工作通常包括更随意的工作时间，低而停滞的工资，越来越少的工作保护和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稳定的趋势有许多原因，但人口过剩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它使资本家能够对少数找到工作的幸运者施加额外的压力随着剩余人口的增加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更多的工人寻求更少的工作，权力就转移到雇主手中。例如，只有在全球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工厂搬迁的威胁才有可能发生。其结果是雇主获得了凌驾于工人之上的力量，而工作的质量下降了(补充了失业统计所衡量的数量)。这正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所看到的。在整个欧洲，工作的强度，从速度和要求两方面来说，都在增加向准时制供应链的转变加剧了工作要求，而新的监视技术正被强加于劳动者身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工作时间之外监视他们)工作质量的下降也体现在工作时间的减少上，而不是直接消除工作岗位。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可以从少量但数量不断增加的兼职、灵活的和自由职业者工作中看出来这一点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UK的失业率相对较低，主要是由于更多的个体经营者依靠贫困工资生活在美国，有650多万人虽然渴望全职工作，但却被迫做兼职这种临时工还涉及众包任务、临时人事机构和零时工合同等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恶劣工作条件和缺乏福利。例如，在UK，据估计近5%的劳动人口目前签订的是零时工合同过剩的人口也给工资带来了下行压力。据估计，劳动力市场萧条每增加1%，收入不平等就会增加1.6%实际工资的停滞和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都与劳动力供应过剩有关，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自动化和无产阶级的全球化是近几十年来工资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自2008年危机以来，所有这些趋势也一直在持续，整个G20的实际工资增长缓慢，英国的实际工资也在下降。工资增长缓慢导致不稳定，这也表现在对高水平消费者债务和低水平个人储蓄的焦虑中例如，在美国，整整34%的全职工人靠工资过日子，而在UK，35%的人靠储蓄生活不超过一个月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不稳定表现为抑郁、焦虑和自杀的增加——这种“过剩”在传统的经济衡量标准中是无法计算在内的事实上，失业与全球五分之一的自杀事件有关，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情况只会恶化

除了不稳定之外，过剩的人口和技术自动化有助于理解失业问题

75 .最近的劳动力市场现象:出现“失业复苏”，即经济在危机后恢复增长，但就业增长仍然乏力这种复苏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标准，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是走向越来越长的失业复苏当前的危机也不例外，有超过100万个全职工作尚未恢复，预测表明，美国的失业率将保持在危机前的水平以上，直到2024年。世界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如此之慢，以至于就业机会的数量至少在十年内仍将显著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虽然失业复苏的原因最终仍是一个谜，但失业复苏似乎与自动化密切相关事实上，唯一经历过失业复苏的职业是那些近几十年来受到自动化威胁的职业——半熟练的常规工作而且，这些失业几乎全部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或衰退之后换句话说，危机时期是可自动化的工作消失，再也听不到的时候。如果自动化在未来几十年加速发展，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资本会利用危机时期永久性地消除这些工作工作岗位的缓慢回归也表现为长期失业率的上升，从而使整个群体越来越与正常的劳动力市场隔离开来。自最近的危机以来，平均失业时间增加了一倍，并顽固地保持在高位这些长时间的失业表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造成的——也就是说，失业工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适应这个问题，比如重新培训一套全新的技能。从零售等行业下岗的工人会发现很难立即进入编程等增长型行业工作。与此同时，即使长期失业者找到了工作，他们也更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工资更低，工作更多是临时性的换句话说，失业复苏加剧了不稳定问题，并越来越多地将一部分人口隔离为永久就业不足的人群。最终，失业及其威胁将成为劳动力的常态。

在一些城市地区，失业和与正常劳动力市场的隔离长期以来一直是日常生活的特征。在巴黎的*郊区*、美国的贫民窟和郊区日益增加的贫困地区，整个社区在经济上与更广泛的经济趋势相分离，甚至在增长时期也停滞不前通常情况下，这些隔离的空间也沿着种族界线划分，故意的忽视和彻底的排斥使这些社区变成社会凝聚力差、住房不足和失业率高的日益严酷的地区这些空间的历史起源是众所周知的:种族主义、奴隶制和政策选择带来的积极排斥、身体暴力和白人移民。88例如，在20世纪初的美国，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村黑人人口迁移并集中在城市地区。然而，工作很难找到，因为持续的种族主义将他们排除在纺织业或制造业之外。(过剩人口的种族化也使企业主能够操纵白人工人阶级，保持低工资并阻止工会化。)89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业的工作最终向黑人开放，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黑人和白人青年的失业率大致相似但随后劳动力供给的全球化对低技能的黑人工人造成了严重破坏。随着制造业工作转移到海外或自动化，这些工人不成比例地受到去工业化的影响工业工作岗位离开了城市中心，被

取而代之的是位于遥远郊区的服务性工作城市贫民区任其腐烂，成为长期失业的集中中心他们变成了贫穷的陷阱，没有工作，很少得到社区的支持，地下经济激增整个社区都被抛弃在资本主义机器之外，任凭他们靠任何能拼凑起来的手段自谋生路。寻求收入的人们被迫从事账外工作，新企业在被白人所有的银行拒绝后转向高利贷，越来越多的绝望导致了彻底的非法活动

与失业集中在城市边缘一样，发展中经济体也不得不应对过剩人口在贫民窟、贫民窟和棚户区的扩张和集中问题。96 .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城市劳动力被抛到一边，进入非正规和边缘经济，这些人口膨胀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一份联合国报告所指出的，“城市已经成为多余人口的垃圾场，这些人从事非熟练的、不受保护的、低工资的非正规服务业和贸易。”97贫民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原始积累。在殖民主义和结构调整政策的刺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由于全球竞争、快速工业化和肆虐的气候变化而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就像欧洲早期的工业化经历一样，被剥夺土地的农村工人已经迁移到城市地区寻找工作。在欧洲，这一过程有时也导致新的城市无产阶级住进贫民窟，陷入赤贫但相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欧洲，这种转变涉及到创造足够数量的就业机会，强大的工业工人阶级的出现，以及最终为移民提供住房在后殖民发展的条件下，这种叙述被打破了。最近的工业化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在劳动力庞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是几乎没有形成任何类似于传统工人阶级的东西，就业前景持续疲软，缺乏足够的住房新的城市移民一直处于农民化和无产阶级化之间的永久过渡状态，有时处于农村生活和城市贫困之间的季节性循环状态因此，贫民窟和其他临时住房代表了对土地和正规经济的双重驱逐这些过剩的人类被剥夺了传统的生存手段，却又没有工作，他们被迫创造自己的非资本主义生存经济。在这里从事的大部分劳动是非正式的:工资低、不安全、不正规、没有国家支持。在这些经济体中，生产通常以非资本主义形式组织，但仍以商品生产为导向——在市场上销售商品，而不是供个人使用。市场的调解将这些后殖民生存经济与前资本主义生存经济区分开来，尽管它们都是一种绝望的生存手段

但是，虽然原始积累是这些贫民窟的起源，但“过早的去工业化”似乎注定要巩固它们的存在。如果说之前的工业化时期至少有为新无产阶级提供足够的工厂就业机会的好处，那么过早的去工业化则有可能完全消除这一传统途径。技术和经济发展现在使各国实际上能够跳过工业化阶段，这意味着发展中经济体现在正在以低得多的人均收入率和低得多的制造业就业份额进行去工业化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制造业就业在下降，劳工斗争变得更加自信，真实

工资的飙升和人口结构的限制导致人们把重点放在“技术升级和提高生产率”上，以保持经济增长工厂的自动化处于这种去工业化趋势的前沿，中国已经是工业机器人的最大购买者，预计不久将比欧洲或北美拥有更多的工业机器人。世界工厂正在走向机器人。去工业化也可以在“回流”中看到，即制造业以失业、自动化的形式返回发达经济体这些去工业化趋势正在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中扎根。113即使在制造业就业绝对增加的国家，这一过程的劳动强度也显著下降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不仅是向一个重要的工人阶级的不完整过渡，而且也阻碍了劳动力预期的就业路径。过早的去工业化使世界上大多数城市无产阶级失去了农业生计，也没有机会被雇佣从事制造业工作。一些人寄希望于新兴的服务业将吸收过剩人口，但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即使在印度这个服务和高科技外包的中心，也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力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工作更重要的是，服务工作的潜力受到最新的自动化浪潮的限制，这可能会消除传统上外包的低技能、低工资的服务工作，例如文书工作、呼叫中心工作或数据输入随着这种非常规的认知劳动越来越自动化，可能发生的是在过早去工业化的基础上，过早地从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转变。这意味着，在贫民窟和非正式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中维持大部分人类的情况，可能会被新兴的技术趋势所巩固。最后，虽然失业措施让我们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规模有所了解，但真正表达全球劳动力市场挤压的是不稳定、失业复苏和大规模城市边缘化。

过剩人口的复仇

一方面，更大的劳动力剩余有利于资本家的利益。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惩戒工人阶级的工具(尤其是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过滤下)，也可以作为增长时期的后备军。它们降低了工资，在工人之间播下了竞争的种子，束缚了无产阶级的野心。这些都是在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渐推动将世界人口纳入全球劳动力大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资本需要一*种特殊类型*的过剩人口:廉价的、温顺的和柔韧的没有这些特征，这种过剩的人性就成了资本的问题。它不满足于躺下来接受自己的可处置性，而是通过骚乱、大规模移民、犯罪，以及各种破坏现有秩序的行动，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因此，资本主义必须同时产生有纪律的盈余，并对那些反抗的人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

管理不受约束的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支持充分就业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即每个身体有能力的(男性)工人都有一份工作。为了支持这一理想，经济政策旨在将盈余重新纳入资本主义，使其成为有纪律和有工资的工人，并由社会主义代表之间的霸权共识来保障

劳动力和资本。这种方法的巅峰时期是战后时期，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对社会秩序的保守关注将充分就业定位为必要的经济目标在这个短暂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失业率被保持在最低水平，资本为了扩张和积累，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寻找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就业增长是通过健康的经济增长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历史上看，国民经济的增长在避免技术性失业的影响方面往往是重要的——要么通过增加现有工业的产量，要么通过发明新的工业来雇用失业的工人。例如，在19世纪后半期，资本品产出的增加创造了就业机会，抵消了农业部门新释放的过剩人口在战前和战后时期，大规模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政府军费开支的激增维持了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增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通过剥夺积累来创造新市场的尝试——把公共或公共物品变成私有化的(和货币化的)商品。然而，如果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适当的劳动力供应——这意味着越来越高技能的劳动力。教育一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例如，中等教育的起源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熟练工人。在大萧条的高失业率时期，教育工人就业的需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教育只是为了使人类适应经济的不断变化才有必要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增长领域趋向于高技能的、非常规的和需要认知的工作这意味着任何实现充分就业的努力都越来越需要工人掌握新技能——这一需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积极地把高等教育变成美化的职业培训整个社会的目标变成了生产有竞争力的主体，他们不断地自我完善，无休止地努力被认为是“可就业的”。要求工人不断接受再培训和要求政策支持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推动充分就业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虽然要求增加就业的呼声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普遍存在，但充分就业的实际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由于战后劳动力市场吃紧，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力量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提供了一个扭转就业优先地位的机会。阶级压力及其影响——停工、工资膨胀、利润下降——是中央银行决定提高利率的主要因素，希望以此减少总需求和增加失业率的确，撒切尔夫人的首席经济顾问最终承认，对抗通货膨胀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工人阶级的代理人战争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的紧缩货币政策恰恰是为了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将失业率提高到资本可以接受的水平，结束充分就业的梦想。然而，即使充分就业没有受到攻击，它也需要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一条件对全球经济来说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仍然明显低于危机前时期在各个政治派别中，经济学家都警告说，经济的根本变化意味着增长可能已陷入永久性的较低状态此外，处于领先增长领域的公司——比如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创造的就业机会根本达不到福特和通用汽车等经典公司的规模。事实上，新兴行业目前只雇用了美国劳动力的0.5%——这很难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记录

关于创造就业机会在稳步下降之后，新企业平均创造的就业机会比20年前减少了40%面对低劳动强度的企业和缓慢的经济增长，旧的社会民主主义鼓励在新兴行业就业的计划摇摇欲坠。尽管如此，可以想象，在适当的政治压力和政策下，恢复充分就业可能是一种选择但是，考虑到社会民主时代的鼎盛时期要求将妇女排除在有工资的劳动力之外，我们实际上应该怀疑，充分就业是否曾经是可能的。

如果充分就业仍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秘化，那么它对工作的正常化仍然延伸到失业者。福利的转变和工作福利的兴起——迫使人们为了获得福利而工作——代表了这方面一个日益阴险的例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根据不同的观念来治理失业，这反映了充分就业的命运变化最初的方法把失业看作是一种个人事故——可以通过类似保险的解决方案来减轻。但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压倒了这种方法，失业随后被视为一个结构性(和男性)问题。劳工运动变成了就业运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福利和充分就业政策作为回应。今天，福利国家正在经历的许多变革可以被理解为试图恢复失业者的纪律功能。他们的自由劳动，以劳动福利的形式，起到了压制工资和威胁就业者工作的作用;“求职者”的形象给每个人强加了一种工作规范;而对残疾福利的攻击甚至把那些不在劳动力大军中的人变成了潜在工人的后备军失业者为了获得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福利，也必须满足越来越多的条件:参加培训、不断地求职、听取建议，甚至免费工作。监督和控制的增加，不仅是为了产生一个听话的、有技能的、灵活的过剩人口，而且也是为了给被雇佣的人施加压力。因此，这些计划是否真的减少失业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们的目的不在此福利国家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旨在利用盈余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机构。

过剩人口的管理并不仅仅围绕着生产有纪律的工人和柔韧性的求职者。统治和惩罚措施正日益成为处理过剩资本的常态。例如，移民政策对这一群体的规模和构成进行了严格监管。对于过剩人口来说，移民到就业前景更好的国家是应对高失业率的一种常见做法，也一直是历史常态。19世纪，随着农业机械化改变了农村，主要的出路是大规模移民到新大陆。141然而今天，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移民的选择越来越少了。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证明加强移民控制是合理的，但减少潜在的难以控制的过剩劳动力供应往往是一个主要原因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军事化，以及欧洲堡垒的兴起，这些都是对外国人抢走工作的错误担忧的回应。然而，移民们对找到一份体面工作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仍然会冒险前往一个新的国家。结果是，在过去的15年里，有22000多名移民在试图进入欧洲时死亡，6000多名移民在试图穿越墨西哥-美国边境时死亡，1500多名移民在试图进入澳大利亚时死亡。143这些致命的移民障碍是今天用来隔离和管理全球过剩人口的主要机制之一。与这种对待移民的方式密不可分的是种族化的编码:这些移民不仅仅是其他个体，而是

其他种族。无论是威胁欧洲边境神圣性的“外国部落”，还是遭受过度剥削和虐待的泰国纺织移民工人，种族等级制度都是控制过剩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将剩余人口吸纳为有纪律的过剩劳动力失败时，国家总是可以采取简单的锁定、排斥和残酷对待大部分剩余人口的方法。145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监狱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增加，大规模监禁一直在增加此外，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种族因素——最明显的是对美国黑人的大规模监禁，以及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穆斯林和加拿大土著居民的大规模监禁，以及对世界各地外国移民的拘留和驱逐这些大规模监禁系统必须被理解为超出监狱的范围，因为它们包含了一整套法律、法院、政策、习惯和规则，这些都是为了征服一群人大规模监禁是一种主要针对过剩人口而非犯罪的社会控制系统。例如，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失业人数的增加与警察就业人数的增加有关随着后备军的增加，国家的惩罚手段也在增加。同样，移民拘留中心的扩大是对自给经济的消亡和流动无产阶级的形成的回应那些不愿被迫进入贫民窟的人在别处寻求更好的机会，结果却被关起来或留在地中海上等死。过剩的人口和警察执法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美国的制度或许是最清晰的例子。有充分证据表明，过去几十年大规模监禁的激增并不是对犯罪率上升的回应，而是对失业贫民窟的扩散和民权运动取得的进展的回应。这一制度的种族化本质是众所周知的，但如果不考虑阶级和过剩人口，就无法完全理解监禁的模式。例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黑人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151而绝大多数监狱人口由“有工作或没有工作的穷人”组成。152同样，种族之间监禁的差异被阶级之间的差异所超越，153而且黑人大规模监禁的增加与同一人口就业的下降是一致的事实上，美国大规模监禁的种族性质“完全”源于对下层黑人人口的极度不成比例的监禁因此，大规模监禁已成为管理和控制这些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并陷入贫困的剩余人口的一种手段。这些群体在空间上集中在市中心的贫民区，很容易成为国家控制的目标。这当然与种族问题有交集，因为失业贫民窟的起源在于对美国黑人的积极排斥。在许多方面，收容制度延续了奴隶制、吉姆·克劳法和贫民窟的遗产——用一种新的排斥制度取代了它们的许多功能但是，阶级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区别:以前的社会控制制度剥削自由劳动力，并试图将黑人人口转变为有纪律的劳动力，而现代监狱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排斥和控制过剩人口考虑到有犯罪记录的影响，监狱制度带来了三重排斥:文化和教育资本的排斥，政治参与的排斥和公共援助的排斥最终的结果是，监禁引发了一个恶性循环，城市穷人失业，找不到工作，从而无休止地将这些群体复制为资本之外的群体与其试图改造、教育囚犯，让他们重新融入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如建立错综复杂的制度，将他们拒之门外，防止他们在入狱后重新进入正常的雇佣劳动。在极端情况下，这些人口变得完全是可抛弃的，处于正常之外

遭受无端的暴力。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产生和再生产永久被排除在正规经济之外的制度。这些人群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并遭受所有可以针对他们的警察暴行和国家暴力。因此，我们有一整套国家和资本用来管理过剩人口的机制，从有纪律的融合到暴力排斥。

工作的危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人没有正式的、有工资的工作，只能靠最低的福利、非正式的谋生工作或非法手段度日。在所有情况下，这些人的生活都以贫困、不稳定和不安全为特征。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就业需求。随着以体面和稳定的工作为基础的霸权秩序崩溃，社会控制可能会回归到越来越强制的措施:更严厉的工作待遇，对移民的敌意加剧，对人口流动的更严格控制，以及对那些拒绝被抛弃的人的大规模监禁。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和构成世界大部分劳动力的过剩人口所面临的工作危机。

随着工作广泛自动化的潜力——这个话题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我们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看到以下趋势:

1. 发达经济体工人阶级的不稳定性将由于全球劳动力供应过剩(由全球化和自动化共同造成)而加剧。
2. 失业复苏将继续深化和延长，主要影响那些工作可以自动化的人。
3. 由于低技能服务工作的自动化，贫民窟人口将继续增长，并将因过早的去工业化而加剧。
4. 随着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被自动化，发达经济体的城市边缘化将会扩大。
5. 为了增加高技能工人的供给，将加速高等教育向职业培训的转变。
6. 经济增长仍将缓慢，替代工作不太可能扩大。
7. 随着失业者越来越多地受到强制性控制和生存经济的影响，工作福利、移民控制和大规模监禁方面的变化将会加深。

当然，这些结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分析是基于当前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随着过剩人口继续增长而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些趋势预示着一场工作危机，以及任何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作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自我意识至关重要，也是大多数人唯一的收入来源。未来二十年所预示的未来是，全球经济越来越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好工作了)，但我们仍然依赖工作来维持生活。政党和工会似乎对这场危机一无所知，尽管自动化有望将越来越多的工人抛到一边，但它们仍在努力应对危机的症状。面对这些紧张局势，21世纪左派的政治计划必须是建立一个人们不再依赖雇佣劳动生存的经济。

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论证的那样，这场斗争可以而且应该跨越一系列不同的方法:它意味着创造关于苦差事过时的霸权思想，将工会的目标从抵制自动化转变为工作分担和减少工作周，政府

为自动化投资提供补贴，提高资本的劳动力成本(161)，以及许多其他选择这意味着反对驱逐过剩人口，并攻击控制他们的机制。大规模监禁和与之相关的种族化统治体系必须被废除，163以及控制的空间机制——从隔都到边境控制——必须被拆散，以确保人民的自由流动。福利国家必须得到捍卫，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而是作为更广泛的后工作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未来依然是开放的，工作危机走向哪个方向，恰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斗争。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6

Post-Work Imaginaries

The goal of the future is full unemployment.

Arthur C. Clarke

鉴于前一章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后工作世界越来越必要，本章将概述后工作世界在实践中可能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些广泛的要求，开始为后工作社会建立一个平台。在主张要求的中心地位时，我们正在打破当今激进左派的一种普遍趋势，即认为不提出要求是激进主义的高度这些批评家经常声称，提出要求意味着通过提出要求，从而使一种权威合法化，从而屈从于现有的事物秩序。但是，这些说法忽略了提出要求的核心的对抗性，以及它们对于构成积极的变革动因至关重要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拒绝要求是理论混乱的征兆，而不是实践进步的征兆。没有诉求的政治，只不过是一群漫无目的的身体的集合。任何有意义的未来愿景都会提出建议和目标，本章是对这种潜在讨论的贡献。所提出的建议都不会是全新的，但这是它们力量的一部分:它不是一个自由浮动的项目，因为框架和运动已经存在，并且在世界上具有牵引力。

今天，革命的要求显得天真，而改良主义的要求显得徒劳。辩论往往就此结束，双方互相指责，而改变现状的战略必要性被遗忘了。因此，我们提出的要求意在进行*非改良主义的改革*。这里我们指的是三件事。首先，它们有一种乌托邦的边缘，在资本主义所能让步的极限上发挥作用。这使它们从礼貌的请求转变为充满好战和对抗的坚持要求。这样的要求将乌托邦的未来取向与需求的直接干预结合起来，唤起了一种“没有道歉的乌托邦主义”。[4]其次，这些非改良主义的建议以当今世界的真实趋势为基础，赋予它们革命梦想所缺乏的生存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要求改变了当前的政治平衡，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平台。它们投射出一种对当前的开放式逃离，而不是机械地过渡到下一个预定的历史阶段本章中的建议不会使我们摆脱资本主义，但它们确实承诺使我们摆脱新自由主义，并建立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新平衡。从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到新自由主义共识，我们的论点是，左派应该围绕工作后共识动员起来。有了后工作社会，我们将有更大的潜力向更大的目标前进。但这是一个必须长期实施的项目: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文化转变而不是选举周期。鉴于当今左翼势力被削弱的现实，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耐心地重建其权力——这一主题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要实现一个后工作时代的世界，除了这一条路别无他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些长期战略目标，并重建可能最终实现这些目标的集体机构。通过引导左派走向后工作时代的未来，不仅会

我们的目标是取得重大成果——比如减少苦工和贫困——但政治权力将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最后，我们认为，在物质条件下，后工作社会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是可行的和可取的本章描绘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在经济完全自动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后工作社会，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实施普遍的基本收入，实现对工作理解的文化转变。

全面自动化

我们的第一个需求是完全自动化的经济。利用最新的技术发展，这样的经济旨在将人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如果没有完全的自动化，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必须在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富足(呼应苏联的以工作为中心)或以牺牲富足为代价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以原始主义的反乌托邦为代表相比之下，有了自动化，机器可以越来越多地生产所有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将人类从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努力中解放出来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自动化和替代人类劳动的趋势应该被热情地加速，并作为左派的一项政治计划而成为目标这是一个采取现有资本主义倾向并试图将其推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可接受参数之外的项目。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一直是技术快速变化的同义词:在迫切需要积累的驱使下，生产方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19世纪，农业开始机械化，小块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越来越大的工业农场之下。手工业也发生了变化，机械作为一种外来的干预手段出现在生产过程中。传统上由熟练工人承担的工作现在被分解成不熟练的组成任务，并且经常使用机器来完成工人被分配去做部分工作，曾经由工人控制的工具变成了有节奏地指挥工人的机器工作变得越来越重复，越来越不熟练，越来越受机器的控制——对廉价的非熟练工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需求越来越大在20世纪早期，随着技术的引入，这种趋势开始发生变化，这些技术消除了最常规和最平凡的体力劳动(如运输和运输货物)。熟练工人在监督新机器、开展扩大的服务工作和管理新兴的越来越大的公司方面变得越来越必要20世纪初，由于打字机、复印机等办公技术的兴起，对熟练工人的需求进一步扩大，这些技术需要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操作人员。换句话说，技术并不总是使人失去技能，过去一个世纪对熟练工人日益增长的需求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期间，由于制造业易受提高生产率技术的影响，其就业人数继续下降20世纪早期大规模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最终随着小批量生产的自动化而得到扩展1970年，工业部门雇用了1000个机器人，而今天，它使用了160多万个机器人就就业而言，制造业已达到全球饱和点。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去工业化的趋势，就业增长现在主要局限于服务部门在制造业衰落的同时，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另一种转变。而早期的办公室

技术补充了工人并增加了对工人的需求，微处理器和计算技术的发展开始在许多领域取代半熟练的服务工人，例如电话接线员和秘书服务领域的机器人化正在加速发展，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售出了超过15万台专业服务机器人受到特别威胁的是“常规”工作——那些可以被编成一系列步骤的工作。一旦程序员开发出合适的软件，这些任务就完全适合由计算机来完成，这导致了过去四十年中常规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数量急剧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因为许多中等工资、中等技能的工作是常规的，因此会被自动化取代在北美和西欧，劳动力市场现在的特点是低技能、低工资的体力和服务工作(例如，快餐、零售、运输、酒店和仓库工人)的工人占主导地位，同时还有少数工人从事高技能、高工资、非常规的认知工作

最近的自动化浪潮将彻底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布，因为它将涵盖经济的各个方面:数据收集(射频识别、大数据);新型生产(机器人的灵活生产，25种增材制造，26种自动化快餐);服务业(AI客户协助、养老);决策(计算模型、软件代理);金融配置(算法交易);尤其是配送(物流革命、自动驾驶汽车、27艘无人机集装箱船和自动化仓库).28在经济的每一个功能中——从生产到分销，从管理到零售——我们都看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趋势这一最新的自动化浪潮是基于算法的增强(特别是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方面)、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计算能力(大数据的来源)的指数级增长，这些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二次机器时代”，正在改变机器可以完成的任务范围它正在创造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时代。新的模式识别技术使日常和非常规任务都可以自动化:复杂的通信技术使计算机在某些技术性知识任务上比人类做得更好，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正迅速使技术在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任务上做得更好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涉及非常规手工任务的自动化，而非常规的认知任务，如撰写新闻故事或研究法律判例，现在正由机器人完成这些发展的范围意味着，从股票分析师到建筑工人，从厨师到记者，每个人都很容易被机器取代在屏幕上移动符号的工人和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的工人一样危险。一份报告预测，随着机器人继续渗透到金融世界，“交易大厅的人口将减少”;34个长期以来作为后工业就业堡垒的零售工作将被机器取代;预计全球将有3500个、超过1.4亿个认知工作被淘汰虽然上一波自动化浪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但这一波最新的自动化浪潮似乎将摧毁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低工资的一端随着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工人们可能面临更低的工资和日益增加的贫困至少，正在兴起的自动化浪潮将彻底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并有可能导致对工人的需求大幅减少。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到

自动化革命所期望的学位如果一台机器取代了工厂里一半的工人，那么如果工厂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生产率应该翻倍。然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率增长普遍放缓撇开生产率是出了名的难以衡量这一事实不谈，我们相信一些现象可以帮助解释这种反常现象。首先，低工资极有可能抑制了对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的投资。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储备意味着，企业专注于资本投资的动力减弱。当更廉价的工人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新机器时，为什么还要购买新机器呢?这意味着，在实现全面自动化的努力中，争取更高的全球工资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补充任务。其次，可能存在延迟因素在起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IT革命花了一些时间才体现在生产率数据上，因为企业必须先进行投资，然后再适应这些技术的新能力。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新技术，组织必须改变，新技能必须学习，流程必须重新设计。总的来说，对数字技术的投资似乎面临着5到15年的生产力滞后今天，许多正在讨论的技术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新技术，甚至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新颖性意味着，随着这些技术被采用并适应商业运作的方式，我们应该预料到生产率数据的反应会有延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这里的论证主要依赖于规范性的主张，而不是描述性的主张。完全自动化是一种可以而且应该实现的东西，无论它是否还在实施。例如，在可能受益于采用工业机器人的美国企业中，只有不到10%的企业这样做了这只是完全自动化占据主导地位的领域之一，这重申了将完全自动化作为一项*政治要求的重要性*，而不是假设它将*出于经济*需要。各种政策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增加国家投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致力于替代而非增加工人的技术研究。在对劳动力市场最详细的估计中，有人认为，目前47%至80%的工作都有能力实现自动化让我们不要把这一估计当作一种确定性的预测，而是把它当作一项反对工作的政治计划的外部限制。我们应该把这些数字作为衡量我们成功与否的标准。

虽然经济的完全自动化在这里被提出是一种理想和要求，但在实践中不太可能完全实现在某些领域，由于技术、经济和道德的原因，人类劳动可能会继续下去。在技术层面上，今天的机器在涉及创造性工作、高度灵活的工作、情感工作和大多数依赖于隐性知识而不是显性知识的任务方面仍然不如人类将这些任务自动化所涉及的工程问题在未来20年内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尽管10年前就有人对自动驾驶汽车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计划将旨在投入研究资金来克服这些限制。实现完全自动化的第二个障碍是出于经济原因:某些任务已经可以由机器完成，但机器的成本超过了同等劳动力的成本尽管机器劳动效率高、精度高、生产率高，但资本主义更愿意赚取利润，因此只要比资本投资便宜，就使用人力。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计划也将旨在克服这一点，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支持劳工运动和利用国家补贴来激励替代人类劳动力等简单措施。

完全自动化的最后一个限制是我们赋予某些工作(如护理工作)的道德地位

许多人认为，这些任务，包括抚养孩子，必须由人类来完成。对于这类劳动，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种大致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认为，这类劳动具有道德价值，应该由人类而不是机器来完成。然而，在后工作社会中，护理劳动可以被赋予更大的价值，使社会摆脱被赋予盈利劳动的特权地位。完全自动化带来的自由时间也可以促进对替代性家庭安排的试验。乌托邦式的实验由来已久，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实验来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如何组织家务劳动、生育劳动和照料劳动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仍然需要一场政治运动来实现;后工作时代的世界或许能促进变革，但不能保证变革。然而，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大部分劳动的自动化应该是未来的目标事实上，认为女性天生就养育和渴望这种情感劳动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对她们继续剥削的有害掩护。但是，如果大部分这种劳动可以被消除呢?传统上，家庭一直是一个几乎没有技术变革的空间:它的无报酬性质和缺乏生产力规范使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动力投资于减少家务劳动然而，像打扫房子和叠衣服这样的家务，越来越多地可以委托给机器来做辅助技术和情感计算也在使一些高度个人化和令人尴尬的护理工作自动化方面取得进展，这些工作可能更适合非人格化的机器人更有推测性的是，一些人认为怀孕期间的痛苦和折磨应该让它成为过去，而不应该被神秘化为自然和美丽在这种设想中，人工合成的生物繁殖形式将使两性之间获得一种新的平等。我们不会在这里评判这些道路，而只是将它们作为后工作世界提供的选择。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关键是劳动不会立即或完全被消除，而是会逐步减少。完全自动化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要求，旨在*尽可能地*减少必要的劳动力。

你讨厌的不是周一，而是你的工作

建立下班后平台的第二个主要需求涉及回归经典理念，即在不减薪的情况下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从资本主义开始，工人们就一直在与强加的固定工作时间作斗争，而缩短工作时间的要求是早期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最初的斗争中，工人们以个人旷工、大量休假和不规律的工作习惯等形式进行了高度的抵抗这种对正常工作时间的抵制今天仍在继续，表现为普遍的偷懒现象，工人们经常上网而不是工作因此，在前进的每一步中，工人们都在努力摆脱正常的工作时间，工人运动早期的许多成功都与减少工作时间有关。例如，两天的周末是自发产生的，因为工人们喜欢喝酒，并多花一天时间休养而不是工作周末最终被巩固为一段公认的有限度的休息时间，是持续的政治斗争的产物(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在西方世界完成)同样，工人们在将每周工作时间从1900年的60小时减少到大萧条时期的35小时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60] .成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5年时间里，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18小时在大萧条的早期，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想法在美国得到了两党的支持

人们认为每周工作30小时的立法迫在眉睫与此同时，知识分子预言工作时间会进一步减少——想象一个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世界。在一篇经典的声明中，保罗·拉法格主张将每天的工作时间限制在3小时以内著名的凯恩斯提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计算出，到2030年，我们所有人每周将工作15小时——尽管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他只是在用语言表达当时普遍持有的信仰马克思把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作为他整个后资本主义愿景的核心，认为这是达到“自由王国”的“基本先决条件”。65

但这种每天工作三小时的愿景已经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缩短工作时间的努力在大萧条期间突然终止，当时商界舆论和政府政策决定利用创造工作机会的计划来应对失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每周工作时间稳定在40小时，从那以后，很少有人认真考虑改变这种情况相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工作时间普遍扩大了。首先，整个社会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增加了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每周的工作时间保持不变，因此用于工作的总时间增加了其次，随着工作渗透到我们清醒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与生活的区别正在逐步消除。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每时每刻都与工作联系在一起，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对工作的焦虑不断地冲击着我们领薪水的工人经常被迫在不被承认的情况下加班，而许多工人感到被人看到长时间工作的社会压力。这些要求意味着，美国全职工人实际上平均每周工作近47小时除此之外，大量的工作是无偿的，因此没有计算在官方数据中(在这些无偿劳动力中也存在持续的性别差异)虽然有工资的工作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很难找到，但无偿工作正在激增——随着销售点的自动化，一个完整的“影子工作”领域正在出现，工作被委托给用户(想想自助结账和自动取款机)此外，还有维持一份工作所需的隐性劳动:财务管理、失业时找工作、持续的技能培训、通勤时间，以及最重要的(性别)领域的劳动，包括照顾孩子、家庭成员和其他家属

如果工作已经延伸到我们生活的许多领域，那么回到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状态将会带来许多好处。除了最明显的好处(即增加了自由时间)之外，它还会带来一系列更微妙的好处首先，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对日益自动化的一个关键反应。事实上，这一政策在以前的自动化时期所起的作用往往被遗忘。许多评论家正确地指出了技术变革的历史，以表明它不一定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然而，自动化的初级阶段与每周工作时间的大幅减少同时发生;就业往往是通过重新分配工作来维持的。这项政策的第二个好处是它的各种环境优势。例如，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将导致能源消耗和总体碳足迹的显著减少自由时间的增加也意味着为了适应我们繁忙的工作日程而购买的便利商品的减少。更广泛地说，利用生产率的提高来减少工作量，而不是增加产出，将意味着能源效率的提高将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减少工作时间是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他研究表明，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可以普遍减轻压力、焦虑和精神压力

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健康问题但是，减少工作时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是一种既巩固又产生阶级力量的要求。首先，减少工作时间可以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临时策略——劳动合同、罢工和其他消除劳动时间的方式都是对资本家施加压力的手段。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也会使工人运动更加强大。通过减少市场上的劳动时间，劳动力的总供给减少，工人的力量增加。正如两位评论员最近指出的那样，“没有其他议价需求能同时提高议价地位。”此外，没有任何其他战略逻辑能够启动一种持续的良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每一次胜利都为下一次斗争中的实力奠定了条件。[79] .由于这些原因，减少每周工作时间的目标应该是21世纪左派的一个直接和突出的要求。

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为期三天的周末，而不是减少工作日，以减少通勤，并在已经存在的长假期周末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要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通过工会的斗争、社会运动的压力和政党的立法改革。工会为未来制定战略，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接受资本主义对工作的要求，可以利用集体谈判来接受自动化，以换取更短的工作周。事实上，历史记录表明，面对技术变革，工会往往是被动的，工资方面的让步只会推迟自动化，而不是阻止它另一种侧重于减少和分散工作的方法可以减少工作，而不会让工人流落街头还可以努力使作为工作周一部分的非正式的、无报酬的劳动得到承认，仅仅通过引起人们的注意来减少这种劳动关注缩短每周工作时间也要求工会与兼职工人和不稳定工人建立联系。[83] .但是，尽管工会在这场斗争中是必要的，但仅仅有工会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每个部门在自动化和生产率提高方面都有不同的潜力如果要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决裂，就必须进行更广泛的斗争。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机构必须通过塑造可能性的空间来为这场斗争做出贡献。包括新经济基金会和吉米·里德基金会在内的一些智库已经开始公开呼吁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在英国，诸如“不稳定工人之旅”和“C计划”等组织都在强调无薪工作，并围绕当今社会中工作地位的问题进行动员但是，最重要的是，公众已经强烈要求减少每周的工作时间，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这一想法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政策方法也多种多样。干预措施可以将劳动力成本从按人计算改为按小时计算，使企业强制实行长时间工作的成本效益降低比利时和荷兰等国赋予工人要求减少工时的权利，而不会受到雇主的歧视。荷兰也开始缩短各个年龄段的每周工作时间。通过逐步改变工作时间，年轻人和老年人现在分别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大军所有这些选择都可以而且应该被动员起来，以追求一个减少每周工作时间的项目。

工资不合适

前两项建议等同于通过完全自动化来减少劳动力需求，通过缩短工作周来减少劳动力供应这些措施的综合结果将是解放大量的自由时间，而不会减少经济产出或显著增加失业。然而，如果人们继续为入不敷出而挣扎，这些自由时间将毫无价值。正如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所说，“饥饿者或贫困者的闲暇根本不是闲暇，而是一种无情的活动，目的是为了生存或改善他们的处境。”例如，未充分就业的人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但缺乏享受这些时间的手段。事实证明，“未充分就业”实际上只是“工资过低”的委婉说法。这就是为什么后工作社会的基本需求是普遍基本收入(UBI)，给每个公民一笔可生活的钱，而不需要任何经济状况调查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想法20世纪40年代初，它的一个版本被提出，作为贝弗里奇报告的替代方案，贝弗里奇报告最终塑造了英国的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段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时期，基本收入是美国福利改革提案的核心。经济学家、非政府组织和政策制定者详细探讨了这一想法，并在加拿大和美国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实验。95UBI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1300多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美国国会制定一项“国家收入保障制度”。三个独立的政府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两位总统——尼克松和卡特——试图通过立法来实现它换句话说，UBI在20世纪70年代和98年代几乎成为现实虽然阿拉斯加最终实施了由其石油财富提供资金的基本收入，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这个想法基本上从辩论中消失了但近年来，这个想法又重新流行起来。在主流媒体和批评媒体中，它都获得了关注，被保罗克鲁格曼、马丁沃尔夫、*《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采纳*。瑞士将于2016年就UBI举行公投，该提案已被其他国家的议会委员会推荐。各政党在各自的宣言中采纳了这一建议，纳米比亚和印度也进行了新的尝试。101这一想法具有全球范围，巴西、南非、意大利和德国的团体以及一个涉及20多个国家的国际网络都大力推广了这一建议因此，在2008年危机和危机后实施的紧缩制度之后，UBI运动再次复苏。

然而，对UBI的要求受制于相互竞争的霸权力量。对于自由主义反乌托邦和后工作社会来说，它同样可以被动员起来——这种模糊性导致许多人错误地将这两个极端混为一谈。因此，在要求UBI时，必须明确三个关键因素，才能使其有意义:它必须提供*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它必须是*普遍的*，无条件地提供给每个人;而且必须是福利国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第一点很明显:UBI必须提供物质上足够的收入。具体数额因国家和地区而异，但利用现有数据相对容易得出。风险在于，如果设定得太低，UBI就会变成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此外，UBI必须是普遍的，无条件地给予每个人。由于领取UBI不需要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或采取其他措施，它将摆脱福利资本主义的纪律性质此外，普遍补助避免了福利的污名化，因为每个人都能得到它。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论证的那样，对“普遍主义”的援引也迫使人们不断颠覆对基本收入的任何限制应用(就个人作为公民、移民或囚犯的身份而言)。对基本收入的需求

普遍性的要求为扩大基本收入的范围和规模的持续斗争提供了基础。最后，UBI必须是福利国家的补充。对于基本收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保守观点是，它应该简单地通过向每个人提供一笔钱来取代福利国家。在这种情况下，UBI将成为进一步市场化的载体，将社会服务转变为私人市场。它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某种失常，而只是通过创造新市场来扩展其基本姿态。相比之下，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将UBI作为复兴的福利国家的补充

根据道德论证和实证研究，有大量理由支持UBI:减少贫困、改善公共卫生和降低医疗成本、减少高中辍学率、减少轻微犯罪、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以及减少政府官僚主义根据UBI的呈现方式，它能够获得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包括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等等。这种要求的效力部分在于这种模糊性，使其能够动员广泛的民众支持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UBI作为一种需求的重要性在于四个关键的相互关联的因素。

首先要强调的是，对UBI的需求是对政治转型的需求，而不仅仅是经济转型。人们通常认为，UBI只是一种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形式，或者只是一种通过刺激消费需求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UBI将具有无可挑剔的改革资格，只不过是一个美化的累进税制。然而，UBI的真正意义在于，它颠覆了目前存在于劳资双方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正如我们在关于过剩人口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无产阶级是由它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离来定义的。无产阶级因此被迫在就业市场上出卖自己，以获得生存所必需的收入。我们当中最幸运的人有闲工夫选择从事什么工作，但很少有人有能力选择*不从事任何*工作。基本收入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给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生活手段，使他们不必依赖于工作换句话说，工人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一份工作(在许多方面，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原话来看，工作是真正自愿的)。因此，UBI解除了雇佣劳动的强制性，部分解除了劳动的商品化，从而改变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政治关系。

这种转变——使工作成为自愿的，而不是被强迫的——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后果。首先，它通过减少劳动力市场的闲置来增强阶级力量。过剩的人口表明了当劳动力市场大量闲置时会发生什么:工资下降，雇主可以自由地降低工人的工资相反，当劳动力市场吃紧时，劳工就获得了政治优势。经济学家米克沃夫·卡莱茨基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充分就业在每一步都会受到抵制如果每个工人都被雇用了，被解雇的威胁就会失去它的纪律性质——外面就会有足够多的工作等着你。工人将占得上风，而资本将失去其政治权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基本收入:通过消除对雇佣劳动的依赖，工人可以控制劳动力供应的数量，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巨大的权力。阶级力量还通过各种其他方式得到增强。罢工更容易动员起来，因为工人们不再需要担心工资被扣减或罢工基金减少。为了工资而工作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整，空闲时间可以用来建立社区和参与政治。一个人可以放慢脚步，安全地进行反思

免受新自由主义的持续压力。此外，UBI的需求结合了就业者、失业者、未充分就业者、移徙劳工、临时工、学生和残疾人的需求。[111]它阐明了这些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动员起来的民粹主义方向。

UBI的第二个相关特征是，它将不稳定和失业从不安全状态转变为自愿灵活状态。人们常常忘记，最初推动灵活劳动的是工人，作为一种摧毁传统福特主义劳动的限制性永久性的方式朝九晚五的重复性工作，再加上大多数工作的单调乏味，很难成为一个吸引人的终身职业。护理工作的需求往往也需要灵活的方法，这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工作的吸引力。马克思自己在他著名的声明中援引了灵活劳动的解放方面，即共产主义“使我有可能今天做一件事，明天做另一件事，早上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养牛，晚饭后批评，就像我有思想一样，永远不会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面对这些对灵活性的渴望，资本适应并将其纳入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今天，灵活的劳动仅仅表现为不稳定和不安全，而不是自由。UBI回应了这种不稳定的普遍化，并将其从一个令人恐惧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自由的国家。

第三，基本收入将需要重新思考赋予不同类型工作的价值。考虑到工人不再被迫接受一份工作，他们可以简单地拒绝那些报酬太低、工作量太大、福利太少、或者贬低人格、没有尊严的工作。低工资的工作往往是粗鲁的、没有权力的，在UBI计划下，许多人不太可能愿意从事这种工作。其结果将是，危险、无聊和没有吸引力的工作将不得不获得更高的报酬，而更有回报、更有活力和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将获得更低的报酬。换句话说，工作的*性质*将成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而不仅仅是*衡量其利润*的标准这种价值重估的结果还意味着，随着最糟糕工作的工资上涨，将会有新的动机使这些工作自动化。因此，UBI与完全自动化的需求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回路。另一方面，基本收入不仅会改变最糟糕工作的价值，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大多数护理工作的无偿劳动。就像对家务劳动的工资要求承认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并将其政治化一样，UBI也承认了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再生产社会的一般方式并将其政治化:从非正式工作到正式工作，从家务工作到公共工作，从个人工作到集体工作。核心不是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新古典主义术语定义的生产劳动，而是更一般的再生产劳动范畴考虑到我们都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做出了贡献，我们的活动也应该得到报酬由于认识到这一点，UBI表明了从基于能力的薪酬向基于基本需要的薪酬的转变所有使努力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不良标准的基因、历史和社会差异在这里都被拒绝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仅仅因为是人而受到重视。

最后，基本收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的提议。它无视性别劳动分工，克服了传统福利国家以男性养家糊口为基础的一些偏见同样，它承认无薪家庭佣工对社会再生产的贡献，并相应地为他们提供收入。财政独立

这与基本收入相伴而来，对于发展女性的综合自由也至关重要。基本收入使人们能够试验不同形式的家庭和社区结构，而不再局限于私有化的核心家庭模式经济独立也可以重新配置亲密关系:UBI实验的一个更意想不到的发现是，离婚率往往会上升保守的评论家们认为这是这种需求不道德的证据，但较高的离婚率很容易解释为女性获得了摆脱不正常关系的经济手段因此，基本收入可以使家庭结构的实验更容易，提供儿童保育的可能性更大，性别劳动分工的转变也更容易。此外，与20世纪70年代对“家务工资”的要求不同，对UBI的要求有望打破工资关系，而不是加强这种关系。

虽然全民基本收入在经济上看似改革派，但其政治含义因此意义重大。它改变了不稳定性，它承认了社会劳动，它使阶级力量更容易动员起来，它扩大了实验我们如何组织社区和家庭的空间。它是一种改变生产关系的再分配机制。它是一种改变工作政治的经济机制。而在阶级斗争方面，充分就业和充分失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收紧了劳动力市场，赋予了劳动力权力，也让剥削工人变得更加困难。完全失业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不依赖于家庭和正式经济之间的性别分工，不把工人束缚在工资关系上，允许工人对自己的生活自主性。基于所有这些原因，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对充分就业的要求应该被面向未来的充分失业的要求所取代。

偷懒的权利

实施基本收入的障碍是什么?尽管为UBI提供资金的问题似乎巨大，但事实上，大多数研究表明，通过减少重复项目、提高富人税、遗产税、消费税、碳税、削减军事支出、削减工业和农业补贴、以及打击逃税。[122]对于UBI(以及后工作社会)来说，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因为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力量是巨大的;还有文化上的，因为工作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同一性之中。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研究政治障碍，但在这里将转向文化障碍。

实施UBI和建立后工作社会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克服普遍存在的服从职业道德的压力的确，美国早期实施基本收入的尝试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它挑战了关于穷人和失业者的职业道德的公认观念UBI提案没有将失业视为缺乏个人职业道德的结果，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结构性问题。然而，尽管该计划消除了这种区别，但该提案的框架语言仍将有工作的人和靠福利生活的人严格区分开来。由于害怕被污名化为福利接受者，贫穷的劳动者最终拒绝了该计划。种族偏见强化了这种抵制，因为福利被视为黑人的问题，而白人不愿意与之联系在一起。而穷人和失业者之间缺乏阶级认同——

过剩的人口意味着没有支持基本收入的有意义的运动的社会基础克服职业道德对于未来任何建立后工作世界的尝试都同样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新自由主义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并将自己定位为竞争主体。围绕这一主题的是一系列与自力更生和独立相关的形象，这些形象必然与后工作社会的纲领相冲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以竞争性的自我实现为中心，而工作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工作，无论多么有辱人格、报酬低或不方便，都被认为是一种终极的善。这是主流政党和大多数工会的口头禅，与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工薪家庭的重要性、削减福利以“工作总有回报”等言论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匹配的是，另一种文化努力将失业者妖魔化。报纸大肆渲染领取福利的人毫无价值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大肆渲染和嘲笑穷人，不断出现的福利骗子的身影。工作已经成为我们自我概念的核心——以至于当有人提出减少工作的想法时，许多人会问:“但我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觉得工作之外无法想象有意义的生活，这一事实表明，职业道德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感染了我们的思想。

虽然对工作的服从通常与新教的职业道德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在许多宗教中都隐含着对工作的服从这些伦理要求一个人不管工作的性质如何都要献身于工作，并灌输了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即苦差事应该受到重视虽然职业道德起源于确保来生更美好的宗教观念，但其目标最终被世俗对改善今生的奉献所取代。这一要求的当代形式已呈现出一种自由人文主义的特征，把工作描绘成自我表现的主要手段工作已经成为我们同一性的一部分，被描绘成实现真正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例如，在求职面试中，对于“你为什么想要这份工作?”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知道最差的答案。，那就是回答“钱”，尽管这仍然是被压抑的事实。当代的服务工作加剧了这一现象。在缺乏明确的生产率衡量标准的情况下，工人们反而表现出生产率——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或者在被客户吼的时候微笑。长时间工作已成为对工作投入的一种表现，尽管它使性别收入差距永久化由于工作与我们的身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克服职业道德需要我们克服自我。

职业道德的核心意识形态支持是报酬与痛苦挂钩。放眼望去，到处都有一种让人们在获得报酬之前受苦的冲动。对无家可归的乞丐的蔑称，对领救济金的人的妖魔化，为领取救济金而设立的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强加给失业者的无薪“工作经验”，对那些被视为免费得到东西的人的虐待式惩罚——所有这些都揭示了一个事实，即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报酬需要工作和痛苦。无论是出于宗教目的还是世俗目的，苦难都被认为是构成必经的成人仪式。人们必须通过工作来忍耐，才能得到工资，必须在资本的眼前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思想有明显的神学基础——在这种思想中，受苦不仅被认为是有意义的，而且实际上是有意义的条件。没有苦难的人生被认为是轻浮和无意义的。这种立场必须被拒绝，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如今已被超越的阶段的遗留物。在贫穷、疾病和饥饿是生存的必要特征的时代，使痛苦变得有意义的动力可能具有某种功能逻辑。但我们今天应该摒弃这种逻辑，认识到

我们已经超越了在苦难中寻找意义的需要。工作，以及与之相伴的痛苦，不应该被美化。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反霸权的工作方法:一种推翻现有的关于工作的必要性和可取性，以及将痛苦强加于人作为报酬基础的想法的计划。媒体已经在改变可能性的条件——将UBI定位为不仅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解决技术性失业问题的必要方案。这些霸权趋势应该被放大。职业道德的主导地位也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物质基础相抵触。资本主义要求人们为了谋生而工作，但它越来越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赋予职业道德的价值与这些物质变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只会加剧制度变革的可能性。使不稳定和失业成为一个日益明显的政治问题的行动，将在某种程度上为后工作社会提供支持。(就像“占领”运动提高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意识，“英国不削减”运动强调了逃税一样。)也许最重要的是，人们已经普遍憎恨那些可以利用的工作。就像新自由主义霸权吸收了真实的欲望并获得了积极的同意一样，任何后工作霸权也必须在人们的真实欲望中找到其积极的力量。要求他人接受职业道德的普遍要求，只能与我们对自己工作的鄙视相匹配。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13%的人说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吸引力大多数工人在工作中感到身心俱疲、精神枯竭、社交疲惫，承受着巨大压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没有任何意义、成就或救赎——它仅仅是用来支付账单的。那些已经被排除在工作之外的人不应该为融入一个工作和劳动的社会而奋斗，而应该创造条件，在工作之外再生产他们的生活。改变关于职业道德的文化共识将意味着在日常层面采取行动，将这些中期目标转化为口号、模因和圣歌。这将需要开展工作场所组织和运动的困难而重要的工作-动员人们的激情，以推翻职业道德的主导地位。当媒体对自动化的讨论从对失业的恐惧转为对摆脱苦差事的庆祝时，这些努力的成功将是显而易见的

自由的领域

21世纪的左派必须寻求与工作在当代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作斗争。最终，我们的选择是赞美工作和工人阶级，还是废除两者前一种立场表现在重视工作、具体劳动和工艺的民间政治倾向上。然而，后者是唯一真正的后资本主义立场。必须拒绝和减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我们的综合自由正如我们在本章所阐述的，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实现四个最低要求:

1. 全自动化
2. 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
3. 基本收入:提供基本收入
4. 职业道德的削弱

虽然这些建议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目标，但当它们作为一个综合计划被推进时，它们的真正力量才会表现出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缘的改革，

而是一种全新的霸权形态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对完全自动化的需求放大了减少每周工作时间的可能性，并提高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需求。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有助于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并撬动阶级力量。而全民基本收入则放大了减少每周工作时间和扩大阶级力量的潜力。它还会加速全面自动化的进程: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和劳动力市场的紧缩，随着公司为了扩张而转向机器，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将会增加这些目标彼此产生共鸣，放大了它们的综合力量。而且，一种新的后工作霸权将抵抗倒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受益于其延续的大众选区这里的野心是从资本主义手中夺回未来，为我们自己建立我们想要的21世纪世界。它要提供时间和金钱，这是任何有意义的自由概念的核心。因此，左派要求充分就业的传统战斗口号应该被要求充分失业的战斗口号所取代。但让我们明确一点:不存在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也不存在进入后工作世界的必要进程。争取完全自动化、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终结职业道德和全民基本收入的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后工作时代的想象产生了一种关于进步的夸张形象——一种旨在使未来成为当前活跃的历史力量的形象。这样一个项目将面临的斗争要求左翼超越其民间政治视野，重建其权力，并采取一种扩张性的变革战略。我们现在转向的正是这些问题。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7

A New Common Sense

The key is to succeed in making 'common sense' go in a direction of change.

Pablo Iglesias

后工作社会具有潜在的广泛吸引力，并将极大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但这并不能保证它一定会实现。如今，媒体对基本收入和自动化的讨论似乎往往假定了精英的仁慈、技术的政治中立以及后工作社会的必然性。然而，一系列强大的力量被投入到维持现状的过程中，左派在过去几十年里遭受了重创。不幸仍然比奢侈更有可能出现。在目前的情况下，自动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失业，新技术的好处将流向富有的所有者。我们得到的任何空闲时间都将随着沉闷的新工作的产生或不稳定生活的延长而消失。如果明天就实现基本收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将被设定在贫困线以下，只是对公司的一种施舍。因此，要实现一个有意义的后工作社会，就需要改变当前的政治状况。反过来，这又要求左派正视摆在它面前的惨淡局面:工会处于废墟之中，政党沦为新自由主义的傀儡，知识和文化霸权正在衰落。近几十年来，国家和企业对左翼的镇压明显加剧，法律变化使其更难以组织起来，普遍的不稳定使我们更不安全，警务的军事化也迅速加快了速度除此之外，我们的内心生活、我们的社会世界和我们的建筑环境都是围绕着工作及其延续而组织起来的。向后工作社会的转变，就像向脱碳经济的转变一样，不仅仅是克服少数精英利益的问题。更根本的是，这是一个从头开始改造社会的问题。与权力和资本的整体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对这样一个项目面临的困难抱有任何幻想。如果不可能立即实现全面的转型变革，我们的努力必须指向打开那些确实存在的可能性空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培育更好的政治条件。我们必须首先达到一个可以有意义地表达更激进要求的空间，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实质性地改变政治格局，我们必须为长期做好准备。

这不应该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量的组成部分必须到位:无地劳动者、广泛的商品生产、私有属性、先进的技术、财富的集中、资产阶级、职业道德等等。这些历史条件是使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最终在世界上获得牵引力的组成部分。这里的教训是，正如资本主义依赖于一组特定组件的积累一样，后资本主义也将如此。它既不会一下子出现，也不会在某个革命时刻出现。左派的任务必须是制定出后资本主义的条件，并努力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建立这些条件。

因此，这一章从一个前提开始，即当代左派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和

任何变革性的计划都需要时间。我们在这里的分析主要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以及它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机构。我们将基本上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广大(和极其重要的)地区放在一边然而，值得重申的是，自动化和人口过剩的问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后工作的基础正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正如最近在印度和纳米比亚进行的基本收入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工业自动化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激增，以及在众多国家自发出现的反工作运动。虽然这些动态是全球性的，但任何改变这种情况的政治计划都必须对当地的特殊情况作出反应。虽然某些核心原则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翻译，但它们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考虑到这些条件，如何才能建立更美好的未来?4、用革命党建立双重政权和推翻国家的经典列宁主义战略已经过时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模式的支持者作为历史重演者似乎比作为当代政治的指南更有用。同样，最近的革命史——从伊朗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只是导致了神权专制主义、军事独裁和内战的某种组合。选举改革派的做法同样是失败的。在一个新世界中投票的想法在战后时代演变成了一种欢乐的精英共识，并在最近几十年被纳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改良主义注定只是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并充当一种政治调解的稳态系统。而且，正如最近的斗争周期所显示的那样，优先考虑各种形式的即时性的民间政治方法未能改变社会。零零碎碎的努力、防御性的斗争、撤资和预示性的零星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无法遏制这一潮流，更不用说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取得进展了。同样，仅仅假定进步会在实践中实现，或者群众会自发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仍然是不够的尽管在任何斗争中无疑都有运气和不可预测性的因素，但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困难要求事先进行战略思考。我们的努力必须沿着广泛的路线进行战略组织，而不是消散在一系列局部的、不连贯的成就中。正如现代性所断言的那样，走向更美好未来的进步需要深思熟虑的反思和有意识的行动。

鉴于这些其他方法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最好的前进道路是反霸权战略。这是一种可以从弱势地位适应的战略，可以从地方到全球扩展，并承认资本主义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控制，从我们最亲密的欲望到最抽象的资金流动。反霸权战略需要一个项目来推翻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常识，并使集体想象力恢复活力。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建立新常识的尝试——一种围绕工作危机及其对无产阶级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的常识。在这方面，它包括为全面斗争爆发的时刻做准备工作，改变我们的社会想象，重新配置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它为新世界建立支持和共同语言，寻求改变权力平衡，为危机扰乱社会合法性做好准备。与民间政治的形式不同，这种战略是扩张性的、长期性的，能够适应抽象和复杂性，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在本章中，我们考察了三个可能的斗争场所——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知识、文化和技术媒介上。下一节将在理论层面上考察霸权，而本章的其余部分将探索如何通过乌托邦将反霸权计划付诸实践的例证

叙事、多元主义经济学和技术的再利用。

工程同意

“霸权”的概念最初是作为解释为什么普通人没有反抗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根据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叙述，工人会越来越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并最终组织起来超越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应该产生一个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日益两极分化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将通过革命手段赢得对国家的控制，这是一种政治战略的基础。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很明显，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欧民主社会发生。那么，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如何在基本上没有公开武力的民主社会中得到保障的呢?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回答说，资本主义的权力依赖于他所谓的霸权——根据一个特定群体的命令来设计同意。霸权计划建立了一种“常识”，将一个群体的特定世界观作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视野。通过这种方式，霸权使一个群体能够主要通过同意(主动和被动)而不是强制来领导和统治一个社会这种同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明确的政治联盟，传播支持特定社会组织方式的文化价值观(例如，通过媒体和教育灌输的职业道德)，阶级之间的利益一致(例如，当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时，工人会过得更好，即使这意味着大规模的不平等和环境破坏)，并通过建设技术和基础设施，以一种无声地约束社会冲突的方式(例如，通过扩大街道以防止在起义期间设置路障)。从广泛和扩散的意义上说，霸权使相对较小的资本家群体能够“领导”整个社会，即使他们的物质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最后，除了确保主动和被动的同意外，霸权项目还部署强制手段，如监禁、警察暴力和恐吓，以中和那些无法被领导的群体综上所述，这些措施使小团体能够影响社会的大方向，有时是通过实现和部署国家权力，但也可以在国家范围之外。

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霸权不仅是当权者的治理策略，也是边缘人改造社会的策略。反霸权项目使边缘和被压迫群体能够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平衡，并带来新的常识。因此，放弃霸权意味着放弃赢得和行使权力的基本理念，实际上是放弃了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虽然有一些左翼人士明确支持这种立场，但就水平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程度而言，它们往往是作为一种反霸权力量来运作的。占领运动的重大成功——改变了围绕不平等的公共话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因此，一个反霸权项目将寻求推翻现有的一套联盟、常识，并通过同意来统治，以建立一个新的霸权这样一个项目将寻求建立一个新的后工作世界可以从中出现的社会条件，并将需要一种超越民间政治的临时和地方措施的扩张性方法。它需要不同社会群体的动员，[13]这意味着将个人利益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形成对后工作社会的共同愿望。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霸权

例如，美国是通过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利益与社会保守主义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产生的。这是一个难以驾驭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联盟，但它是一个通过强调个人自由在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中找到共同利益的联盟此外，反霸权项目在不同领域运作——从国家到公民社会，再到物质基础设施。这意味着需要一整套行动，例如寻求传播媒体影响力，试图赢得国家权力，控制关键经济部门和设计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个项目需要经验性和实验性的工作，以确定这些不同领域中哪些部分正在运作，以加强当前社会的总体方向。圣山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MPS煞费苦心地意识到凯恩斯主义是当时的霸权常识，因此承担了拆解支撑凯恩斯主义的要素的长期任务。这是一个花了几十年才实现的项目，在此期间，MPS不得不采取反霸权行动来实施它。这种长期的思考是对今天倾向于关注即时抵抗和新的日常暴行的重要纠正。然而，霸权并不仅仅是思想和价值观的非物质之争。例如，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依赖于一系列物质实例——在政府权力、媒体框架和新自由主义智库网络的关系中，这是一个范例。正如我们在对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考察中所观察到的，MPS特别擅长创建一个智力基础设施，包括必要的制度和物质途径，以灌输、体现和传播他们的世界观。

社会联盟、战略思维、意识形态工作和制度的结合，构建了改变公共话语的能力。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奥弗顿窗口”的概念——这是一种可以被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现实地”讨论并因此被公众接受的思想和选择的带宽现实选择的一般窗口出现在一个复杂的原因联系中——谁控制着新闻和广播媒体的关键节点，流行文化的相对影响，有组织的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相对权力平衡，谁掌握行政政治权力，等等。虽然奥弗顿窗口是不同元素的交集，但它有自己的力量来塑造社会和政府未来的道路。如果某件事不被认为是“现实的”，那么它甚至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它的支持者也会被认为是“不严肃的”。我们可以以此来评价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成功，看他们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勾勒出了什么是可能的虽然从来都不可能让大多数人相信关键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优点，但积极的同意是不必要的。世界各地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府，与智库网络和主要是右倾的媒体相结合，已经能够改变可能选择的范围，甚至排除最温和的社会主义措施通过这一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霸权使权力的行使成为可能，而不总是需要行政国家权力。如果可能选择的窗口可以进一步向右延伸，那么右翼政府是否掌权就无关紧要了——这是美国共和党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利用的现实，经常让自由主义左翼人士感到惊讶。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意识形态霸权，并不是要在可以讨论的问题上保持严格的政党路线。仅仅把左派的议题和范畴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就已经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虽然通常被理解为与思想、价值观和社会的其他非物质方面有关的东西，但实际上霸权也有一种物质意义。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基础设施

对社会施加重要的霸权力量——在没有公开胁迫的情况下强加一种生活方式。例如，关于城市基础设施，大卫·哈维写道:“关于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成为什么样的项目是……关于人类可能性的项目，我们想要谁，或者更贴切地说，我们不想成为谁。”[18]像美国郊区这样的基础设施，其建设的明确意图是孤立和个性化现有的团结网络，并以单户家庭的形式在私人和公共之间建立性别划分经济基础设施也有助于改变和塑造人类的行为。的确，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往往既是出于经济目的，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例如，如果我们考虑全球准时制供应链，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经济效率，但在打破工会权力方面也异常有效。换句话说，霸权，或通过同意的工程来统治，既是一种物质力量，也是一种社会力量。它是一种根植于人类思想、社会和政治组织、个人技术和构成我们世界的建筑环境中的东西而且，虽然霸权的社会力量必须持续保持，但霸权的物质化方面施加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在其最初创造之后很久就会持续下去基础设施一旦到位，就很难移除或改变，尽管政治条件在变化。例如，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个问题，围绕化石燃料建立的基础设施。我们的经济是围绕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分销和消费来组织的，这使得经济脱碳变得极其困难。然而，这个问题的另一面是，一旦后资本主义基础设施到位，不管有什么反动势力，要从它身上转移出去也同样困难。因此，技术和技术基础设施既构成了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大障碍，也构成了确保替代方式长久存在的巨大潜力。这就是为什么，例如，即使有一场大规模的民粹主义运动来反对当前的资本主义形式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对生产和分配技术等事物的新方法，每一个社会运动都会发现自己被迫回到资本主义的实践中。

因此，左派必须发展一种社会技术霸权:既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在物质基础设施领域。这样一种战略的目标，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是引导目前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生产霸权走向一个新的平衡点，超越强加雇佣劳动。这将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长期的、实验性的实践。因此，霸权计划暗示并回应社会作为一种复杂的紧急秩序，是各种相互作用的实践的结果社会实践的某些组合将导致不稳定，但其他组合将趋向于更稳定(如果不是字面上的静态)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霸权政治是跨越各种社会子系统，从国家的国家级政治到经济领域，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到不同的技术制度，保持或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新点的工作。作为这些不同领域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出现的秩序就是霸权，它的作用是限制某些类型的行动，并使其他行动成为可能。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考察进行这种斗争的三种可能渠道:经济多元化、创造乌托邦叙事和重新利用技术。这些当然没有穷尽可能的攻击点，但它们确实确定了将资源集中在潜在的生产领域。

牢记未来

今天，霸权最普遍和最微妙的方面之一是它对我们集体想象力的限制。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反对霸权主义，但“别无选择”这句口头禅仍然是真实的。这标志着与漫长的20世纪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当时乌托邦式的想象和对未来的宏伟计划蓬勃发展。例如，太空飞行的图像一直是人类控制自己命运愿望的暗号在前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人们对太空探索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尽管航空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但太空飞行的梦想承诺“从过去的象征中彻底解放出来:社会不公正、不完美、重力，最终是地球”。当时的乌托邦倾向使人们理解了迅速变化的世界，使人们相信人类可以将历史引导到理性的方向上，并培养了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在更为神秘的表述中，宇宙学家以令人钦佩的雄心主张，地球工程和太空探索只是实现真正目标的部分步骤:使全部死者复活与此同时，更世俗的方法概述了全自动经济、大众经济民主、阶级社会的终结和人类繁荣的详细计划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太空旅行的热情和信仰是如此之高，以至于1924年，当有关可能用火箭飞往月球的谣言流传开来时，几乎爆发了一场骚乱流行文化中充斥着这样的形象，充斥着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交织在一起的故事。但这些不仅仅是外星幻想的问题，因为它们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具体的影响。在后革命时期，这种雄心勃勃的文化催生了一系列社会实验，包括新的公共生活方式、家庭安排和政治形式这些实验使人们相信，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时代，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为布尔什维克和人民提供了支持。虽然在斯大林主义时代，乌托邦的野心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在地下，但随着新发现的经济信心的增长和实现一些早期梦想的资源的增加，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出现苏联实验中最伟大的时刻——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它在20世纪50年代似乎即将实现的经济主导地位——最终都与充满乌托邦欲望的流行文化分不开在美国的早期，类似的乌托邦野心也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普遍信仰，新的工业资本主义是暂时的，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很快就会出现，工人们为这个新世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一个远比我们现在的环境更加敌对的环境中，工人们能够创建一系列强大的组织，并施加巨大的压力这一时期的成功与更广泛的乌托邦文化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仍然牢牢地局限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内未来已经被取消了。我们更倾向于相信，生态崩溃迫在眉睫，军事化加剧不可避免，不平等加剧不可阻挡。当代科幻小说被一种反乌托邦的思维方式所主导，它们更倾向于描绘世界的衰落，而不是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当乌托邦被提出时，必须从工具的角度严格证明其合理性，而不是允许其存在于任何计算之外。与此同时，在学术界的殿堂里，乌托邦的冲动被痛斥为幼稚和徒劳。在数十年失败的威吓下，左派一直在放弃其传统上的宏伟抱负。举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激进的女权主义和酷儿宣言，呼吁建立一个根本的新社会，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已经沦为一种更温和的同一性政治;到了21世纪初，讨论的主题被更温和的要求所主导，要求承认同性婚姻，要求女性有平等的机会成为首席执行官今天，激进希望的空间已经消失了

被一种被认为是怀疑的成熟和一种普遍的愤世嫉俗的理由所占据而雄心勃勃的左派的目标，曾经以社会的全面变革为目标，已经沦为社会边缘的小修修补补。

我们认为，一个雄心勃勃的左派对于工作后的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记住和重建未来乌托邦是进步的矫枉过正的体现。它们要求未来得以实现，它们构成了一种不可能但必要的欲望目标，它们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和向往更美好世界的语言。对乌托邦幻想的谴责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想象力的元素使乌托邦成为任何政治变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我们想要逃离现在，我们必须首先摒弃未来的既定参数，并打开可能性的新视野。没有对不同未来的信仰，激进的政治思想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的确，乌托邦思想在解放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是中心思想——从早期的自由主义，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再到女权主义和反殖民民族主义。宇宙主义、非洲未来主义、永生之梦和太空探索——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一种普遍的乌托邦思想冲动。即使是新自由主义革命，也在面对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共识时，培养了对另一种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渴望。但自苏联解体以来，任何与之竞争的左翼乌托邦都严重缺乏资源。因此，我们认为，左派必须将乌托邦的冲动从新自由主义的枷锁中释放出来，以便扩大可能性的空间，动员对当下时刻的批判视角，培养新的欲望。

首先，乌托邦思想严格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并将其趋势投射到未来科学方法试图减少对未来的讨论，以适应概率框架，而乌托邦思想认识到未来是完全开放的。今天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有可能。在最好的情况下，乌托邦包含了自身的紧张和活力，而不是呈现出一个完美社会的静态形象。虽然不能简化为工具性的关注，但乌托邦也培养了对可能在条件变化时实施的想法的想象。例如，19世纪的俄罗斯宇宙学家是第一批认真思考太空飞行的社会影响和潜力的人。他们最初被认为是无用的空想家，结果却对未来的火箭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早期关于太空探索和宇宙主义乌托邦的科幻小说在俄国革命之后继续影响着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政策。替代方案的创造也使人们有可能首先认识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随着苏联提出的有缺陷但意义重大的全球替代方案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这种不同世界的图像变得越来越重要，扩大了奥弗顿的窗口，并试验了在不同条件下可能实现的想法。

42 .在阐述未来的形象时，乌托邦思想也产生了一种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现在变得可以接受批判它把现在的表象悬置为不可避免的，并揭示了否则会被忽视的世界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必须从本质上排除的问题例如，最近的美国科幻小说经常是针对当代的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而写的，而早期的俄罗斯乌托邦所想象的世界克服了快速城市化和种族冲突所带来的问题这些世界不仅为解决方案提供了模型，而且阐明了问题。正如斯拉沃伊□i□ek在他对托马斯·皮凯蒂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实施全球税收的看似温和的要求实际上意味着对整个全球政治结构的彻底重组在这个小小的要求中，隐含着一种乌托邦

冲动，因为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要求对现有环境进行根本性的重新配置。同样，对普遍基本收入的要求提供了一个视角，从这个视角来看，工作的社会性质、看不见的家庭方面及其延伸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变得更加明显。从后工作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组织工作生活、家庭和社区的方式有了新的面貌。为什么我们要把生命的三分之一奉献给屈从于别人?为什么我们坚持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完成)是无偿的?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是围绕着从郊区来的漫长而沉闷的通勤而组织起来的?因此，来自未来的乌托邦式需求迫使我们质疑我们这个世界的既定条件。通过这些方式，乌托邦既可以是对现在的否定，也可以是对可能的未来的肯定

最后，在肯定未来的过程中，乌托邦发挥着情感调节器的作用:它在意识和前意识层面上操纵和修改我们的欲望和感受。在所有的变化中，乌托邦最终关注的是“欲望的教育”。[47]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告诉我们如何渴望和渴望什么，同时将这些力比多的因素从理性的界限中释放出来。乌托邦给了我们一些目标——一些超越资本主义永恒的当下所提供的一成不变的重复的东西。在打开现在并提供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形象的过程中，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空间变成了希望和对更多的*渴望*的空间通过产生和引导这些影响，乌托邦思想可以成为行动的动力，变革的催化剂;它会扰乱习惯，打破对现有秩序的认同未来的思考，通过沟通机制的延伸，产生了希望的集体影响，动员人们为更美好的未来而行动——这种影响对任何政治计划都是必要的虽然乌托邦思想拒绝了在当代左派的某些部分中发现的忧郁和先验的悲惨主义，但它也唤起了它自己的消极影响希望的反面是失望(这种情绪在今天具身在像年轻的“没有未来的毕业生”这样的人物身上)。[53]传统上，愤怒一直是激进左派的主要情绪，而失望唤起了一种更富有成效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现状的意志转变，而且是一种对未来的渴望。失望表明了对失去的未来的向往。

如果左派要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常识(“没有足够的钱”、“每个人都必须工作”、“政府效率低下”)，乌托邦思维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从大处着眼。左派的自然栖息地一直是未来，这个地形必须开垦。在我们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在日常生存的压力和要求下，追求更美好世界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在这种压抑中，失去的是那种创造“一个在存在、美学和政治上超越资产阶级文化悲惨界限的世界”的雄心。[54]但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明显的普遍的和不可抑制的特征，乌托邦思想甚至可以在最压抑的条件下涌现出来乌托邦倾向在人类的各种感情和影响中发挥作用——体现在流行文化、高雅文化、时尚、城市规划，甚至日常的白日梦中例如，人们对太空探索的普遍渴望表明一种超越利润动机的好奇心和野心与之相类似的非洲未来主义趋势不仅提供了一个高度程式化的更美好未来的形象，而且还将其与对现有压迫结构的激进批判和对过去斗争的回忆联系起来。后工作想象在乌托邦写作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先例，指向了一种不断努力超越雇佣劳动的约束。文化运动和审美生产在重新点燃对乌托邦的渴望和激发对未来的愿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世界。

导航新自由主义

当乌托邦寻求转变新自由主义的文化霸权时，教育形成了转变知识霸权的关键机构。正是教育机器向新一代灌输特定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在几十年里复制其意识形态。在教育系统中，孩子们学习社会的基本观念，尊重(实际上是服从)现有秩序，以及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部分分配这些观念所必需的技能因此，改变知识分子的教育体系是建立新霸权的关键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写道:“只要我能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不在乎谁来制定一个国家的法律，或者为这个国家撰写先进的论文。”“专注于改变这种社会制度因素的项目可以集中在三个主要目标上:使经济学教学多元化，重振左翼经济学研究，扩大大众经济素养。”

这一点经常被遗忘，因为我们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以至于经济学曾经是一门相对多元化的学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是各种形式主义和非形式主义方法之间良性竞争的时期在学术期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经济计划、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其他标准范畴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剑桥资本之争把非正统和主流思想家聚集在一起，就这一学科的基础展开了一场开创性的辩论——每个人都承认，非正统思想家赢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还在一家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讨论剥削、劳动价值论和转型问题这样的事件，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包含各种方法的大帐篷，但从根本上讲，它对什么是真正的经济知识的看法是有限的。这一问题因最杰出期刊的特殊方法论要求而变得更加复杂，正式建模优先于更多的社会学分析和定性理解。

如果要改变关于如何运行经济的广泛的文化和学术观念，至少需要在学生教育方面实行更多的多元化。在这里，多元主义的复兴有了一线希望。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将另类经济学引入主流大学，学生和专业人士团体也开始围绕这个问题动员起来。自2000年以来，许多大学都看到学生们公开要求在他们的经济学教育中实行多元化近年来，学生们公开抗议主流经济学的捍卫者，并且出现了像“后危机经济学会”和“反思经济学”这样的团体，他们共同努力改变课程设置然而，经济学多元化项目的关键是研究计划和教科书的发展。形式主义方法兴起的部分原因恰恰是它们符合高等教育的制度要求:它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花时间检验的理论，提供了延续思想谱系的教科书和博士学位，提供了清晰和可传播的原则今天，这一领域已被新古典主义教科书所主导，其结果是，即使教授们想要使这门学科多元化，他们手头也没有很多可获得的资源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其中包括两位支持者创建了一本非正统教科书

[67] .现代货币理论但是，为了拓宽主流经济学狭隘的视野，在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为了支持这一进程，应该有一场运动来重振左翼经济学。2008年危机之后，左翼经济分析的匮乏就可以看出，当时最突出的批评性回应是一种权宜之计的凯恩斯主义。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经济纲领，他们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而不是对替代方案的阐述。这是一场乌托邦想象的危机，也是一场认知极限的危机。一系列新兴的当代现象必须仔细思考:例如，长期停滞的原因和影响;向信息、后稀缺经济的转变所引发的转变;引入全面自动化和全民基本收入所带来的变化;集体化自动化制造和服务的可能途径;量化宽松替代方法的进步潜力;使生产资料脱碳的最有效途径;黑池对金融不稳定的影响——等等。同样，应该重新研究后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可能是什么样子。除了一些过时的经典著作之外，很少有研究来思考另一种经济体系——在增材制造、自动驾驶汽车和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出现之后，就更少了。[68]例如，非国家加密货币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如果不通过抽象或具体的劳动来衡量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呢?生态问题如何在后资本主义经济框架中得到充分考虑?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取代市场，克服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利润率可能下降的趋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70]建立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既是一项技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为了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左派需要克服对形式建模和数学的普遍厌恶。讽刺的是，批评数学建模抽象的同一批人，往往坚持对资本主义最抽象的辩证解读。这种对定量方法使用的承认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采用新古典主义模型或盲目地遵循数字的指令，而是正式建模所带来的严谨和计算上的详细阐述对于应对经济的复杂性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从现代货币理论到复杂性经济学，从生态经济学到参与经济学，创新思维的轨迹正在启动——即使它们目前仍处于边缘地位。同样，像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这样的组织在创建经济模型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模型可以为左翼政治目标提供信息，同时也可以培养公众对经济事务的素养。

后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提高经济素养不仅意味着改变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实践，还意味着让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经济。对经济趋势的复杂分析需要与日常生活的直觉洞察联系起来。虽然在不久的将来，左派经济学的复兴很可能集中在学术界，但其目标应该是将这种经济学教育传播到远远超出大学范围的地方。工会可以利用它们的资源，让会员了解当代经济不断变化的本质。通过内部教育计划，普通工人可以开始把他们的工作场所和社区的问题放在更大的经济背景下。类似的方法可以——在许多情况下已经——通过培训积极分子来实现。开放学校为教育提供了另一种媒介，让公众有机会了解那些常常被学术术语弄得难以理解的思想，他们被高昂的学费和出版费拒之门外。在英国，工人阶级有着悠久的传统

教育，这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工人教育协会已经向当地社区提供低成本的成人教育这些机构提供了一些途径，使抽象的经济理解可以与工人、活动家和社区成员的实际知识联系起来，彼此相互影响。系统地发展多元主义，经济研究和公共教育将在加强前一节概述的乌托邦叙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提供必要的导航工具来绘制出资本主义的路线。

重新利用技术

如上所述，霸权不仅存在于社会理念中，也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建筑环境和技术中。这些对象在其内部带有一种政治:它们促进特定的用途和行动，同时约束他人。例如，我们目前的基础设施倾向于将我们的社会塑造成个人主义的、以碳为基础的、竞争的形式，而不管个人或集体可能想要什么。随着技术扩展到最小的纳米尺度，并扩展到最大的后行星结构，这些政治化基础设施的意义只会越来越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科技的影响，事实上，许多人会认为人类本质上是科技的为了应对这种物质化的霸权——一种完全由资本主义构建并与资本主义有牵连的霸权——出现了几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立场认为，为了解放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摧毁这种建成的环境虽然这种观点在原始主义中达到了顶峰，并要求结束文明，但类似的倾向渗透到今天的左派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项目将带来的破坏，以及这些主张背后的理论缺陷，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学术上的好奇心。相反，第二种立场认为，技术是后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础，但任何对改变技术的有意义的关注都应该等到后资本主义的政治计划实现之后这无疑会使我们的任务更简单，但是，考虑到技术与政治的普遍纠缠，以及当前技术的潜在潜力，我们认为更谨慎的选择是考虑如何在今天改变发展方向，并立即改变现有技术的用途。因此，第三种方法侧重于发明，并强调选择开发哪些技术以及如何设计这些技术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技术发展的方向不仅取决于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而且还取决于政治意图。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夺取生产资料，而是宣告需要发明新的生产资料。最后一种方法侧重于现有技术如何包含在我们当前的视界中被封锁的潜力，以及如何重新利用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潜力受到极大的限制——沦为创造利润和控制工人的工具。然而，在现有用途之外，技术的潜力仍然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发现隐藏的潜力，并将它们与可扩展的变革过程联系起来。这最终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干预，因为重新定位的目的是激发集体的想象力，让他们知道用手头的资源可以做些什么

因此，在处理技术霸权问题时，我们有两种有效的策略。在第一种方法中，重点是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强调我们可以创造变革的工具。本着这一思路，一些人呼吁加强民主

控制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设计和实施在工作场所，这意味着要为引进哪些技术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技术而斗争。鉴于技术很少(如果有的话)一次全部引进，因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利用权力来控制技术的开发和实施方式。拒绝监视措施是最明显的目标之一，但工作场所的斗争也意味着抵制那些只会加剧、加速和恶化工作条件的技术在国家层面，考虑到大多数重大创新来自公共部门的资助而不是私营部门，有一个同样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对技术发展的民主控制。正是国家领导了重大的技术革命——从互联网到绿色技术、纳米技术、b谷歌搜索引擎的核心算法，以及苹果iPhone和ipad的所有主要组件微处理器、触摸屏、全球定位系统、电池、硬盘和SIRI只是政府投资产生的部分产品事实是，资本主义市场倾向于短视和低风险投资。正是政府提供了长期资源，使重大创新变革得以发展和繁荣，而当代的风险资本越来越倾向于产生短期利润正是政府在高风险的发展项目上进行投资，这些投资很可能会失败——但正因为如此，它们也很可能导致重大变革。鉴于政府在技术发展和消费品创新中的作用，公共资金应该受到民主控制。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仅要在技术发展的*速度*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技术发展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被称为“任务导向”的项目它们的目标不是产品差异化和对现有产品的微小改进，而是与大规模的创造性项目有关，如太空旅行和互联网。这是革命性的发展，旨在创造全新的技术路径，并对在此过程中出现意外创新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87] .在民主的控制下，它可以对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并通过例如利用国家投资银行通过资助决策来塑造项目的社会价值来促进大规模的思考一个具有前瞻性思维的政府可以支持以任务为导向的项目，如经济脱碳、工作完全自动化、扩大廉价可再生能源、探索合成生物学、开发廉价药物、支持太空探索和建设人工智能。挑战在于建立体制机制，使民众能够控制技术创造的方向。

公众对政府资金如何用于发展的控制，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一系列以工人为基础的斗争的核心。在现在基本上被遗忘的实验中，UK和日本(以及后来的巴西、印度和阿根廷)的工人试图将技术发展引向“对社会有用的产品”的生产。[89]这些是对社会需求作出反应的商品，其生产方式是尽量减少浪费，在生态上可持续，并尊重工人和他们的技能这些项目中最具影响力的发生在UK的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生产高科技部件，主要用于军事，并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资助面对不断上升的结构性失业和即将到来的裁员，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的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如何经营公司和维持就业提出了另一项建议。他们的基本论点是，鉴于公共资金被输送到公司，社会应该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有发言权，并从中受益。这是一个需要疏导资源的论点

从军事装备变成有用的产品。为了提出对社会有用的产品的建议，工人们编制了一份可供他们使用的技术和设备清单，站在计划者的角度，向工人及其社区征求产品建议，并集体决定如何将这些技术和技能重新用于不同的目的现有的能力将被重新用于设计和生产医疗技术、可再生能源、安全改进和用于社会住房的加热技术，而不是高科技军事装备最终的计划长达1200多页，包括150种产品的详细建议为了达到反对不妥协的管理层的政治目标，所采取的战略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反霸权的计划，工人们明确的目标是“激发他人的想象力”，并改变人们对生产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计划拒绝停留在一个预示性政治的临时空间，而是旨在动员工会和政府的资源，努力创建一个新的霸权秩序。在这一努力中，该计划引起了和平活动家、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共鸣，导致了国际联系的建立和工人领导行动的浪潮然而，最终，工党和全国工会的停滞不前，加上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卢卡斯计划未能实现其目标。但它所取得的成功——减缓失业——主要是超越防御方法并朝着创造替代方案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尽管有这些失败，卢卡斯计划展示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如何重新利用社会生产力来改变社会的技术方向。这并不是简单地试图在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中建立一个工人控制的工厂;更激进地说，这是一种重新组织技术发展的尝试，从边缘武器改进转向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它是一个理想的模式，说明技术知识、政治意识和集体力量如何结合起来，以实现对物质世界的彻底改造。

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出现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重新利用项目。新当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试图通过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机构实施渐进式变革，将智利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赛博syn的发展，这是一项分散经济计划的创新尝试，旨在将全国各地的公司与政府和官僚职能联系起来。该项目涉及将控制论从经常被指责为控制系统99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设施。赛博syn系统不是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外部中央政府而设计的，而是作为持续经济流动的局部和内部调节器它的目的是让工人在计划过程中有发言权，并使工厂能够自我管理，同时为国民经济提供一个理性的方向。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赛博syn包括一个连接工厂的原始互联网，一个测试政策的经济模拟器，一个预测问题的统计预测器，以及一个直接从科幻小说中提取的操作室。但美国对该国的敌意使得购买新电脑几乎不可能，与法国的交易直到阿连德被推翻后才开花结果其结果是，智利建立控制论社会主义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重新利用现有技术，以便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这是一种拼凑的方法，利用现有的东西，拼凑出新的东西。当时，智利只有四台大型计算机(其中只有一台可供赛博syn使用)，全国只有102台和50台计算机，所以原始互联网被削减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

更广泛使用的电传机器。1973年，美国支持的推翻阿连德政权的政变，最终使建立一个民主的、由工人管理的企业体系的雄心戛然而终。虽然这个项目从未完全实现，但赛博syn的一部分在一次值得注意的经历中展示了它们的潜力。1972年，面对经济精英日益高涨的反对，政府不得不应对4万多名卡车车主的罢工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阻止工厂生产必需材料的运输来破坏政府。但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并在可能的地方继续驾驶卡车，而国家政府则部署了赛博syn电传网络，以协调封锁和罢工。实际上，正如赛博syn的杰出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网络提供了一个通信基础设施，将阿连德领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与智利工人和基层组织成员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联系起来”。[104]换句话说，这次罢工显示了赛博syn将社会基础设施改造为民主和社会主义目标的潜力。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独特而充满希望的愿景，即另一种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因此，最终，这个实验提供了一个富有想象力和乌托邦式的例子，重新利用了控制论原理、现有的智利技术和尖端软件

虽然前面的例子表明，重新用途如何成为当前政治项目的重点，但对于后资本主义的未来，也可以想象出更多的推测性命题。作为生产力的中心来源和我们行动能力的扩展，技术创新构成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任何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新世界必须建立在当前最先进的元素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今天，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种方法被遮挡的潜力，因为实现经典左派目标(减少工作、增加富足、加强民主控制)的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问题是，它们仍然被包裹在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掩盖了这些潜力，使它们变得无能为力。在这种背景下，反思和重新利用技术的要求重新点燃了陈旧资本主义中心的乌托邦想象。一系列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最后一章考察了自动化技术作为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键枢纽，但重新定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生产力的自动化。类似的争论围绕着物流网络，围绕着为了生态原因而重新利用城市，围绕着为后资本主义目的部署最新的计算技术精确定位这类技术有助于将精力集中在其开发和使用的政治斗争上。物流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因为它同时利用了工资差异，实现了全球生产，并且处于自动化的前沿。在不否认物流对在世界各地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项目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物流将在后资本主义中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它的用途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首先，任何后资本主义经济都需要生产(例如，增材制造)和分销(例如，即时物流)的灵活性。这使得一个经济体能够对个人消费的变化做出反应，而不像苏联时代那种宏大而僵化的计划努力。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后资本主义将有可能重复在第一次共产主义实验中已经出现的所有经济问题其次，全球物流使得广泛的比较优势的利用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工资差异。举个例子:研究发现，与在新西兰生产和消费相比，某些农产品在新西兰生产并运往英国更环保

即使在运往世界各地之后，它们的碳足迹仍然较小。原因很简单，在英国重现适宜的气候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这种环境比较优势只有在拥有高效的全球物流网络的地方才会存在。最后，物流处于工作自动化的最前沿，因此代表了后资本主义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主要例子:机器嗡嗡作响，处理人类被迫做的艰苦劳动。值得回顾的是，在物流革命之前，运输货物对工人的身体来说是一项体力消耗的任务。这种劳动的自动化是值得称赞的，而不是因为狭隘的原因而受到阻碍。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物流因此呈现出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之间的重要过渡技术。

但是，重新利用也有重要的限制。例如，苏联人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技术可以简单地被接管，并转向共产主义的目的，但这些技术倾向于最高效率和严格的管理控制考虑到他们大量采用资本主义机器和管理技术，这个体系倾向于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工人们再次沦为机器中的齿轮，被剥夺了自主性，被迫更加努力地工作。征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搁浅在这样一个现实上，即权力关系植根于技术之中，因此，技术不能无限地倾向于与它们的功能背道而驰的目的例如，数控技术已被用来设定生产的节奏，迫使工人跟上机器的步伐——从而使管理的权力更加间接和无形通过这种方式，机器可以通过使权力关系看起来像简单的机械过程来掩盖权力关系。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限制，重新利用仍然是可能的，因为在一项技术中，往往有大量尚未开发的潜力处于休眠状态。难理解的一点是，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技术无好也无坏;也不是中性的。任何给定的技术都是政治性的，但也是灵活的，因为它的存在总是超出了设计它时可能达到的目的更确切地说，一项技术的设计、意义和影响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用户对它的改造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套用斯宾诺莎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一个社会技术团体能做什么。我们当中有谁能充分认识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中，有哪些尚未开发的潜力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什么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建立在我们已经拥有的材料之上?我们的赌注是，我们的许多技术和科学研究的真正变革潜力仍未得到探索。

那么，我们如何区分受其限制的技术和其特性为后资本主义未来提供潜在支持的技术呢?117 .没有先验方法来确定一项技术的潜力，但我们仍然可以建立广泛的参数来判断一项技术的潜力，并在思考个别技术的具体方面时应用这些参数就标准而言，一种方法是确定哪些功能构成一项技术的必要和/或详尽的方面。例如，如果一项技术的唯一作用是剥削工人，或者这种作用对于其部署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它在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就没有立足之地。根据这些标准，必然建立在对工人的控制和高度剥削基础上的泰勒主义将被拒绝。核武器要求具有造成大规模毁灭的能力，因此在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会有立足之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将比这更加模棱两可。如果技术

它旨在减少管理阶层对熟练劳动力的统治，也为工作分担和减少工作开辟了空间。如果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降低了就业人口的比例，那么它也减少了人们工作的需求。如果一项将决策集中于基础设施的技术促进了私人控制，那么它也为集体决策提供了一个节点。这些技术同时体现了这两种潜力，重新利用的任务仅仅是如何改变它们之间的平衡。任何面向未来的左派的一个目标可能是概述这些广泛的裁决参数，并在确定具体技术如何被重新利用和动员到后资本主义项目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这对于参与技术部门的工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设计选择，构建了未来政治的地形然而，让我们明确一点:如果不同时转变社会的霸权思想，新技术将继续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发展，而旧技术将继续受制于资本主义价值观。

因此，这种霸权战略对于任何改造社会和经济的项目都是必要的。而且在很多意义上，霸权政治是民间政治的对立面。它寻求说服和影响，而不是假定自发的政治化;它在多个尺度上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有形的和局部的;它着眼于实现持久的社会权力形式，而不是暂时的;而且它的运作领域往往根本不是表面上的“政治”，而不是专注于最壮观的政治媒介，比如街头抗议。反霸权战略将包括努力改变社会的常识，复兴乌托邦式的社会想象，重新思考经济学的可能性，并最终重新调整技术和经济基础设施的用途。这些步骤都不够，但它们是可以采取具体行动为后工作世界建立社会和物质条件的例子。它们为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可能发生变革的时刻奠定了基础。然而，迄今为止所概述的反霸权战略仍然是抽象的。我们需要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反霸权战略究竟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牵引力。霸权需要被建构，权力也需要被建构。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构建这样的权力，以及谁将构建这样的权力。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hapter 8

Building Power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Ernesto Laclau

一项战略可能表明要采取的大方向，但它仍然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存在什么力量来执行它。任何战略都需要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动员成一个集体编队，对世界起作用。但是，虽然将反霸权战略付诸实践将需要使用权力，但左派已经被权力所压倒，并系统地表示反对使用权力左派权力的传统代理人(工人阶级及其相关的制度形式)在右翼的攻击和他们自身的停滞下已经萎缩。与此同时，由于先前社会转型尝试的失败，许多人已经动员起来，采取边缘和防御性的民间政治行动然而，建立一个后工作世界将涉及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并需要建立使用权力的能力。本章认为，为了建立一个新的霸权秩序，至少需要三件事:一场大规模的民粹主义运动，一个健康的组织生态系统和对杠杆点的分析阶级团结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是左派长期争论的主题。阶级团结被认为能产生团结的网络、数量上的力量、信心和对共同利益的意识。同样，组织力量提供了领导力、协调性、长期稳定性和资源集中度。杠杆点较少被讨论，但重要性丝毫不减。这些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点，可以用来迫使他人适应特定群体的利益例如，罢工的经典策略旨在破坏生产，以迫使厂主同意工人的要求。没有这样的杠杆点，只有在符合权贵利益的情况下，变革才会发生。本章考察了建立权力的这三个要素，并概述了一些前进的道路。下面的内容并不打算作为应该做什么的详尽或充分的处方，而是对历史先例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并对上面列出的因素对重建左派权力的重要性进行论证。重建这种权力可能是当今左派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但如果要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破坏中出现一个后工作世界，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

民粹主义左翼

或许，建设权力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将成为工作后项目的积极推动者。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会找到一个符合自己利益的后工作社会?最明显的答案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不断扩大的过剩人口。事实上，随着发达国家的工人重新陷入不稳定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人口被纳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劳动者，无产阶级的基本状况正逐渐成为更广泛人群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都是实质上的穷光蛋。起初

因此，乍一看，这些趋势似乎支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叙述，即工人阶级应该通过吸收更多的人并简化其经济地位来获得统治地位工人阶级被浓缩到越来越大的工业工厂中，预计将在物质方面(共享空间)，在利益方面(减少劳动，提高工资)，最终在意识方面(意识到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地位)团结起来。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将消除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等级制度，而对劳动力的高需求将意味着资本几乎不关心基于身份的划分(超过种族、性别、国籍)这确实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发生过。例如，20世纪初，美国黑人工人阶级被粗暴地排除在白人工会之外，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种族分裂在许多地区开始瓦解基于年龄、性别、技能、民族和收入的差别同样也被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失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兴的工人阶级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以生产为中心的一系列杠杆点。罢工、工厂接管、怠工和类似的策略都是为了扰乱生产过程，迫使管理层和资本家默许工人阶级的要求因此，这个阶级——典型地由白人男性工厂工人组成——被预测将变得庞大、同质和强大，使其成为后资本主义革命的先锋。但这并没有发生。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其组织结构分崩离析，今天“再也没有一个阶级部分能够统治整个阶级”。10

在去工业化、生产全球化、服务经济的兴起、不稳定的扩大、经典福特主义立足点的消亡和多样化身份的扩散的综合压力下，工业工人阶级已经变得严重分裂。在世界范围内，传统工人阶级就其力量而言，主要处于边缘地位(南非和巴西等国家有少数例外)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一定的力量，但即使在这里，将生产外包给外围国家也已经在削弱它的力量今天，全球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害，似乎不太可能恢复到过去的力量。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经典的革命主体已不复存在;只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部分重叠的利益和不同的经验。然而，我们可能会质疑工业工人阶级曾经有能力改变世界的观点——今天的情况与早期的工人运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首先，工人团结的形象一直更多地是一种渴望的愿景，而不是已经实现的现实。从它的起源开始，无产阶级就被分裂了——在有工资的男性工人和无工资的女性工人之间，在“自由”工人和不自由的奴隶之间，在熟练的工匠和不熟练的工人之间，在核心和边缘之间，以及在民族国家之间统一的趋势始终是一种有限的现象，这些差异今天仍然存在，在全球化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加剧了。或许更根本的是，如果去工业化(制造业自动化)是通往后资本主义社会道路上的一个必要阶段，那么产业工人阶级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它的存在是建立在经济条件的基础上的，而在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这些经济条件必须被消除。如果向后资本主义过渡需要去工业化，那么产业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力量——分裂和分崩离析，就像我们近几十年来看到的那样。

那么，今天谁能成为变革的主体呢?尽管过剩人口不断增加，无产阶级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但我们必须欣然接受这个没有答案的事实

出现了。就业与失业、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界限的瓦解，与一种连贯的变革力量的衰落不谋而合。传统抵抗和反抗团体的分裂以及工人阶级的普遍分解意味着，今天的任务必须是将一个新的集体“我们”编织在一起。没有一个预先存在的群体能够体现普遍的利益，或者构成这一变革项目的必要先锋——产业工人、知识分子劳动者和流氓无产阶级都不行。那么，在无产阶级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如何组成一个民族呢?[14]在实践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组织这样的汇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预设了资本主义的趋势会加剧阶级之间的分裂，并导致无产阶级的团结。其他人则主张在一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统一——例如，生物需求——但是最小的共性往往导致最小的需求相比之下，在占领运动中，团结往往来自于身体上的接近——在营地里一起工作和生活的身体。然而，这种团结往往掩盖了真正的差异，使其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表面。当物理上的接近在被占领空间的拆除中被摧毁时，团结迅速瓦解。与此同时，随着阿拉伯之春的到来，团结是通过反对共同的专制对手而形成的，将一系列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然而，这些最近的经验表明，当对手垮台时，完全建立在反对基础上的团结往往会破裂。

工作后项目的问题是，尽管无产阶级存在着潜在的共性，但它只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可以支持广泛的不同经验和兴趣变革政治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一系列的差异清晰地表达成一个共同的项目——而不是简单地断言阶级斗争是唯一*真正*的斗争。在这些条件下，近年来许多最有希望的政治斗争都将自己定位为民粹主义运动而不是阶级运动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所说的“民粹主义”，并不是指一种盲目的群众运动，或最低公分母的反抗，或具有任何特定政治内容的运动相反，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逻辑*，通过这种逻辑，不同身份的集合被编织在一起，反对一个共同的对手，并寻求一个新的世界从反全球化运动，到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的“我们可以”(Podemos)、众多拉丁美洲运动，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占领运动(Occupy)，这些运动动员了社会的广大阶层，而不仅仅是特定的阶级认同

这些民粹主义运动起源于对未满足的要求的挫败感。在正常的民主环境下，诉求是在现有制度内单独处理的——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和医疗保障。微小的变化是允许的，但制度安排，包括整个社会，永远不会受到质疑。在这种方式下，现有的霸权可以得到加强，威胁一般可以得到有效调节。相比之下，当这些要求——公平薪酬、社会住房、儿童保育等——日益受阻时，民粹主义运动就开始出现。正如政治民粹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解释的:

> Once we move beyond a certain point, what were requests *within* institutions became claims addressed *to* institutions, and at some stage they became claims *against*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When this process has overflown the institutional apparatuses beyond a certain limit, we start having the people of populism.[22]

特殊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普遍，民粹主义应运而生，毅然决然

反对现有秩序。“人民”不同于传统的阶级群体，即使在没有任何*概念*统一的情况下，也通过名义上的统一团结在一起。人民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被建构的行动者。他们将自己命名为一个连贯的群体，而不是具有任何必要的物质利益统一。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例如，很难确定占领运动的政治立场。99%的人更多是通过一个名字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政治立场团结在一起的。这种名义上的团结得到了民粹主义的补充，民粹主义指出了社会的裂痕，以及他们自己所反对的反对派在指定敌人的过程中，许多人都有可能看到运动表达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例如，占领运动命名为1%，我们可以党命名为“种姓”，激进左翼联盟命名为“三驾马车”。和给人民起名一样，给对抗者起名也有一些对经验事实的依附，但不必被它们束缚。例如，占领运动所假定的1%和99%之间的划分，就是一种动员了人们的对抗，尽管它缺乏经验上的准确性命名人民和他们的反对派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科学声明。因此，人民和社会上的对立都是通过提名的行为构成的。这代表了一种回应，即在一个阶级身份已经支离破碎、差异激增的时代，简单地从野蛮的历史必然性中解读社会的对抗性是不可能的。

然而，为了让民粹主义的“人民”出现，额外的因素是必要的。首先，一个特定的要求或斗争必须取代其他的要求或斗争。例如，占领运动动员了一系列地方、地区和国家的不满，这些不满在反对不平等的斗争中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寻求社会的认可，而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为社会普遍说话。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它看作是多重利益的体现。它不仅要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且要真正反映广泛的利益对于一个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来说，共同的利益就足以保证所有人的忠诚。但在民粹主义运动中，由于缺乏基于物质利益的直接统一，意味着它的连贯性永远受到一种紧张关系的困扰，这种紧张关系存在于已经开始代表其他人的斗争和那些其他斗争之间。因此，民粹主义涉及对差异和特殊性的持续谈判，寻求建立一种共同的语言和纲领，尽管存在任何离心力。民粹主义运动和民间政治方法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差异的立场:前者寻求建立一种共同的语言和计划，后者更喜欢以差异来表达自己的差异，并避免任何普遍化的功能。围绕反工作政治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动员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阐明民粹主义，即各种争取社会正义和人类解放的斗争可以看到他们的利益在运动中得到表达。重要的是，反工作政治提供了这样的资源:例如，它可能是红绿联盟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克服了就业和增长的经济计划与减少碳排放的环境计划之间的紧张关系。后工作项目也是一个内在的女权主义项目，它承认主要由女性进行的无形劳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化，以及为女性的全面解放提供经济独立的必要性。同样，它与反种族主义斗争联系在一起，因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不成比例地受到高失业率的影响，以及与失业社区相关的大规模监禁和警察暴行。最后，后工作项目建立在后殖民和土著斗争的基础上，目的是为大量非正式劳动力提供生存手段，并动员起来反对移民障碍[26]

阐明一场能够汇集这些差异的运动的特征，有助于强调诉求对任何合适的民粹主义的重要性。要求是建立团结的关键媒介，因此要求必须以多种方式与不同的人联系起来这些要求并不预先假定知道谁会被要求采取行动，而是让人们在保持彼此差异的同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特殊利益例如，反工作政治的要求对大学生、单身母亲、产业工人和劳动力之外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对后工作社会的呼吁中找到自己的利益代表。于是，以要求的名义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就成了实地政治的工作。因此，以民粹主义逻辑为基础的运动可以使一系列分散的不满和要求保持一致，而不一定会否定差异特定的要求被写入连贯的叙述中，阐明各种要求如何共享一个共同的对手。正因为如此，对未来的愿景对一种恰当的民粹主义至关重要，而这正是近期许多民粹主义运动所缺乏的。例如，占领运动从未将不服从的消极时刻转化为一项积极的政治计划，人们可以围绕它组织起来。它从未将不同的利益结合成一个更美好未来的计划，停留在拒绝的消极层面，从未提供“主体化的自主焦点”。30

最后，虽然后工作项目要求将中心地位赋予阶级，但仅仅以阶级利益为基础进行动员是不够的。需要将广泛的社会光谱作为一种积极的变革力量聚集在一起。民粹主义正是对这一需求做出了回应。然而，在口号、诉求、标志、符号和身份的层面上对共性的谈判，不能继续作为进行这种政治的初级层面。一场民粹主义运动还需要在一系列组织中并通过这些组织行动起来，同时也要致力于实现对新自由主义常识的推翻，并在其位置上创造一个新的常识。它必须寻求建立霸权形式的权力，包括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不同形式。

组织生态

组织是不满和有效行动之间的关键中介——它将一定数量的人转化为一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形式。正如占领运动、反战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左派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原始数字的问题。在纯粹的数量层面上，左派并不明显比右派“弱”——就其实现大众动员的能力而言，相反的情况似乎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左派似乎非常有能力动员一场民粹主义运动。问题在于下一步:如何组织和部署这支力量。对于民间政治来说，组织意味着对地方主义和水平主义方法的拜物教式依恋，这往往会破坏一个扩张性的反霸权计划的建设然而，这种组织拜物教是最近左派思想中最有害的方面之一:信仰只要发展出适当的组织形式，政治上的成功就会随之而来民间政治对此负有责任，但许多正统立场也同样如此——为左派权力的衰落而提出的灵丹妙药包括工会、先锋队、亲和团体和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组织形式是在不考虑它们所面临的不同战略地形的情况下被提倡的。例如，民间政治采取在特定条件下建立的特定组织形式，并试图将其转置到整个社会和政治领域。

我们需要从一个健康的、多样化的组织生态系统的角度来思考，而不是用一种去情境化的方法来解决组织问题。

反对组织拜物教的简单观点是，一个政治项目需要分工。在一场成功的政治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基本任务需要完成:提高意识、法律支持、媒体霸权、权力分析、政策建议、巩固阶级记忆和领导，这只是其中的几个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足以履行所有这些角色，并带来大规模的政治变革。因此，我们并不寻求推动任何单一的组织形式作为体现变革载体的理想手段。每一次成功的运动都不是单一组织类型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组织生态的结果。这些组织以或多或少协调的方式运作，实现了政治变革所必需的分工。在变革的过程中，领导人将会出现，但没有先锋党——只有流动的先锋职能组织的生态意味着力量的多元化，能够对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积极的反馈它需要在另一个世界的共同愿景下动员起来，而不是松散和务实的联盟它还需要发展一系列广泛兼容的组织:

> The point is to create something more than mere alliance building (where the parts, understood as constituted groupings of people, are supposed to stay the same, only co-operating punctually) and less than a one-size-fits-all solution (e.g. the idea of the party). This is about strategic interventions that can attract both constituted groups and the ‘long tail’ that does not belong to any groups, pitched not as exclusive but as complementary, whose effects can reinforce each other.37

这意味着这种生态的总体架构是一种相对分散和网络化的形式——但是，与标准水平主义的愿景不同，这种生态还应该包括等级和封闭的群体，作为更广泛网络的元素最终不存在特权的组织形式。并非所有组织都需要将参与、开放和横向作为其监管理想。自发起义和组织长寿、短期愿望和长期战略之间的分歧，分裂了本应大体一致的建设后工作世界的项目。组织多样性应该与广泛的民粹主义团结结合起来。

对这种生态如何运作的快速概述将有助于了解这些建议如何协同工作。考虑到任何特定斗争的特殊性和手头问题的复杂性，这只能是高度概要性的。不可避免地，一个组织生态系统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形成的，面对不同的政治背景，做出不同的决定。也就是说，广泛的社会运动对于任何反工作政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提供了广泛的不同组织和战术组成。在光谱的一端，有短暂的政治能量爆发，以骚乱和自发抗议的形式出现。例如，美国的城市骚乱是20世纪60年代精英阶层支持基本收入的一个关键激励因素这样的爆发可能不会提出复杂的要求，但它们需要一个回应。在更有组织的模式下，社会运动采取了近几十年来所看到的民间政治方式。在直接民主的原则下运作有助于实现某些目标，例如让人们有发言权，创造一种强大的集体能动性，并使不同的观点得以表达它可以促进民粹主义同一性的形成，并使人们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集体。但这些民间政治组织缺乏的是将壮观的抗议场面和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转化为

41 .有效的长期行动往往是其他更长期制度化的组织围绕相对短暂的运动的要求、战术和战略进行霸权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抗议的最终效果。近年来，最成功的占领运动是那些与劳工运动(例如在埃及)和/或政党建立联系的运动。例如，在冰岛，最大的抗议成功是当一个红绿联盟在迫使保守派政府下台后被投票加入时取得的;42正如我们所写的，西班牙正在展示当社会运动在政党体系内外采取双重战略时所产生的潜力。如果要发生重大的社会转型，如工作后项目，它将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进行，而不是简单地从高处颁布法令。街头的民粹主义运动将是其基本要素之一。

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但媒体组织是任何旨在建立新霸权的新兴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种战略所涉及的任务需要一个健康的媒体存在——创造一种新的共同语言，为人民发声，命名对抗，提高期望，产生与人民产生共鸣的叙事，并用清晰的语言表达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满。正是这些元素为媒体叙事提供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锚点。基金会和记者在努力改变媒体叙述方面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圣殿山协会的成员中有许多记者，这并非偶然。这种交流也必须以一种与日常对话产生共鸣的方式来实现。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学术术语毫无用处。左翼媒体组织不应回避平易近人和娱乐性，从热门网站的成功中汲取见解。与此同时，左派通常专注于创造主流之外的媒体空间，而不是试图拉拢现有机构，将更激进的想法泄露给主流。很多时候，这些新闻机构最终只是向唱诗班说教，推动的叙事永远无法逃离他们自己狭隘的回音室。互联网让每个人都有了发声的机会，但并没有让每个人都有听众。主流媒体来源在这方面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未来也将继续如此。它们通过定义什么是“现实的”、什么不是“现实的”来影响和改变公众舆论的能力仍然惊人地强大。如果一个反霸权的项目要取得成功，它将需要向主流注入激进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主流之外建立日益分散的受众。事实上，从美国基本收入政策的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关键教训是，媒体对这类问题的描述对其成功前景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现有的媒体组织构成了本文所述项目的关键战场。

与媒体一样，知识分子组织是任何政治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组织从智库这样的机构，到受控制的大学院系和其他教育机构，再到组织更松散的培训和提高意识的机构。但建立霸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先锋知识分子组织下达命令。并非偶然的是，作为霸权思想的关键思想家，葛兰西也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与社会中关键的物质和经济力量密切相关并从中产生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是实际生活的参与者、组织者和建设者一个正常运作的左派知识分子基础设施将通过参与这些机构，传播它们的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资源，来支持那些被认为与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大体一致的机构。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没有人对整体有特权的看法，因此一个健康的知识领域将参与其中

多角度的知识分子。这将与工人进行的实地调查相结合，例如，检查零售物流的运作方式及其中断的可能性，或详细分析当地电网作为一种带来变革的手段除了有机知识分子之外，某些有价值的工作只能在能够与日常政治的喧嚣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机构中进行。正如圣山学社所理解的那样，一些知识分子的努力需要少投入到眼前和紧迫的问题上，而更多地投入到长期建议的发展上。这将包括一些至关重要的努力，如发展新的组织和理解经济的方式，这需要高度的技术知识和长期的研究。但这些工作总是需要反馈到政治行动者和社会叙事的网络中，以获得充分的效果。

劳工组织传统上一直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但今天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与此同时，根深蒂固的习惯和顽固的——如果不是彻底的腐败的话——工会领导层使得这些组织的复兴成为一场艰苦的战斗。然而，它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转型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任何设想新的工会结构的努力都必须从旧模式的失败和它们今天面临的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中吸取教训。这些包括一些基本的东西，如丰富领导和成员之间的联系，建立跨越传统部门界限的支持(例如，学者支持大学里的清洁工)，向创新的、通常由工人领导的工会(例如，围绕移民劳工的工会)学习，使现有工会激进化，并在缺乏这种组织杠杆的地区建立新的工会。从广义上讲，工会的充分性取决于其政治形式与经济和基础设施条件的一致性。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看到的，这些条件目前是由正在出现的工作危机来定义的。过剩人口的增加、不稳定的回归、工资的停滞和就业的痛苦缓慢复苏，都是对工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关键挑战。随着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工作保障减少，个人债务不断上升，与工作有关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工作场所。这些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改变了工会、其成员和更广泛的社区之间的关系。这首先要求认识到斗争的社会性质，并弥合工作场所和社区之间的差距工作中的问题会蔓延到家庭和社区，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对工会行动的关键支持来自社区，工会最好认识到他们对工作场所以外那些无形劳动力的亏欠这些人不仅包括家庭佣工，他们再现了雇佣工人的生活条件，还包括移民工人、不稳定工人和大量在过剩人口中分担资本主义痛苦的人。因此，工会的重点需要扩大，而不仅仅是支持缴纳会费的会员。可以肯定的是，工人组织与更广泛的社区建立这种联系是有历史的，但今天，这需要成为工会组织的一个日益明确的目标。这个过程可以是双向的。例如，法国出现过“代理人罢工”，工人们宣称自己不罢工(因此继续领取工资)，但却允许人们封锁或占领他们的工作场所此外，工人运动一直依赖于当地社区的道义和后勤支持，如果团结起来，社区就会站出来保护工人反对国家的镇压工会可以参与社区问题，如住房，在这个过程中显示有组织的工人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围绕工作场所建立工会

因此，如果他们围绕区域空间和社区组织起来，将更适合今天的条件

在扩大工会组织的空间焦点的过程中，当地工作场所的需求拓展为更广泛的社会需求。正如我们在第7章中所论述的，这涉及质疑福特主义者对永久性工作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迷恋，以及传统的工会对工资和工作保留的关注。面对自动化、不断上升的不稳定性和不断扩大的失业率，我们必须评估这些经典要求的可行性。我们相信，通过重新关注后工作社会，以及减少工作周、分担工作和基本收入等解放性方面，许多工会将得到更好的服务美国西海岸的码头工人代表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允许自动化以换取保证更高的工资和更少的裁员(尽管他们在资本主义基础设施中也占据了一个关键的杠杆点)芝加哥教师工会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表明工会远远超出了集体谈判，而是围绕整个教育状况动员了广泛的社会运动。此外，转向后工作方向克服了生态运动和有组织劳工之间的一些关键僵局。将生产力的提高部署到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不是增加工作和产出，可以将这些群体聚集在一起。改变工会的目标，在社区范围内组织工会，将有助于使工会远离经典的——现在正在失败的——社会民主目标，这对任何成功的劳工运动的复兴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国家仍然是斗争的场所，政党将在任何组织生态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如果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继续崩溃，并使新一代政党得以出现。确保人人享有后工作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工作场所;它还需要国家层面的成功虽然政党经常因其对选举主义的愤世嫉俗的同意和国际资本所施加的限制而受到谴责，但这种情况在组织生态中发生了变化。与其让它们成为实现革命愿望的不可能的载体——与无望的后资本主义“投票”的前景联系在一起——它们不如承担更现实的任务，即在政治压力方面形成“冰山一角”，以及发展将广泛不同的选民聚集在一起的能力国家可以补充街头和工作场所的政治，正如后两者可以扩大政党的选择范围一样。对国家的回避是一个错误——这是许多民间政治途径的共同之处。群众运动和政党应被视为同一民粹主义运动的工具，各自能够实现不同的目标。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政党可以将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倾向——从改良主义到革命主义——整合到一个共同的项目中。虽然国际资本和国家间体系使得国家内部的激进变革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在紧缩、住房支持、气候变化、儿童保育、警察非军事化和堕胎权等方面，仍有基本而重要的政策选择需要做出。简单地拒绝议会政治，就是忽视了这些政策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不关心最低工资法规、移民法、法律支持的变化或对堕胎的裁决，需要相当特权的地位。在最好的情况下，选举实体可以充当一股破坏性力量(拖延、宣传争议、表达民众的愤怒)，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充当一股进步力量。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运动应该简单地变成政党动员选票的羽翼。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应该远远超出这一点，成为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一方面，政党可以对社区倡议给予财政支持，也可以修改各种政策——比如关于公众抗议的法律——以促进社会运动的活动。

例如，国家支持建立邻里公社，作为将社会主义融入日常实践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新政党的资源可以被集体动员起来——例如，“我们可以”党就是通过群众集资15万欧元成立的——党的活力可以通过地方运动、党员和中央政党结构之间不断的制度化谈判来维持

例如，Podemos旨在建立民众治理的机制，同时也寻求进入既定机构的途径它是一种多管齐下的社会变革方法，比任何一种选择本身都提供了更大的真正变革潜力与此同时，巴西的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一直对多个团体(解放神学团体、农民运动)保持开放，同时仍然围绕一个本质上以工会为基础的核心组织。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这种基层和先锋队的结合构成了一种不是很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63然而，所有这些经验表明，为了将国家转变为他们利益的有意义的工具，并克服运动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的生硬划分，人民的大规模动员是必要的。其目的必须是避免“迷恋国家、官方权力及其机构的倾向，以及相反的迷恋反权力的倾向”。64在对政治制度普遍不满的背景下，这仍然是可能的——尽管，再一次，有一个适当的话语框架来引导这种不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最后，政党仍然掌握着重要的政治权力，关于他们未来的斗争当然不应该被抛弃给反动势力。

应该清楚的是，我们现在离地方主义、水平主义和直接民主的民间政治拜物教有多远。组织生态学并不否认这样的组织形式可能有作用，但它拒绝这种组织形式就足够的观点。对于一个需要推翻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反霸权项目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我们所呼吁的是组织之间的功能互补，而不是对特定组织或组织形式的拜物教。

杠杆点

如果民粹主义运动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反霸权的组织生态系统，为了发挥作用，它仍然需要有破坏的能力。即使有健康的组织生态和大规模的统一运动，如果没有机会利用运动的力量，变革也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看，工人运动取得的许多最重大的进步都是由关键战略位置的工人实现的。不管他们是否有广泛的团结、高水平的阶级意识或最佳的组织形式，他们通过能够融入并反对资本主义积累的流动而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工人战斗性和阶级斗争成功的最佳预测指标可能是工人在经济中的结构性地位。

例如，在早期的物流基础设施中，码头工人发现自己占据了资本流通的一个关键点。多式联运——在轮船、火车和卡车之间转移货物——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成本很高由于位于货物流通的关键通道上，从事这项工作的码头工人控制着一个主要的杠杆点。其结果是，码头工人非常好斗，在劳资纠纷中损失的工作日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要多像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这样的著名的工会力量也是如此

源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地位以及汽车工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他们的力量是在高失业率和低组织水平的时期出现的——事实证明，支持性的劳动力市场和组织力量都不是成功所必需的煤矿工人也拥有类似的杠杆地位。在矿井里工作，在一个停工特别容易发生的环境中，从管理层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其结果是，“他们的地位和集中度，在某些时刻给了他们机会，去锻造一种新的政治力量”。68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今天的采矿业，因为资源供应本身是不流动的，所以采矿业能够抵抗资本外逃的威胁。南非的矿区提供了一个当代的例子，既揭示了工会的力量，也揭示了资本的暴力。当矿工们在2012年进行野猫罢工时，政府被召集起来，30多名工人在马里卡纳大屠杀中丧生。不那么暴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某些供应商的垄断地位。69 .在这些地方发生的罢工，如中国宝成集团的罢工，堵塞了整个供应链，对资本主义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在供应链的另一端，零售分销也为重大的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为打破当代资本主义对准时物流的依赖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这些杠杆点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看到了有意无意地剔除这些杠杆点的过程。集装箱的发展促进了多式联运的自动化;物流的全球化促进了资本为应对罢工而转移工厂的能力;石油作为主要能源的转变大大减少了可供政治行动使用的瓶颈点。如今，经典的杠杆点已经基本消失，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实验和战略反思。实验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政治是一套动态系统，由冲突驱动，由适应和反适应驱动，导致战术军备竞赛。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行动都极有可能变得无效，因为它的对手会学习和适应。因此，没有一种特定的政治行动模式在历史上是不可侵犯的。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需要抛弃熟悉的战术，因为他们所对抗的力量学会了更有效地防御和反击这些战术。秘密遭遇卧底渗透者;戴口罩遭遇新立法禁止;Kettling会遇到跟踪警察行动的应用程序;对警察暴力行为的记录会被其定罪;大规模抗议遭遇的是严厉的监管，让抗议变得枯燥乏味;非暴力的非暴力反抗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政治策略是一个动态的力量领域，在克服国家和企业阻碍变革的新障碍时，实验是必不可少的。

劳工运动的历史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典范。它的主要策略之一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从而使其更有力量和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进行的早期努力往往是基于技能、性别和种族的歧视而拒绝对特定工作进行培训例如，早期的排字工人组织起来，以保护以男性为中心的熟练劳动力不受引进相对不熟练的女工的威胁然而，资本的去技能化和生产的工业化使得削弱许多熟练的工会成为可能，并在更大程度上开放了劳动力供应。其结果是许多以特定技能为基础的传统工艺工会的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沿着工业路线组织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产业工会的出现减少劳动力供应的另一个可能的策略是我们前面研究过的:减少工作时间。这就产生了

减少劳动力供应，正如上文所述的排他性工会所实现的那样，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76 .减少工作时间的策略不是依赖于将特定群体排除在技术行业之外，而是依赖于收回每个人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由于战后劳资双方达成的共识——这种策略不再受欢迎，工人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了关于工资的集体谈判。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这种策略有可能在改造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努力中复活。另一个关键策略是罢工，其逻辑是让资本付出代价，迫使其在谈判中出手。但这种方法受到了一个事实的限制，即非技术劳动力很容易被新的(更温顺的)痂工取代。罢工还允许雇主利用停工时间引进新机器——这恰恰是工人们可能正在努力反对的变化。作为回应，20世纪初出现了静坐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新策略，这使得替代工人无法操作，并有可能证明管理是多余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手之间发生的动态军备竞赛，因为每个人都试图利用新的战术和技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今天，这些斗争的地形再次发生变化，至少有两个与经典工作场所中断有关的广泛和新出现的问题表明了这一点。首先，存在着自动化的趋势。正如物流的自动化夺走了码头工人占据的一些杠杆点一样，工厂、运输以及最终服务工作的自动化也预示着职场斗争的可能性会显著下降。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将迅速减少运输系统中所包含的杠杆点。英国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自动驾驶列车已经投入运营，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明确表示，应该用自动化来摧毁英国仅存的几个激进工会之一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杠杆点仍然存在，在重组和自动化之后，新的杠杆点将会出现。例如，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1957年!——“极少数工人的罢工有可能使整个自动化工厂瘫痪”。监督一个过程的工人数量的减少也意味着潜在的权力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同样，虽然自动化运输系统可能不会受到司机罢工的影响，但它可能会受到程序员和it技术人员的罢工，而且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限制，它更容易受到封锁。这些车辆通过减少环境变化来发挥作用，使它们“更类似于在看不见的轨道上运行的火车”。80 .因此，对环境的意向性的操纵可能特别具有破坏性。同样，模式识别算法在各种任务(如诊断、情绪和面部检测、监视)中的使用也极易受到干扰对这类机器的技术理解对于理解如何中断它们至关重要，任何剩下的未来都必须在技术上和政治上一样流畅。最后，需要的是对正在重构生产和流通的自动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对新的杠杆点可能在哪里发展的战略理解。

经典破坏性策略的第二个相关限制是，面对大规模失业和围绕过剩人口而非工人阶级组织的斗争，它们可能会动摇。如果没有工作场所可供破坏，还能做什么?同样，争论的套路也随着社会、政治、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随着不稳定、零时工合同、临时工作和实习在整个社会蔓延，运动

关于失业者和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运动提供了抵抗的重要和有益的例子。这些斗争从来没有一个工作场所可以破坏，所以他们总是不得不发明新的手段来撬动权力。许多左翼人士的短视之一是，他们只看到工人的力量来自于破坏生产，而事实上，在工作场所之外，对现有秩序的挑战已经采取了多种形式。例如，在阿根廷，失业工人的运动封锁了主要街道，以便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这对推翻政府起了关键作用被赶出工资，失去工作场所，封锁城市主干道成为行使政治权力的主要手段2014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杀死迈克尔·布朗后，高速公路封锁事件激增，这表明这类斗争日益普遍类似的策略也出现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其他方面，其基本目标是相同的，包括房租罢工和债务罢工。港口封锁也有作为一种策略的潜力，计算机建模可以提供关于如何避免分散和无效的政治行动的见解当然，这些新策略必须置于一个更大的战略计划之中，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许多临时运动，爆发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此，工人运动的经典权力基础已经被分散和削弱了。然而，这并不一定预示着阶级斗争的丧钟。自动化和不稳定性可能意味着生产环节中断的减少，但它们并不意味着中断的终结。正如传统的杠杆点在灵活的全球基础设施背景下被抹去一样，这种转变也在其他方面增加了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定位良好的地方斗争可以立即变成全球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必须是对变化了的物质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为新的行动空间制定战略。在现有的实践中，有先例和教训可以学习，比如工会和社区组织者所进行的“权力结构分析”，它绘制了当地社会网络和关键行动者的地图，确定了他们的弱点、优势、盟友和敌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为了构建对这一过程的补充，强调斗争的物质条件，而不仅仅是它的社会网络。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实地知识都必须与有关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的更抽象的知识联系起来。

后工作时代的世界不会从资本家的仁慈、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或危机的必然性中出现。正如这一章和前一章所论证的那样，在后工作社会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战略选择之前，左翼的力量——广义地解释——需要重建。这将涉及一个广泛的反霸权项目，该项目寻求推翻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并重新阐明对“现代化”、“工作”和“自由”的新理解。这必然是一个民粹主义的项目，它动员了广泛的社会群体，虽然植根于阶级利益，但仍然不可简化为阶级利益。它将涉及对组织采取全方位的方法，寻求将不同的组织优势结合起来——不是根据松散联盟的实用主义，而是在对更美好世界的愿景的支持下。这些组织和群众将不得不在日益贫瘠的工作场所的资本主义回路中确定并确保新的杠杆点。面对一个永远在移动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反对它的人必须在灵活的预期政治中先发制人，以应对未来的转变。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Conclusion

You live the surprise results of old plans.

Jenny Holzer

那么，我们的处境如何呢?最近的斗争周期已经耗尽，被他们倾向于民间政治所破坏，今天到处都是大规模的愤怒与大规模的无能相结合。我们认为，最有希望的前进道路在于恢复现代性，并攻击新自由主义的常识，从新深奥的政策讨论到最生动的情感状态，这些常识制约着一切。这个反霸权的计划只能通过想象更美好的世界来实现，并超越防御性的斗争。我们已经概述了一个可能的项目，其形式是一种后工作政治，使我们能够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生活和社区。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就需要组织一个广泛的民粹主义左翼，在多个战线上建立一个全方位政治所必需的组织生态系统，并尽可能利用权力的关键点。

然而，工作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为后工作社会建立一个平台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将左翼政治构想为一种现代性政治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要求我们不要将后工作社会——或者说任何社会——与历史的终结混为一谈。普遍主义总是自我毁灭，它拥有自己的资源来进行一种内在的批判，这种批判坚持并扩展了它的理想。任何特定的社会形态都不足以满足它的观念和政治要求。同样，综合自由迫使我们拒绝满足于现有的可能性范围。如果满足于后工作状态，就有可能让种族、性别、殖民和生态的划分原封不动地留在我们的世界，而这些划分仍在构成我们的世界虽然这种权力的不对称有望被后工作世界所解决，但消除它们的努力无疑需要继续下去。此外，我们仍将寻求系统性地取代市场，并面临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任务。我们仍然不知道一个社会技术机构能做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解除技术发展的束缚，释放新的自由。超越我们对有偿劳动的依赖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消除其他政治、经济、社会、物理和生物限制的巨大任务。一个面向后工作世界的计划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然而，后工作平台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平衡目标，完成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的后工作霸权的转变。我们相信，它集中了当前的任务，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点，从中寻求进一步的解放收益。与任何平台一样，创建它的人无法完全预测它将如何被使用。虽然平台内置了某些限制和机会，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决定它将实现的生活方式。平台让未来敞开大门，而不是假定它会关闭未来当它设计正确时，它的成功恰恰在于允许人们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开发。有了一个工作后的平台，人们可能会开始更多地参与政治进程，或者他们可能会退回到由媒体景观形成的个性化世界。但考虑到后工作社会所需的职业道德转变，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这样一个项目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主观的转变——它为更广泛的转变提供了条件

从资本主义形成的自私的个人，到工作结束所解放的共同的、创造性的社会表达形式。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受到资本主义冲动的影响，后工作时代的世界预示着这样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这些约束已经大大放松。这并不意味着后工作社会将仅仅是一个游戏王国。相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剩余的劳动将不再由外部力量——雇主或生存的必要性——强加给我们。工作将由我们自己的欲望驱动，而不是由外界的要求驱动相对于保守势力的紧缩和反现代主义者所承诺的简朴生活，对后工作世界的需求陶醉于欲望、富足和自由的解放。

这样的未来无疑是有风险的，但任何建设更美好世界的项目也是如此。没有人能保证事情会像预期的那样发展:后工作世界可能会产生内在的动力，导致资本主义的迅速解体，或者反动力量可能会在新的控制体系下吸收被解放的欲望。对政治行动风险的担忧，使部分当代左派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渴望新奇，但渴望一种没有风险的新奇。对实验、创造和预测的一般性要求是司空见惯的，但具体的建议往往会遭到一波批评，批评中列出了事情可能出错的每一个可能点。鉴于这种双重倾向——追求新奇，但反对社会变革中固有的风险——庆祝自发“事件”的政治思想的吸引力变得更加明显。事件(作为革命的决裂)成为一种没有责任的对新奇的渴望的表达。这一弥赛亚式的事件有望粉碎我们停滞不前的世界，将我们带入历史的新阶段，方便地免去了政治这一艰巨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在建立新世界的同时，承认新世界将带来新的问题。最好的乌托邦总是被不和谐所撕裂。

这种迫切需要与旨在消除决策过程中的偶然性和风险的预防性原则背道而驰。在强读的情况下，预防性原则旨在将认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对现状的监护，温和地拒绝那些试图用“做更多研究”的命令来建立更美好未来的人。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认为，预防原则包含了一个几乎是固有的缺陷:它忽略了其自身应用的风险。在寻求总是在谨慎的一边犯错，从而消除风险，它包含了对不作为和不作为的危险的盲目虽然风险需要被合理地对冲，但对偶然性的阵痛更充分的认识意味着，采取预防措施通常不会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结果。预防性原则的目的是关闭未来，消除偶然性，而事实上，高风险冒险的偶然性恰恰是通向更开放的未来的因素——用概念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的话来说，“你活在旧计划的意外结果中。”建立未来意味着接受意外后果和不完美解决方案的风险。我们可能总是被困住，但至少我们可以逃到更好的陷阱里

资本主义之后

后工作计划，更广泛地说，后资本主义计划是对普遍解放承诺的进步决定。在实践中，这些项目涉及到“对市场力量的有控制的消解……以及工作与收入的脱钩”。但是，普遍解放的最终轨迹是克服物理的、生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限制。这种消除约束的雄心，如果达到极限，就会引领我们前进

不可阻挡地走向宏大和投机的前沿。对早期俄国的宇宙学家来说，甚至死亡和地心引力都是需要通过未来的聪明才智来克服的障碍在这些后行星时代的推测中，我们看到人类解放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计划，它沿着两条高度交织的发展道路蜿蜒前行:技术和人类。

技术发展遵循重组的道路，将现有的思想、技术和技术成分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组合。简单的对象被联合成日益复杂的技术系统，每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都构成了进一步技术的基础。随着这种扩展，组合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看来，资本主义竞争一直是这种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一种流行的叙述中，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被视为推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变革，而消费资本主义则要求越来越差异化的产品。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在技术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了实质性的障碍。虽然精心策划的资本主义形象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冒险和技术创新，但这种形象实际上掩盖了经济中活力的真正来源。铁路、互联网、计算机、超音速飞行、太空旅行、卫星、制药、语音识别软件、纳米技术、触摸屏和清洁能源等发展都是由国家而不是企业培育和引导的。在战后研发的黄金时期，三分之二的研发是由政府资助的然而，近几十年来，企业对高风险技术的投资急剧下降由于新自由主义削减了国家开支，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变革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是集体投资，而不是私人投资，成为了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高风险的发明和新技术风险太大，私人资本家无法投资;像史蒂夫·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物狡猾地掩盖了他们对国家主导的发展的寄生依赖同样，数十亿美元的大型项目最终是由非经济目标驱动的，这些目标超出了任何成本效益分析。这种规模和雄心的项目实际上受到了市场约束的阻碍，因为对它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行性的冷静分析表明，它们是非常不令人印象深刻的此外，一些社会福利(例如埃博拉疫苗提供的福利)没有得到开发，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利润潜力，而在某些领域(如太阳能和电动汽车)，资本家可以看到积极阻碍进展，游说政府终止绿色能源补贴，实施阻碍进一步发展的法律。整个制药行业为知识属性垄断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特别具有破坏性的例证，而科技行业正日益受到专利骚扰的困扰。因此，资本主义错误地认定了技术发展的来源，将创造力置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束缚之下，将社会想象力限制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参数范围内，并攻击破坏利润的创新。为了释放技术进步，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把创造力从它目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将开始把技术从目前的控制和剥削范围中解放出来，走向合成自由的定量和定性扩展。它将使大型项目的乌托邦野心得以释放，唤起人们对发明和发现的经典梦想。太空飞行的梦想、经济的脱碳、平凡劳动的自动化、人类寿命的延长等等，都是重大的技术项目，它们发现自己以各种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的阻碍。技术的自力更生的扩张过程，一旦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使这两者都成为可能

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由。它可以构成完全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使人们能够摆脱匮乏、劳动和剥削，走向人性的全面发展

因此，人类的未来与这种自由技术变革的图景交织在一起。通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需要从人类的无产阶级化转向一个转型的、新可变的主体。这个主体不能预先确定;它只能在实践和概念分支的展开中得到阐述。在我们对技术、自然和社会网络的纠缠之外，不可能发现人性的“真正”本质认为后工作社会只会进一步灌输盲目消费的想法忽视了人类创新和创造的能力，并引发了一种基于当前资本主义主观性的悲观主义同样，新需求的发展必须与它们的商品化区分开来。后者将新的欲望锁定在一个限制人类繁荣的逐利框架中，而前者则代表着一种真正的进步形式。“需求作为一个整体的扩展和分化”比任何回归到“这些需求的原始自然状态”的民间政治梦想都值得称赞。诚然，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下，需求的复杂性被毁容了，但是，脱离了这种变异，“它们的目的必然是为整个人类发展一种‘丰富的个性’”。20

因此，后资本主义主体不会揭示一个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遮蔽的真实自我，反而会揭示创造新的存在模式的空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历史只不过是人性的不断变化”，人类的未来不能抽象地预先确定:它首先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要在时间上实现。尽管如此，一些一般的概念还是可以接受的。对马克思来说，后资本主义的首要原则是“人类力量的发展本身就是目的”。事实上，他的计划的基本目标是普遍解放。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提出的各种思想——生产社会化、终结价值形式、消除雇佣劳动——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直接的问题是:这个目标需要什么?对自由的综合建构是人类力量得以发展的手段。这种自由找到了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包括经济和政治的表达方式，对性和生殖结构的实验，以及新欲望的创造，扩展的审美能力，新的思想和推理形式，以及最终的全新的人类存在方式欲望、需求、生活方式、社区、存在方式和能力的扩展——所有这些都是由普遍解放的计划所唤起的。这是一个打开未来的计划，一个阐述人类可能意味着什么的工作的计划，一个为新欲望产生乌托邦计划的计划，一个将政治计划与无止境的普遍向量的轨迹结合起来的计划。资本主义虽然表面上有解放和普世性，但它最终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一个无休止的积累循环中，使人类的真正潜力僵化，并把技术发展限制在一系列平庸的边缘创新中。我们走得更快——资本主义要求这样做;然而我们却一事无成。相反，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加速摆脱停滞的世界。

在未来到来之前

本书的论点是，左派既不能停留在现在，也不能回到过去。为了建设一个新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开始采取必要的步骤，建立一种新的社会

霸权主义。这与我们今天的政治常识背道而驰。民间政治的倾向——强调地方的和真实的，暂时的和自发的，自主的和特殊的——可以解释为对最近失败历史的反应，部分的，矛盾的胜利，以及激增的全球复杂性。但它们仍然根本不足以取得更广泛的胜利，以反对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必须超越这些限制，而不是在民间政治的各种掩体中寻求暂时和局部的救济。反对抵抗、撤退、退出或纯粹的想法，今天左派的任务是参与规模和扩张的政治，以及这样一个项目所带来的所有风险。这样做需要我们拯救现代性的遗产，并重新评估后启蒙时代矩阵的哪些部分可以保存，哪些部分必须丢弃;因为只有一种新的普遍行动形式，才有能力取代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没有表格或奇迹事件，我们必须在当今世界的趋势和能力范围内找到建立新霸权的资源。虽然这本书关注的是完全自动化和工作的终结，但当代左派也有广泛的政治选项可供选择。这将意味着，最直接的是，根据最先进的技术，重新思考经典的左派要求。这将意味着建立在“堆栈”的后民族国家领土上，即使我们今天的数字世界成为可能的全球基础设施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在当代技术的前沿。增材制造和工作自动化预示着某些商品基于灵活性、去中心化和后稀缺性的生产的可能性。物流的快速自动化提供了一个全球互联系统的乌托邦式可能性，在这个系统中，零件和货物可以在没有人工的情况下快速有效地运输。加密货币及其区块链技术可以带来一种脱离资本主义形式的新的公共货币

新兴技术也加速了经济的民主引导。著名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说过，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占用了太多的夜晚。日益增长的经济民主可能要求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和决定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对于避免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它既简化了要做的决定，又使集体认为无关紧要的决定自动化。例如，与其对经济的每一个方面进行审议，不如对某些关键参数(能源投入、碳产出、不平等程度、研究投资水平等)进行决策社交媒体——脱离了货币化的驱动和自恋的倾向——也可以通过带来新的公众来促进经济民主。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催生新的审议和参与模式。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长期问题——如何在没有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有效地分配商品——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解决。从苏联早期对经济计划的尝试到今天，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变得比现在强大1000亿倍如何分配我们的主要生产资源的计算越来越可行。同样，通过普适计算收集有关资源和偏好的数据意味着，运行经济的原始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所有这些都可以动员起来，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实施卢卡斯计划——将我们的经济转向自觉地生产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如可再生能源、廉价药品和扩大我们的合成自由。

这就是21世纪左派的样子。任何希望保持相关性的运动

在我们的技术世界里，政治强国必须努力应对这种潜力和发展。我们必须将我们的集体想象力扩展到资本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外。左派不应该满足于电池寿命和计算机能力的微小改进，而应该动员经济脱碳、太空旅行、机器人经济等所有科幻小说的传统试金石的梦想，为超越资本主义的那一天做好准备。新自由主义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安全的，但它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生存。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社会制度一样，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发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Notes

引言

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劝导的散文*》(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63年);乔治·杨，《*俄罗斯宇宙学家: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及其追随者的深奥未来主义*》(牛津:牛津出版社，2012);马克·德里，“黑到未来:采访塞缪尔·r·德拉尼，格雷格·泰特和特里西亚·罗斯”，在马克·德里，编辑，*火焰战争:网络文化的话语*(达勒姆，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94年);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性别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的案例*》(纽约:莫罗出版社，1970年)。

2. 关于这种立场的范例，请参见Franco Berardi, *After* the *Future*(爱丁堡:AK Press, 2011);T. J. Clark，《为了一个没有未来的左派》，《*新左派评论*》II/74(2012年3 - 4月);费尔南多·科罗尼尔，“未来问题:拉丁美洲的历史和乌托邦(1989-2010)”，载于克雷格·卡尔霍恩和乔治·德鲁吉安主编的《*一切照常: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1年)。或者，用最近一篇流行文章的话说:“未来没有未来”:《看不见的委员会，*即将到来的起义*》(洛杉矶:Semiotext(e)， 2009)，第23页。

1. 我们的政治常识:介绍民间政治

1. Dave Mitchell, ‘Stuff White People Smash,’ *Rabble*, 26 June 2011, at rabble.ca.
2. It is telling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ongoing Doha Round negotiations at the WTO is because of divisions between states, rather than any social movement resistance.
3. Insight into some of the internal debates within Occupy around the issue of demands can be found in Astra Taylor and Keith Gessen, eds, *Occupy! Scenes from Occupied America* (London: Verso, 2011). For a detailed critique of the ‘no demands’ position, see Marco Desiriis and Jodi Dean, ‘A Movement Without Demands?’, *Possible Futures*, 3 January 2012, at possible-futures.org.
4. Zach Schwartz-Weinstein, ‘Not Your Academy: Occupation and the Future of Student Struggles’, in A. J. Bauer, Christina Beltran, Rana Jaleel and Andrew Ross, eds, *Is Th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Social Text E-Book, 2012, at what-democracy-looks-like.com. For a piece that tracks the diminishing importance of concrete demands over time within a single student occupation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2010, see Guy Aitchison, ‘Reform, Rupture, or Re-Imagination: 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of an Occupatio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0: 4 (2011), pp. 431–9.
5. Hakim Bey’s work is perhaps the most infamous example of this self-sufficiency of the autonomous protest. See Hakim Bey, *TAZ: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2nd rev. edn. (Brooklyn: Autonomedia, 2011). See also Jeremy Gilbert, *Anti-Capitalism and Culture: Radical Theory and Popular Politics* (Oxford/New York: Berg, 2008), pp. 203–9, for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from within the social movement space of the dangers of ‘the activist imaginary’.
6. Linda Polman, *The Crisis Caravan: What’s Wrong with Humanitarian Ai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10).
7. Radix, ‘Fracking Sussex: The Threat of Shale Oil & Gas’, *Frack Off*, 2013, at frack-off.org.uk. In fact, the most successful force to stop fracking has been the market, with the recent drop in crude oil prices.
8. Eviction Free Zone, ‘Direct Action,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Future of Housing Justice: A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2013, at libcom.org.
9. Adam Gabbatt, ‘Occupy Wall Street Activists Buy $15m of Americans’ Personal Debt’, *Guardian*, 12 November 2013.
10. Paul Mason, *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 How the Working Class Went Global* (London: Vintage, 2008).
11. Stephen Stich, *From Folk Psychology to Cognitive Science: The Case Against Belief*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Patricia Churchland, *Neurophilosophy: Towards a Unified Science of the Mind–Bra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While we want to draw a somewhat loose analogy with the neurophilosophical tradition here, we do not mean to argue that folk politics is in any sense *grounded* in folk psychology. Rather, our critique of it is similarly focu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 appearance of phenomena is both necessary and deceptive as to the reality of how a system operates.
12. For a history of these ‘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 see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A: Paradigm, 2004).
13. James Doward, Tracy McVeigh, Mark Townsend and Matthew Taylor, ‘March for the Alternative Sends a Noisy Message to the Government’, *Guardian*, 26 March 2011.
14. Liza Featherstone, Doug Henwood and Christian Parenti, ‘Left Anti- Intellectu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in Eddie Yuen, George

Katsiaficas and Daniel Burton Rose, eds, *Confronting Capitalism: Dispatches from a Global Movement* (New York: Soft Skull, 2004).

15. Bey, *TAZ*.

16. Paul Davidson, *The Keynes Solution: The Path to Global Economic Prospe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7.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Los Angeles, CA/Cambridge, MA: Semiotext(e), distributed by the MIT Press, 2009).

18. Greg Sharzer, *No Local: Why Small-Scale Alternatives Won't Change the World* (Winchester: Zero, 2012).

19. Ernst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20. Taylor and Gessen, *Occupy!*.

21. Richard J. F. Day, *Gramsci Is Dead: Anarchist Currents in the Newes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Pluto, 2005); Jon Beasley-Murray, *Posthegemony: Political Theory and Latin Americ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22. Justin Healey, *Ethical Consumerism* (Thirroul, NSW: Spinney, 2013).

23. James Ladyman, James Lambert and Karoline Wiesner, 'What Is a Complex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3: 1 (2013), pp. 33–67.

24. Susan Buck-Morss, 'Envisioning Capital: Political Economy on Display', *Critical Inquiry* 21: 2 (1995), pp. 434–67.

25. Fredric Jameson, 'Cognitive Mapping',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26. Ibid., p. 356.

27.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Carl Honoré, *In Praise of Slow: Challenging the Cult of Speed*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2005).

28. Rosa Luxemburg, *The Essential Rosa Luxemburg: Reform or Revolution and the Mass Strike*, ed. Helen Scott (Chicago: Haymarket, 2008), p. 68.

29.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1962); and '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 in Michael Martin and Lee McIntyre, eds,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4).

30. This is the ques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See Oskar Lange and Fred M. Taylo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Fikret Adaman and Pat Devine, 'The Economics Calculation Debate: Lessons for Socialist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 5 (September 1996); Allin Cottrell and Paul Cockshott, 'Calculation, Complexity and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Once Agai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5: 1 (1993).

31.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here that 'the left' is an ultimately artificial if useful term, used to describe an incredibly diverse and potentially contradictory se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s. For a full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left/right distinc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see Marcel Gauchet, 'Right and Left', in Lawrence Kritzman, ed., *Realms of Memory: Conflicts and Divis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As a point of clarification, we consider 'the left' today in the broadest sense to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movements, positions and organisations: democratic socialism, communism, anarchism, left-libertarianism, anti-imperialism, anti-fascism, anti-racism, anti-capitalism, feminism, autonomism, trade unionism, queer politics, and large sections of the green movement, among many groups allied or hybridised with the above. Any consistency these forces might have is a matter of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articulation, rather than being in any sense natural or pre-given.

32. 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5 to the Present*,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2), pp. 15–17; 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2 (1982).

33. After the demise of 1968, there was a brief reassertion of more classical Leninist and Maoist revolutionary thought. Yet these attempts to double down on traditional methods of organising remained numerically marginal and suffered eventual failure. For a history of this moment in America, see Max Elbaum, *Revolution in the Air: Sixties Radicals Turn to Lenin, Mao and Che* (London: Verso, 2006).

34.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pp. 35–6.

35. For an early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se modes of organising, see Jo Freeman, *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 1970, at struggle.ws.

36. Martin Klimke and Joachim Scharloth, eds, *1968 in Europe: A History of Protest and Activism, 1956–7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7. Ibid., p. 5.

38. Giovanni Arrighi, Terrence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Antisystemic Movements* (London/New York: Verso, 1989), pp. 45–7.

39. Ibid.

40. Peter Starr, *Logics of Failed Revolt: French Theory After May '6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1. Grant Kester, 'Lessons in Futility: Francis Alÿs and the Legacy of May '68', *Third Text* 23: 4 (2009).

42. Gilbert, *Anti-Capitalism and Culture*, pp. 23–4.

43.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Barry J. Eichengreen,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Lessons of Bretton Woo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45. 作为新自由主义计划彻底粉碎工会力量的成功的一个迹象，在1980-2000年期间，21个OECD国家中有17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属于工会的比例下降，在2000 - 2007年期间，21个国家中有19个国家再次下降。OECD，“工会密度”，*OECD统计摘要*，stats.oecd.org。
46.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第11-14页。
47. 同上，第13页。
48. 科林·克劳奇，《*后民主*》(剑桥:政治学，2004)，第一章。
49. 蒂姆·乔丹，《*行动主义!*》《*直接行动、黑客行动主义与社会的未来*》(伦敦:Reaktion出版社,2001),第32页。
50. 金伯姆·l<e:1>·克伦肖，《种族与性别的交叉点去边缘化:黑人女性主义对反歧视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批判》，《芝加哥大学法律论坛》*140期*(1988)。
51.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性别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的案例*》(纽约:莫罗出版社,1970年);曼迪·默克和斯特拉·桑福德主编,《*性别辩证法的进一步冒险:对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批判性散文*》(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0年)。
52. 例如，参见James A. Geschwender的《*阶级、种族和工人暴动*》(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
53. Amory Starr,*命名敌人:反公司运动对抗全球化*(伦敦:Zed, 2000)。
54. 乔丹，*激进主义!*;泰勒和格森，*占领*。
55. 这项工作建立并扩展了我们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提出的早期建议。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在这项工作中使用“加速主义”一词，因为围绕这一概念产生了相互竞争的理解，而不是因为我们对其原则的任何放弃。参见Alex Williams和Nick Srnicek，“#加速:加速主义政治宣言”，见Robin Mackay和Armen Avanessian主编，*#加速:加速主义读者*(法尔茅斯:Urbanomic, 2014)。

2. 为什么我们不赢?对当今左派的批判

1. 这些其他立场可以从各种谴责“占领”运动过于自由的言论中看到。参见Mark Bray，“困扰占领运动的五种自由主义倾向”，*ROAR杂志*，2014年3月14日，网址:roarmag.org。过去也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论点。例如马克思认为，农民为革命政治提供的阶级基础不足，只有产业工人阶级才会有与共产主义一致的利益。我们的论点是，无论水平主义、地方主义和其他民间政治的阶级基础如何，它们都仍然受到空间、时间和概念直接性概念的束缚。
2. Anna Feigenbaum, Fabian Frenzel和Patrick McCurdy，《*抗议营地*》(伦敦:Zed出版社，2013)，第159页。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水平主义的变体在左翼政治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在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更早的运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水平主义的承诺。
3. 本章将抛开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漫长历史，只关注作为其一些原则和实践的当代体现的水平主义。
4. 约翰·霍洛威,《*不夺取权力而改变世界:今天革命的意义*》(伦敦/斯特林,弗吉尼亚州:冥王星,2002年)。
5. 理查德·戴，《*葛兰西已死:最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5)，第8页。另见乔恩·比斯利-默里,《*后神权论:政治理论与拉丁美洲*》(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0)。
6. 对共识决策的承诺并不总是水平主义的明确支柱，而是在实践中体现水平主义的一种流行的当代方式。一些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如南美的“平台主义”，明确地避免共识决策。
7. Uri Gordon, *Anarchy Alive!从实践到理论的反威权政治*(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第20页。
8. 虽然我们仍然不相信面对面和/或共识驱动形式的直接民主的大规模前景，但这当然不排除考虑如何沿着更复杂的、技术中介的路线构想参与式民主。
9. 默里·布克钦，*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爱丁堡:AK出版社，2004)，第xxviii页。
10. 同上，第58页。
11. 《*愤怒与希望的网络: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剑桥，英国/马尔登,麻萨诸塞州:Polity, 2012),第11页。
12. 一般认为，当代左翼激进主义中使用的共识决策形式起源于大约300年前的贵格会宗教运动。通过参加反核运动的贵格会教徒，这一程序被引入政治行动主义。L. A.考夫曼，《共识的神学》，载于阿斯特拉·泰勒和基思·格森主编，《*占领!*》《*被占领的美国*》(伦敦:Verso出版社，2011)。
13. Marina Sitrin，“占领:使民主成为一个问题”，载于Federico Campagna和Emanuele Campiglio主编，《*我们在为什么而战:一个激进的集体宣言*》(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12)，第86-7页。

14. Colin Crouch, *Post-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2004).

15. Kauffmann, 'Theology of Consensus'.

16. Federico Campagna and Emanuele Campiglio. 'What Are We Struggling For?', in Campagna and Campiglio,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p. 5.

17.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1.

18. South London Solidarity Federation, 'Direct Action and Unmediated Struggle', in Campagna and Campiglio, *What Are We Fighting For?*, p. 192.

19. Perhaps the best-known form of direct action, the mass strike, wa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of labour movements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nd remains a significant tool when used appropriately today. But this often requires scaling up (to a national or industry-wide level) as well as persistence, solidarity, consistent membership and organised systems of funding. The structure of horizontalist movements often militates against the success of this kind of tactic.

20. Feigenbaum et al., *Protest Camps*, p. 161.

21. The relative successes of Egypt, Tunisia and Iceland in using the tactic of occupation stem from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that render them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ondition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for instance, the relatively homogeneous religious and ethno-cultural composition of Tunisia and Iceland; the strong links forged between the occupations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forms of resistance in all three countries; the different (more visible) form of state repression in Egypt and Tunisia; the small size of Iceland (and the conscious attempt to express the movement in parliamentary terms); and the distinctive affective hurdles (namely, fear) to be overcome in Egypt and Tunisia. For these and other reasons, these countries managed more success with the tactic.

22. Research and Destroy, 'The Wreck of the Plaza', *Research and Destroy*, 14 June 2014, at researchanddestroy.wordpress.com.

23. Josh MacPhee, 'A Qualitative Quilt Born of Pizzatopia', in Kate Khatib, Margaret Killjoy and Mike McGuire, eds, *We Are Many: Reflections on Movement Strategy from Occupation to Liberation* (Edinburgh: AK Press, 2012), p. 27.

24. Taylor and Gessen, *Occupy!*.

25.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From Oscar Grant to Occupy: The Long Arc of Rebellion in Oakland,' in Khatib et al., *We Are Many*, p. 42.

26.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p. 59.

27. Feigenbaum et al., *Protest Camps*, p. 35.

28. Ibid., pp. 52–3.

29. Ibid., p. 42.

30. See, for example, the Australian Tent Embassy built around aboriginal land rights (ibid., p. 45);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pp. 59–60.

31. Lester Spence and Mike McGuire, 'Occupy and the 99%', in Khatib et al., *We Are Many*, p. 58.

32. Raúl Zibechi, 'Latin America Today, Seen from Below', *Upside Down World*, 26 June 2014, at upsidedownworld.org, pp. 42–4. We would argue that, while spontaneous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lasting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have a role to play, a politics that consists *entirely* of such entities will find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take apart and replace the relatively long-lasting embedded phenomena that characterise advanced capitalism.

33. Anton Pannekoek, *Workers' Councils* (Edinburgh: AK Press, 2003); Gregory Fossedal, *Direct Democracy in Switzerlan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7); Keir Milburn, 'Beyond Assemblyism: The Processual Calling of the 21st-Century Left', in Shannon Brincat, ed., *Communism in the 21st Century, Volume 3: The Future of Communism*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3).

34. Isabel Ortiz, Sara Burke, Mohamed Berrada and Hernán Cortés, *World Protests 2006–2013* (New York: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and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3), pdf available at fes-globalization.org.

35. Michael Albert,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4).

36. Samuel Farber, 'Reflections on "Prefigu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92 (March 2011), at isreview.org.

37. Jane McAlevey, *Raising Expectations (and Raising Hell): My Decade Fighting for the Labor Movement* (London: Verso, 2014), p. 11.

38. Not An Alternative, 'Counter Power as Common Power',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Protest* 9 (2014), at joaap.org.

39.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 3 (2014).

40. Rodrigo Nunes, *Organisation of the Organisationless: Collective Action After Networks* (London: Mute, 2014), p. 36.

41. David Graeber,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Chicago, IL: Prickly Paradigm, 2004), p. 89.

42. Helen Hester, 'Synthetic Genders and the Limits of Micropolitics', *···ment* 6 (2015).

43. Marco Desiriis and Jodi Dean, 'A Movement Without Demands?' *Possible Futures*, 3 January 2012, at possible-futures.org.

44. Noam Chomsky, *Occupy* (London: Penguin, 2012), p. 58.

45. Not An Alternative, 'Counter Power as Common Power'.

46. Ibid.

47. Jeroen Gunning and Ilan Zvi Baron, *Why Occupy a Square? People, Protests and Movements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London:

Autonomedia, 2011), p. xi.

50. ‘Communiqué from an Absent Future’, *We Want Everything*, 24 September 2009, at wewanteverything.wordpress.com, p. 19.

51. Desiriis and Dean, ‘A Movement Without Demands?’.

52. See, for example, Theodore Schatzki’s discussions of Shaker villages: Theodore Schatzki, *The Site of the Social: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Life and Chang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2).

53. Farber, ‘Reflections on “Prefigurative Politics”’.

54. Bruno Bosteels, ‘The Mexican Commune’, at academia.edu, p. 12.

55. This is an old question, often invoked in debates between anarchism and Marxism. See, for exampl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anarchism and communism in Mexico in ibid., p. 6.

56.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The Coming Insurrectio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9), p. 12; John Holloway, *Crack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2010); Nathan Brown, ‘Rational Kernel, Real Movement: Badiou and Theorie Communiste in the Age of Riots’, *Lana Turner: A Journal of Poetry and Opinion* 5 (2012); David Graeber, ‘Afterword’, in Khatib et al., *We Are Many*, p. 425.

57. Spence and McGuire, ‘Occupy and the 99%’, p. 61.

58. Paul Mason, *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 The New Global Revolutions* (London: Verso, 2012), p. 63.

59. In light of the emergence of Occupy, McKenzie Wark memorably asked: How do you occupy an abstraction? See McKenzie Wark, ‘How to Occupy an Abstraction’, at versobooks.com.

60. R. I. M. Dunbar, ‘Neocortex Size as a Constraint on Group Size in Primat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2: 6 (1992).

61. For the most extensive study of this, see Marina Sitrin, *Everyday Revolutions: Horizontalism and Autonomy in Argentina* (London: Zed, 2012).

62. Silvia Federici, ‘Feminism, Finance and the Future of #Occupy –An Interview’, *ZNet*, 26 November 2011, at zcomm.org.

63. A similar problem arose with the general assemblies at Occupy Wall Street. Milburn, ‘Beyond Assemblyism, p. 191; Sitrin, *Everyday Revolutions*, p. 67–8.

64. Sitrin, *Everyday Revolutions*, p. 130; Juan Alcorta, ‘Solidarity Economies in Argentina and Japan’, *Studies of Modern Society* 40: 12 (2007), p. 270.

65. Farber, ‘Reflections on “Prefigurative Politics”’.

66. Estimates are that the barter economy went from between 1 and 2.5 million people to just 100,000 people once the economy recovered. Alcorta, ‘Solidarity Economies’, pp. 272–3; Sitrin, *Everyday Revolutions*, p. 77.

67. Feigenbaum et al., *Protest Camps*, p. 159.

68.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69. Ernst Schumacher,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70. Phillip Blond, *Red Tory: How Left and Right Have Broken Britain and How We Can Fix It*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71. Justin Healey, *Ethical Consumerism* (Thirroul, NSW: Spinney, 2013).

72. Uri Gordon, *Anarchy Alive! Anti-Authoritarian Politics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London: Pluto, 2007).

73. Alan Ducasse, ‘The Slow Revolutionary’, *Time*, 3 October 2004.

74. Carl Honoré, *In Praise of Slow: Challenging the Cult of Speed*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2005).

75. Ibid., p. 84.

76. Sarah Bowen, Sinikka Elliott and Joslyn Brenton, ‘The Joy of Cooking?’ *Contexts* 13: 3 (2014).

77. Miriam Glucksmann and Jane Nolan,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Women’s Labour at Home and Work’, *Equal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26: 2 (20 February 2007).

78. Will Boisvert, ‘An Environmentalist on the Lie of Locavorism’, *New York Observer*, 16 April 2013.

79. Alison Smith, Paul Watkiss, Geoff Tweddle, Alan McKinnon, Mike Browne, Alistair Hunt, Colin Treleven, Chris Nash and Sam Cross, *The Validity of Food Miles as an Indica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 Report* (London: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2005).

80. Caroline Saunders, Andrew Barber and Greg Taylor, *Food Miles: Comparative Energy/Emissions Performance of New Zealand’s Agriculture Industry*, Agri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search Unit, Lincoln University, Canterbury, NZ, July 2006, pdf available at lincoln.ac.nz.

81. In the UK in 2005, air freight made up just 1 per cent of food tonne miles travelled, but 11 per cent of food-related emissions. Smith et al., *Validity of Food Miles*, p. 3.

82. Doug Henwood, ‘Moving Money (Revisited)’, *LBO News*, 2010, at lbo-news.com.

83. Stephen Gandel, ‘By Every Measure, the Big Banks Are Bigger’, *Fortune*, 13 September 2013, at fortune.com.

84. Victoria McGrane and Tan Gillian, ‘Lenders Are Warned on Risk’, *Wall Street Journal*, 25 June 2014.

85. *OTC Derivatives Statistics at End-June 2014*,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4, p. 2, at bis.org.

86. David Boyle, *A Local Banking System: The Urgent Need to Reinvigorate UK High Street Banking*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11), p. 8.

87. Ibid., pp. 8–9.

88. Giles Tremlett, ‘Spain’s Savings Banks’ Culture of Greed, Cronyism, and Political Meddling’, *Guardian*, 8 June 2012.

89. Boyle, *Local Banking System*, p. 10.

90. Andrew Bibby, ‘Co-op Bank Crisis: What Next for the Co-operative Sector?’, *Guardian*, 21 January 2014.

91. Greg Sharzer, *No Local: Why Small-Scale Alternatives Won't Change the World*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12), p. 3.

92. Philip Mirowski,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How Neoliberalism Survived the Financial Meltdown* (London: Verso, 2013), p. 326.

93. Zibechi, ‘Latin America Today’.

94. Christian Marazzi, ‘Exodus Without Promised Land’, in Campagna and Campiglio, eds,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p. viii.

95. Such an approach has also been labelled ‘alternativism’ by communisation theorists. Endnotes, ‘What Are We to Do?’ in Benjamin Noys, ed., *Commu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ntestation, Critique, and Contemporary Struggles* (Brooklyn: Minor Compositions, 2012), p. 30.

96. Day, *Gramsci Is Dead*, pp. 20–1.

97. Bey, *TAZ*, p. 99.

98. Invisible Committee, *Coming Insurrection*, p. 96.

99. Ibid., p. 113.

100. Ibid., p. 102.

101. Ibid., pp. 107, 114.

102. Vivek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3), pp. 228–9.

103. Dan Hancox, *The Village Against the World* (London: Verso, 2013), Chapter 8; Ulrike Fokken, ‘Die Rote Insel’, *Die Tageszeitung*, 16 February 2013, at taz.de; Jason E. Smith, ‘The Day After the Insurrection’, *Radical Philosophy* 189 (2015), p. 43.

104. See also Alberto Toscano, ‘The Prejudice Against Prometheus’, *STIR*, 2011, at stirtoaction.com.

105. Chris Dixon, ‘Organizing to Win the World’, *Briarpatch Magazine*, 18 March 2015, at briarpatchmagazine.com; Keir Milburn, ‘On Social Strikes and Directional Demands’, *Plan C*, 7 May 2015, at weareplanc.org.

3. 他们为什么会赢?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形成

1. Jamie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0.

2. This standard history is now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rewritten, and this chapter relies heavily on the pioneer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ing the unpublished work of Alex Andrews. See, for example, Philip Mirowski and Dieter Plehwe, eds, *The Road from Mont Pe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hilip Mirowski,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How Neoliberalism Survived the Financial Meltdown* (London: Verso,

2013);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Daniel Stedman Jone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chard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Think-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 1931–1983* (London: Fontana, 1995);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3. Witness, for instance, the unlikely but immensely productive alli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economic neoliberals and radical social conservatives.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6;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9–50.

4. Pierre Dardot and Christian Laval, *The New Way of the World: On Neoliberal Society*, transl. Gregory Elliot (London: Verso,

2014).

5. Rob Van Horn, ‘Reinventing Monopoly and the Role of Corporations: The Roots of Chicago Law and Economics’, in Mirowski and Plehwe, *Road from Mont Pelerin*, pp. 204–37.

6.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7. Philip Cerny,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28.

8. Karl Polanyi is a notable exception, having long ago recognise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building markets in labour and land.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ism Reason*, p. 4.

9. This gendering of rights is appropriate fo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10.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i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ies negates the possibility of any simple economism. Thomas Lemke,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Michel Foucault’s Lecture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on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30: 2 (2001), p. 194.

11.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2.

12.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s has been exceptionally well studied within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sociology. See Donald MacKenzie, *Material Markets: How Economic Agents Are Construct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ter 7;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eds,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Michel Callon, 'An Essay on Framing and Overflowing: Economic Externalities Revisited by Sociology', in Michel Callon, ed., *The Laws of Markets* (Oxford: Blackwell, 1998), pp. 244–69; Michel Call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in Callon, *Laws of Markets*; Andrew Barry,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thlone, 2001).

13. Nick Srnicek, 'Representing Complexity: The Material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litics', PhD thesi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3, Chapter 5; Donald MacKenzie,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8).

14. Callon, 'Essay on Framing and Overflowing'.

15. This create-and-sustain movement in many ways parallels Jamie Peck's notion of the roll-back and roll-out phases of neoliberalisation. See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p. 22–3.

16. Mirowski and Plehwe, *Road from Mont Pelerin*.

17.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48.

18. Plehwe, 'Introduction', in Mirowski and Plehwe, *Road from Mont Pelerin*, p. 16.

19.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109.

20.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50;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4.

21.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50.

22. Cited in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104.

23.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49.

24. Cited in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111.

25. Plehwe, 'Introduction', p. 7.

26. Dardot and Laval, *New Way of the World*, p. 55.

27. Plehwe, 'Introduction', p. 4.

28.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276.

29. Colin Crouch, *The Strange Non-Death of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11), p. 23.

30.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117.

31.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51.

32. Ibid., p. 84.

33.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57.

34. Quantitativ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Fisher as well, placing him alongside Hayek at the centre of the MPS network. See Plehwe, 'Introduction', p. 20.

35.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131.

36. Ibid., p. 132.

37. Ibid., p. 141.

38. Ibid., p. 142.

39. Ibid., pp. 156–7.

40. Ibid., Chapter 5.

41.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44.

42. Ibid.

43.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184.

44.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Empire* (London: Verso, 2012), p. 114.

45.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54.

46. Plehwe, 'Introduction', p. 6.

47.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13.

48. Ann Pettifor, 'The Power to "Create Money out of Thin Air"', openDemocracy, 18 January 2013, at opendemocracy.net.

49. This desire for an answer can also be seen in the choice of macroeconomic models. Peter Kenway, *From Keynesianism to Monetarism: The Evolution of UK Macroeconometric Models*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39.

50.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p. 196.

51.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xiv.

52. Some argue that neoliberalism was necessary because of the crisis of accumulation facing capitalism in the 1970s. But this argument neglects alternative ways in which that crisis could have been resolved and attributes immense clarity of self-interest to capitalists.

53. Philip Cerny,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9.

54. David Stuckler, Lawrence King and Martin McKee, 'Mass Privatisation and the Post-Communist Mortality Crisi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Lancet* 373: 9,661 (2009).

55.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41.

56. This is one source of the common claim that postmodernism is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neoliberalism.

57.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53.

58. Dardot and Laval, *New Way of the World*, p. 3.

59. Ibid., p. 265.

60. 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Winchester: Zero, 2009), Chapter 4.

61. Wanda Vrasti, 'Struggling with Precarity: From More and Better Jobs to Less and Lesser Work', *Disorder of Things*, 12 October 2013, at thedisorderofthings.com.

62. Harvey,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p. 61.

63. For evidence of the austerity narrative and its adoption in popular consciousness, see Liam Stanley, '"We're Reaping What We Sowed": Everyday Crisis Narratives and Acquiescence to the Age of Austerity', *New Political Economy* 19: 6 (2014).

64. Ernesto Laclau, 'Identity and Hegemony: The Role of Universali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Political Logics', in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i☒ek, eds, *Contingency, Hegemony and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2011), p. 50.

65. The classical mark of ideology today is that it feeds on cynicism, or, as Slavoj ☒i☒ek puts it, ideology works even (and especially)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it*. See Slavoj ☒i☒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New York: Verso, 1989).

66. Mirowski,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p. 356.

67. Ibid., p. 332.

4. 左现代性

1. This expansionary process has been conceived of in a variety of (not incompatible) ways –for instance, through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spatial fixes, and expanding cycles of hegemony. In each case, though, the expansionary nature of capitalist universalism is readily apparent. See, respectively,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London: Verso, 2010);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Verso, 2006);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2009).

2. For a lengthy defence of this claim, see Vivek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3), ¶ 9. 4.

3. 'For it is finally the universal …which furnishes the only true denial of established universalisms.' François Jullien, *On the Universal: The Uniform, the Comm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Cambridge: Polity, 2014), p. 90.

4. Mark Fisher and Jeremy Gilbert, *Reclaim Modernity: Beyond Markets, Beyond Machines* (London: Compass, 2014), pp. 12– 14.

5. Sandro Mezzadra, 'How Many Histories of Labor? Towards a Theory of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Europe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ive Cultural Policies*, 2012, at eipcp.net.

6. 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Winchester: Zero, 2009).

7. Similar arguments have also been made about postmodernity. See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1).

8. Peter Wagner, *Modernity: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Cambridge: Polity, 2012), p. 23.

9. For a similar argument with respect to 'development', see Kalyan Sanyal,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New Delhi: Routledge India, 2013), p. 92.

10. To give a sense of this variety, Jameson outlines fourteen different proposals for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as historical period. Fred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 Verso, 2002), p. 32.

11. Alberto Toscano, *Fanaticism: On the Uses of an Idea* (London: Verso, 2010); Frederick Cooper,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 The Labo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Chibber, *Postcolonial Theory*, p. 233.

13. We seek to follow Susan Buck-Morss when she writes: 'The rejection of Western-centrism does not place a taboo on using the tools of Western thought. On the contrary, it frees the critical tools of the Enlightenment …for original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 Susan Buck-Morss, *Thinking Past Terror: Islamism and Critical Theory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2003), p. 99.

14. Wang Hui, *The End of the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2011), pp. 69–70.

15. Göran Therborn, *European Modernity and Beyond: The Trajectory of European Societies, 1945–2000* (London: Sage, 1995), p. 4.

16. Jameson, *Singular Modernity*, p. 18.

17. Corey Robin, *The Reactionary Mind: Conservatism from Edmund Burke to Sarah Pal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 Simon Critchley, 'Ideas for Modern Living: The Future', *Guardian*, 21 November 2010.

19. Kamran Matin, 'Redeeming the Universal: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Inner Life of Eurocentris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 2 (2013), p. 354.

20. Walt Whitman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 Walter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xxiv–xxv.

22.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2000), p. 1.

23. 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1997);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1991).

24. David Priestland, *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 (New York: Grove, 2009).

25. Stephen Eric Bronner, *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a Politics of Radical Engag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8.

26.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 Walter Mignolo and He Weihua, 'The Prospect of Harmony and the Decolonial View of the World', *Marxism and Reality* 4 (2012).

28. Wagner, *Modernity*, p. 81.

29.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1 (2000).

30. For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on this concept, see the debates collected in Alex Anievas, ed., *Marxism and World Politics: Contesting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2).

31. For a philosophical–political–religious genealogy of the universal, see Jullien, *On the Universal*, Chapters 4–7.

32.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the discussion of the universal here is within a political rather than a philosophical register.

33. Étienne Balibar, 'Sub Specie Universitatis', *Topoi* 25: 1–2 (2006), p. 11.

34. Broadly, we can divide these criticisms between Latin American decolonialism, South Asian subaltern studies and African postcolonialism, which each inflect modernity and colonialism through their regional history.

35. Mignolo,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36. Ibid., Chapter 2; Ramón Grosfoguel, 'Decolonizing Western Uni-Versalisms: Decolonial Pluri-Versalism from Aimé Césaire to the Zapatistas', transl.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Transmodernity: Journal of Peripheral 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Luso-Hispanic World* 1: 3 (2012).

37. Jullien, *On the Universal*, p. 92.

38. Jullien argues that Islamic thought does have a degree of ethico-political universal normativity, but this is in any case significantly less apparent than that emerging from European modernity and is qualified by the priority given to community (ibid., p. 74). John Hobson,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Amartya Sen, 'East and West: The Reach of Reas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7: 12 (2000).

39. 'The project of provincializing Europe cannot …originate from the stance that the reason/science/universals that help define Europe as the modern are simply "culture-specific" and therefore only belong to the European cultures. [This] simple rejection of modernity would be, in many situations, politically suicidal.'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3–5; Matin, 'Redeeming the Universal, Duy Lap Nguyen, 'The Universal Province of Modernity', *Interventions* 16: 3 (2014), p. 447; Mignolo,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p. 275.

40.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posed in light of the critiques of classic substantialist universalism. We will not elaborate on them here, but a few quick comments are in order. 'Negative universalism' grounds universalism on a common opposition, but this remains a folk-political, defensive and negative approach. It does not elaborate an alternative future. 'Minimal universalism' argues for a few basic principles common to all, but is simply a reduced version of classical universalism and remains subject to all its problems. Finally, 'pluri-versalism' is the most intriguing perspective, and the one we would most closely align with. It argues for self-determination of cultures in mutual horizontal engagement. But it requires three quick comments. First, it neglects the medium of engagement between cultures, which we argue requires a sophisticated theory of reasoning in order to avoid domination. (See Anthony Laden's work for a non-dominating and collective conception of reasoning.) Secondly, it rightly opposes a homogeneous vision of universalism, but overlooks the ways in which universalism can already incorporate the sorts of differences it highlights. Pluri-versalism too easily suggests neglecting the common aspect required in a globalised world. Humanity exists not simply as mutually exclusive ways of being, but instead as a deeply intertwined set of differences. Thirdly, pluri-versalism recognises that capitalist universalism needs to be eliminated first in order for it to stand a chance. Until then, it is bound to resistance and defensive gestures against expansionary capitalism. Pluri-versalism thus relies upon the elimination of capitalism and is dependent upon a counter-hegemonic postcapitalist project as its presupposed condition of existence.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especially actually-existing universalism –cannot be dispensed with by theoretical fiat. Grosfoguel, 'Decolonizing Western Uni-Versalisms', p. 101; Bhikhu Parekh, 'Non-Ethnocentric Universalism', in Tim Dunne and Nicholas J. Wheeler, eds, *Human Rights in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28–59; Mignolo,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p. 275; Anthony Simon Laden, *Reasoning: A Social Pi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1. Ernesto Laclau, 'Identity and Hegemony: The Role of Universali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Political Logics', in Judith Butler, Ernesto Laclau and Slavoj Žižek, eds, *Contingency, Hegemony and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London: Verso, 2011).

42. Nora Sternfeld, 'Whose Universalism Is It?', transl. Mary O'Neill, 2007, at eipcp.net; Jullien, *On the Universal*, p. 92.

43. Butler, 'Restaging the Universal: Hegemony and the Limits of Formalism', in Butler et al., *Contingency, Hegemony and Universality*, pp. 33.

44. Stefan Jonsson, 'The Ideology of Universalism', *New Left Review* II/63 (May–June 2010), p. 117.

45. Matin, 'Redeeming the Universal'.

46. For the classic reference point on negative freedom, see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Henry Hardy, ed.,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7.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Chapter 1.

48. Friedrich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49. This has overlaps with Philippe van Parijs' s (as well as many other theorists')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al and real freedom, but the notion of 'synthetic' freedom highlights that it is not a natural aspect of humanity, but something constructed. See Philippe Van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t (If Anything) Can Justify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1–4.

50. Daniel Raventós, *Basic Income: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Freedom*, transl. Julie Wark (London: Pluto, 2007), p. 68; Mignolo,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pp. 300–1.

5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Prometheus, 1976), p. 44.

52.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2nd edn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65.

53. As Erik Olin Wright puts it, 'The idea of "flourishing" includes not jus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tellectu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apacities during childhood, but also the lifelong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those capacities, and to develop new capacities as life circumstances change.' 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2010), pp. 47–8.

54. There is no strict order of preference for these three elements, even though the remainder of this book will focus predominantly on the first.

55. Alex Gourevitch, 'Labor Republica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Political Theory* 41: 4 (2013), p. 597.

56. Slavoj ☒i☒ek,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s', interview with Slawomir Sierakowski, 23 February 2015, at lareviewofbooks.org.

57. Karl Marx, *Wage-Labour and Capital & Value, Price and Profi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p. 54;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 Martin Nicolaus (Middlesex: Penguin, 1973), p. 706; and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p. 820.

58.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republican argument for this position, which rightly argues that wage labour involves domination (as distinct from interference), and that only the provision of the basic means of existence enables us to overcome this domination. This tradition has a long line of thinkers associated with it, from Aristotle to Robespierre to nineteenth-century labour activists. While we will not rely on it here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for a post-work society, it nevertheless ha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ke over and above liberal conceptions of freedom. See Raventós, *Basic Income*, Chapter 3; Gourevitch, 'Labor Republica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pp. 593–8.

59. Antonella Corsani, 'Beyond the Myth of Woman: The Becoming-Transfeminist of (Post-)Marxism', transl. Timothy S. Murphy, *SubStance* 36: 1 (2007), p. 127.

60. For this argument, see Parijs, *Real Freedom for All*, pp. 17–20.

61. This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he ideas of power-with and power-to. See Uri Gordon, *Anarchy Alive! Anti-Authoritarian Politics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p. 54–5;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Sterling, VA: Pluto, 2002), p. 28.

62. Laden, *Reasoning*, pp. 14–23; Gordon, *Anarchy Alive!*, p. 54.

63. For the notion of language as cognitive scaffolding, see Andy Clark,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3.

64. Cited in Gregory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eiden: Brill, 2006), p. 16.

65. Krafft Ehricke, 'The Extraterrestrial Imperative', *Air University Review*, February 1978.

66. Marx and Engels, *German Ideology*, p. 44.

67. For a defence of this Promethean spirit, see Ray Brassier, '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68. For an earlier, histor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our cyborg nature, see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91). For a contemporary updating, see the Laboria Cuboniks manifesto in Helen Hester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Dea Ex Machina* (Berlin: Merve Verlag, 2015).

69. Benedict Singleton, 'Maximum Jailbreak', in Mackay and Avanessian, *#Accelerate*.

70. Alfred Schmid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Verso, 2014), pp. 144–5.

71. Sadie Plant, 'Binary Sexes, Binary Codes', 3 June 1996, at future-nonstop.org.

72. Reza Negarestani, 'The Labor of the Inhuman', in Mackay and Avanessian, *#Accelerate*, 452.

73. Ibid., p. 438.

75. 关于身体实验的两个引人入胜的描述，请参阅香农·贝尔的《*快速女权主义*》(纽约:自主媒体，2010);比阿特丽斯·普雷西亚多，《*德斯托·瘾君子:药物色情时代的性、毒品和生物政治*》(纽约:纽约市立女性主义出版社，2013)。

76. 本书的其余部分将主要讨论综合自由的前两个方面:生存的基本条件和集体行动的能力。然而，我们将在结束语中回到人类的技术增强上来。

77. 苏珊·巴克-莫尔斯，《*黑格尔、海地与世界史*》(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5. 《未来行不通》

1. Two recent manifestos from India and Germany have also attacked the glorification of work: Kamunist Kranti, 'A Ballad Against Work', 1997, at libcom.org; and Krisis-Group, 'Manifesto Against Labour', 1999, at krisis.org.

2.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p. 820.

3.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hanges in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moments such as an economic crisis) are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evel of grievances in generating a social movement. In other words, the idea that making things worse will lead to revolution has little empirical support.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ter 5.

4.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ransl.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90), Part 8.

5. Michael Perelman,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4.

6. As Marx writes, '"Proletarian" must be understood to mean, economically speaking, nothing other than "wage-labourer", the man who produces and valorises "capital", and *is thrown onto the street as soon as he becomes superfluous to the need for valorisation.*'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764 n. 1 (emphasis added).

7. In the case of groups like unpaid domestic labourers, the proletariat can also rely upon the wages of another for its survival, along with all the problematic dependencies this fosters. In this case, the proletariat is *indirectly* reliant upon waged labour for its survival.

8. Richard Freeman, 'The Great Doubl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 Global Labor Market', in John Edwards, Marion Crain and Arne Kalleberg, eds, *Ending Poverty in America: How to Restore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9. Steve Fraser, *The Age of Acquiescenc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merican Resistance to Organized Wealth and Power* (New York: Little, Brown US, 2015), p. 60.

10. The problem of how to define the surplus population is one which is often assumed away in the literature. But there are important issues here that cannot simply be passed by. If the surplus is defined in terms of waged versus non-waged, then are working prison populations not part of the surplus? What about the vast amounts of informal labour that works for a wage and produces for a market? Other problems arise if one defines the surplus in terms of 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In particular, one is led to the conclusion Negri and Hardt draw –that since socially productive labour exists everywhere under conditions of post-Fordism, the term no longer has meaning.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5], p. 131.) We reject that conclusion and attempt to demonstrate here that the concept still has important analytical and explanatory utility. We believe that the surplus can be defined as those who are outside of waged labour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The latter qualification means that most informal labour (not under capitalist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is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We are particularly influenced here by the work of Kalyan Sanyal.

11. Joan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4), p. 46.

12. In economics thi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NAIRU). Hiring workers when unemployment is at this level is thought to raise wages and eventually cause inflation, thereby setting a floor to how low the unemployment rate should go.

13. For classic statements about the political uses of unemployment, see Micha☒ Kalecki,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Political Quarterly* 14: 4 (1943); Samuel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a Competitive Economy: Walrasian, Neo-Hobbesian, and Marxian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 (1985).

14. This emphasis on secular trends, we would argue, is on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a Marxist understanding of unemployment.

15. The fear of automation taking jobs has a long history, of which the Luddites were one of the earliest examples. More recently this fear was a major issue in the 1960s with discussions about the idea of cybernation and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ith headline-grabbing journalistic commentary, and has re-emerged again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texts include: Ad Hoc Committee, 'The Tripl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24: 3 (1964); Donald Michael, *Cybernation: The Silent Conquest* (Santa Barbara,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1962); Paul Mattick, 'The Economics of Cybernation', *New Politics* 1: 4 (1962); David Noble, *Progress Without People: In Defense of Luddism*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5); Jeremy Rifkin, *The End of Work: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 Putnam, 1997); Martin Ford, *The Lights in the Tunnel: Automation,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of the Future* (U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09);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16. These estimates are for the US and European labour markets, though similar numbers undoubtedly hold globally and, as we argue later, may even be wors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2013, pdf available at oxfordmartin.ox.ac.uk; Jeremy Bowles, 'The Computerisation of European Jobs', *Bruegel* (2014), at bruegel.org; Stuart Elliott, 'Anticipating a Luddite Revival',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0: 3 (2014).

17.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ransl.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90), p. 566–7.

18. Paul Einzi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57), p. 78.

19. Thor Berger and Carl Benedikt Frey, *Technology Shocks and Urban Evolutions: Di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Shift the Fortunes of US Cities?* (Oxford Martin School Working Paper, 2014), p. 6.

20. James Bessen, 'Toil and Technology', *Finance & Development* 52: 1 (2015), p. 17.

21. Evidence already suggests that the global density of bank branches is retreating.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Osborne, *Technology at Work: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Citi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Solutions, 2015), pp. 25–6, pdf available at ir.citi.com.

22. Wassily Leontief, 'National Perspectives: The Definition of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ymposium (1983).

23. There is some evidence for this currently happening, with businesses reporting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skilled workers and rising wage disparities within occupations between the most and least skilled. Bessen, 'Toil and Technology', p. 19.

24. Boyan Jovanovic and Peter L. Rousseau,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05, at nber.org; George Terbough, *The Automation Hysteria: An Appraisal of the Alarmist View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6), pp. 54–5; Aaron Benanav and Endnotes, 'Misery and Debt', in *Endnotes 2: Misery and the Value Form* (London: Endnotes, 2010), p. 31.

25. Barry Eichengreen, *Secular Stagnation: The Long View*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15), p. 5, pdf available at nber.org.

26. Kalyan Sanyal,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New Delhi: Routledge India, 2013), p. 55. Notably, this means that this economic sector is eminently contemporary, rather than being a residue of some pre-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27. Gabriel Wildau, 'China Migration: At the Turning Point', *Financial Times*, 4 May 2015, at ft.com; 'Global Labor Glut Sinking Wages Means U.S. Needs to Get Schooled', *Bloomberg*, 4 May 2015, at bloomberg.com. While Africa has yet to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it is worth emphasising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the post-Soviet states was a one-off surge in the global labour force. The trend from here on out will be a general decline i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mechanism for producing surplus populations.

28. We note here that while the first two mechanisms are integral to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changes in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the third is a logic distinct from just accumulation. The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also change over time (as with, for instance,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to the workforce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Lynda Yanz and David Smith, 'Women as a Reserve Army of Labour: A Critiq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5:1 (1983), p. 104.

29. In other words, these dominations can often be functional for capitalism, even if their function does not explain their genesis.

30. A full 36 million people are considered to be in slavery today: *Global Slavery Index 2014* (Dalkeith, Western Australia: Walk Free Foundation, 2014).

31. Edward E. Baptist,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Silvia Federici, 'Wages Against Housework', in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Oakland, CA: PM Press, 2012).

32. In terms of global unemployment, women have faced the brunt of the crisis in recent years.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he Changing Nature of Job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5), p. 18.

33. For example, black m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particularly affected by the automation and outsourcing of manufacturing. William Julius 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pp. 29–31.

34. Michael McIntyre, 'Race, Surplus Population, and the Marxist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tipode* 43:5 (2011), p. 1500–2.

35. These draw broadly upon the divisions Marx drew between the floating/reserve army, latent and stagnant, but are here offered as an updating of his historical example.

36. Gary Fields, *Working Hard, Working Poor: A Global Journ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6.

37. This is what Kalyan Sanyal describes as 'need economies'. See Sanyal,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38. The area of 'vulnerable employment' now accounts for 48 per cent of global employment –five times higher than pre-crisis levels. This number is also thought to underestimate the amount of vulnerably employed, given its informal, off-the-books nature. ILO,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Risk of a Jobless Recover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4), p. 12; David

Neilson and Thomas Stubbs,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the Neoliberal Era: Theory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 *Capital & Class* 35 (2011), p. 443.

39. In Marx's schema, this can be understood as C-M-C, where commodities are produced and sold on the market in order to receive money to buy goods for subsistence. This differs from pre-capitalist subsistence economies in that goods are not produced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but instead must be mediated through the market. Sanyal,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p. 69–70.

40. Michael Denning, 'Wageless Life', *New Left Review* II/66 (November–December 2010), p. 86; ILO, *G20 Labour Markets: Outlook, Key Challenges and Policy Response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OECD/World Bank, 2014), at ilo.org, p. 8.

41. Marilyn Power, 'From Home Production to Wage Labor: Women as a Reserve Army of Labo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5:1 (1983).

42.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Verso, 2010), p. 280.

43. 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8th ed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at ilo.org.

44. *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 Employee Engagement Insights for Business Leaders Worldwide*, Gallup, 2013, at ihrim.org, p. 27; 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 'The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November 2011; Neilson and Stubbs,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currently estimates that 5.9 per cent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201 million people) are unemployed –but this relies on a very stringent definition of unemployment.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15*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5), at ilo.org, p. 16. If one works for an hour mowing a lawn, makes a few dollars selling homemade wares on a street, or has a doctorate and works in a call centre, the ILO counts this as employment. In other words, part-time workers, informal workers and underemployed workers all count as employed. The ILO definition of unemployment also *improves* when people drop out of the labour force: a smaller workforce means lower unemployment. A more meaningful measure is therefore the level of employment among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ILO estimates that over 40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not employed. ILO,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p. 18. In a similar measure, they estimate that only half the global labour force is in waged or salaried work.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he Changing Nature of Job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5), p. 28. But these measures still overestim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employed, and so other measures have attempted to overcome these deficiencies. Gallup, for instance, defines 'employment' as formal work for thirty hours or more per week –and concludes that 74 per cent of the global labour force fails to meet this definition. *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 Employee Engagement Insights for Business Leaders Worldwide*, Gallup, 2013, pdf available at ihrim. org, p. 27. Another study, based on ILO data on the unemployed, vulnerably employed and economically inactive, estimates the surplus population at 61 per cent of the total working-age population (calculated from data by Neilson and Stubbs,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p. 444). The conclusion to draw from these alternative measures is simple: the global surplus population is massive, and in fact outnumbers the formal working class.

45.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 Constance Farrington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1), Chapter 2; Patricia Connelly, *Last Hired First Fired: Women and the Canadian Work Force* (Toronto: The Women's Press, 1978).

46. Cleaver here uses the term 'Lumpen' to refer to what we have called the 'proletariat' condition. Eldridge Cleaver, 'On Lumpen Ideology', *The Black Scholar*, 4:3 (1972), pp. 9–10.

47. Mattick, 'Economics of Cybernation', p. 19.

48. Benanav and Endnotes, 'Misery and Debt';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London: Verso, 2011), p. 2. Broadly speaking, we can discern two ways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surplus populations has functioned in recent debates. One set of arguments is concerned with the overlapping of particular social groups (for example, black minorities)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surplus population. Another, much smaller, set of arguments ha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claim that the surplus population has a secular trend to grow in size.

49.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798.

50. Richard Duboff, 'Full Employment: The History of a Receding Target', *Politics & Society* 7: 1 (1977), pp. 7–8.

51. While NAIRU is debatable as a measure of full employment, the postwar period saw unemployment typically below NAIRU, and the neoliberal period has seen unemployment consistently above NAIRU. Jared Bernstein and Dean Baker, 'Full Employment: The Recovery's Missing Ingredient', *Washington Post*, 3 November 2014, p. 10; José Nun, 'The End of Work and the "Marginal Mass" Thesi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27: 1 (2000), p. 8;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pp. 46–7; Jeffrey Straussman, 'The "Reserve Army" of Unemployed Revisited', *Society* 14: 3 (1977), p. 42.

52. *Economic Projections of Federal Reserve Board Members and Federal Reserve Bank Presidents, December 2014*, Federal Reserve Board, 2014, pdf available at federal-reserve.gov, p. 1.

53. Claire Cain Miller, 'As Robots Grow Smarter, American Workers Struggle to Keep Up', *New York Times*, 15 December 2014.

5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ivilian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2014, at research. stlouisfed. org; Deepankar Basu, *The Reserve Army of Labour in the Postwar US Economy: Some Stock and Flow Estimates*, Working Pap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12), p. 7.

55. ILO,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p. 17.

56. The job growth rate dropped from 1.7 per cent between 1991 and 2007 to 1.2 per cent between 2007 and 2014.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p. 16;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p. 29.

57. Ibid., p. 20.

58. Worker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of course, have long lived under conditions of precarity. The new concern for precarity is therefore a symptom of the collapse of a model of work peculiar to developed economies in the postwar period.

59. A more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in Standing, *Precariat*, pp. 10–11.

60.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789.

61. Francis Green, Tarek Mostafa, Agnès Parent-Thirion, Greet Vermeylen, Gijs van Houten, Isabella Biletta and Maija Lyly-Yrjanainen, 'Is Job Quality Becoming More Unequal?', *Industrial & Labor Relations Review* 66: 4 (2013), pp. 770–1; Andrew Glyn, *Capitalism Unleashed: Finance, Globalization, and Welf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14.

62. Carrie Gleason and Susan Lambert, *Uncertainty by the Hour*, pp. 1–3, pdf available at opensocietyfoundations.org.

63. While this aspect of precarity has often been emphasised, irregular work still remains a small por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in most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Kim Moody, 'Precarious Work, "Compression" and Class Struggle "Leaps"', *RS21*, 10 February 2015, at rs21.org.uk. 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a quarter of worker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are on temporary contracts or without a contract.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p. 30.

64. *Self-Employed Workers in the UK –2014*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4), pdf available at ons.gov.uk.

65.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Level –Part-Time for Economic Reasons, All Industries'.

66. Official business surveys find that 1.4 million people are working under zero-hours contracts in the UK. See *Analysis of Employee Contracts that Do Not Guarantee a Minimum Number of Hours*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30 April 2014), pdf available at ons.gov.uk.

67. Dean Baker and Jared Bernstein, *Getting Back to Full Employment: A Better Bargain for Working Peopl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13), p. 12.

68. Bernstein and Baker, 'Full Employment'.

69. In a poll of mainstream economic experts, a weighted 43 per cent of respondents agreed that technology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wage stagnation, versus 28 per cent who disagreed. 'Poll Results: Robots', *IGM Forum*, 25 February 2014, at igmchicago.org.

70. ILO, *G20 Labour Markets*, p. 5; *The Slow Recovery of the Labor Market*,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February 2014, at cbo.gov, p. 6; Ciaren Taylor, Andrew Jowett and Michael Hardie, 'An Examination of Falling Real Wages, 2010–2013'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4), at ons.gov.uk.

71. The level of personal savings in America has dropped drastically since the 1970s.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Personal Saving Rate'.

72. 'Share of U.S. Workers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Continues Decline from Recession-Era Peak, Finds Annual CareerBuilder Survey', CareerBuilder, 25 September 2013, at careerbuilder.com; *8 Million People One Paycheque Away from Losing Their Home*, Shelter, 11 April 2013, at england.shelter.org.uk.

73. Saskia Sassen,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4.

74. Carlos Nordt, Ingeborg Warnke, Erich Seifritz and Wolfram Kawohl, 'Modelling Suicide and Unemploymen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Covering 63 Countries, 2000–11', *Lancet*, 2015, p. 5; Justin Wolfers, *Is Business Cycle Volatility Costly? Evidence from Survey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3, at nber.org; Nikolaos Antonakakis and Alan Collins, 'The Impact of Fiscal Austerity on Suicide: On the Empirics of a Modern Greek Trage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2 (July 2014); Karen McVeigh, 'DWP Urged to Publish Inquiries on Benefit Claimant Suicides', *Guardian*, 14 December 2014.

75. Ben Bernanke, 'The Jobless Recove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Outlook Conferenc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6 November 2003, at federalreserve.gov.

76. Olivier Coibon, Yuriy Gorodnichenko and Dmitri Koustas, *Amerisclerosis? The Puzzle of Rising US Unemployment Persistenc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Fall 2013, pdf available at brookings.edu.

77. Natalia Kolesnikova and Yang Liu, 'Jobless Recoveri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Regional Economist*, April 2011, at stlouisfed.org.

78. *Slow Recovery of the Labor Market*, p. 2;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ed, Usually Work Full Time'.

79. ILO, *G20 Labour Markets*, p. 4.

80.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one reason for this connection is that, in the wake of a recession, firms are risk-averse in relation to hiring for occupations that are automatable. Nir Jaimovich and Henry E. Siu, *The Trend Is the Cycle: Job Polarization and Jobless Recoveries*,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at nber.org, p. 29.

81.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outine and non-routine better explains the data than either a division between low and high levels of education, or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jobs. Ibid., pp. 3, 16–19.

82.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 full 92 per cent of the job losses in automatable mid-skill positions have occurred in the twelve months from the onset of a recession. Ibid., p. 2.

83. In previous recessions, the routine jobs have never returned. Ibid., p. 14.

84. ILO,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pp. 11–12;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f Total Unemployed, Percent Unemployed 27 Weeks and Over',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1 January 1948; Eurostat, 'Long-Term

Unemployment Rate', *Eurostat*, 2015, at ec.europa.eu.

85. Alan Krueger, Judd Cramer and David Cho, 'Are the Long-Term Unemployed on the Margins of the Labor Marke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14.

86. Loïc Wacquant, 'The Rise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Notes on Its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Acta Sociologica* 39: 2 (1996), p. 125; Richard Florida, Zara Matheson, Patrick Adler and Taylor Brydges, *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2014, at martinprosperity.org.

87. William Julius 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p. 15.

88. Loïc Wacquant, 'Class, Race and Hyperincarceration in Revanchist America',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8: 3 (2014), p. 46.

89.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 191.

90. 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New York: New Press, 2012), p. 218.

91. The number of black males working in manufacturing was nearly cut in half between 1973 and 1987. Wil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pp. 29–31.

92. Ibid., p. 42.

93. Ibid., p. 19.

94. Wacquant, 'Rise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p. 127.

95. While the siz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s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measure, by all accounts it form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For an overview of methods to measure the global shadow economy, see Friedrich Schneider and Andreas Buehn, *Estimating the Size of the Shadow Economy: Methods, Problems, and Open Questions* (CESifo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448, 2013), pdf available at papers.ssrn.com. For a more detailed,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one urban informal economy, see: Sudhir Alladi Venkatesh, *Off the Books: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of the Urban P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6. The United Nations suggests that two-fifths of worker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re in the informal sector, while other research notes a significant growth in this proportion between 1985 and 2007.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6), p. 176; Friedrich Schneider, *Outside the State: The Shadow Economy and the Shadow Economy Labour Force*, Working Paper, 2014, pdf available at econ.jku.at, p. 20.

97. UN-Habitat, *The Challenge of Slums: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2003* (Nairobi: UN-Habitat, 2003), at mirror.unhabitat.org, p. 46.

9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2001), p. 41.

99. Jan Breman, 'Introduction: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the Setting of Asia', in *Outcast Labour in Asia: Circulation and Informalization of the Workforce at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8–9; Nicholas Kaldor,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haca, NY: New York St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1967).

100. Jan Breman, 'A Bogus Concept?', *New Left Review* II/84 (November–December 2013), p. 137.

101. Sukti Dasgupta and Ajit Singh, *Manufacturing, Services an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Kaldorian Analysis*,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2006, at ideas.repec.org, p. 6; Breman, 'Introduction', p. 2; Fields, *Working Hard, Working Poor*, p. 58; Davis, *Planet of Slums*, p. 15.

102. Davis, *Planet of Slums*, p. 175; Breman, 'Introduction', pp. 3–8;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We Created Chávez: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9.

103. Sassen, *Expulsions*, Chapter 2.

104. Sanyal,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 69.

105. Davis, *Planet of Slums*, pp. 181–2.

106. Rather than a 30–40 per cent manufacturing share of total employment, the numbers are closer to 15–20 per cent, and manufacturing now begins to decline as a share of GDP at per capita levels of around $3,000, rather than $10,000. Dani Rodrik, 'The Perils of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Syndicate*, 11 October 2013, at project-syndicate.org, p. 5.

107. Over 30 million manufacturing jobs have been lost since 1996. Erik Brynjolfsson, Andrew McAfee and Michael Spence,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August 2014.

108. Manfred Elfstrom and Sarosh Kuruvilla, 'The Changing Nature of Labor Unrest in China', *ILR Review* 67: 2 (2014)

109. Real wages rose by 300 per cent between 2000 and 2010. ILO, *Global Wage Report 2012/13: Wages and Equitable Growth*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pdf available at ilo.org, p. 20.

110. ILO,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p. 29.

111.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World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2014* (Frankfur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2014), pdf available at worldrobotics.org, p. 19; Lee Chyen Yee and Clare Jim, 'Foxconn to Rely More on Robots; Could Use 1 Million in 3 Years', *Reuters*, 1 August 2011; 'Guangzhou Spurs Robot Use amid Rising Labor Costs', *China Daily*, 16 April 2014, at chinadaily.com.cn; Angelo Young, 'Nike Unloads Contract Factory Workers, Showing How Automation Is Costing Jobs of Vulnerable Emerging Market Laborer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20 May 2014.

112. *Majority of Large Manufacturers Are Now Planning or Considering 'Reshoring' from China to the US*,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24 September 2013, at bcg.com; Stephanie Clifford, 'US Textile Plants Return, with Floors Largely Empty of People', *New*

York Times, 19 September 2013.

113. Dani Rodrik,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BREAD Working Paper No. 439, Bureau for Research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2015, at ipl.econ.duke.edu, p. 2.

114. Fiona Tregenna,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industrialization*,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2011, at econstor.eu, p. 11.

115. Out of a labour force of 481 million, approximately 1 million work in this sector. Fields, *Working Hard, Working Poor*, p. 51.

116. Frey and Osborne, *Technology at Work*, p. 62; Brynjolfsson and McAfee, *Second Machine Age*, pp. 184–5.

117.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344–5.

118. This is why, despite the massive size of China's proletarian population, this surplus labour supply is becoming a problem as real wages surge upwards.

119. Göran Therborn, *Why Some People Are More Unemployed than Others: The Strange Paradox of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London: Verso, 1991), pp. 23–4.

120.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1*, p. 280.

121. Th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to bring this about is often missed by commentators who are sanguine abou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automation. See, for example, George Terbough, *The Automation Hysteria: An Appraisal of the Alarmist View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6), Chapter 5.

122. Lewis Corey,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Covici Friede, 1934), p. 272.

123. Harry Braverman, 'Automation: Promise and Menace', *American Socialist*, October 1955, at marxists.org; Benanav and Endnotes, 'Misery and Debt', p. 36; Duboff, 'Full Employment', p. 1.

124. 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Work Without End: Abandoning Shorter Hours for the Right to W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59–60.

125. Pierre Dardot and Christian Laval, *The New Way of the World: On Neoliberal Society*, transl. Gregory Elliot (London: Verso, 2014), p. 67.

126. ILO, 'Trends',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p. 23.

127. Peter Cappelli, 'The Path Not Studied: Schools of Dreams More Education Is Not an Economic Elixir',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7 November 2013, at issues.org; Stanley Aronowitz, Dawn Esposito, William DiFazio and Margaret Yard, 'The Post-Work Manifesto', in Stanley Aronowitz and Jonathan Cutler, eds, *Post-Work: The Wages of Cyber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48; Stefan Collini, *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 (London: Penguin, 2012); Andrew McGettigan, *The Great University Gamble: Money, Markets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3).

128. Standing, *Precariat*, p. 45.

129. Notably, even Paul Krugman and Lawrence Summers are doubtful that skills training will be able to solve the upcoming problems. Paul Krugman, 'Sympathy for the Luddites', *New York Times*, 13 June 2013; Lawrence Summers, 'Roundtable: The Future of Jobs', presented at The Future of Work in the Age of the Machine, Hamilton Project, Washington, DC, 19 February 2015, at hamiltonproject.org.

130. Glyn, *Capitalism Unleashed*, pp. 27–31.

131. Harvey,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Volume 1*, pp. 284–5.

132. PMI surveys suggest the annual growth rate has been 2 per cent, which is far below what has been standard for global GDP growth. (Chris Williamson, 'January's PMI Surveys Signal First Global Growth Upturn for Six Months', *Markit*, 4 February 2015, at markit.com.) Other studies find that growth is higher than this, but potential output has been declining in developed economies since before the crisis, and estimates of global potential output have continually been revised down after the crisi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5: Uneven Growth: Short- and Long-Term Factor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5), pp. 69–71, pdf available at imf.org.

133. We do not pretend to adjudicate between the competing explanations here, but merely point to the growing consensus about a new era of lower growth: Andrew Kliman, 'What Lies Ahead: Accelerating Growth or Secular Stagnation?'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4 January 2014, at e-ir.info; Robert Gordon,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ugust 2012, at nber.org; Lawrence Summers, 'US Economic Prospects: Secular Stagnation, Hysteresis,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Business Economics* 49: 2 (2014); Tyler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New York: Dutton, 2011); Coen Teulings and Richard Baldwin, eds,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London: CEPR, 2014).

134. Cowen, *Great Stagnation*, pp. 47–8.

135. Thor Berger and Carl Benedikt Frey, *Industrial Renewal in the 21st Century: Evidence from US Cities?* (Oxford Martin Schoo Working Paper, 2014).

136. Calculated based on data from: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able 1. Private Sector Gross Jobs Gains and Losses by Establishment Ag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able 5. Number of Private Sector Establishments by Age'.

137. This is the position of a variety of centre-left economists. See Baker and Bernstein, *Getting Back to Full Employment*; Pavlina Tcherneva, *Beyond Full Employment: The Employer of Last Resort as an Institution for Change*, Annandale-on-Hudson: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September 2012, pdf available at levyinstitute.org.

138. Denning, 'Wageless Life', pp. 84–6.

139. Aaron Bastani, 'Weaponising Workfare', *openDemocracy*, 22 March 2013, at opendemocracy.net; Joe Davidson, 'Workfare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solidated Surplus Population', *Spectre* 1 (2013), at spectrecambridge. wordpress. com; Marta Russell, 'The New Reserve Army of Labo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3: 2 (2001).

140. Aufheben, 'Editorial: The "New" Workfare Schemes in Historical and Class Context', *Aufheben* 21 (2012), pdf available at libcom.org, p. 4.

141. 'In 1820 Britain had a population of 12 million, while between 1820 and 1915 emigration was 16 million. Put differently, more than half the increase in British population emigrated each year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otal emigration from Europe as a whole to the "new world" (of "temperate regions of white settlement") over this period was 50 million.' Foster, McChesney and Jonna, 'The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Davis, *Planet of Slums*, p. 183.

142. For example, in the 1970s and 1980s Switzerland maintained low unemployment despite slow growth by repatriating Italian immigrants. Therborn, *Why Some People Are More Unemployed than Others*, p. 28.

143. Tara Brian and Frank Laczko, eds, *Fatal Journeys: Tracking Lives Lost During Migr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4), pdf available at publications.iom.int, p. 12.

144. Dennis Arnold and John Pickles, 'Global Work, Surplus Labor, and the Precarious Economies of the Border', *Antipode* 43: 5 (2011).

145. Between 1998 and 2013, prison populations have increased from 25 to 30 per cent, while the overall world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by 20 per cent. Roy Walmsley, *World Prison Population List* (Lond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Prison Studies, 2013), 10th edn, pdf available at prisonstudies.org, p. 1.

146. Molly Moore, 'In France, Prisons Filled with Muslims', *Washington Post*, 29 April 2008; Scott Gilmore, 'Canada's Racism Problem? It's Even Worse than America's', *Macleans*, 22 January 2015, at macleans.ca; Jaime Amparo-Alves, 'Living in the Necropolis: Homo Sacer and the Black Inhuman Condition in Sao Paulo/Brazil', presented at Critical Ethnic Studies and the Future of Genoci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 March 2011, at repositories.lib.utexas.edu.

147. Alexander, *New Jim Crow*, p. 13.

148. George S. Rigakos and Aysegul Ergul, 'Policing the Industrial Reserve Army: An International Study',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56: 4 (2011), p. 355.

149. Angela Y. Davis, 'Deepening the Debate over Mass Incarceratio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8: 3 (2014), p. 16.

150. It suffices to point to two facts here: that the spike in prison construction came during a period of declining crime rates, and that if the crime rate is held constant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is six times more punitive now. Alexander, *New Jim Crow*, p. 218; Wacquant, 'Class, Race and Hyperincarceration', p. 45.

151. Wacquant, 'Class, Race and Hyperincarceration', p. 42.

152. In California, 80 per cent of defendants required representation by state-appointed lawyers. Ruth Wilson Gilmore, 'Globalisation and US Prison Growth: From Military Keynesianism to Post-Keynesian Militarism', *Race & Class* 40: 2–3 (1998–99), p. 172.

153. Wacquant, 'Class, Race and Hyperincarceration', p. 44.

154. Derek Neal and Armin Rick, *The Prison Boom and the Lack of Black Progress After Smith and Welch*,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4, at nber.org, p. 2.

155. Wacquant, 'Class, Race and Hyperincarceration', p. 43.

156. Wacquant, 'From Slavery to Mass Incarceration: Rethinking the "Race" Question 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II/13 (January– February 2002), p. 42.

157. Ibid., p. 53; Alexander, *New Jim Crow*, p. 219.

158. Wacquant, 'From Slavery to Mass Incarceration', pp. 57–8; Rocamadur, 'The Feral Underclass Hits the Streets: On the English Riots and Other Ordeals', *Sic* 2 (2014), at communisation.net, p. 104 n. 10.

159. Jeremy Travis, Bruce Western and Steve Redburn, *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4), p. 258; Neal and Rick, *Prison Boom and the Lack of Black Progress*, p. 34.

160. The mechanics of getting un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o adapt to new goals must necessarily be worked out in practice and in the context of local conditions. Union habits and structures differ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nd from sector to sector, making tailored responses necessary.

161. For example, recent fast food strikes brought forth numerous predictions that raising the minimum wage would lead to automation. Given how deplorable these jobs are, we consider their automation an unambiguous positive. Steven Greenhouse, '$15 Wage in Fast Food Stirs Debate on Effects', *New York Times*, 4 December 2013.

162. Paul Lafargue, 'The Right to Be Lazy', in Bernard Marszalek, ed., *The Right to Be Lazy: Essays by Paul Lafargue* (Oakland: AK Press, 2011), p. 45.

163. For thoughts on how this might practically be achieved, see Angela Y. Davis, *Are Prisons Obsolet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03), Chapter 6.

6. 工作后的想象

1. Both explicitly and implicitly, this chapter owes much to Kathi Weeks's work. See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Communiqué from an Absent Future', *We Want Everything*, 24 September 2009, at wewanteverything.wordpress.com.

3. Ben Trott, 'Walk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urbulence* 1 (2007), at turbulence.org.uk; Marco Desiriis and Jodi Dean, 'A Movement Without Demands?' *Possible Futures*, 3 January 2012, at possible-futures.org; Bertie Russell, 'Demanding the Future? What a Demand Can Do',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Protest*, 2014, at joaap.org.

4.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p. 218–24, 175.

5. This is one aspect that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concept of 'transitional demands' articulated by Trotsky. See Trott, 'Walk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Leon Trotsky, *The Transitional Program: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London: Bolshevik Publications, 1999).

6. On the criteria of desirability, viability and achievability, see 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2010), pp. 20–5.

7. For an example of the former, see the Stakhanovite movement, or Lenin's comments on Taylorist management methods: 'The Russian is a bad worker compared with people in advanced countries ⋯We must organise in Russia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the Taylor system and systematically try it out and adapt it to our own ends.' Vladimir Lenin,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1918,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at marxists.org; Lewis H. 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For a critique of the idea of freedom without abundance, see: '[T]hi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absolutely necessary practical premise, because without it privation, *want*, is merely made general'.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Prometheus, 1976), p. 54.

8. While we do not have the space to discuss them here, there are important ethical questions surrounding machines and work –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ch issues are bound to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oming decades. For more, see Thomas Metzinger, *The Ego Tunnel: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and the Myth of the Self*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Illah Reza Nourbakhsh, *Robot Futur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9. While ending work is a common theme of the left, the demand for full automation surprisingly finds few explicit expressions. See, for example, Eldridge Cleaver, 'On Lumpen Ideology', *The Black Scholar* 4: 3 (1972); Valerie Solanas, *S.C.U.M. Manifesto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en)* (London: Verso, 2004), p. 3; J. Jesse Ramírez, 'Marcuse Among the Technocrats: America, Automation, and Postcapitalist Utopias, 1900–1941', *American Studies* 57: 1 (2012). More recently, Aaron Bastani of NovaraMedia has made calls for a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and members of the Plan C collective have similarly called for 'luxury communism' –discussions which this book attempts to contribute to.

10.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al labour is the historical task and justification of capital. This is just the way in which it unconsciously creates the material requirements of a higher mode of production.'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p. 259.

11. Marilyn Fischer, 'Tensions from Technology in Marx's Communist Society',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6: 2 (1982), pp. 125–6;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17 September 2013, pdf available at oxfordmartin.ox.ac.uk, p. 8;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ransl.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90), Chapters 13–15.

12. Karl Marx,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 Martin Nicolaus (Middlesex: Penguin, 1973), p. 693.

13.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517.

14. Maarten Goos, *How the World of Work Is Changing: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pdf available at ilo.org, pp. 10–12; Frey and Osborne, *Future of Employment*, p. 10.

15. Bruno Latour, 'How to Write "The Prince" for Machines as Well as Machinations', in Brian Elliot, ed.,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

16. Fiona Tregenna,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industrialization*,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2011, at econstor.eu, p. 7.

17. Colin Gill, *Work,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Techn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85), p. 95.

18. Tessa Morris-Suzuki, 'Robots and Capitalism', in Jim Davis, Thomas Hirschl and Michael Stack, ed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1997), p. 15; *World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2014*, Frankfur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2014, pdf available at worldrobotics.org, p. 15.

19. Globally, 45 per cent of workers are involved in services, 32 per cent in agriculture and 23 per cent in manufacturing, with over half of recent job growth coming from the service sector. ILO,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2014: Risk of a Jobless Recovery?*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4), p. 23.

20. Frey and Osborne, *Future of Employment*, p. 11.

21. This does not include the numerous robots sold for entertainment, domestic and personal services. *World Robotics: Service*

Robots 2014, Frankfur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 2014, pdf available at worldrobotics.org, p. 20.

22. Routine jobs have declined from 60 per cent to 40 per cent of total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eriod. David Autor, Frank Levy and Richard 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4 (2003), p. 1,296; Stefania Albanesi, Victoria Gregory, Christina Patterson and Ay□egül □ahin, 'Is Job Polarization Holding Back the Job Market?' *Liberty Street Economics*, 27 March 2013, at 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

23. Guido Matias Cortes, Nir Jaimovich, Christopher J. Nekarda and Henry E. Siu, *The Micro and Macro of Disappearing Routine Jobs: A Flows Approach*,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ly 2014, at nber.org.

24. David Autor, *Polanyi's Paradox and the Shape of Employment Growth*,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eptember 2014, at nber.org; Maarten Goos, Alan Manning and Anna Salomons, 'Job Polarization in Europ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 2 (2009).

25. Morris-Suzuki, 'Robots and Capitalism', p. 17.

26. The significance of 3D printing (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lies first in its generic capacity to create complexity with a simple technology –anything from houses to jet engines to living organs can be created in this way. Second, its ability to drastically reduce the costs of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both material and labour) portend a new era in the building of basic infrastructure and housing. Finally, its flexibility is a significant advance, overcoming the traditional costs associated with revamping fixed investment for new production lines.

27. Businesses will easily be the quickest adopters of this technology, since it can achieve significant cost savings. Governments and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the automated overground railways already in London) are likely to be the second wave of adopters. Eventually, with legal and insurance changes, consumers will be forced into adopting this technology.

28. Isaac Arnsdorf, 'Rolls-Royce Drone Ships Challenge $375 Billion Industry: Freight', *Bloomberg*, 25 February 2014, at bloomberg.com; BBC News, 'Amazon Testing Drones for Deliveries', BBC News, 2 December 2013; Danielle Kucera, 'Amazon Acquires Kiva Systems in Second-Biggest Takeover', *Bloomberg*, 19 March 2012, at bloomberg.com; Vicky Validakis, 'Rio's Driverless Trucks Move 100 Million Tonnes', *Mining Australia*, 24 April 2013, at miningaustralia.com.au; Elise Hu, 'The Fast-Food Restaurants that Require Few Human Workers', NPR.org, 29 August 2013, at npr.org; Christopher Steiner, *Automate This: How Algorithms Came to Rule Our World* (New York: Portfolio/Penguin, 2012); Mark Levinson,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Daniel Beunza, Donald MacKenzie, Yuval Millo and Juan Pablo Pardo-Guerra, *Impersonal Efficiency and the Dangers of a Fully Automated Securities Exchange* (London: Foresight, 2011).

29. For a slightly outdated but still useful summary of various automation processes, see Ramin Ramtin, *Capitalism and Automation: Revolution in Technology and Capitalist Breakdown* (London: Pluto, 1991), Chapter 4.

30. Erik Brynjolfsson and Andrew McAfee,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Chapters 2–4.

31. Ibid., Chapter 1; Frey and Osborne, *Future of Employment*, p. 44.

32. Paul Lippe and Daniel Martin Katz, '10 Predictions About How IBM's Watson Will Impact the Legal Profession', *ABA Journal*, 2 October 2014, at abajournal.com.

33. Brynjolfsson and McAfee, *Second Machine Age*, Chapter 2.

34. Dave Cliff, Dan Brown and Philip Treleaven, *Technology Trend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 2020 Vision* (London: Foresight, 2011), p. 36. The exact timeline of autom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depends on the product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an outline of the uneven adoption of trading automation, see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Osborne, *Technology at Work: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Citi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Solutions, 2015), pp. 26–7, pdf available at ir.citi.com

35. Vauhini Vara, 'The Lowe's Robot and the Future of Service Work', *New Yorker*, 29 October 2014.

36. Frey and Osborne, *Future of Employment*, p. 19.

37. Ibid., p. 42.

38. In an unexpected revival of an old Marxist theory, two recent models have suggested that automation will lead to the immiseration of workers: Jeffrey Sachs, Seth Benzell and Guillermo LaGarda, *Robots: Curse or Blessing? A Basic Framework*,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2015, at nber.org; Seth Benzell, Laurence Kotlikoff, Guillermo LaGarda and Jeffrey Sachs, *Robots Are Us: Some Economics of Human Replacement*,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ebruary 2015, at nber.org.

39. Lawrence Summers, 'Roundtable: The Future of Jobs', presented at The Future of Work in the Age of the Machine, Hamilton Project, Washington, DC, 19 February 2015, at hamiltonproject.org. The ILO also argues that today's sluggish global job growth is related largely to sluggish economic growth, but they also note that productivity growth has recovered quicker than employment growth. 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he Changing Nature of Job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5), pp. 19, 23.

40.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nnual Report, 2013/2014*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14), at bis.org, pp. 58–60; Robert Gordon, 'US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Slowdown Has Returned After a Temporary Revival',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 25 (2013); David Autor, 'Roundtable: The Future of Jobs', presented at the The Future of Work in the Age of the Machine, Hamilton Project, Washington, DC, 19 February 2015, at hamiltonproject.org.

41. Susantu Basu and John Ferna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s a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U.S. Industry Data* (San Francisc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06), p. 17, pdf available at frbsf.org.

42. However, emerging research suggests industrial robots have already contributed around 16 per cent of recent labour productivity growth. Georg Graetz and Guy Michaels, *Robots at Work*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2015), p. 21, pdf available at events.crei.cat.

43. Frey and Osborne, *Technology at Work*, p. 40.

44. Frey and Osborne, *Future of Employment*, p. 38; Stuart Elliott, 'Anticipating a Luddite Revival',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0: 3 (2014), at issues.org.

45. The standard Marxist response to full automation is to point to its 'objective' limits by arguing that capitalism will never eliminate its source of surplus value (i.e. labour). But this argument confuses a systemic outcome with an individual incentive, an internal barrier with an absolute limit, and a political struggle with a theoretical tension. In the first place, the individual imperatives are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technology in order to gain extra surplus value relative to other capitalists. The systemic outcome of this is detrimental for all capitalists (less surplus value being produced), but still remains beneficial for individual capitalists, and will therefore continue.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limit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re mistakenly taken to be the limits of any possible change. If capitalism cannot survive with full automation, it is deemed that full automation must not be possible. Such a position makes capitalism the end-point of history, rejecting in advance any postcapitalist possibility. Finally, the theoretically derived tension between increased productivity, rising organic composition and a reduced rate of profit is taken to present a situation that capital will never allow to occur because of its systemic effects. Missing from this account is a political movement that would struggle to push capitalism beyond itself. In other words, the argument that full automation will never occur simply posits that political struggle is ineffective. In the end, such a line of reasoning gives up on every critical account of capitalism, and accepts it as the final stage of history. As Ramin Ramtin bluntly puts it, 'The fact that [full automation] would result in explosive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does not make it impossible' (Ramtin, *Capitalism and Automation*, p. 103). The simple wager of the demand for full automation is that wealth can be produced in non-capitalist ways. For representative critiques of full automation, see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8), p. 205; George Caffentzis, 'The End of Work or the Renaissance of Slavery? A Critique of Rifkin and Negri', in *In Letters of Blood and Fire* (Oakland, CA: PM Press, 2012), p. 78.

46.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increasingly, tacit knowledge tasks are being automated through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machine learning, with more recent innovations eliminating even the need for a controlled environment. Frey and Osborne, *Future of Employment*, p. 27; Autor, *Polanyi's Paradox*; Sarah Yang, 'New "Deep Learning" Technique Enables Robot Mastery of Skills via Trial and Error', *Phys.org*, 21 May 2015, at phys.org.

47. As Marx notes, because of this 'the field of application for machinery would therefore be entirely different in a communist society from what it is in bourgeois society.' Marx, *Capital, Volume I*, p. 515 n. 33.

48. Silvia Federici, 'Permanent Reproductive Crisis: An Interview', *Mute*, 7 March 2013, at metamute.org.

49. For an excellent overview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alternative domestic arrangements, see Dolores Hayden,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urhoods and Citi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50.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se that, historically, domestic labour-saving devices have tended to place greater demands on household maintenance, rather than allowing more free time. Ruth Schwartz Cowan,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Leopoldina Fortunati,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Housework, Prostitution, Labor and Capital* (Brooklyn: Autonomedia, 1995), p. 145; Silvia Federici,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Unfinished Feminist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Oakland, CA: PM Press, 2012), pp. 106–7.

51. We mean 'productivity' here in the strictly Marxist sense, and not as a suggestion that domestic work is idle.

52. 'Robot Capable of Sorting Through and Folding Piles of Rumpled Clothes' *Phys.org*, 16 March 2015, at phys.org.

53. Thanks to Helen Hester for emphasizing this point to us.

54.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3), pp. 180–1.

55. E.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38: 1 (1967), p. 85; Stanley Aronowitz, Dawn Esposito, William DiFazio and Margaret Yard, 'The Post-Work Manifesto', in Stanley Aronowitz and Jonathan Cutler, eds, *Post-Work: The Wages of Cyber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59–60; David Graeber, 'Revolution at the Level of Common Sense', in Federico Campagna and Emanuele Campiglio, eds,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A Radical Collective Manifesto* (London: Pluto, 2012), p. 171.

56. 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Work Without End: Abandoning Shorter Hours for the Right to Work*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

57. Roland Paulsen, 'Non-Work at Work: Resistance or What?', *Organization*, 2013, at sagepub.com.

58. Witold Rybczynski, *Waiting for the Weekend* (New York: Penguin, 1991), pp. 115–17;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 76.

59. Rybczynski, *Waiting for the Weekend*, p. 133.

60. Hunnicutt, *Work Without End*, p. 1.

61. Ibid., p. 155.

62. Ibid., pp. 147–9.

63. Paul Lafargue, 'The Right to Be Lazy', in Bernard Marszalek, ed., *The Right to Be Lazy: Essays by Paul Lafargue* (Oakland: AK Press, 2011), p. 34.

64.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Hunnicutt, *Work Without End*, p. 155.

65. Marx, *Capital, Volume III*, p. 820.

66. Hunnicutt, *Work Without End*, Chapter 7.

67. A handful of EU countries –most notably France –have reduced the working week to as little as thirty-five hours, but the overall trend has been to maintain a forty-hour working week. The 1970s also saw some sectors strike explicitly in support of a shorter working week. Ibid., p. 198; Anders Hayden, 'Patterns and Purpose of Work-Time Reduction: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in Anna Coote and Jane Franklin, eds, *Time on Our Side: Why We All Need a Shorter Working Week*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13), p. 128; Aronowitz et al., 'Post-Work Manifesto', p. 63; Chris Harman, *Is a Machine After Your Job? New Technology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London, 1979), at marxists.org, Part 8.

68. Hunnicutt, *Work Without End*, p. 2.

69. Notably, this appears to have reach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US. Despite the addition of 40 million new workers, overall labour hours remained the same between 1998 and 2013. Shawn Sprague, 'What Can Labor Productivity Tell Us About the U.S. Economy?', *Beyond the Numbers: Productivity* 3: 12 (2014), p. 1.

70. Jonathan Crary, *24/7: Terminal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London: Verso, 2013).

71. Lydia Saad, 'The "40-Hour" Workweek Is Actually Longer –by Seven Hours', *Gallup*, 29 August 2014, at gallup.com.

72. Valerie Bryson, 'Time, Care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oote and Franklin, *Time on Our Side*, p. 56.

73. Craig Lambert, 'The Second Job You Don't Know You Have', *Politico*, 20 May 2015, at politico.eu.

74.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pp. 120–7.

75. The manifold arguments for shorter working weeks have been repeated throughout history: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enefits, the response to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the improved productivity it could bring about, and the better bargaining position it would generate for labour. These arguments were as dominant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s they are now.

76. David Rosnick and Mark Weisbrot, *Are Shorter Work Hour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 Comparison of US and European Energy Consumptio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December 2006, pdf available at cepr.net, p. 7; Anders Hayden and John M. Shandra, 'Hours of Work an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Nation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Local Environment* 14: 6 (2009).

77. Juliet Schor, 'The Triple Dividend', in Coote and Franklin, *Time on Our Side*, pp. 9–10.

78. Denis Campbell, 'UK Needs Four-Day Week to Combat Stress, Says Top Doctor', *Guardian*, 1 July 2014.

79. Ibid., pp. 20–1.

80. Mondli Hlatshwayo, 'NUMSA and Solidarity's Responses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at the ArcelorMittal Vanderbijlpark Plant: Unions Caught on the Back Foot', *Global Labour Journal* 5: 3 (2014); Ramtin, *Capitalism and Automation*, p. 132.

81. This was a position floated by the TUC in the UK during the 1970s, and which achieved some success with metalworkers in West Germany. Gill, *Work,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Technology*, pp. 171–2.

82. This was what occurred in the 1996 French truck drivers' strike. Alan Riding, 'French Trucker Strike Ends with Indirect Defeat for 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30 November 1996.

83. André Gorz,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transl. Malcolm Imri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5), p. 46.

84. Anna Coote, Jane Franklin and Andrew Simms, *21 Hours*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10), at neweconomics.org; Tom Hodgkinson, 'Campaigners Call for 30-Hour Working Week to Allow for Healthier, Fairer Society –and More Time for Fun', *Independent*, 24 April 2014.

85. Jo Littler, Nina Power and Precarious Workers Brigade, 'Life After Work', *New Left Project*, 20 May 2014, at newleftproject.org.

86. Will Dahlgreen, 'Introduce a Four Day Week, Say Public', *YouGov*, 16 April 2014, at yougov.co.uk.

87. Schor, 'Triple Dividend', p. 8.

88. Anna Coote, 'Introduction: A New Economics of Work and Time', in Coote and Franklin, *Time on Our Side*, p. xxi; Hayden, 'Patterns and Purpose of Work-Time Reduction'.

89. The above subheading is from Sleaford Mods' song of the same name.

90. Paul Mattick, 'The Economics of Cybernation', *New Politics* 1: 4 (1962), p. 30.

91. The idea has also been called a guaranteed income, a social dividend, a citizen's income and a negative income tax. Each of these invokes a slightly different variation. We prefer the term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cause it does not immediately limit who can receive the income (as does the idea of a 'citizen's income'), and it does not rely on an income ceiling (as does a 'negative income tax').

92. UBI has been advocated by numerous thinkers. See, among many other sources, Thomas Paine, 'Agrarian Justice', in *Rights of*

Guaranteed Income: Next Step in Economic Evolu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6); Martin Luther King,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Boston, MA: Beacon, 2010);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Edinburgh: AK Press, 200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93. Walter Van Trier, 'Who Framed "Social Dividend"?', presented at the First USBIG Conference, CUNY, New York, 8 March 2002, at econpapers.repec.org, p. 29.

94. Lynn Chancer, 'Benefitting from Pragmatic Vision, Part I: The Case for Guaranteed Income in Principle', in Aronowitz and Cutler, *Post-Work*, p. 86.

95. Evelyn Forget,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Using Health Administration Data to Revisit Outcomes of a Canadian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Field Experiment*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2011); Derek Hum and Wayne Simpson, 'A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From Mincome to the Millennium', *Policy Options/Options Politique*, February 2001.

96. Chancer, 'Benefitting from Pragmatic Vision, Part I', p. 86.

97. Specific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included Nixon's Family Assistance Plan and Carter's Better Jobs and Income Program, neither of which was passed. In Australia, a guaranteed income was also recommended by the Poverty Commission in 1973, but support for it evaporated after elections brought in a new government. Ibid., pp. 87–9; Barry Jones, *Sleepers Wake!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Work*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04–5.

98. An indispensable resource for the story behind this rise and fall in a basic income policy, along with an essential guide to how cultural framing affects the viability of the policy, is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99. Daniel Raventós, *Basic Income: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Freedom*, transl. Julie Wark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 12.

100. Paul Krugman, 'Sympathy for the Luddites', *New York Times*, 13 June 2013; Martin Wolf, 'Enslave the Robots and Free the Poor', *Financial Times*, 11 February 2014.

101. More specifically, the Green Party of England and Wales has included it in its manifesto; the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has put the idea on their agenda, and its leader pushed for it in 2001; in Canada, the Standing Senate Committee on Social Affairs recommended it as a way to deal with poverty; and the Swiss will be voting in a referendum on the idea. Denis Balibouse, 'Swiss to Vote on 2,500 Franc Basic Income for Every Adult', *Reuters*, 4 October 2013; Hum and Simpson, 'A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Rigmar Osterkamp, 'The Basic Income Grant Pilot Project in Namibia: A Critical Assessment', *Basic Income Studies* 8: 1 (2013); Davala et al., *Basic Income*; Forget,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p. 2.

102. Davala et al., *Basic Income*; Barbara Jacobson, 'Basic Income Is a Human Right! A Report on the Demonstration in Berlin', *Basic Income UK*, 29 September 2013, at basicincome.org.uk; Alfredo Mazzamauro, '"Only One Big Project": Italy's Burgeoning Social Movements', *ROAR Magazine*, 20 January 2014. The 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 which has been campaigning for a UBI since 1986.

103. This is a design choice, however –as the conservative proposal for a UBI (or the functionally similar negative income tax) often invokes means-testing. See, for example, Lewis Meriam, *Relief and Social Secur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46);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04. A UBI programme would ideally involve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Programmes that provide services must be kept and expanded –for example, healthcare, childcare, housing, public transport and internet access. All of these should be immediate goals of the left, not only for their inherent good but also because expanding public services is necessary for reducing overall energy consumption. Alyssa Battistoni, 'Alive in the Sunshine', *Jacobin* 13 (2014), at jacobinmag.com;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p. 4.

105. Forget, *The Town with No Poverty*; Hum and Simpson, 'A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Chancer, 'Benefitting from Pragmatic Vision, Part I', pp. 99–109.

106. The rise of UBI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as largely a result of this capacity to generate support across political divisions. Steensland,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p. 18–19.

107.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p. 218.

108. Cutler and Aronowitz, 'Quitting Time', p. 8.

109. Micha☒ Kalecki,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Political Quarterly* 14: 4 (1943).

110. The influential Holmes and Rahe Stress Scale found the loss of a job to be one of the most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 adult can face. Richard H. Rahe and Ransom J. Arthur, 'Life Change and Illness Studies: Past History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Human Stress* 4: 1 (1978).

111. A basic income has been a centrepiece proposal of the Japanese Blue Grass Collective, a group of disability activists who have been mobilizing for the idea since the 1970s. Toru Yamamori, 'Una Sola Moltitudine: Struggles for Basic Income and the Common Logic that Emerged from Italy, the UK, and Japan', presented at Immaterial Labour, Multitude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9 April 2006, pp. 9–12, pdf available at academia.edu.

112.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Cambridge: Semiotext(e), 2004), pp. 98–9.

113. Marx and Engels, *German Ideology*, p. 53.

114. Robert J. Van Der Veen and Philippe Van Parij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ety* 15: 5 (1986), pp. 645–6.

115.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 230.

116. Ailsa Mckay and Jo Vanevery, ‘Gender, Family, and Income Maintenance: A Feminist Case for Citizens Basic Income’,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and Society* 7: 2 (2000), p. 281; Gorz, *Paths to Paradise*, p. 42.

117. Notably, this also fundamentally distinguishes the position here from a number of other proposals (such as Parecon or New Socialism) which explicitly identify effort and sacrifice as the bases for reward. Michael Albert,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4), p. 157; W.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1993), p. 27;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6), pp. 8–10.

118.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 149.

119. Mckay and Vanevery, ‘Gender, Family, and Income Maintenance’, p. 280.

120. Hum and Simpson, ‘A Guaranteed Annual Income?’, p. 81.

121. This is one reason why the UBI is a better demand than that of wages for housework.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 144.

122. Raventós, *Basic Income*, Chapter 8; Chancer, ‘Benefitting from Pragmatic Vision, Part I’, pp. 120–2;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Needs a Basic Income’ *Financial Times*, 21 November 2013; Gorz, *Paths to Paradise*, p. 45.

123. For an eloquent polemic against the work ethic, see Federico Campagna, *The Last Night: Anti-Work, Atheism, Adventure* (Winchester: Zero, 2013).

124. Steensland,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p. 13–18.

125. Ibid., p. 17.

126. Pierre Dardot and Christian Laval, *The New Way of the World: On Neoliberal Society*, transl. Gregory Elliot (London: Verso, 2014), p. 260.

127. Campagna, *Last Night*, p. 16.

128.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 44.

129. Ibid., p. 46.

130. Ibid., pp. 70–1.

131. Youngjoo Cha and Kim A. Weeden, ‘Overwork and the Slow Convergence in the Gender Gap in Wag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3 (2014).

132. Keir Milburn, ‘On Social Strikes and Directional Demands’, *Plan C*, 7 May 2015, at weareplanc.org.

133. *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 Employee Engagement Insights for Business Leaders Worldwide*, Gallup, 2013, pdf available at ihrim.org, p. 12.

134. As usual, the satirical newspaper *The Onion* is ahead of the curve, with a recent headline declaring: ‘Chinese Factory Workers Fear They May Never Be Replaced with Machines’.

135. Gáspár Miklós Tamás,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Class’, *Grundrisse* 22 (2007), at grundrisse.net.

136. While it adhered to unscalable folk-political practices, the ‘back to the land’ movement of the 1970s was in many ways an expression of the desire to escape the dominant work ethic. Bernard Marszalek, ‘Lafargue for Today’, in *The Right to Be Lazy*, p. 13.

137. Gorz, *Paths to Paradise*, p. 10.

138. Steensland,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220.

7. 一个新的常识

1. Lesley Wood, *Crisis and Control: The Militarization of Protest Policing* (London: Pluto, 2014).

2. For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debates around capitalism’s origins, see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A Longer View* (London: Verso, 2002), Chapters 1–3.

3. For a foundational step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conditions of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and the hegemony of ‘development’, see Kalyan Sanyal,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New Delhi: Routledge India, 2013).

4. The unique conditions of Venezuela appear to have produced the only space in which this strategy is being meaningfully adopted, albeit in an intriguingly modified form. See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Dual Power in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59: 4 (2007); Vladimir Lenin, ‘The Dual Power’, *Pravda*, 9 April 1917, at marxists.org.

5. For a critique of communisation’s tendency to make this supposition, see Alberto Toscano, ‘Now and Never’, in Benjamin Noys, ed., *Commu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ontestation, Critique, and Contemporary Struggles* (Brooklyn: Minor Compositions, 2012).

6. While agreeing with their counter-hegemonic approach and insistence on a postcapitalist vision, we diverge from J. K. Gibson-Graham’s goal of folk-political community economies and their discursive understanding of hegemony. The major difference in analysis is in their denial of capitalist universalism, which enables them to see small-scale particularities as sufficient for changing economies. For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universalism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a postcapitalist hegemony, see, respectively, J. K. Gibson-Graham,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明尼苏达出版社，2006);J. K.吉布森-格雷厄姆，《*后资本主义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6)。

7. 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演变的完整故事，始于1884年普列汉诺夫(G. V. Plekhanov)的著作中把它作为*gegemoniya*，到列宁时代，它已经演变成一个阶级联盟内政治领导的概念。葛兰西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更为分支和复杂的共识统治理解，以分析马克思主义战略和资本主义权力的现状。g·f·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哲学选集*》第一卷(莫斯科《进步》1974年版);列宁:*已死什么*?(莫斯科:进展，1971年);安东尼奥·葛兰西，《*监狱笔记选集*》，昆廷·霍尔和杰弗里·诺埃尔-史密斯主编(伦敦:劳伦斯和维思哈特出版社，1971年)。

8. 有许多对霸权的批评，包括理查德·戴，*葛兰西已死:最新社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潮流*(伦敦:冥王星，2005);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霸权之后的权力:变异中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与社会*》24:3 (2007);《*当代世界的权力、抵抗和冲突:社会运动、网络和等级制度*》(伦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乔恩·比斯利-穆雷，《*后神权:政治理论与拉丁美洲*》(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0)。足以说明的是，这些批评大多建立在对霸权的错误建构之上，要么等同于统治(在其所有后葛兰西的表述中，霸权显然不是)，要么依赖于积极的同意(霸权并非如此)。虽然其他关于权力的理论理解——比如福柯、德勒兹、瓜塔里和布迪厄等思想家提出的理论理解——可能被有效地应用于霸权观念所提供的观点的补充，但我们不同意最近那些认为它们可以有效地取代霸权的人的观点。

9.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霸权治理通常是在(至少是被动的)同意的范围内，但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统治或强制力量。它仅仅表明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强制力必须披着令人尊敬的共识外衣。参见葛兰西，《*监狱笔记选集*》，第80页。这种澄清是必要的，以避免批评者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那种指责，这些批评者想要证明这一思想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特别是考虑到它与非常不同的政治形势(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明显不相容，或奴隶制时期的美国。参见Ranajit Guha，《*没有霸权的统治:殖民印度的历史与权力*》(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弗兰克·怀尔德森:《葛兰西的黑色马克思:公民社会中的奴隶向何处去?》《*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ies) 9: 2(2003)。我们将假定，在本章中概述的广义意义上的霸权将适用于任何统治*不是*主要治理模式的复杂社会。

10. “我们可以”党领导人Pablo Iglesias也提出了这一观点。Pablo Iglesias，“左派能赢”，*雅各宾*，2014年12月9日，jacobinmag.com。

11. 约翰·霍洛威,《*不夺取权力而改变世界:今天革命的意义*》(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10)。

12. 虽然葛兰西主义经常与欧洲共产主义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将把霸权理论的基本政治分析和战略洞见与这一特定的历史表现区分开来。的确，在我们看来，公开关注选举主义而不是实现更广泛的霸权转型，似乎是对霸权本身的基本见解的放弃——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权力的理解，认为权力存在于多个互锁的位点中，而国家只是其中之一。

13. 虽然我们赞同埃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著作中所包含的霸权概念的扩展，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政治主体性范围的扩展，但这并非没有问题。话语理论作为社会本体论的使用导致了一种有效的反现实主义解释，这对理解政治世界的复杂性这一更广泛的项目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参见埃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伦敦/纽约:Verso, 1985);埃内斯托·拉克劳:《*对我们时代革命的新思考*》(伦敦/纽约:Verso出版社，1990)。关于拉克劳和墨菲基于话语的霸权理论的长篇批判，请见杰夫·鲍彻，《*意识形态的魔圈:拉克劳和*墨菲、*巴特勒和*☒i☒*ek批判*》(墨尔本:出版社，2009年)。

14.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第40页。

15. 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约瑟夫奥弗顿提出的，与智库的适当操作目的有关。参见Nathan J. Russell，“奥弗顿政治可能性之窗简介”，Mackinac公共政策中心，2006年1月4日，mackinac.org。

16. 这可以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创造。参见马克·费希尔《*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别无选择*吗?》(温彻斯特:Zero, 2009)。

17. “在这种情况下，霸权与让别人相信你的能力无关;这与使他们的信仰或不信仰变得无关紧要的战略能力有关。杰里米·吉尔伯特，《现在的霸权》，2013年，在academia.edu，第16页。

18.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第159页。

19. Judy Wajcman,《*技术女权主义*》(剑桥:Polity, 2004)，第35页。

20. 乔纳森·约瑟夫:《*霸权:现实主义分析*》(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

21. 托马斯休斯，“技术动力”，见梅里特·罗伊·史密斯和里奥·马克思主编，《*技术驱动历史吗?*》《*技术决定论的困境*》(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4);《*电力网络:西方社会电气化，1880*-1930》(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

22. 这就是彼得·托马斯所说的:“葛兰西……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实践都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实践是社会整体中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某些地区的表达。

logics. That led him to conceive of what I would describe as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the social".' Peter Thomas, '"The Gramscian Moment": An Interview with Peter Thomas', in Adam Thomas, ed., *Antonio Gramsci: Working-Class Revolutionary: Essays and Interviews* (London: Workers' Liberty, 2012).

23. De Witt Douglas Kilgore, *Astrofuturism: Science, Race, and Visions of Utopia in Spa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p. 21.

24. Asif A. Siddiqi, *The Red Rockets' Glare: Spaceflight and the Russian Imagination, 1857–19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78.

25. Nikolai Federovich Federov,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Task', in *What Was Man Created For?*, transl. Elisabeth Kouitaissof and Marilyn Minto (London: Honeyglen, 1990), p. 98.

26. For one example, see Alexander Bogdanov, *Red Star: The First Bolshevik Utopia*, ed. Loren Graham and Richard Stites, transl. Charles Rougl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 Siddiqi, *Red Rockets' Glare*, pp. 86–7.

28.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6.

29. Francis Spufford, *Red Plenty: Inside the Fifties' Soviet Dream*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Siddiqi, *Red Rockets' Glare*, Chapter 8.

30. While the Soviet Union is now often deemed an economic failure, between 1928 and 1970 its economy did exceptionally well, outpacing every country except Japan. Robert Allen,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7.

31. Steve Fraser, *The Age of Acquiescenc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merican Resistance to Organized Wealth and Power* (New York: Little, Brown US, 2015), Chapter 6.

32.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33. The shift from the secular, postcapitalist techno-optimism of *Star Trek* to the fundamentalist techno-pessimism of *Battlestar Galactica* is one example of this. Barry Buzan, 'America in Spac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tar Trek* and *Battlestar Galactica*',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9: 1 (2010).

34. See, for example,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82–3; Nancy Fraser, *The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Women's Liberation to Identity Politics to Anti-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13); Helen Hester, 'Promethean Labours and Domestic Realism', in Joshua Johnson, ed., *The Scales of Our Eyes: The Scope of Leftist Thought* (London: Mimesis International, 2015); José Esteban Muñoz, *Cruising Utopia: The Then and There of Queer Futu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9–21;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orrow, 1970).

35. Fredric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Verso, 2010), p. 413.

36. 'Marx alone sought to combine the politics of revolt with the "poetry of the future" and applied himself to demonstrate that socialism was more modern than capitalism and more productive. To recover that futurism and that excitement is surely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any left "discursive struggle" today.'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London: Verso, 2011), p. 90.

37. Fredric Jameson, *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London: Verso, 2002), p. 8.

38. We can draw a distinction here between abstract and concrete utopias. Whereas the former project an image of the future unbound from current political conditions, the latter are guided by a rigorous analysis of the given conjuncture and aimed at intervention in the here and now. Alfred Schmidt,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Verso, 2014), p. 128; 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39. George Young, *The Russian Cosmists: The Esoteric Futurism of Nikolai Fedorov and His Follow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0. Richard Stites, 'Fantasy and Revolution: Alexander Bogdanov and the Origins of Bolshevik Science Fiction', in Bogdanov, *Red Star*, p. 15; Siddiqi, *Red Rockets' Glare*, Chapter 4.

41. 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2010), p. 23.

42. Jameson, *Singular Modernity*, p. 26; Vincent Geoghegan, *Utopianism and Marxism* (Oxford: Peter Lang, 2008), p. 16.

43. Zygmunt Bauman, *Socialism: The Active Utopia*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13.

44. Kilgore, *Astrofuturism*, pp. 237–8;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p. 33.

45. Slavoj ☒i☒ek, 'Towards a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Birkbeck, London, 22 May 2014, podcast available at backdoorbroadcasting.net.

46.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 204.

47.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Oxford: Peter Lang, 2011).

48. E. P. Thompson, 'Romanticism, Utopianism and Moralism: The Case of William Morris', *New Left Review* I/99 (September–October 1976), p. 97.

49. The most condensed and interventionist form of this utopian dimension is the manifesto. See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p. 213–18.

51. Patricia Reed, 'Seven Prescriptions for Accelerationism',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p. 528–31.

52. Wendy Brown, 'Resisting Left Melancholy', *Boundary 2* 26: 3 (1999).

53. Paul Mason, *Why It's Kicking Off Everywhere: The New Global Revolutions* (London: Verso, 2012), pp. 66–73.

54. Mark Fisher, 'Going Overground', *K-Punk*, 5 January 2014, at k-punk.org.

55. Bloch, *Principle of Hope*.

56.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1993), p. 37;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p. 190–3; Geoghegan, *Utopianism and Marxism*, p. 20.

57. Curiously, this lack of a profit motive has led some on the left to see space exploration perversely as a 'capitalist utopia'. George Caffentzis and Silvia Federici, 'Mormons in Space', in George Caffentzis, *In Letters of Blood and Fire* (Oakland: PM Press, 2012), p. 65.

58.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2001), pp. 88–9.

59.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10.

60. Mary Morgan and Malcolm Rutherford, 'American Economics: The Character of the Transform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0 (1998).

61. G. C. Harcourt,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62. Paul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9: 2 (1971).

63. Edward Fullbrook, 'Introduction', in Edward Fullbrook, ed., *Pluralist Economics* (London: Zed, 2008), pp. 1–2.

64. More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their website: rethinkeconomics.org.

65. David Colander and Harry Landreth, 'Pluralism, Formalism and American Economics', in Fullbrook, *Pluralist Economics*, pp. 31– 5.

66. The most dominant textbook is by Greg Mankiw, a former Bush lackey and courageous defender of the 1 per cent: N. 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8th edn (New York: Worth, 2012).

67. William Mitchell and L. Randall Wray,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pdf available at mmtonline.net.

68. For two brief but excellent exceptions, see Tiziana Terranova, 'Red Stack Attack!', in Mackay and Avanessian, *#Accelerate*.

69. For some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ee Oskar Lange and Fred M. Taylo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W.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1993); W. Paul Cockshott, Allin Cottrell, Gregory Michaelson, Ian Wright and Victor Yakovenko, *Classical Econophysics* (London: Routledge, 2009); Andy Pollac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Self-Management', *Monthly Review* 49: 4 (1997); Dan Greenwood, 'From Market to Non-Market: An Autonomous Agent Approach to Central Planning', *Knowledge Engineering Review* 22: 4 (2007).

70. There are already a number of economists working on these issues. The problem is hindered by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measures (many of which nonetheless reach similar conclusions about the cyclical and secular trends), and by studies remaining at the level of appearances and not digging deeper into the causal mechanisms behind them. There seems to be a correlation between increasing use of fixed capital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a long-term secular decline in profitability, but any causal connection so far remains at the level of assertion. For more, see Minqi Li, Feng Xiao and Andong Zhu, 'Long Wave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Historical Trends: A Study of the Long-Term Movement of the Profit Rat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13: 1 (2007); Guglielmo Carchedi, *Behind the Crisis: Marx's Dialectic of Value and Knowledge* (Chicago: Haymarket, 2012); Deepankar Basu and Ramaa Vasudevan, 'Technology, Distribution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US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Crisi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7: 1 (2013); Gerard Dumenil and Dominique Levy, 'The Profit Rate: Where and How Much Did It Fall? Did It Recover? (USA 1948–2000)',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 4 (2002).

71. Mary Morgan, *The World in the Model: How Economists Work and Thi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72.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wea.org.uk.

73. Andy Clark,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74. John Zerzan, *Future Primitive and Other Essays* (Brooklyn: Semiotext(e), 1996); Derrick Jensen, *Endgame: The Problem of Civilization, Volume 1*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06).

75. Gavin Mueller, 'The Rise of the Machines', *Jacobin* 10 (2013), at jacobinmag.com.

76.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feminist approaches to technology. For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this research, see Wajcman, *TechnoFeminism*; Wiebe Bijker, Thomas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Wiebe Bijker,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eds,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Thomas Hughes,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77. This is the subject of recent debates over the 'reconfiguration thesis'. Alberto Toscano, 'Logistics and Opposition', *Mute*, 2011, at metamute.org; Jasper Bernes, 'Logistics, Counterlogistics and the Communist Project', in *End Notes 3: Gender, Race, Class and Other Misfortunes* (September 2013); Alberto Toscano, 'Lineaments of the Logistical State', *Viewpoint*, 2015, at viewpointmag.com.

78. 'Machinery does not lose its use value as soon as it ceases to be capital. While machinery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m of the use value of fixed capital, it does not at all follow that therefore subsumption under the social relation of capital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ultimate social relation of produc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achinery.' Karl Marx, *Grundriss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 Martin Nicolau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 699–700.

79. As the examples here will show, repurposing and creation are ultimately highly intertwined, given that every repurposing involves a creative use of old material, and every creation involves a repurposing of existing material to h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is ultimately a matter of emphasis rather than opposition.

80.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81. For a series of useful guidelines for how workers can adopt technology into the workplace, see Chris Harman, *Is a Machine After Your Job? New Technology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 (London, 1979), at marxists.org, Part 8.

82. Mariana Mazzucato,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Anthem, 2013); Michael Hanlon, 'The Golden Quarter', *Aeon Magazine*, 3 December 2014, at aeon.co.

83.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see Mazzucato, *Entrepreneurial State*, Chapter 5.

84. Mariana Mazzucato, *Build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A New Framework for Envisioning and Evaluating a Mission-Oriented Public Sector*, Working Paper No. 824,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2015, pdf available at levyinstitute.org, p. 9; 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85. Mazzucato, *Building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p. 2.

86. For more, see missionorientedfinance.com.

87. Caetano Penna and Mariana Mazzucato, 'Beyond Market Failures: The Role of State Investment Banks in the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ission-Oriented Finance for Innovation, London, 24 July 2014, available on youtube.com.

88. Germany's major transformation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provides perhaps the best current example of this.

89. Nick Dyer-Witheford,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in Jim Davis, Thomas Hirschl and Michael Stack, ed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apital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1997), pp. 206–7; Adrian Smith, *Socially Useful Production*, STEPS Working Paper 58 (Brighton STEPS Centre, 2014), at steps-centre.org, p. 2.

90. This shares some properties with Murray Bookchin's notion of liberatory technologies, though we are obviously less inclined towards his vision of a small-scale communitarian future. Murray Bookchin, 'Towards a Liberatory Technology', 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Edinburgh: AK Press, 2004).

91. Hilary Wainwright and Dave Elliott, *The Lucas Plan: A New Trade Unionism in the Making?*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1), p. 16.

92. Ibid., pp. 10, 89.

93. Ibid., pp. 101–7.

94. Smith, *Socially Useful Production*, p. 5.

95. Ibid., p. 1.

96. Ibid., p. 2.

97. Wainwright and Elliott, *Lucas Plan*, p. 231.

98. Ibid., p. 157.

99. Tiqqun, *The Cybernetic Hypothesis*, n.d., at theanarchistlibrary.org.

100.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London: MIT Press, 2011), p. 26.

101. Ibid., p. 64.

102. Ibid., p. 72.

103. Ibid., p. 146.

104. Ibid., p. 150.

105. Ibid., p. 79.

106.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Toscano, 'Logistics and Opposition'; Mike Davis, 'Who Will Build the Ark?', *New Left Review* II/61 (January–February 2010);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Nick Dyer-Witheford, 'Red Plenty Platforms', *Culture Machine* 14 (2013); Terranova, 'Red Stack Attack!'; Evgeny Morozov, 'Socialise the Data Centres!' *New Left Review* 91 (January–February 2015).

107. For a sophisticated argument to the contrary, see Bernes, 'Logistics, Counterlogistics and the Communist Project'.

108. For a compelling quasi-fictional account of these problems, see Spufford, *Red Plenty*.

109. Caroline Saunders and Andrew Barber, *Food Miles –Comparative Energy/Emissions Performance of New Zealand's Agriculture*

111. There is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this political natur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but we would also add research on skill-biased and class-biased technical change. David Autor, Frank Levy and Richard Murnane,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4 (2003); Amit Basole, 'Class-Biased Technical Change and Socialism: Some Reflections on Benedito Moraes-Neto's "On the Labor Process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Discussing the Socialist Project"', *Rethinking Marxism* 25: 4 (2013).

112. For one of the earliest arguments to this effect, see Raniero Panzieri, 'The Capitalist Use of Machinery: Marx Versus the "Objectivists"', in Slater,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Technology*.

113. David F.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ransl. Ben Fowkes (London: Penguin, 1990), p. 526.

114. Melvin Kranzberg, 'Technology and History: "'Kranzberg's Law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7:3 (1986), p. 545.

115. George Basalla,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

116. On how users shape technology, see Nellie Ooudshorn and Trevor Pinch, eds, *How Users Matter: The Co-Construction of Users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117. Harry Cleaver, 'Technology as Political Weaponry',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81, pdf available at academia.edu.

118. Even if never used, nuclear weapons are still fundamentally premised on this function.

119. For an incisive reflection on cognitive workers and their relation to other figures of the working class, see Matteo Pasquinelli, 'To Anticipate and Accelerate: Italian Operaismo and Reading Marx's Notion of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Rethinking Marxism* 26: 2 (2014).

8. 建筑动力

1. By 'power', we mean the capacity to bring about one's interests.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2nd edn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2. John Holloway, *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Today* (London/Sterling, VA: Pluto, 2002).

3. We focus on these three factors here, but there are undoubtedly numerous others –not least, unpredictable elements like luck and individual vision.

4.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class struggle, this category includes associational power, marketplace bargaining power and workplace bargaining power. Beverly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16.

5. Indeed, the unique feature of class conflict under capitalism was argued to be its tendency to simplify the antagonism.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p. 210.

6. 'The Holding Pattern: The Ongoing Crisis and the Class Struggles of 2011–2013', *Endnotes* 3 (2013), at endnotes.org.uk, pp. 49– 50.

7.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 194.

8. Marx and Engels, 'Communist Manifesto', pp. 217–18.

9. As Beverly Silver reminds us, though, we should not assume that these tactics and leverage points were obvious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had to be invented and built up through practice and experimentation. Silver, *Forces of Labor*, p. 6.

10. 'Editorial', *Endnotes* 3 (2013), p. 7.

11. Göran Therborn, 'New Masses? Social Bases of Resistance', *New Left Review* II/85 (January–February 2014), p. 9.

12.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Kevin Hamlin, Ilya Gridneff and William Davison, 'Ethiopia Becomes China's China in Global Search for Cheap Labor', *Business Week*, 22 July 2014.

13. Silvia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4), pp. 63– 4; Zak Cope, *Divided World, Divided Class: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Montreal: Kersplebedeb, 2012).

14. To give just a sample of how this topic has been broached, we can point to the problem of building the common, the problem of articulating a hegemony, the problem of the party, the problem of composition and the problem of framing. See, respectively,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5);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7); Jodi Dean, *The Communist Horizon* (London: Verso, 2012); 'The Holding Pattern';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 Badiou, for example, offers a critique of the tendency of minimal rights to reduce the human down to its animalistic basis. 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transl. Peter Hallward (London: Verso, 2002), pp. 11–13.

16. Anna Feigenbaum, Fabian Frenzel and Patrick McCurdy, *Protest Camps* (London: Zed, 2013), p. 176.

17. In more classical language, we might say that objectivite unity is faced with subjective plurality.

18. While populist movements are often set in opposition to class movements, it is more accurate to say that populist movements *encompass* class movements. As Laclau argues, what populism denies is not class struggle, but instead the ahistorical necessity of class struggle as the only motor of social change. But within a populist movement, certain struggles can be more relevant than others, and under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of surplus populations, we believe class is again emerging as the dominant –though repressed –locus of struggle of our times. As understood here, populism therefore expresses a connective logic rather than a specific content. The 'people' is therefore not a subject, nor a substantial entity, but an emergent collective formed by a particular logic of connection. Linda Zerilli, 'This Universalism Which Is Not One', *Diacritics* 28: 2 (1998);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 236.

19. For a useful genealogy of the changing valence of 'populism', see Marco D'Eramo, 'Populism and the New Oligarchy', transl. Gregory Elliot, *New Left Review* II/82 (July–August 2013).

20.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p. 117.

21. Yannis Stavrakakis and Giorgos Katsambekis, 'Left-Wing Populism in the European Periphery: The Case of Syriza',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19: 2 (2014); Pablo Iglesias, 'The Left Can Win', *Jacobin*, 9 December 2014, at jacobinmag.com; Dan Hancox, 'Why Ernesto Laclau Is the Intellectual Figurehead for Syriza and Podemos', *Guardian*, 9 February 2015;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We Created Chavez: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 Ernesto Laclau, '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 *Critical Inquiry* 32: 4 (2006), p. 655.

23. Enrique Dussel, *Twenty Theses on Politics*, transl. George Ciccariello-Mah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3.

24. For exampl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stimated that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earning under $500,000 would be in the 99 per cen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many earning a little under that were aligned with the project expressed by Occupy Wall Street. See Phil Izzo, 'What Percent Are You?', *WSJ Blogs –Real Time Economics*, 19 October 2011, at blogs.wsj.com.

25. Referring back to the discussion of universalism in Chapter 4, this is the way in which universalism becomes contaminated with the particular, and vice versa.

26. Therborn, 'New Masses?', pp. 8–9.

27. Bertie Russell, 'Demanding the Future? What a Demand Can Do',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Protest*, 2014, at joaap.org.

28. Ben Trott, 'Walk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urbulence* 1 (2007), at turbulence.org.uk.

29. This also has resonances with what Plan C has called a 'community of reference'. Russell, 'Demanding the Future?'.

30. Tiziana Terranova, 'Red Stack Attack!',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387.

31. William K. Carroll, 'Hegemony, Counter-Hegemony, Anti-Hegemony', *Socialist Studies/Études Socialistes* 2: 2 (2006), pp. 30–2; Richard Day, *Gramsci Is Dead: Anarchist Currents in the Newes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Pluto, 2005).

32. David Harvey,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2013), p. 125.

33. The Free Association, 'Rock 'n' Roll Suicide: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Post-Crisis UK', *Freely Associating*, n.d., at freelyassociating.org.

34. For a discussion of 'vanguard functions', see Rodrigo Nunes, *Organisation of the Organisationless: Collective Action After Networks* (London: Mute, 2014), pp. 34–40.

35. For an argument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ultiple organizational forms, see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Chapter 8.

36. Carroll, 'Hegemony, Counter-Hegemony, Anti-Hegemony', p. 22.

37. Nunes, *Organisation of the Organisationless*, p. 30.

38. This is what is termed a 'network-system' by Rodrigo Nunes. Ibid., p. 20. Nunes's work also highlights an important area for more research –namely, a comparative network topology of movements. In this endeavour, the mathematical tools of graph theory will be indispensable.

39. Brian Steensland, *The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America's Struggle over Guaranteed Income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2.

40. Henry Farrell and Cosma Shalizi, 'Cognitive Democracy', *Crooked Timber*, 23 May 2012, at crookedtimber.org.

41. Zeynep Tufekci, 'After the Protests', *New York Times*, 19 March 2014.

42. Manuel Castells,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Polity, 2012), pp. 34–5.

43. Jane McAlevey, *Raising Expectations (and Raising Hell): My Decade Fighting for the Labor Movement* (London: Verso, 2014), p. 312.

44. Steensland, *Failed Welfare Revolution*, p. 230.

45. Roger Simon,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1), Chapter 12.

46.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p. 5–6.

49. 这就是所谓的“全员组织”。参见同上，第14-16页。

50. Erik Olin Wright,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London: Verso, 2010), p. 223.

51. Alain Badiou, *The Rebirth of History: Times of Riots and Uprisings* (London: Verso, 2012), p. 30.

52. Harvey, *Rebel Cities*, p. 132.

53. McAlevey, *Raising Expectations*, p. 51.

54. Bill Fletcher and Fernando Gapasin, *Solidarity Divided: The Crisis in Organized Labor and a New Path Toward Social Justic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 174.

55.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1), p. 1.

56. Steven Greenhouse, ‘The Nation: The $100,000 Longshoreman; A Union Wins the Global Game’, *New York Times*, 6 October 2002.

57. Nina Power has recently suggested that UBI should be a global demand, rather than a national demand. While i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we believe current political conditions make it inevitable that these demands will have to first pass through individual states. Nina Power, ‘Re-Engineering the Future,’ presented at *Re-Engineering the Future*, Tate Britain, London, UK, 10 April 2015.

58.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common to argue that there is a crisis of the party-form, yet these announcements overlook the ways in which the party-form has been continually reinvented as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In simple terms, we can say there has been a breakdown of the vanguard party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The former is predicated on a small elite group of intellectuals telling the masses what their interests are and inciting them to revolution. Lars T. Lih, *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Chicago: Haymarket, 2008), pp. 13–18. The latter, on the other hand, is predicated on mass support, electoral politics, an independent financial base and a central position in a network of traditional workers’ organisations. Gerassimos 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5 to the Present*, transl.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2), p. 35. Both are unfit for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in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but we believe the Gramscian concept of the party as a modern Prince may hold value and help to clarify the structure of a party like Podemos. A full discussion of the party would go beyond what can be included here, but we follow Peter Thomas in seeing this party as (1) only one section of a broader populist movement; (2) a form of self-governance of the movement; (3) an organisation that institutionalises difference rather than imposing identity; and (4) an organisation that can both synthesise the movement’s demands and act as an experimental apparatus to lead it. Peter Thomas,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and the Question of Organization’, *Theory & Event* 16: 4 (2013), at muse.jhu.edu.

59. Dario Azzellini, ‘The Communal State: Communal Councils, Communes, and Workplace Democracy’, *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n Latin America*, Summer 2013, at nacla.org.

60. Dan Hancox, ‘Podemos: The Radical Party Turning Spanish Politics on Its Head’, *Newsweek*, 22 October 2014.

61. Specifically, in the case of Podemos these include ‘open citizen primaries, the constitu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the circles, the editing and approval of a participative programme, collective funding, transparent accounting, agreement on the revocability of roles, the limitation of mandates and salaries of representatives’. Germán Cano, Jorge Lago, Eduardo Maura, Pablo Bustinduy and Jorge Moruno, ‘Podemos: Overcoming Representation’, *Cunning Hired Knaves*, 31 May 2014, at hiredknaves.wordpress.com.

62. There is, however, much internal debate within Podemos about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movement should move forward. Broadly, we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who appear to want more state-based and centralized power, and those who want more power delegated to decentralized and local social movements. See Luke Stobart, ‘Understanding Podemos (2/3): Radical Populism’, *Left Flank*, 14 November 2014, at left-flank.org.

63. Gary Genosko, *The Party Without Bosses: Lessons on Anti-Capitalism from Félix Guattari and Luís Inácio ‘Lula’ Da Silva* (Winnipeg: Arbeiter Ring, 2003), p. 19.

64. Ciccariello-Maher, *We Created Chavez*, p. 16.

65. Mark Levinson, *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

66. Ibid., p. 27.

67. Silver, *Forces of Labor*, p. 47.

68. Timothy Mitchell,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London: Verso, 2013), p. 19.

69. Ashok Kumar, ‘5 Reasons the Strike in China Is Terrifying! (to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Novara Wire*, April 2014, at wire.novaramedia.com.

70. SomeAngryWorkers, ‘Gr***ford?’.

71. Deborah Cowen, *The Deadly Life of Logistics: Mapping Violence in Global Trad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41–5.

72. This is what is described by Erik Olin Wright as a type of structural power. Erik Olin Wright, ‘Working-Class 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4 (2000), p. 962.

73. Jonathan Cutler and Stanley Aronowitz, ‘Quitting Time’, in Stanley Aronowitz and Jonathan Cutler, eds, *Post-Work: The Wages of Cybern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9–11.

74. Cynthia Cockburn,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Pluto, 1991).

75. McAlevey, *Raising Expectations*, p. 28.

76. Cutler and Aronowitz, ‘Quitting Time’, p. 17.

77. Ibid., pp. 12–13; Noam Chomsky, *Occupy* (London: Penguin, 2012), p. 34.

78. Murray Wardrop, ‘Boris Johnson Pledges to Introduce Driverless Tube Trains Within Two Years’, *Daily Telegraph*, 28 February 2012.

79. Paul Einzi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57), p. 235.

80. David Autor, *Polanyi’s Paradox and the Shape of Employment Growth*, Working Pap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eptember 2014, at nber.org, p. 26.

81. Anh Nguyen, Jason Yosinski and Jeff Clune, ‘Deep Neural Networks Are Easily Fooled: High Confidence Predictions for Unrecognizable Images’, *arXiv*, 2015, at arxiv.org.

82. A classic resource here is Piven and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See also Liz Mason-Deese, ‘The Neighborhood Is the New Factory’, *Viewpoint* 2 (2012), at viewpointmag.com.

83. Day, *Gramsci Is Dead*, p. 42.

84. Jael Vizcarra and Troy Andreas Araiza Kokinis, ‘Freeway Takeovers: The Reemergence of the Collective Through Urban Disruption’, *Tropics of Meta: Historiography for the Masses*, 5 December 2014, at tropicsofmeta.wordpress.com.

85. For instance,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effects of a West Coast port stoppage,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has been used to forecast the effects for individual industries, along with the impacts from items like perishable goods and rerouted goods. The model further disaggregates these effects into impacts on exports, imports and consumer purchasing power, pinpointing the precise targets of any political pressure exerted through a blockade. ‘The National Impact of a West Coast Port Stoppag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and the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June 2014, pdf available at nam.org, p. 9.

86. See, for exampl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of organising around logistics networks. Jane Slaughter, ‘Supply Chain Workers Test Strength of Links’, *Labor Notes*, April 2012.

87. McAlevey, *Raising Expectations*, p. 37.

结论

1. This is a point implied by Marx when he writes that ‘the realm of freedom actually *begins* only where labour which is determined by necessity and mundane considerations ceases’.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I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Emphasis added.

2. The tenacity of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society is amply demonstrated in 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Zed, 1999).

3.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16.

4. Robert J. Van Der Veen and Philippe Van Parij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ety* 15: 5 (1986), p. 637.

5. Gregory N. Mandel and James Thuo Gathii, ‘Cost-Benefit Analysis Versu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Beyond Cass Sunstein’s Laws of Fea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5 (2006).

6. For an essential meditation on this, see Benedict Singleton, ‘Maximum Jailbreak’,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7. Paul Mason, ‘What Would Keynes Do?’, *New Statesman*, 12 June 2014.

8. Singleton, ‘Maximum Jailbreak’; Nikolai Federovich Federov,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Task’, in *What Was Man Created For?*, transl. Elisabeth Kouitaissof and Marilyn Minto (London: Honeyglen, 1990).

9. For an accessible articulation of this position, see W. Brian Arthur,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 (London: Penguin, 2009).

10. Tony Smith, ‘Red Innovation’, *Jacobin* 17 (2015), p. 75.

11. Mariana Mazzucato, Erik Brynjolfsson and Michael Osborne, ‘Robot Panel’, presented at the FT Camp Alphaville, London, 15 July 2014, available at youtube.com.

12. Michael Hanlon, ‘The Golden Quarter’, *Aeon Magazine*, 3 December 2014, at aeon.co; Tyler Cowen, *The Great Stagnation: How America 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Modern History, Got Sick, and Will (Eventually) Feel Better* (New York: Dutton, 2011), p. 13.

13. This is one of the primary conclusions of Mariana Mazzucato’s important book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London: Anthem, 2013).

14. For a lengthy analysis of how Apple cynically deployed state-developed technologies to build the iPhone, see ibid., Chapter 5.

15. The fact that so many megaprojects continue to go ahead despite their history of cost overruns and lack of profitability is deemed a paradox by one study: Bent Flyvbjerg, Nils Bruzelius and Werner Rothengatter, *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5.

16. André Gorz,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transl. Malcolm Imrie (Boston, MA: South End, 1985), p. 61.

17. As Marx and Engels write, ‘thi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absolutely necessary practical premise because without

it privation, *want* is merely made general, and with *want* the struggle for necessities would begin again, and all the old filthy business would necessarily be restored'.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London: Prometheus, 1976), p. 54.

18. This appeal to a humanity outside of capitalism is one of the more problematic aspects of Jacques Camatte's work, for instance. See Jacques Camatte, *This World We Must Leave* (Brooklyn: (Semiotexte), 1996).

19.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 169.

20.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8), pp. 394–5.

21. Translation slightly modified –from 'human energy' to 'human powers'. Marx, *Capital, Volume III*, p. 820.

22. Federico Campagna, *The Last Night: Anti-Work, Atheism, Adventure* (Winchester: Zero, 2013), p. 68.

23. For some investigations into what these could look like, however, see Alexandra Kollontai, *Selected Writings*, transl. Alix Holt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7).

24. Stephen Eric Bronner, *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 Toward a Politics of Radical Engag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

25. Weeks, *Problem with Work*, p. 103.

26. Benjamin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27. Tiziana Terranova, 'Red Stack Attack!',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p. 391–3.

28. Accounts of daily life under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make for sobering reading. See Michael Albert, *Parecon: Life After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04), Part 3.

29. Nick Dyer-Witheford, 'Red Plenty Platforms', *Culture Machine* 14 (2013), p. 13.

30. Measured in terms of floating operations per seco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1969 and what is expected by 2019 is 10-7 versus 10-18. Ibid., p. 8.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索引

1968, 16 - 7,63, 188n33 15M, 11,22

抽象，10,15,36,44,81
增材制造，110,143,150,182
影响，7 - 8,113 - 4,140 - 1
非洲未来主义，139,141
AI(人工智能)，110,143
异化，14-5,82
算法交易，111
阿连德，萨尔瓦多，148,149
《替代主义》，194n95
路易斯·阿尔都塞，81,141-2
反全球化，3,159,162
反战，3、5、22、162
苹果，146分，
阿拉伯之春，131,159
阿根廷，37比9,173
真实性，10-1、15、27、82、180
自动化，1-2、86、88-9、94-5、97-8、104-5、109-17、122、127、130、143、150-1、167、171-4、181-2、203n15、212n121、214n161、215n9、218n45

银行业，43 - 6,61,147贝弗里奇报告，118大数据，110,111
布尔什维克革命，131布尔什维克，137

俄国革命，139巴西，75、119、147、157、169布雷顿森林，61-2
迈克尔·布朗，173

护理劳动，113-4
芝加哥学派，51,59-60
智利，52、62、148、149、150
中国，87、89、97、170
类，14、16 - 7,20 - 1,25、53、64 - 5,87、91、96-102、116、120、122-3、126-7、132-3、155-62、170、173-4、189n1、206n44、233n119、233n4、233n5、234n18
Cleaver, Eldridge, 91-2
气候变化，13-4,116
殖民主义，73,75 - 6,96 - 7,225n3
常识，9-11、21-2、40、54-5、58-60、63-7、72、131-7
公社化，92,225n5
竞争科目，63-5,99,124
复杂系统，13-4;
阴谋论，14-5

宇宙论，139克里奇利，西蒙，
72加密货币，143,182赛博辛，
149-150

债务，9、22、35-6、94
诉求，6-7、30、33、107 - 8、130、159-62、167无诉求，
7、34-5、107、186n3非改良诉求，108过渡诉求，215n5
民主诉求，31-3、182

直接民主，27-9、31-3、164、190n8直接行动，6、
11、27-9、35-6

教育，64、99、104、141-5、165-6
埃及，32-4,190n21

能源，2、16、19、41、42-43、116、147、148、150-51、164、171、178、179、182、183恩格
斯、弗里德里希，79

埃哈德，路德维希，57岁

伦理学，42岁

职业道德，124-6

驱逐，8、12、36

女权主义，18 - 21,122,138,161费雪，
安东尼，58 - 9,196n34食物里程，42-3

水力压裂法，8

法国，17、62、149、167

自由时间，80,115 - 6,120 - 1,167,219n50自由，
63 - 5,120 - 1,126 - 7,180 - 1负自由，79

合成自由，78-83弗里德曼，弥尔
顿，56,59-61

充分就业，98-100

未来，1,71 - 5,175 - 8,181 - 3

G20, 6, 94
性别，21、41、90、122德
国，45、56-7

犹太区，95-6

安东尼奥·葛兰西，132,165，大
卫·格雷伯，33

《宏大叙事》，73-4

《大萧条》，46、65、99-101、114-5

大卫·哈维，135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54-6页

珍妮·霍尔泽，175,178

Horizontalism, 18, 26-39

住房，8、28、35、48、77、80、95、96、148、159、167、168，
人文主义，81 - 3,180 - 1

Hyperstition, 74-5, 138-9

冰岛，34,164
闲散，85-6

即时性，10比1

移民，101 - 2,161

印度，87、97-8、130

不平等，22、80、93-4

非正规经济，95-8,203n10, 206n44, 210n95经济事务研究所，
58-9伊朗革命，131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14、92、198n10日
本，147
吉米·里德基金会，117失业复苏，
94-5乔布斯、史蒂夫，179约翰逊、
鲍里斯，172

卡莱茨基，米克沃夫，
120克鲁格曼，保罗，118

劳工，2、3、9、17、20、21、33、38、48、52、58、61-3、74、79、81、83、85-143、148、150、151、156-8、161、163-181、182拉克劳，
埃内斯托，155、159
拉弗格，保罗，115;

语言，81,132,160,164-5

休闲，85-6

列宁主义，17、131、188n33

《Live Aid》，8

地方主义，40比6

本土主义，41-2

卢卡斯航空航天，147

罗莎，卢森堡，15

弗朗索瓦·利奥塔，73岁，74岁

曼哈顿政策研究所，58,59行军，6,30,49

Marikana大屠杀，170

马里纳莱达，48岁

马克思，卡尔，73、79、85、86、92、115、119、121、122、132、142、156、158、180马
蒂克，保罗，92、118
媒体，2、7-8、31、36、52、58、60、63、67、88、118、125-6、129、133-5、163-5、176、182米罗斯基，
菲利普，66

现代性，23、63、69-85、86、131、176、181

现代化，23、60、63、137、174

圣山会，54、86、134、164、166

国会议员，55、56、58、66、67、134

Move Your Money, 44

查尔斯·默里，59岁

伊隆·马斯克，179岁

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172人
消极团结，20,37

新自由主义，3、12、20-3、47、49、51-67、70、72、108、116、117、119、121、124、134、141、142、148、156、176、179、183

新自由主义，7、9、14-16、20、21、37、47、49、73、93、99、118、126、127、129、131-2、134、135、162、169、174、176、181新经济基金会，117、144
新左派，18-22

新西兰，151

职业，5、7、10、11、29-31、34、49、94、172
占领华尔街，3、6、7、11、18、22、26、29-38、126、133、158、159、160、162、189n1自由主义者，54、57
有机知识分子，165-6

奥弗顿之窗，134,139

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 169
政党，政治，2、10、16、17、18、20、21、30、34、39、46、59、105、116、118、124、129、162、164、168、169
个人储蓄，94分

托马斯·皮凯蒂，140页
C计划，117

规划，1、15、56、141、142、149、151、182
Plant, Sadie, 82

Podemos, 159、160、169
警察，6、30、33、36、37、102、133、161、168、171、173

后资本主义，17、38、130、143、145、150、151、158、168、178、180
后资本主义，12、15、16、32、34、83、109、115、126、136、143、145、150、152、153、157、179、180

后崩溃经济社会，143
工作后，23、69、83、85、86、105、107-127、129、130、138、140、141、153、155、156、158、161、163、164、167、174、175、176、177、178宝臣集团，170

动力，1、2、7、9、10、14、15、18-21、26、28-30、33、36、43、46、48、49、59、61、62、65、73、78、79、80、81、87、88、93、100、108、111、116、120、123、127、130-5、146、148、151、153、155-74、175、176、179、180、182

不稳定性，9、86、88、93、94、95、98、104、121、123、126、130、156、157、166、167、173、174

不稳定，2、64、117、129、167
不稳定工人大队，117
过早去工业化，97,98

原始积累，87、89、90、96、97
监狱，90、102、103、119、133

监禁，102、103、104、105、161
生产力，74、88、97、110-17、125、150、167

进步，21、23、46、71-5、77、107、114、115、120、126、131、138、179、180
抗议，1、7、18、22、28、31、37、49、66、153、164

精神病理学，64

射频识别，110
赛跑，14、31、90、102、103、140、156、171、172
里根，罗纳德，60岁，62岁，66岁，70岁
共和党(美国)，135岁

阻力，2、5、12、15、30、35、46-8、49、69、72、74、83、114、124、134、158、173、181
《反思经济学》，143

琼·罗宾逊，87岁
机器人化，110,209n69

机械化，95,101
滚动禧年，9

保罗·萨缪尔森，142秒机年
龄，111

长期停滞，143
自动驾驶汽车，110、111、113、173
影子工作，115分
奴隶制，74、90、95、103
慢食，41,42
贫民窟，86、96-8、102、104
社会民主，3 17 46 66 70 167 176
社会民主党，10、13、16、17、19、21、22、47、57、72、80、98、100、108、123、127、168
社交媒体，1、8、182
南非，119、157、170
西班牙，12、22、34、35、45、159、164
滞胀，19、27、61、65、100
斯大林主义，17、18、137
战略，12、20、26、49、56、67、117、127、131-3、136、148、153、156、163、164
战 略 ，8、9、11、12、14、15、17、18、25、28、29、35、49、52、55、66、70、77、108、116、131、135、157、162、163、164、170、171、173、174罢工，9、10、28、36、37、116、120、157、167、170 - 3
自杀，94分
过剩人口，40、86、88-94、96-97、101-3、104、105、120、130、166-7、173、203n10
激进左翼联盟，159,160

战术，6、10、11、15、18、19、26、28、39、40、49、157、164、171-4
解放广场，32、34
泰勒主义，152
技术，1、3、72、81、88、89、98、109、110、111、129、136、137、145 - 8,150 - 3,178、179、182撒切尔，玛格丽特，59、60、62、66、70、72、100
智库，16、55、56、58、59、60、63、67、117、134、135、165
工会，10、27、47、59、61、62、71、105、116、117、124、129、148、162、166工会，16、171
工会，17、18、20、27、30、44

UK Uncut, 126
失业，20、56、60、79、86-98、99、100、101、101、102、115、116、118、121、123、125、127、129、147、159、161、168、170、173、207n44汽车工人联合会，170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英国，8、20、40、42、45、52、54、56、58、61、62、92、93、94、117、118、126、144、147、151、172
美国，8、18、29、36、44、45、59、62、78、92、95、103、114、118、123、133、135、138、167
美国，6、16、30、38、47、56、62、76、95、97、98、100、101、102、103、110、164
全民基本收入，108、118、123、127、140、143
基本收入，80、108、118、119、120、121、122、123、124、127、129、130、140、143、164、165、167
普遍主义，69、70、75-8、83、119、132、175、197n1、199n40
苏联，62、63、79、139
苏联，57、70、74、139
乌托邦，3、28、32、35、48、54、58、60、66、69、70、72、108、113、114、132、136、137、138、139、140、141、143、145、146、150、153、177、179、181，182
先锋函数，163委内瑞拉，169

工资，2、71、87、90、91、93、94、97、98、101、111、120、122、125、156、166、167福利，14、38、57、59、61、62、63、64、71、73、90、100、101、103、105、118、119、122、124王尔德，奥斯卡，182

提现，11,47,48,69,131,182

退出，47、48、181
逃生，3、9、11、38、69、107、114、139、165、178
工作，1、2、16、17、23、32、36、41、44、47、64、71、85、86、90-6、98、100、101、103-5、108、109、110-7、120-7、130、131、132、133、134、136，140、141、142、143、147、150、151、152、157、163、165、166、170、173、174、176、177、178、181
雇佣劳动，74、85、86、87、89、90、92、103、104、105、120、136、141、180
工作，2、38、41、47、48、63、64、79、85、86、88、89、90、93、94、95、96、97、98、99、100、101、103、104、105、110、111、113、114-23、124、125、126，129、147、148、161、166、167、171
工人控制的工厂，38,39
工人福利，59,100,104
世界贸易组织，6
第二次世界大战，46、54、56、57、115、156
萨帕塔斯，11,22,26,35零时工合
同，93 ⌧i⌧ek，斯拉沃伊，140
祖科蒂公园，31,32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

Verso电子书许可

这本电子书在2016年1月4日被随机卖给了random@mailinator.com。

Verso电子书是免费的数字版权管理(DRM-free)，但受本许可证的条款。一旦你下载了这个文件，你就拥有了它，你可以在任何设备上使用它。它有可见和不可见的水印，由Booxtream应用，其中包含你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禁止您将Verso电子书上传到任何网站或文件共享网络，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其可用于分发，共享，复制，下载或转售。每次销售的版税都将支付给作者:如果你正在阅读别人的副本，那么请从Verso图书公司购买你自己的许可证。

This eBook is licensed to some random, random@mailinator.com on 04/01/2016